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马克思的复仇

——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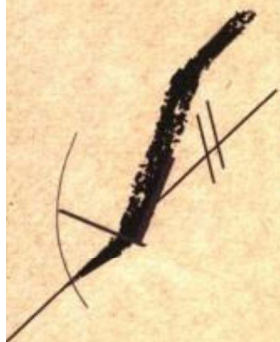
[英]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著

汪澄清 译

郑一明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3-0537 号



ISBN 7-300-06520-1



9 787300 065205 >

ISBN 7-300-06520-1/D · 1239

定价：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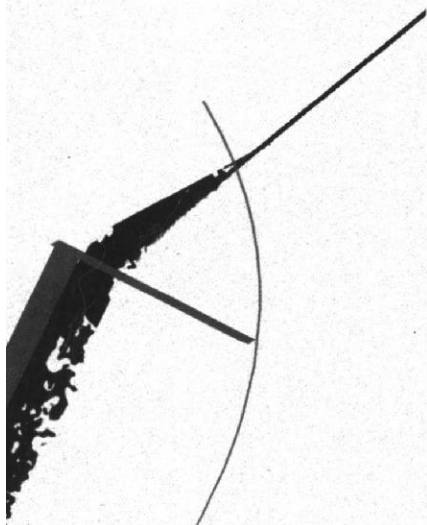
# 马克思的复仇


——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英]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著

汪澄清 译

郑一明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英] 德赛著；汪澄清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7-300-06520-1

- I. 马…  
II. ①德…②汪…  
III. 马克思主义-影响-研究-20世纪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567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马克思的复仇**

——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英]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著

汪澄清 译

郑一明 校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24.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8 000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对马克思在 20 世纪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做了全景式的考察。作者认为，20 世纪存在着两种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是资本主义之外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权（指苏联），二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议会社会主义，但它们在全球化下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在于它们没有实践马克思的思想，只是借用了马克思的名义。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另外，从 20 世纪的历史发展看，虽然利润率下降趋势是一个根本要素，但全球化在抵制着这种下降趋势。市场与政府的较量成为推动全球化运动的根本力量。它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证明。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应该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是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与该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英国上院议员、英国工党党员、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家。他于1940年生于印度的巴罗达 (Baroda)，毕业于孟买大学，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教授，获得博士学位。1991年在英国受封为德赛勋爵。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和全球化等领域。近年来，全球化是他研究的主要问题，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声誉。主要作品有：《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的伦理学与经济学》(1995)，《全球化：既非理想主义亦非乌托邦》(2001)，《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全球治理》(2001)，《货币与全球市民社会：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2001)，《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2003) 等。

策划编辑 李艳辉  
责任编辑 张立波 田淑香

 COVER DESIGN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JIANGHONG STUDIO

版式设计 王坤杰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编委会

顾问 徐崇温 李景源 叶汝贤 陈学明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编 郑一明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治河 刘元琪 李惠斌 杨金海 余文烈

陈振明 陆俊 欧阳英 曹荣湘 鲁克俭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总 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只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



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

① [美] 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教授，目前是伦敦经济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英国上院议员、英国工党党员、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他于1940年7月10日出生于印度的巴罗达 (Baroda)，后来在孟买大学学习，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完成博士论文，1991年4月30日成为勋爵。德赛勋爵自1965年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83年成为经济学教授，1992年创建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经济史、南亚研究和全球化等方面。近年来，全球化是他研究的主要问题，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声誉，相关作品包括《全球治理：世

界秩序的伦理学与经济学》(1995)、《世界政治经济：选集》第一卷(1999)、《全球化：既非理想主义亦非乌托邦》(2001)、《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全球治理》(2001)、《货币与全球市民社会：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2001)、《马克思的复仇》(2002)、《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2003)等。

众所周知，德赛勋爵也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家。诚如作者所言，“我在青少年时代已经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在1968年学生‘动乱’的令人兴奋的岁月中，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我在1970—1971年访问德里期间，曾阅读《列宁选集》，并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摘编。列宁在反对民粹派(19世纪晚期等同于反全球化者)时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深深打动了。后来，我把这项工作放到一边。不过到了1989年，我想根据列宁的经济学著作编辑一本书。于是，我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突然明白了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本质(尽管最终要灭亡)的信仰是多么坚定。”<sup>①</sup>这段话其实是对《马克思的复仇》写作动机的重要交代。继1974年完成《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979年完成《马克思的经济学》之后，德赛于1989年12月完成了《列宁的经济学著作》一书，而这部著作赶在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sup>②</sup>之际出版，其深刻用意在于本书第1章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就是由此发现了马克思被误解的秘密。

不言而喻，《马克思的复仇》是作者把全球化研究与马克思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展示了这样一幅生动图景：19世纪末全球性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过“行将就木”的百年历程，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运动而再度兴起，并显示出强劲生命力。伴随这百年历程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以及这场斗争背后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探索，还有自由主义的衰落与复兴。其中最为重要的现象，是马克思的复仇，也就是说，当今全球化复活了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经济思想：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它自身的灭亡和被共产主义取代，但是，在它自身能量耗尽之前，它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他<sup>③</sup>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但他同样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能改变、创新和适应的。资本主

① 见本书《序言与致谢》。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允许居民自由过境，两天中有75万民主德国人涌进联邦德国。这股洪流把象征德国分裂的柏林墙“推倒”。

③ 指马克思。



产国际的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政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不再安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包括中国、民主德国、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越南等，并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殖民主义运动，使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殖民地纷纷独立，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存在，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严重的竞争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

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的名下进行的，甚至是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整个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把对付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曾对德国共产党进行过疯狂的镇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在国内到处搜捕共产党分子，并把此作为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后来还推出国门，先去朝鲜，然后去越南搜捕共产党分子，把数十万美国士兵送往大洋彼岸。

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光中，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它们担心会即将灭亡；与此同时，蓬勃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假设下展开的。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观念来自马克思，这一公认的事实把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命运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只是到了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才突然醒悟，一位倡导共产主义的巨人在这个世界上无情地消失了。到了21世纪之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灭亡的迹象，这使许多人疑惑的目光开始盯住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

与许多人的预期相反，马克思并没有讲过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他只是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最终将会被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但是究竟什么时候被取代，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观点，也不代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全部论断。因为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时，还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认为资本主义利润率虽然存在着下降的趋势，但也仅仅是一个趋势，并不代表一定下降。即使下降，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利润率回复的可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还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有多远，马克思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不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现出来的热忱，倒是让许



多人感觉到一个新社会即将来临，这似乎是20世纪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基础，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

事实上，尽管马克思绝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但他是它的最好的学生。他毕生6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动力。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看到了难以置信的资本主义的活力和革命潜力。在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他赞扬资本主义的勃勃生机，把资本主义视为当时最富有生命力的、比封建主义更为优越的生产关系，而在这种生产关系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之前，它是不会被其他生产关系所取代的。按照这种逻辑，他期望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发生在英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可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在当时，俄国共产党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俄国共产党的理论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俄国共产党的胜利就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胜利。于是，人们认为俄国真正发生了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这恰恰应验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论断”。

不过，在当时对于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托洛茨基认为苏联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还在建设资本主义，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列宁实际上也强调加速建设苏联资本主义，只不过冠以“国家”的定语。但是，在列宁去世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的加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加上苏联逐渐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苏联化和把马克思神化的风气的影响，人们无暇分辨苏联究竟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比较。这样，就给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即将灭亡的时间表。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巩固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信念，也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自己前途的担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成功地击退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既提升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威望，也提升了人们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信仰，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施加了强大的压力。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滞胀现象，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感觉。于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左右，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和德国，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经济调整，以对付通货膨胀带来

的巨大压力，即使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斗争也在所不惜。资本主义真正建立起能够长命百岁的自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切地说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而在经过整个20世纪之后，人们似乎可以用后见之明这样评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发挥出它全部的潜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还不能立即灭亡。

## 二、诠释了20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沉浮

20世纪的社会主义，也是在极度动荡中度过的。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在世纪之末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惊人局面。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仍可以认为，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世纪，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的实验在整个20世纪一直进行着，而且还因为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打出了一个第三世界，并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社会主义对于20世纪的影响，是以苏联为龙头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之前，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理论上探讨的概念。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发展得很快，但终究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它选择的是议会道路。后来证实，这条道路是不能通向政权的，因为它的政治势力的扩大依赖于经济繁荣，而在经济繁荣时，恰好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正确。不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过魏玛共和国，但它并没有巩固住自己的政权，而且实质上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权。尽管以后也存在着共产主义运动，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对整个世纪都产生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共产党，出现在俄国。它不仅取得了政权、保住了政权，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基础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能够成为反抗法西斯德国的主战场和主力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声望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空间技术方面，而且体现在它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把社会主义阵线推到了德国的本土，推到了柏林，建立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卫星国。中国共产党执政，使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两个，它的反殖民地的口号和行动为它带来了第三世界普遍的信任，当然这些信任主要来自那些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独立出来的殖民地。美国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的不光彩表现，似乎使人们认定，资本主义无法战胜社会主义，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那些一直想破坏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阵营，开始希望通过和平演变来

实现它们的目的，这就是结束冷战、实现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社会主义的声望在1956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不是来自美国或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来自苏联本土，来自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苏联本身。苏联国内许多人不敢相信这样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与那些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所想像的结局大相径庭。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声望再次受到损害，但这次似乎注定是致命的损害。戈尔巴乔夫推行了公开化政策，在他的参与下于1989年推倒了柏林墙，随后他自己也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失去了权力。苏联不是因为政治解体的，首先是因为它在发展经济时出了问题，它没有及时解决产权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东欧剧变实质上也是以市场经济改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而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能把社会主义带向成功。它宣扬的计划经济毕竟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它拒绝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正是由于他和他的时代定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定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首要的区别标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人们才会如此惊呼社会主义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的胜利。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在苏联执政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宣布效忠于马克思、效忠于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著作被广泛印发、宣传，马克思的论断被作为真理广泛应用。仿佛一切都已由马克思注定、由马克思预言。等到苏联解体之后，尤其是东欧剧变之后，人们疑惑的目光才开始盯住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事实上，马克思只是指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得出了资本主义要灭亡的结论。但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不应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应该不应该局限于苏联形式的公有制，都是他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列宁和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列宁认为，在落后的国家，尤其是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走到了它的高级阶段——帝国主义。后来，列宁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这甚至被认为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于是，人们开始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因为列宁论述了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



有可能单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毋庸置疑，俄国进行的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它要解决的是农民问题或者说是土地问题。士兵是这次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包括先进的、集中的工人阶级。但是，夺取政权与维持政权是两回事。夺取政权可以依靠当时的工人阶级，而维持政权就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农民的利益。所以，这里并不涉及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非常幼稚，甚至还没有资格被革命。这一点在苏联新经济政策中表现得比较明确，列宁当时要发展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以便能够赶上资本主义。可以看出，列宁进行的革命，与马克思所言的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两回事。所以列宁置换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么也可以承认：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事件。但这一偶然事件，却改写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

### 三、演奏着20世纪日益高昂的自由主义旋律

20世纪自由主义的旋律，始于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中叶，他就目睹了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盛况，看到了自由市场的繁荣，体会到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从而在那时就已经奏响了自由主义的序曲。商品、原料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之共同运动的还有劳工和资本。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了开辟欧洲本土的殖民地，德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自然立即招致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因为几百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试图在欧洲本土扩张领地。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自由经济的衰退。许多国家重新提高了关税，建立起贸易保护壁垒。

由于国际市场的收缩，许多国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本土，但是这毕竟与先前的世界市场不同，以往在世界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分工秩序被打破，与这种国际分工相连的专业技术和工艺也因为缺乏市场的支持而衰退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了经济的衰退，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卷了进去。到了1929年，美国也由于股市崩溃而进入了衰退的行列。各个国家都在试图寻找办法，首先解决本国面临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创造就业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

然而，这时的经济学界仍然是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家像以往一样，仍然信奉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教义，经济会自动修复自己。但是，经济自动修复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忍耐限度，

有些国家甚至看不到经济自动修复的迹象。人们迫切需要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这时，有一位巨匠拿出了干预的秘方，即凯恩斯提出了赤字政策。他认为，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可以扩大就业，从而增加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能够增加社会产品，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些更多的收入可以补偿早些时候的政府赤字，实现财政预算的跨年度平衡，使经济进行良性循环。虽然这违反了传统的年度内财政预算平衡的原则，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已经别无选择。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理论能够改变经济格局，走出经济谷底。

实践证明，凯恩斯的理论是成功的。它成为英国和美国复苏经济的指导思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它已经成为成功对付经济衰退的主要武器。政府为了消灭经济衰退，大量增加财政赤字，大量钞票源源不断地印发出厂。通货膨胀在所难免。但在当时，通货膨胀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复苏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人们相信，一旦投入的资金能够取得回报，通货膨胀不是问题。既然如此，增加投入、增加钞票也不是问题，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大量增加货币投放，对于通货膨胀视而不见。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突然发现，非但经济没有复苏，反而通货膨胀成为更大的敌人。因为货币贬值使许多中产阶级也进入了贫困的行列，更有甚者，英国的累进税把原先达不到大公司规模的企业也纳入了更高的税收体系中，因为这些小公司和个人商贩的货币收入达到了大公司的纳税范围。此时许多政府明显意识到，比经济衰退更大的敌人是通货膨胀。因为按照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货币发行量过大打乱了经济自身的活动规律，政府当局的首要任务不是扩大财政支出，而是控制货币发行量，以把经济活动纳入正常轨道。当初人们为了增加就业、复苏经济，宁愿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如今人们宁愿付出失业的代价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就导致了撒切尔、科尔和里根政府的经济改革。事实证明，人们宁愿忍受很高的失业率，只要有个较好的长期结果。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又一次进步，因为财政赤字是由政府控制的，它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发行标准，是政府意志的自由，但却是经济本身的不自由。货币发行量同样也是由政府控制的，但这里存在着一个必须参照的发行标准，超过了这个标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样，凯恩斯政策仿佛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驾驶员可以按照自由的意图到达自己想到的地方，而货币主义政策则是行驶在大海中的航船，船长虽然有自己的目的地，但它必须适应大海的风向和浪潮，确保不被大海吞没。在凯恩斯政策那里，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开支创造就业；而在货币主义政策那里，政府只

能通过创造良好条件发展企业，而由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显然，这是对于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回归，因为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样，是主张经济自由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同时强调了政府的合理干预。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有在认识规律、利用规律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 四、打开了 21 世纪方兴未艾的全球主义大门

21 世纪的全球主义源于 19 世纪的全球主义。19 世纪早期的航海探险，引发了后来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和殖民活动，并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全球主义。所不同的是，19 世纪的全球主义，是以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对外扩张为特征的，还保留着许多殖民色彩，武力往往起辅助作用，只是偶尔也起着开道和保护作用。此时的全球主义实质上是一部分国家对于另一部分国家的市场扩张，英国是其中的领导国家。

20 世纪的全球主义是以政治对外扩张为特征的，它甚至还消灭殖民地、帮助建立新的国家。它在经济上表现为更多国家的对外扩张，但实际上 19 世纪形成的资本、劳力的自由流动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实行了这样或那样的资本管制。21 世纪的全球主义，劳工的自由流动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公民权与该国的福利制度联系在一起，这自然是 20 世纪阶级斗争的产物。

与此同时，与 20 世纪不同的，在 21 世纪是经济主宰政治，而在 20 世纪是政治主宰经济。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 WTO 这一经济组织中常常败诉并深感对此无能为力，这是 20 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支配或者无视联合国，但不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 WTO。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它要在 WTO 成员国中发挥作用，也只能按照一国一票的方式行使权力，而不能像在世界银行中所表现的那样，以自己的经济实力谋取单独的实惠，这显然也得感谢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选举权的倡议和肯定。在 WTO 中，一个甚至相当弱小的成员，都可以拥有与经济大国同样的选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近年来几次大的诉讼案中败诉的重要原因。人文主义给原先的以财产为基础的自由政治经济秩序加上了道德约束，使得自由市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得不兼顾公平。

19世纪尤其是后期已经形成的全球主义，往往是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全球化，到了20世纪之初，已经出现以殖民主义为主要表现特征的帝国主义现象，许多国家成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的政治手段剥夺着殖民地的财富。先是印度，后来是墨西哥被纳入到了这样的体系中，本国的发展为其他国家所安排。印度在独立之后把自己的落后归罪于英国的变向的殖民掠夺，这一看法在拉丁美洲得到了相应的验证。

为了抵制这种不平等现象，许多希望发展的后起国家，开始通过关税保护来发展自己。尽管保护的方式存在着出口替代与进口替代之分，但其实质是要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相应的机会和利益。20世纪的大萧条，加深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资本壁垒，当英国要求美联储为其及时提供通货支持时，美国认为事不关己而拒绝了，但其后美国也陷入经济萧条之中，这是美国货币当局所始料不及的。不过，正是这种壁垒，才使得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有用武之地，因为一旦国际之间存在着货币或者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壁垒式的管制，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在发行过多钞票、扩大财政开支时，必然会反映在外汇市场上，汇率的波动会抵消这种努力，它将会通过扰乱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方式实现这种抵消。

但是，野兔不能一直关在门后。一旦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或者国外存在着更为合适的环境时，野兔便会逃出国门。而一旦冷战结束，战争不再是一个威胁商业的最重要的方面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欲望便被调动起来，于是，争相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就成为一种时尚流行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网络技术为跨国公司方便地进行全球规模的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过剩和金融创新，也加速了资本全球化进程，从而吹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主义的春风。许多国家为了加入这一进程，不得不积极解除资本管制，加速削减贸易壁垒，以便在对等的条件下取得平等的贸易权。

于是整个世界仿佛又恢复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全局化景象：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





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依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sup>①</sup>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中国理论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现实，我认为《马克思的复仇》对于了解21世纪全球化大趋势，重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也是我翻译此书的初衷。

不过，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作者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起因所持的绝对的机会主义倾向，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所追求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影响所持的相当漠视的态度，以及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论断都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本书对于市场力量的信念，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信念，对于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信念，还是极其有益于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69~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古人云：“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文如是，译文亦然。“十月怀胎”几多辛苦，孕文经年实属不易。值此作品付梓之际，如释重负之感油然而生。古之作者寄身翰墨，以望声名自传于后；今之译者不敢奢求，但愿劳作有益当今。

自2002年12月拿到此书的英文本到现在手扶中译本定稿，已经整整三个年头。三年来，我花费了许多时间来思考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因为我比别人更加清楚这本书在作者心中的位置。德赛曾真诚地对我说：“这本书几乎花去了我毕生的精力，它是我迄今为止学术思想的结晶，它是我所认为的唯一一本可以代表我本人水平的著作。你可以拿着它走遍全欧洲。”此书也的确是一部重要作品，它在英国一出版，就受到各方的好评，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站在经济学类畅销书的榜首。作者对这本中译本也寄予厚望，唯其如此，也令我深感责任重大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德赛是一位博学而严谨的学者，他的这部作品涉及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字里行间洋溢着浪漫的文学气息，章节句读绽放着清新的思辨之花。他那俯瞰全球的广阔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他那纵意所如的宏伟构思和精湛的写作技巧，使他的作品能够游刃有余地表现他的气度与深刻。他还不时流露出对于隐喻的特别偏好和对于比喻的熟练运用。但是，这也为我理解这部作品、原汁原味地表达作者的意图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此书主要章节的翻译工作，是在2003年夏季完成的。我忘不了每天13个小时伏案翻译的劳作，忘不了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改稿的辛苦，后来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进行反复修改和润色。我的导师王东教授在此期间曾给我提出许多建议，使我受益匪浅。也特别感谢主编郑一明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的无私帮助，感谢他对书稿的认真核对。

对于此书出现的纰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李艳辉、杨宗元和田淑香，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全体同仁，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密切合作，使得此书顺利与大家见面。

汪澄清

2006年1月20日于北京金融街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序言与致谢

本书注定引起人们的某些烦思甚至不安，不过我也希望能够说明，我们是如何走进现在所谓的全球化世界的。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的生命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从事“左翼”活动。我为此参与了许多令人苦恼的辩论，以探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探讨俄国十月革命的背叛，探讨议会社会主义的前景甚或可能性。与此同时，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也都目睹了凯恩斯主义的潮起潮落；目睹了自由主义哲学的骤然升温，尤其是哈耶克著作的流行风靡；目睹了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现象，以及中国与印度的命运变迁。作为一名活跃的英国工党成员，我也像许多其他成员一样，经历了工党连续四次的大选失败。随后在1989年，柏林



墙倒塌了，不久苏联也寿终正寝。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我就开始重新思考曾经认可的诸多东西。在印度，我在青少年时代已经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在 1968 年学生“动乱”的令人兴奋的岁月中，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那时，凯恩斯主义是我在学院经济学中的信条，我还写过一篇批评货币主义的文章。但是，保守党在严重失业的形势下赢得大选，提出了一种现实的挑战。即便有人把 1983 年保守党的胜利归功于马岛战争（尽管我那时就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自我安慰），那么 1987 年工党的失败，则完全是致命的。它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终结。苏联体制的崩溃，只不过证实需要重新检查我的信念。

答案来自一个根本意想不到的机会。我在 1970—1971 年访问德里期间，曾阅读《列宁选集》，并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摘编。列宁在反对民粹派（19 世纪晚期等同于反全球化者）时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把这项工作放到一边。不过到了 1989 年，我想根据列宁的经济学著作编辑一本书。于是，我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突然明白了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本质（尽管最终要灭亡）的信仰是多么坚定。

正是这个古典的前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一般是指 1924 年列宁去世之后的称呼）关于马克思的解读，提供了理解我们当代世界的钥匙。在我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著作中，我把自己严格限制在他对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批判性理解上。我只是不得不回到那里，并把这些工具用来理解 20 世纪 90 年代资本主义的复兴。不过，这一次并不带有对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目的论的期望。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人们都在等待资本主义的崩溃。时至今日，西雅图、布拉格以及国际劳动节等示威活动中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者，依旧希望着、期待着并且预言着全球化的末日。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不会立即灭亡——或者至少不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灭亡，比如说，在下一个一百年灭亡，情况又将如何呢？那时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不论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时下流行的激进政治经济学，都无法回答此类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注重讨论资本主义的前景，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却又是以资本主义即将灭亡这一观念为前提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一个非时间性的概念。只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体制来讨论：它虽然生存着，但却是通过周期和危机、财富的创造和破坏、贫穷与富有的辩证法

以及通过工人、资本家、食利者和地主的人类行动而存在的。马克思不需要沦为以他的名义所写的愚蠢的东西：不是在苏联体制解体之后不需要，而是永远不需要。马克思不需要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占星家来神化和赞颂，说什么他绘出了资本主义的天宫图，预测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确切日期。

因此，本书是理解我们当代世界，即理解全球化世界或者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尝试。它是对过去大约150年间思想和事件的一个说明。虽然它的中心焦点是马克思，但我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因为他是确立了我所谓“社会天文学”的规律的第一人：通过历史而支配社会运动的规律。接着我简要地讨论了黑格尔。对非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带有风险的话题。不过，黑格尔对于矫正斯密的这一观念是根本的，该观念认为，市民社会（市场，如同我们今天称呼的那样）是自动调节和自治的。接下来的两章涉及的是马克思。第4章是一般性的介绍；第5章我企图解释价值理论，解释利润的来源。有些读者可能发现那些图表有点令人讨厌。如果这样，请越过它们，不会遗漏什么东西的。把图表放在那里，只是再次向那些关心此类事情的人保证，马克思的理论核心有着无法反驳的论证。当然，毋庸置疑，有些人还会继续纠缠于这种论证的细节。

接下来的14章，我回顾了资本主义这一范畴的命运，尤其是回顾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曾一度盛行的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观点（见本书第6章）。在多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进步和理性的信仰为依据的。为此我讨论了这次战争的成因，讨论了战争对社会民主党及其分裂的影响。我还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重点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因为它挪用马克思的主要方式为有关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争论设定了前提（见本书第7章、第8章）。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我又回顾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回顾了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对1914年之前的自由秩序崩溃的反应（见本书第9章和第10章）。这可能会使如今拥护市场干预的人们大吃一惊，但是，正是法西斯主义把它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市场失败的观念之上，并在市场经济中提升对于计划的需求。在两次大战期间，许多经济学家都参加了有关自由主义是对抗资本主义干预模式的辩论。因此，观念像事件一样重要。本书第11章专门讨论了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的资本主义理论，并在本书第12章中讨论了社会主义能否建立在理性的经济原理之上的问题。

众所周知，这种原理首先是由冯·米塞斯提出的，并于20世纪30年代为哈耶克所坚持。

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内部自由政治秩序与威权主义体制的战争（见本书第13章）。但是，鉴于计划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广泛接受和应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力在战后时期还是存在下来。与此相反，战前的自由经济学说在1914年之后一蹶不振，甚至在整个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代（1950—1975年），知识界拥护的依旧是混合经济（见本书第14章）。不过，结合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经济专业的学生以及接着作为理论工作者的亲身经历，我回顾了自由主义观念复兴的漫长的妊娠期。当然，也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和新左翼的兴起（见本书第15章）。

正统经济学家错失而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至少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抓住的，正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盈利能力的破坏。人们所谓的滞胀现象是指盈利能力危机。我在本书第16章中回顾了石油价格上涨和货币主义者对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挑战。这里也涉及战后经济学的发展所涵盖的一些背景，但是我避免使用任何技术上的符号或者图表。根本的是要认清，对于凯恩斯思想的挑战根植于战后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中，而非根植于“资本主义的走狗”之类的粗俗攻击中，这是毛泽东喜爱的表达方式。连同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盈利能力危机，我对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进行了讨论。

20世纪80年代是给我们带来重大变化的10年。在发达的资本家国家中，撒切尔、里根和科尔之类的政治家开始执政，他们通过对战后资本主义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以对付盈利能力危机。这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但是正如同列宁所言，你不能不打破鸡蛋就可以做出煎蛋，也不能不流血牺牲就可以进行革命。那是一场赌博，但是成功了：这些政府一次又一次赢得了民主的委任（见本书第17章）。与此同时，苏联体制没有能够控制它的盈利能力（生产效率）危机，于是失败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没能兑现带来巨大物质繁荣的诺言，更谈不上正义或者公平。同时，民主社会主义也遭受了历史性失败，因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前景变暗了（见本书第18章）。

资本主义展示，经过新的技术和制度革命——IT技术、解除对资本运动的管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出现——它仍然拥有巨大的潜力。资本主义并未行将就木，与20世纪60年代罗斯托教授等人预言的趋势也不相符，不管预言者是资本主义的敌人还是朋友。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才重新获得相关性。

他是继亚当·斯密之后惟一一位严肃尝试了解资本主义的动力的人物。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人取得成功，虽然熊彼特更为接近一些。一旦抛掉布尔什维克及其在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远亲们所强加在马克思身上的一些讨厌遗产，马克思作为一位严肃但并非一贯正确的社会天文学的理论家的面貌便浮现出来了（见本书第19章）。

这就是本书要讲的。它是为一般的读者而写的。出于认真或者学术的原因，这里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来源的注释。我希望读者能够像我喜欢写它那样喜欢读它。

※ ※ ※ ※

我必须感谢乔安妮·海（Joanne Hay）对于我和我的笔迹所表现的耐心，因为我是手写而不是直接打字完成这样一本书的。她的技巧帮助我找到了许多我自以为记得的资料。她是一个快活的同事和朋友。我的朋友艾莉森·霍普（Alison Hooper）给了我第5章中被称为“倒置马克思”的思想。她拥有简洁而敏锐的洞察力，对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与她进行的多次交谈，也使我受益匪浅。我也要感谢上议院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他们多次为我找到了各种图书和参考资料。吉莉安·博蒙特（Gillian Beaumont）是一个极好的技术编辑。我感谢她在改进我最初的手稿方面所做的英勇的努力，那个手稿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错误。如果书中仍然存在错误，我认为应该由我自己负责。

罗伯特·斯凯德斯基（Robert Skidelsky）读了整个草稿，而且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我并没有全部接受这些建议，但是他的努力使本书得到了修改。不过，我的这本书将比不上他在1995年出版的《共产主义之后的世界》。毫无疑问，本书尚存的问题和特异之处也完全是由我自己造成的，除我以外没有人能够对这些缺点负责。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研究会或者基金会为这本书出过一个便士。过去一直用于理论研究的丰富资源，如今变得越来越稀缺。而且我不可能抽出太多的时间进行阅读和写作。本书的主要写作是在1999年和2000年两个夏天完成的。

义的局限性必须从资本主义的最大优点所包含的不足中寻找——也就是说，用辩证的方法去寻找。只有当资本主义不能进步时，它才会达到自己的极限”<sup>①</sup>。

可以认为，作者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说明了以自由市场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实为大势所趋。自由市场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主导地位以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不仅不能视为马克思的灭亡，而且恰恰相反，可以理解为马克思的复仇。

事实上，作者在第1章已经对本书的整体框架作了很好的安排：“在马克思（斯密也一样）逝世100多年以后，有必要勾勒他们思想的盛衰历史。国家调控经济的观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对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以及它对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引起我们注意的对资本主义不同理解上的张力；卡尔·博兰尼著作中对市场的批评以及50年中它的逆转；许多独立的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资本主义的局限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尝试——第三条道路；20世纪末的惊人顿悟：一种整体的替代性哲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条道路——已经从可能性的菜单中消失，也从对资本主义复兴的条件下生存前景的出路——任何出路——的独立探索中消失；马克思（实际上也包括19世纪的其他社会学家）仍然与这一问题是有关系的，所有这些构成了本书关注的内容。”<sup>②</sup>

总的来看，作者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变迁，二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沉浮，三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兴衰，四是21世纪全球主义的到来。

### 一、描述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资本主义变迁

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在极度动荡中度过过的。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还经历了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种危机的隐患甚至穿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演变为众所周知的滞胀现象，导致了英国、法国和美国更为激烈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如此，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面临着德国共产党、瑞典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以及共

<sup>①</sup>见本书9页。

<sup>②</sup>见本书10页。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目 录

序言与致谢 .....	( I )
第 1 章 两次革命和一次毁灭 .....	( 1 )
第 2 章 亚当·斯密和社会天文学 原理 .....	( 12 )
第 3 章 黑格尔和理想的国家 .....	( 26 )
第 4 章 马克思 I：准备行动 .....	( 37 )
第 5 章 马克思 II：利润 .....	( 58 )
第 6 章 资本主义的前景 I：何时 结束? .....	( 91 )
第 7 章 战争与革命 .....	( 115 )
第 8 章 战争与帝国主义（理论与 实践） .....	( 142 )



第 9 章	战争之间的岁月：返回常态，1919—1929 .....	(156)
第 10 章	战争之间的岁月：危机和大灾难 .....	(173)
第 11 章	治疗资本主义：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 .....	(188)
第 12 章	社会主义能运行吗？ .....	(203)
第 13 章	全球秩序的基础 .....	(217)
第 14 章	国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	(234)
第 15 章	社会主义的正午 .....	(255)
第 16 章	土崩瓦解 .....	(272)
第 17 章	走出深渊 .....	(292)
第 18 章	梦幻曲 .....	(314)
第 19 章	资本主义的前景 II：最后阶段或游戏？ .....	(327)
参考书目 .....		(343)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1 章 两次革命和一次毁灭

1989 年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一年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尽管是分隔的，但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柏林墙的倒塌，它标志着苏联在东欧霸权的崩溃，不久之后，苏联的一党制国家本身也随之灭亡。二是法国革命 200 周年纪念日。

据说，当周恩来被问及对法国革命的看法时，曾回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实际上，200 周年纪念日作为讨论法国革命对后来 20 世纪的意义提供了把各种看法公之于众的契机。作为一名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想要声明的是，这场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强调了人权。他的一位客人则很不礼貌地声称，1688 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 1689 年通过的《权利法案》，早就更持久地确立了



人权。乔治·布什总统则更有外交风度地表示赞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提出的观点，接着他又指出，1776年的美国革命不仅从法国那里获得了物质援助，而且从法国获得了几乎与英国一样多的思想上的支持。

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永恒主题。弗朗索瓦·孚雷和赛门·夏玛不过是最近出现的历史学家的典型，他们支持各种主要的修正主义的解释。并且不怀疑这场战斗，争论将会继续下去。<sup>[1]</sup>但是长期以来有一种解释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即认为1789年大革命是随后革命的先驱——不成功的1848年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当然还有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非常熟悉1789年的那段历史，并且随意地使用“热月”和“波拿巴主义”这样的词汇。当然，革命是一种恐怖时代。列宁被频频比作罗伯斯比尔。托洛茨基谴责斯大林，认为他代表了法国革命早期的热月阶段所表现的那种反动。但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不是最近200年的话，一般都会认同法国革命是一场民众的、民主的起义，它推翻封建贵族的社会及其政治制度。法国革命的早期理想主义鼓舞了社会主义的先驱；它的发生预示着现代社会的诞生；它后来的颠覆影响了欧洲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其中包括黑格尔和贝多芬。

既有的强大的政权可以突然地、几乎是一夜之间被推翻，并且被它从前统治的力量所代替，这一事实界定了什么是革命。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巴士底日，也就是1789年7月14日，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一切。革命是由中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并非一直都是广大民众的朋友。但是从此以后，革命便意味着突然地、彻底地推翻一个政权，并由被压迫者的统治所代替。

由被压迫者推翻统治者——被界定为压迫者——的观念在整个19世纪都在萦绕着欧洲。在漫长的19世纪（1815—1914）结束之际，这个梦魇终于变成现实。在1917年，俄国见证了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明确宣布继承了1789年法国革命的传统。德国、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起义以及意大利北部的动乱接踵而来。然而，除了十月革命之外，其余的都失败了。正是这次十月革命以及它在东欧的旁支，都在1989年终结了。

连接这两次革命的纽带，是卡尔·马克思。人们认为正是他的著作鼓舞了从1917到1923年所有的欧洲革命。十月革命凭借自己的幸存挪用了马克思的思想，并且以野蛮的、甚至凶残的顽强来捍卫自己对他的遗产的垄断。他们说，马克思是预知他们胜利的先知，是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征服整个世界的保障。这并不只是俄国人的大话。在短短的20世纪（1914—1989），许多

意识形态上的动荡，许多社会科学，以及实际上我们通过政治的多棱镜折射过的关于国家和社会、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的观点，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朋友——甚至他们的敌人阅读马克思的方式而塑造的。因而，难道是马克思及其影响摧毁了柏林墙吗？

当柏林墙倒塌时，有人就宣告了历史的终结。作出上述断言的弗朗西斯·福山，深受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黑格尔被描述为一个有点可怕的、难以理解的作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对黑格尔进行了粗野的攻击，把他谴责为威权主义之父和哲学的贱民。令许多说英语的知识分子和政客感到吃惊的是，福山声称黑格尔是一个先知，他的预言已经被柏林墙的倒塌所证实。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被谴责为威权主义者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在40年后被宣称为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胜利的先知呢？<sup>[2]</sup>

对于哲学家进行重新评价，并非闻所未闻。实际上，修正主义在思想史上如同在事件史上一样，是很常见的。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四五十岁的时候被忽视和嘲弄，却在七八十岁的时候被誉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就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命运来说，他曾被视为从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中挽救了资本主义，但是，就在资本主义胜利复兴的时候，他却被宣布死了。他的思想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曾经占据了统治地位，现在却已经贬值。

那么，马克思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的思想能够重新流行吗？或者他已经平安过世，并随着曾经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社会主义一起被埋葬吗？

我想声明一点，在资本主义胜利复兴——并且，它确实已经扩展到全世界——之际，一个被证明正确的思想家就是卡尔·马克思。不仅如此，1917年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终止，不仅不会使马克思感到痛苦，反而使他感到高兴，如果他有在天之灵的话（尽管他是个无神论者）。实际上，如果要在市场与政府谁将主导经济之间进行选择，当代自由主义者会与当代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等）一样会惊奇地发现，马克思站在市场的一边。

作出这一声明，并非轻率或是开玩笑。这也不是想竭力证明马克思永远正确。所有那些嘲弄甚或是崇拜马克思的人们，究竟读过他多少著作呢？如果他们知道，马克思并不提倡企业国有化或用中央计划代替市场，他们会大吃一惊。马克思并不指望用国家甚至是“社会主义”国家，来改善工人的状况。他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而不是关税壁垒的朋友。他并不赞成一党统治



的垄断，从未说过共产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党——将领导无产阶级。他没有创建一个政党。尽管在与他的社会主义者同仁打交道时，他常常令人难以忍受并且不讲民主，但他一生中甚至没有伤害过一只苍蝇。使用恐怖和小集团政党夺取政权的做法，对他来说是一种诅咒：布朗基主义。

马克思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但他是它最优秀的学生。他毕生 65 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动力，并发现这些力量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被共产主义取代。当然，这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被一个导致社会主义的政府所取代。认为国家可以导致社会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所支持的一切都是相背离的。

早在 1848 年，马克思就看到了资本主义难以置信的活力和革命潜力。在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他赞扬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性质。几乎还不到 30 岁，他就在书中这样论述了资本主义：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3〕

当马克思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探寻资本主义的秘密时，他在思想上通过黑格尔扩展了他从亚当·斯密和启蒙运动中的苏格兰哲学家继承而来的历史理论。斯密把商业和自由这一成就看作人类历史的最高和最终阶段。柏林墙的倒塌使资本主义（商业）和民主（自由）有可能取得普遍的全球性的成就的胜利，这一前景使得福山庆祝历史的终结。人类已经达到了它最终的目标。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之外一定还有某种其他体制——这种体制超越了以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也超越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的议会民主，这种民主在权力分配上表现出固有的不平等。这必将是共产主义。这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当他们承认自己是相互依赖的——没有他人的自由就没有自己的自由时，他们才是自由的。但是，共产主义不可能只存在于某个角落，也不存在一套可供遵循的时刻表。

从整个世界历史在先前阶段走过的道路，可以吸取一些教训。这是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亚当·佛格森、弗朗西斯·哈奇森、约翰·穆勒最初指出的发展程序。他们看到，人类历史是从狩猎采集到畜牧驯养，再到发展农业，最终进入商业社会，虽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在同一时间或以同一形式进入，但这是人类史上统一的线索，就像牛顿在天体和地球的运动中发现了统一的定律一样。马克思超越了他们，发现人类历史经原始共产主义、古典奴隶制度和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有规律的线索，最终是被资产阶级革命打断的。但是，如果你把握了变化的秘密，那么你就会发现，变化并没有就此却步。

什么使这些历史阶段（epochal stages）——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生产方式——持续了几个世纪？为什么它们会衰落？什么使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优于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什么使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并使资本主义继续存在？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持续增长和生存的秘密是什么？当人们明白自己只能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帮助他人——自己的雇主——致富时，是什么使他们仍然接受雇佣劳动？既然商业带来了自由，为什么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却没有从事喜欢的工作的自由？

可以将资本主义的起源确定在14世纪到16世纪之间的任何地方，但只是到18世纪，资本主义才以巨大的生产力迅猛发展起来。它已经有能力利



用全球任何地方的原材料，号召科学帮助技术上的进一步革命。简而言之，它具有克服稀缺的潜力。但是，为什么正如恩格斯 1844 年在曼彻斯特仔细观察过的那样，工业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着不幸呢？<sup>[4]</sup>资本主义能否履行它会带来富裕的承诺，亦或是存在某种内在的、固有的障碍阻止它承兑现诺言吗？

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因做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以及法国的重农学派——已经研究过这一问题，但是很明显，他们都没有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批判的思考是一种哲学方法。它既是一种武器也是一种工具。通过确定它的矛盾——包含在它的最有力的观点中的弱点，它可以帮助你从内部削弱一种已被接受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你只有了解这个世界，才知道如何改变它。

但是，变革并非一项机械的行动，就像打开一扇门那样。任何历史上的变革都涉及大量的群众、事件和制度的变动。从封建主义完全过渡到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大约经历了 2 个到 4 个世纪的时间。即使在当时，马克思也声称自己仅仅研究了西北欧的经验。实际上，东欧在同一时期所能看到的，恰恰是强化了封建制度的约束，尽管在易北河以西这种约束正在变得松弛。俄国是另一块没有图籍可以依凭的疆域。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 10 年开始学习俄语，就是为了能够理解俄国的土地占有制——俄国封建制度的性质。当时资本主义几乎还没有渗入到那里。

不过，在 19 世纪 70 年代，马克思已经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同样也是名声狼藉的）人物。他被德国、法国和英国（尽管被允许在英国定居）的统治者视为危险的颠覆分子，甚至可能是一位弑君者，但他的名字在欧洲许多激进的政党中得到赞美。年轻的特别是欧洲大陆——法国、德国和俄国——的革命者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著作，认真地对待他的理论。他们把他的理论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这导致他作出自己的著名评述：就他所知，他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革命者想得到的是进行变革的公式和处方。他们对于推翻马克思向他们指明的东西——一种趋于危机的压迫体制——缺乏耐心。但是，马克思是不会满足的。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形成一个要求与他的思想结合的政党时，他严厉地批评了它们的纲领。当俄国革命者要求马克思回答，他是否能够预言俄国必须走与西欧最发达国家相同的道路时，他对此表示犹豫，并告诉他们，他只研究过西欧的经验，不能对这一迫切的要求发表任何意见。但他后来一直在研究俄国的形势。



在马克思 1883 年逝世后，不知何故，说马克思预见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言论开始流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现在仍牢牢地把马克思主义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制定了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实际上，认为资本主义为增加生存机会已经发生突变和变化的观点，在伯恩斯坦（右翼）和考茨基（左翼）的追随者之间造成了深刻的裂痕。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有关资本主义濒临灭亡的信仰是如何确立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将在后面予以阐述。但是，即使在那时，如果这种灭亡真的发生的话，也应该发生在像英国这种资本主义已经成熟的国家。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马克思曾经对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变迁作过简短的提示：只有当它的全部潜力都消耗完毕——也就是当它丧失了自己的发展动力时，任何特定的生产方式才会消失。伴随着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是成熟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他们能够采取自发的集体行动。连接二者之间的纽带从来没有得到确切说明，不过在资本主义耗尽自身潜力时，是工人自主的集体行动将它推翻。

每一代人都很容易自以为处在进步的前沿。毕竟，这点已不言自明地隐含在 18 世纪末期对商业和自由的赞美声中。19 世纪末期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是缺乏耐心的。在他们看来，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变革了。然而，1917 年到来的这场变革发出了全部错误的信号。老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俄国革命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既然俄国并没有任何正经的资本主义，那么这场革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变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发生了，这场战争已经使欧洲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痛苦地分裂。其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狂热地支持德国的战争宣言，尤其让它的崇拜者——实际上，也让它自身感到震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土崩瓦解。工人阶级政党支持资本主义的军事冒险家。这是马克思没有料到的。

领导十月革命的俄国人——列宁、托洛茨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具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另一批人（后来更名为共产党）——完全希望在德国、法国，可能的话甚至在英国爆发一连串的革命。当他们排除重重困难而独自幸存下来时，他们的确令人感到吃惊。不像德国社会主义者，他们在俄国战争的努力中反对合作，并且认为他们的思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所以，他们不仅挪用了马克思，而且重新解释和修正了马克思，利用他的声望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很难认为在那段时期资本主义真的处于危机四伏的状态中，但是，另外一场革命浪潮似乎已经临近了。即



便是温和的费边社会主义者锡德尼·韦伯和比阿特里斯·韦伯，也在1922年书写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sup>[5]</sup>在接下来的20年里，随着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大萧条先后光临资本主义家园，资本主义的情况并未得到好转。当时很容易认定，社会主义确实已经在俄国建立，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即使是资本主义最好的朋友也认为，为了生存，资本主义不得不采纳社会主义的某些方法——控制市场、引入计划和实行社会所有制。

有人认为，如果马克思在世的话，他会对其俄国的形势感到震惊，因为俄国宣称自己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这场革命是对他的理论的实证。有这种看法的，是为数极少的人。这些人不断地受到各式各样的布尔什维克派别——如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的不断追逼。这株非布尔什维克的（实际上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脆弱植物在布尔什维克这棵藤蔓上很快就凋零了。即使在1956年和匈牙利革命以后，当苏联共产党正统的垄断地位在西方受到挑战时，新左翼的出现只是激励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持不同政见派别，如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原始”列宁主义的繁荣。十月革命的正当性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问题是，革命是在何时、是怎样以及被谁扭曲和背叛的？

马克思的思想开始被重新审查。漏洞和不足被发现了。他的经济理论在20世纪之初就在鲁道夫·希法亭和列宁的手中相继遭到修改和校正。但是现在，他缺乏国家理论、阶级理论和政治变革的行动理论，都被指了出来。他对生产方式转换的分析被认为过于简单、过于机械。他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和它作为社会主义预兆的潜力之间存在明显脆弱的环节，这一观点由托洛茨基幸运地、英明地发明了。他没有看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垄断资本主义与他赞扬的资本主义的所有优点相矛盾。垄断资本主义是剥削性的，但是如果缺乏活力的话，也就没有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的革命潜力。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殖民地、边缘地区和南方地区而寄生性地生存下来，靠的是使它们处于不发达状态。马克思曾经预示过的那种导致资本主义成熟和灭亡的辩证法，被一种发展的辩证法所替代，这种发展是由停滞状态下的不发展所供养的。实际上，尽管苏联社会主义是不好的和扭曲的，但它在技术上的动力表明，它是进步性的。它有一种不幸的独裁倾向，但是不久，苏联国内自主的工人阶级行动取代了这个政权。托洛茨基如是说。

一切以泪水而告终。经历了短暂的暴风雨般的75年后，苏联的社会主义者开始冒险了，这种加快历史脚步的尝试，这个马克思没有看到的脆弱环

节，终于突然而彻底地终结了。然而，资本主义并不准备认输。1916年列宁曾经宣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的（最新的）但却是最终的阶段。至迟在1972年，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厄内斯特·曼德尔，写了一部著作叫做《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Le Troisième Âge du Capitalisme*）（字面意思是资本主义处于老年阶段，但是英语翻译成《晚期资本主义》）。<sup>[6]</sup>在20世纪70年代，也认为资本主义的腐朽和灭亡即将来临，正如在19世纪80年代一样。即使资本主义的朋友，像华尔特·罗斯托，也预言苏联和美国工业文化存在一种趋同。

但是，笑到最后的是马克思。他没有错，他也不是简单化的和机械论的。除非资本主义耗尽它的潜力，否则它不会让路的。信息技术革命才刚刚开始。我们所不知道的更多的事物——生物技术、新材料和可开发的外部空间都可能会出现。整个世界还没有完全整合成全球资本主义。尽管出现过保罗·巴兰、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悲观主义预言，亚洲现在却成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家园。在英国有韩国人拥有的工厂，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都有日本人拥有的工厂。然而，拉丁美洲在它早期融入资本主义以后已经进入停滞时期，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地区仍有待被全球化。

很多人对全球化的前景感到惊恐。他们不顾一切地希望找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某些局限。也许是环境问题，也许是民族国家的复兴或地区性超级大国的出现，甚或是民族国家之间通过联合国、七国集团或者是77国集团在全球层面上的协调。某种东西在驯服资本主义和阻止它猖獗发展。

也许是，但也许不是。马克思不会从这些外部因素中寻找资本主义的局限。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但他同样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能改变、创新和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必须从资本主义的最大优点所包含的不足中寻找——也就是说，用辩证的方法去寻找。只有当资本主义不能进步时，它才会达到自己的极限。但是，只有那些在日常实践中创造了资本主义机制的人们才能感觉到资本主义的局限，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克服这种局限。

资本主义在21世纪初继续充满活力，是马克思在向所有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复仇，这些人曾经以他的名义进行说谎、欺骗和谋杀，并提供了虚假的希望。那次错误冒险的瓦砾已经扭曲了对于社会变革的很多思考。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以理解资本主义的长处和它充满活力的秘密。但是，也有必要了解，资本主义的极限将会如何达到。经历了20世纪的惨痛经验之

后，询问这些极限何时能够达到，是一种愚蠢的行为。马克思是一位历史的天文学家，而不是一位占星家。

但是，除了马克思，我们还需要涉及其他人。约瑟夫·熊彼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他们是20世纪三位研究资本主义并试图揭示其秘密的经济学家。我们还需要返回马克思的先驱亚当·斯密和黑格尔那里；毕竟，是他们开创了这门社会运动天文学的研究领域。

在本书中，在理解由苏格兰哲学家发启的探索社会运动规律方面，我将从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哲学家的最初历险出发。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出现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纪的结尾。如果我们要明白为什么黑格尔耗用大量时间研究但却用不同的方式解决斯密曾经提出过的同样问题，就必须了解上述事件。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到批判政治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重复了黑格尔曾经走过的路线。如果我们明白，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主题，那么对于马克思所说过的话——甚至，对于他没有说过的话——所具有的复杂性就必须作出评价。这一主题在本书的中间部分将得到讨论。

在马克思（斯密也一样）逝世100多年以后，有必要勾勒他们思想的盛衰历史。国家调控经济的观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对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以及它对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引起我们注意的对资本主义不同理解上的张力；卡尔·博兰尼著作中对市场的批评以及50年中它的逆转；许多独立的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资本主义的局限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尝试——第三条道路；20世纪末的惊人顿悟；一种整体的替代性哲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条道路——已经从可能性的菜单中消失，也从对资本主义复兴的条件下生存前景的出路——任何出路——的独立探索中消失；马克思（实际上也包括19世纪的其他社会学家）仍然与这一问题是有关系的；所有这些构成了本书关注的内容。

#### [注释]

[1] Francois Furet (1988/1992),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70—1814)*; 英文由安东尼·纳维尔 (Antonia Nevill) 译自 *Révolution* (1988), Hachette, Blackwell, Oxford; Simon Schama (1989),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Viking, London.

[2] Francis Fu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Hamish

Hamilton, London; Karl Popper (1945),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2 vol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我在这里指的是 vol. 2, *The High Tide of Prophecy: Hegel, Marx and the Aftermath*.

[3] Harold Laski (ed.) (19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e Centenary Edition*, Allen & Unwin, London, pp. 123-125. 该书是为工党出版的。

[4] Friedrich Engels (1845/1892),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最先以德文版发表于 1845 年, 1885 年由弗洛伦斯·凯里-威施纳维茨基 (Florence Kelly-Wischnewetzky) 译成英文, 1886 年由纽约的约翰·W·洛维尔 (John W. Lovell) 出版公司出版, 1892 年由伦敦的乔治·艾伦和安文 (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公司出版。恩格斯为英文版写了序言。

[5]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1923), *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sation*, Harcourt Brace, New York.

[6] Lenin (1916),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各种译本), 见: *Collected Works*, 45 vol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vol. 22; Ernest Mandel (1972/1975), 《晚期资本主义》的德文译本是由乔伊斯·德·布里斯 (Joëis de Bres) 翻译的: *Der Spätkapitalismus* (1972), Suhrkamp Verlag, Berlin, New Left Books, London.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2 章 亚当·斯密和社会 天文学原理<sup>[1]</sup>

艾萨克·牛顿在他的一生中，一直被人们誉为伟大的天才。他开创了近代物理学的许多领域，也可以说是微积分的共同创造者。他还涉猎炼金术，笃信巫术。在经历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评议员的成功生涯之后，他当上了英国皇家造币厂的厂长。他所确定的 1 盎司金币的价值等于 3.88% 英镑的换算关系，在长达 200 年的时间内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直到 1933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决定美国脱离金本位制。

然而，是有关天体和地球运行规律的发现，才使牛顿成为启蒙时代的英雄。他根据一套小小的原理，解释了大量的自然现象。一旦你了解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的本质，其余的道理就会顺理成章、迎

刃而解。行星的运动和月相都遵守着牛顿发现的简单原理。在许多人看来，牛顿偶然发现了上帝自身的精妙的计划。他理解了宇宙。

但是，如果物理宇宙中存在的简单的潜在统一性可以揭示，为什么人类社会不能揭示出这种统一性呢？如果上帝有一个可以解释宇宙和谐的秘密计划，那么，对于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而言，是否存在一个有着同样范围的计划，而且还基于同样简单的原理呢？整个18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哲学家一直在寻找这只独特的圣杯。十分明显，他们在乞求着牛顿的英名。他们试图要揭示人类社会天文学的奥秘——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

这些哲学家中最著名的一位，也是经常被誉为揭示了隐藏在社会运动背后的简单原理的一位人物，就是亚当·斯密。但是，这些规律并不是他独立发现的。他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还有他的同代人亚当·佛格森，对此也作出了一些贡献。比他大一点的同代人大卫·休谟和法国的官僚/哲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阁，也是有用的理论来源。法国学者孟德斯鸠比起意大利人乔维尼·巴蒂斯塔·维柯来，要更多地出现在他的引文中。但是，要把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设计变为可能，关键在于揭示这一秘密，即把似乎是混乱的事物重新设定为一种有意义的模式，这件事情成了亚当·斯密取得超级成功的冒险。

环顾四周，斯密发现到处充满着混乱。他自己的国家苏格兰在整个18世纪就经历了多次革命。在他出生的几年前，苏格兰与英国之间的《联邦法案》已经签署。像所有类似的联邦事件一样，总是存在着失利者和获利者——他自己的父亲，他从来不了解的父亲，就是获利者中的一员。当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尽管他在此之前待在牛津——邦尼·普林斯·查利在要求继承王位时遭到失败，接着便是开尔敦大屠杀。亚当·斯密不是一名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不是一名英王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这与詹姆士·斯图尔特爵士不同。斯图尔特爵士曾经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之父，但这的确值得怀疑。实际上，那些在爱丁堡为亚当·斯密做过第一次讲座的人们很愿意指出，斯密待在牛津大学期间，学会了他说英语的适当方式。

作为一个苏格兰低地出生的人，斯密不可能没有注意到高地地区与低地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像我们今天所称呼的）的差别。它们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当他进一步往南到达伦敦时，他可以看到英国是何等的繁荣。他放弃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职位，是要接受一项最赚钱的家庭教师的职位，以赚取自己进行贵族式的环欧旅游的费用。在这里他再一次赏识到这一差别，



也欣赏到为法国思想的新酵素。法国是一个实行专制君主政体的国家，而英国在 1688 年已经终止了这种政体。在德国有许多小公国，也有一两个大的王国，看不出与 70 年前的苏格兰有什么不同。法国的君主政体可以走向英国的道路吗？德国的小王国会最终形成一个联盟吗？

比政治上的剧变速度更加激烈的，是商业的变化。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近一千年来一直是无可争议的统治精英，现在正被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推到舞台的后面。这对 17 世纪的哲学家们来说，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种新财富的变幻无常、漂泊不定和银光闪闪的性质，使得哲学家们把它比作女人。这种金钱的魔术诱惑，今天来明天又去，恰似女性欲望的深不可测的奥秘。道德家怒斥它。政客哀悼德行丧失。平民向君主挑战。货币兑换商走进神殿，并接管它。

这种金钱是从哪里来的？在经历君主统治社会秩序的数个稳定世纪之后，甚至在迫使国王交纳赎金之后，这些暴发户变得是何等重要？15 世纪消逝的数十年间，人们已经看到了远途航行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到达西方的哥伦布和到达东方的达·伽马在“发现”新大陆的为数众多的人群中，是两个最响亮的名字。对穆斯林来说，已经在 7 世纪丧失的主宰贸易和战争的动态领导权，如今在 16 世纪又回到了欧洲。

这些探险的最初动力确实是十字军东征以及他们吹嘘要寻找通往亚洲的另一条贸易之路。通过陆路以及通过水路到达这些地点的商业公司被组建起来。由于亚洲的一些商品非常短缺，从而使贸易变得有利可获。在欧洲各处的国王很快认识到，贸易和商业公司的形成是赚钱的活动，可以为他们提供争夺领土战争所需的经费，他们希望通过战争获取“真正的”财富——土地。如果贸易财富可以转换成更大的领土，就更有理由鼓励贸易。

除了贸易之外，伴随航行而来的当然还包括殖民地。伊比利亚人在美洲和非洲西海岸的探险，导致大量的黄金泛溢于欧洲。黄金实际上在罗马帝国结束的时候是已经耗尽的贵金属，欧洲开始为一场金融革命的降临所震撼。100 年的通货膨胀横跨了 16 世纪和 17 世纪。当一些商品的价格比另外一些商品的价格上升得更快的时候，旧的价值被改变了。黄金所拥有的神秘力量遭到怀疑，正像莎士比亚的剧中人物曾再三地证明的。当贸易增长而殖民地变得有利可获时，财富变成了王室政策的一个目标。

同时，旅行也带来了关于其他文明和国家的知识。18 世纪，一个博学的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和印度，知道那里有比欧洲更大的繁荣和都市化。他



们也已经知道太平洋岛屿和美洲的部落民族。后者维持生存的更简单的技巧以及看起来尚未开化的社会习俗，使旅行者感到惊奇。

正如天文学家已经测量到行星和天体的位置和运动但缺乏一种简单的把这些数据统一起来的理论一样，18世纪的哲学家有着可利用的大量有关不同国家、文明和民族的事实。他们也非常了解自己的古典历史，而且观察到当代发生的迅速变化。但是，对于这些令人困惑的杂乱事实，是否存在着一个可以把它们归纳进去的统一的模式呢？

自亚当·斯密29岁登上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的讲坛一直到他67岁逝世，他一直在思考、讲授和写作这个主题。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授课达13年。他的《法学讲座》从在那里的最后两年开始便流传下来。后来他放弃教授职位，成为布克莱公爵的家庭教师。两年的旅行和辅导为他带来了一份退休金，使他能够不再为生计而工作。他已经写了一本关于人类行为激励问题的著作——《道德情操论》，这使他出了名。但是，他在“提前退休”之后的10年内，一直专心于写作一本使他不朽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这是那年的第二起革命事件。

要理解亚当·斯密关于社会结构深层模式的答案，包括现在和过去的社会结构，必须把《国富论》与《法学讲座》拼在一起加以考察。为纪念《国富论》发表200周年，为亚当·斯密的全部著作出版过一套精美的系列，这第一次为我们对他的生活和成就有个全面的印象提供了机会。斯密不仅仅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或政府干预的鞭笞者（无论如何，这两者都是片面的观点），他还是社会领域中的牛顿，是社会的天文学家。他不仅创立了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他还引导了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正是这场启蒙运动创建了所有的社会科学。对于历史的系统研究也应归功于亚当·斯密，尽管这可能引起维柯和孟德斯鸠的拥护者的争议。

斯密从考察不同社会是如何对待正义的开始。正如他的学生约翰·穆勒所观察到的：“在这个主题上，他所遵从的计划，仿佛是孟德斯鸠提议的；努力追踪法学的逐渐进步的踪迹，包括公众和私人两个方面，从最粗糙的时代到最精致的时代，并指出了财产在改进和更迭法律和政府方面产生的相应的影响。”<sup>[2]</sup>穆勒继续补充，斯密没有实现在这一领域得出结论的意图。但是，也正是在格拉斯哥，他讲到“那些已经建立的政治规则，不是以正义原则为基础的，而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这些规则的目标，是增加国家的财富、力量和繁荣”。这正是他在1776年作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来发表的内容。

一条贯穿《法学讲座》（很高兴现在它能为我们所用）和《国富论》的共同主线是：一个社会维系生存和累积财产的方式，会在它的法律和政府方面产生“相应的”（使用约翰·穆勒的说法）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可以在进步的背景下以及在任何瞬间都能看到。当技能对生存进步作出贡献的同时，它们也改善了法律和政府。因此，当我们的社会在物质上变得更进步、更富有时，我们也变得更文明、更正直和更尊重法律。如同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这种进步是渐进的，并非必然不可逆转的。但是，在这里存在着明确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既存在于进步的普遍潮流中，也存在于已揭示出的如下现象中：物质一方与司法/政治一方存在着耦合。

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在详细阐释——或者讨论——这个基本主张的某个方面。亚当·斯密甚至不怎么认同这些主张，尽管马克思认同，有时黑格尔也认同。我们将在下面看到，黑格尔和马克思与斯密相差是多么遥远。但是，斯密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的理论的革命性质仍然有可能被误解。

首先，斯密的理论是一个关于进步——物质技术上的进步和正义方面的进步的理论。它有一种普遍的关注：“从最粗糙的时代到最精致的时代”。这里不存在地理方面的限制。人们已经追踪了正义方面的进步，这个理论继续围绕着“那些对于生存和财富积累作出贡献的技能的影响”——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法律和政府方面的相应的改善或改变”。因此，对于法学发展的研究，不应仅仅是文本上的，或限制在政府体制的变化方面。它还应该包括（如我们所说的，内部含有）对生存和财富积累所取得的进步的系统研究。

历史的进步发生在生存模式的不同阶段。因此，在他的格拉斯哥《法学讲座》中，斯密从讨论财产权开始，尤其讨论了私人财产权是如何进化并且取得法律保护的：

在我们正确思考人们获得财产的这种或者任何其他方法之前，最好是要观察到，涉及它们的规则是随着社会在当时所处的状态或时代而完全不同的。人类经历过四种不同的状态：第一，狩猎时代；第二，游牧时代；第三，农业时代；第四，商业时代。（LJ [A]，14）<sup>[3]</sup>

国家、民族——还有人民，如果你喜欢的话——一般都会经过这些阶



段。这是一些历经千年的、划时代的阶段。它们也具有包容性。所以，在农业时代，一个国家会同时拥有牧羊人和狩猎—采集者。在边界上甚至可能还会有某些贸易，但是，财富主要由土地及其产品构成。在商业时代，新的财富持有形式将会出现。在这些新的形式中，需要复杂的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权。

这不是一种机械的说明。因此，当“人类”经历过这四个时代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立即处于同一发展时代。据斯密计算，欧洲西北部的某些区域已经进入商业时代。这样说，并非因为那里有贸易，或者商人使用了信用手段进行远距离交易。在商业时代，为了防止国王或封建领主的任意掠夺，私有财产权是受到保护的。因此，甚至18世纪中叶的法国也没有达到商业时代，而荷兰和英国却已经达到了。如同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国人拥有上好的技术，而且如同伏尔泰声称的，他们也许还有一个比路易十六还要好的国王。但是，斯密关心的是私有财产的安全，它只有通过任意规则的减弱和自由的增长才能够获得。所以，在这方面，中国落后于英国，甚至落后于法国。

在生存模式与法律和政治的制度安排的进步之间，存在着互相作用。生存模式愈高级，法律结构就愈复杂。在何种意义上谓之高级呢？标准可以用农民、劳工和商人的劳动创造的可支付的剩余，即富有来衡量。获得的自由度较高，被界定为在一个法律框架内能够得到保护，免受任意规则的侵犯。

进步不同于变化。进步暗示着事物正在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但它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能逆转的。没有直线上升的进步阶梯。可能会有倒退。在欧洲历史上，罗马帝国的衰落与文艺复兴（两者都大约持续了一二百年）之间的时期——黑暗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当然，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这一时期并不是一个黑暗时代。伊斯兰教是这个时期的活跃力量，它从大西洋传播到乌拉尔流域，接着传向印度、马来西亚群岛和印度尼西亚。而此时中国正处于一个技术和科学健康增长的时期。印度商人在西部同非洲和欧洲进行贸易，中国在东部同非洲和欧洲进行贸易。欧洲却正陷入一个从罗马时代所达到的顶峰不断衰退的时期。

对于欧洲来说，在其黑暗时代，在道路建设、输水管道以及室内加热等技术知识方面存在着衰退，而且在财产保护和任性规则的使用上也在衰落。但是，变化的来临可以有多种方式。因此，斯密追踪了在牧师与国王

力量的结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农奴制的衰落、分益佃农以及其后承租农民的出现。牧师感兴趣的是传播他们的影响，在农奴中建立一个拥护他们利益的稳固团体。国王感兴趣的是控制地主的力量。这种利益的一致迫使地主必须承认自己的农奴的自由，而一旦他们作出让步，转到收取固定货币租金就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

在讲述农奴制（虽然斯密称其为奴隶制）转变为自由的租地人时，斯密澄清了，这只适合于特殊的“欧洲的角落”，在那里出现了一对孪生的情形：“牧师与国王的力量必须同时十分强大，可以给予奴隶自由。但是它绝对需要国王和牧师的权威也是强大的。”在斯密看来，波兰、德国、波希米亚、奥地利或者俄国，都不真正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如果这个故事对西欧是特定的，那么，斯密的阐述——可以说是他的理论——就具有普遍性，是建立在教会和国王根据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的基础上的。因此，斯密在谈及牧师时说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所看到和想到的是，这样做可以导致教会权力的剧增，他们所给予极大影响的那些人可以获得自由，并以缴纳租金的方式不再依赖于他们的主人。因此，他们极大地推进了农奴的解放，并且在确立农奴的权力时同样鼓励人们对农奴具有的权威”（LJ [A]，188）。

在全部的论述中，有两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正是有关理论的或推测的历史的事例，被斯密视为他的科学方法。牛顿的方法是经验性的，它要求观测或实验。大卫·休谟，这位斯密同时代的年长者，怀疑一切阐述都不是以直接感觉为基础。斯密的方法是牛顿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他在寻求一种唯一的解释方面，追随的是牛顿。总的来说，斯密所强调的是自身利益——但不是他的朋友和敌人所误解的自私，也不是个人的贪欲。在牧师推进农奴的自由方面，牧师的动机是以斯密的推测为基础的：如果他们要推进农奴的自由，这样做肯定符合教会的利益。这不是最近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可检验的”假设。但它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上是一个有力的方法，因为在那里直接的观察或实验是不可能的。单个的人和集体的人，像各种制度一样，只按照自己感觉到的自身利益去做事。教会对扩大影响感兴趣，但是不能把这看作是寻求货币财富或是提高牧师的消费水平。

从狩猎时代到商业时代的进步，是物质层面（剩余规模）的进步，是法律结构和相应的政府性质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进步。但是斯密一直与之斗争的难题是他的同时代的世界。商业时代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彻底推翻了旧的制度安排。在较早的时代，土地是财富的惟一来源，地主是统治的精英，

而德行是参与公众生活的稳固的基石。公民佩戴武器被作为这种优雅传统的一部分。职业常备军曾经受到那种奥古斯丁理想的诅咒，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却受到了崇拜。（在美国宪法中对此还存在清晰的回声：佩戴武器权。）按照这种观点，商业正在腐化人民，因为金钱变成了一切关系的溶解剂，而在此之前，这些关系是以荣誉、身份和责任为基础的。各处的精英都想停止这生活的商业化。商业是柔性的，它鼓励奢侈和匿名交易。

斯密拥护商业。他想要表明，商业时代要比封建时代前进了一步。财产已经表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而且同时，法律的发展使财产变得更有保障。财产规模的扩大、形式的多样化和安全性，构成了自由的最好保证。通过追踪狩猎时代以来的进步，斯密把农业社会，连同它的奥古斯丁的理想主义一道，纳入一种历史的视野之中。它是一个阶段，但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终结状态。封建制度也远远不是一种高贵状态，它容忍了——事实上，激励了——国王和地主的武断权力，这对于财产权利进行了不合理的限制。财产权是如何随着生存模式而变化的，这个故事占据了《法学讲座》的前半部分。

在早期和“野蛮”阶段，占有仅仅是要保证财产权。作为猎人，你不但要悄悄靠近猎物 and 伤害它——而且实际要消灭它。在他的演讲中，斯密发展了这些各种不同的界限，即这些步骤造成了财产权。如果我悄悄靠近它，你伤害它，而他杀死它，我对猎物就没有所有权，而你会和他分享猎物。但是，一旦你在田园社会中驯养动物，法律将会变得更详细，设计这种法律是用来奖赏间接的努力和直接的最终占有。随着农业的到来，产生了定居——一个固定的住所和对财产的永久占有，不管你是否在物质上附属于它：“私人财产的第一起源或许是男人把自己的住所固定下来，并一起生活在城市中，在任何一个改良的社会中，情况大约都是如此。”（LJ [A]，22）斯密所使用的“城市”一词，并不具有我们现在的意义，而是用来描述任何一个定居的社区。土地财产是对私人财产权的“最大扩展”。

“封建政府的专横，以及男人们尽可能勒索下级的倾向”（LJ [A]，23），促使法律进一步编纂为法典。这样，从前自由的野蛮狩猎就被那些游牧者挪用。的确，法律制定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以至于只有大地主可以从事野蛮狩猎：“对于这种体制，没有公正的理由可言”（LJ [A] 24）。狩猎物事实上还包括捕鱼，应该是一种谁都能从事的共同财产。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变成“可视为属于大家的共同财富”，这些财富“不能因使用而减少或受

损，也不能在使用它们时对任何人造成伤害”（LJ [A] 24）。因此，空气、流水、海洋、在河流和海洋上的航行，都应该为大家所共有。这段话所具有的当代语调，是令人吃惊的。

第二个获得和提升财产的方法是自然增益，也就是创造财产的权利。由于猎人不能驯养和保存猎物，因此在第一个时代不存在自然增益。但是在游牧时代，在某种范围内也就带来了“动物的奶汁和幼崽”。这些东西属于任何拥有动物的人。不过，随着农业时代的到来和实行土地私有财产制，机会就会扩大了——的确，“它们在数量上的增长几乎是无限的”。土地以及所有依附于土地的东西——即矿物和通过耕作土壤而获得的丰收——全部属于土地所有者。无论如何，在封建时代，所有土地都不是以绝对自主地的所有制形式，而是以为某些特权者——地主或国王服务的形式而开始被占有。武断的权利，例如对土地下埋藏的贵金属的所有权，被指定属于这些特权者。土地的收益，或者耕作者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出的任何东西，属于耕作者，不过，任何可以追溯到没有经过劳动之前的原始形式的东西——例如，金子——属于特权者。“这条规则在理由上是没有根据的”（LJ [A] 27-30）。

随着进步——以及它事实上的伴随物，私人财产的积累——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商业时代的标志是，少数人的财富由众多人的劳动来维持。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之所以需要，是为了阻止穷人垂涎和募集富人的财产。斯密表达思想的方式，使他看起来更像早期的布尔什维克，而不像自由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但是，尽管存在着更大的不平等，斯密还是认为，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还是比早期社会的生活水平高：

我是说，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提供给人的那些所有不同的便利和奢侈，并考虑一下为生产这些东西而雇用的各种不同的劳动，我们将会感觉到，在文明社会中，如果没有数以千计的卑贱者的帮助与合作，甚至连那些我们误以为以简易的方式被人所共同接受的东西，也不可能提供。的确，与大人物的过度奢侈相比，普通人的供应无疑显得极其简易；也许真实情况是，一个欧洲王子的供应，并不比一个勤劳而节俭的农民强多少，因为这些农民的供应超过了北美洲未开化民族的首领的供应。[《〈国富论〉早期草稿》（Early Draft of part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ED LJ P. 563。]<sup>[4]</sup>

在过去，社会比较平等，但也比较贫穷。现代世界比较不平等，但是能够提供较高水平的消费。这并非是人均收入较高。正如斯密在《〈国富论〉早期草稿》中进一步谈到的：“在这么多压制性的不平等中间，如果将最受尊敬的人的所得与特别活跃的野蛮人的所得进行对比，我们怎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甚至那些最下层和最不受尊重的文明社会的成员都共同拥有特权者的富足？”（同上）

这样，斯密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甚至今天它也没有丧失它所具有的相对意义。随着全球化传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随着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崩溃以及早期确定性的毁灭，对于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逐渐增加的不平等，人们有很多的担忧。斯密看来倾向于认为，更大的不平等与如下事实是共存的——事实上也是对它有责任的——这就是，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最下层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很可能比早期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的生活水平还要高。它是怎样造成的呢？

是劳动分工使更高的生产力成为可能，反过来，又把许多事情都归功于这一事实，即人们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和财产，激励着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商业使许多复杂的和匿名的交易成为可能，因为他们不再依赖于他们的特权者——他们的地主，他们公会的主人。进入复杂交易的可能性，使得一个广阔的市场更易接近。这意味着，如果你生产的东西可能是先前的10倍，你仍然要为它找到市场。这样，贸易就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力。

《国富论》是从一个别针工厂的例子入手的，在那里，通过把别针的制造分解成各个单独的工作，而且实行专业化，生产力被提高了好几倍。劳动分工由此成为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当然这不仅包括车间内部的分工，而且也包括车间以外的分工。正是通过贸易、运输和金融领域的专家，市场才得到延伸，而且更高的生产力也由更大的销售得到回报。对商品的流动不加限制，让市场尽可能延伸，是非常重要的。

就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革命的学说，尽管斯密使用的是一种简洁的尽量避免夸耀的风格。那些不喜欢商业时代的人们，把它与过去的幸福时光相比。那时，工人拥有永久的主人，主人照料他们的福利，当地生产的东西，当地消费，交换不仅仅是匿名行为，而且是一种带有额外经济回应的丰富的社会礼仪。甚至今天，这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并不陌生。他们批评贸易的增长，哀叹随着金钱算计进入社会生活之后旧的社会约束的崩溃，一句话，就是渴望



一个更安静、更快乐和更小的社会。

斯密认为，尤其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这些早期社会是以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它们也保护财产的各种任性法律。权力高于法律，因此，对他人的劳动果实的征收并没有自然的和合理的根据。自由意味着从这些无数的社会压迫中独立出来。凭着这种独立和保护财产的法律体制，繁荣出现了。虽然这种繁荣仍然具有大量不平等的特征，但是，与此同时，生活在底层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却得到了改善。

但是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更多的东西是肉眼看不到的。在从前的社会，人们对他人的依赖是直接的和看得见的，他们的义务是清楚的和可以强制执行。在现代的社会，独立的人进行着匿名交易，没有义务关系却存在着契约关系，仍然存在着一张相互依赖但却看不见的复杂网络。每个人都在为他或她自己的自身利益而行动，做他们自己选择的工作，但是从其结果来看，他们最后都以为社会提供无数需求而告终。现代社会甚至需要越来越多不同的相互依赖，因为劳动分工更加复杂了。

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语时，他是试图说明这种在独立的匿名交易的外衣掩饰之下商业社会的隐秘的复杂的互相依赖关系。屠夫和面包师等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了使他们的客户需求得到满足的愉快结果。但是，在面包师身后当然也存在着一连串的操作——农民种植谷物，磨房主把它磨成面粉，而运输者则把粮食运送给磨房主并把面粉运送给面包师，也许还要经过一个批发商的手。如果是现在，还会有一家面包坊，依次把面包运送到超市。如果我想吃意大利的查巴特或者法国的新月形面包，德国的裸麦粉粗面包或者希腊的熏烤皮塔面包，所有这些都可以得到，因为由农民、磨房主、面包师、批发商组成的这个复杂的网络，会把它们送往超级市场，而我可以从那里买到。

当然，曾经有过一个时代，面包是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烘焙是一个家庭主妇的家务杂务。农民种植谷物；他们的老婆、母亲和女儿把它磨成面粉，然后制成面包。那些不耕种的人，例如当地的铁匠，以提供打铁服务作担保，换取一年的面包供应。这种地方性经济很少能够自给自足（盐和铁并不是到处都有的两种产品），人们的生活常常十分贫穷。不过，除了地主和牧师以外，人们之间也许更平等。但是，即使是地主和牧师对劳动者进行严重的剥削，他们能够享受的奢侈也非常有限。

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像在斯密时代一样，崇拜这个旧的体制。斯密却认



为，由于商业的存在，才有种类越来越多的面包可选择，而且实际上，面包的价格也变得越来越便宜。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要求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如今在英国，工业制品甚至比土地的产品更便宜；你可以用一周购买杂货的开支中的一小部分购买一块斯瓦奇牌手表；购买一台计算机的花费比一次夏日度假的花费还要低。

因此斯密的挑战是想证明，随着货币与市场关系吞噬欧洲西北部的社会，商业和自由作为对早期农业社会的选择，有如乌托邦似的获得了魔幻般的增长。对于底层的人来说，不平等是体面的生活水平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商业社会可以保证这一点，是因为伴随着财产保护，它唤醒了企业精神。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商业精神自然是与节俭、经济、缓和、劳动、审慎、宁静、秩序和规则的精神相伴随的”<sup>[5]</sup>。斯密同意这一点，但是他把它纳入了经济进步的理论。商业带来了奢侈，而懒惰的地主为了一些不值钱的饰物放弃了自己的剩余，以作为对于商人的回报。这些都是善行，不应该受到指责。商人通过把资本投入到生产性的劳动中增加国家财富而成为英雄；而地主作为旧德行的代表则是浪费剩余。地主一方面失去权力为国王所有，另一方面当他们挥霍起来时，他们又不得不向别人征收封建地租。但是，国王鼓励商业，而且通过赞同保护财产安全，促使面向更大自由的运动。劳动分工在某种意义上使每个人都成了商人，因为交易是谋生的一部分。

进步并非全部是完美和有益的，但是斯密认为，总的来看，它比早期的王国更可取。一方面，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压迫性的不平等，但也存在着富裕，甚至大多数人口能够从劳动分工和商业精神创造的富饶中受益。这里没有过去所存在的依附，有的只是独立。这转而也有一些消极的方面。劳动分工使人变得麻木。“随着人类的创造成为可能”，工人“变得愚昧和忽略不计”。斯密继续指出了在近乎现代的条件下专业化流水作业的后果。这段以近乎马克思的语调说出的话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在自己特殊贸易中的技巧，看来是通过付出智力、社会和军事方面的德行代价而获得的。但是，在每个改良的和文明的社会中，这是一个劳苦大众（即大多数的人民）必然要沦落的阶段，除非政府煞费苦心地避免它。”<sup>[6]</sup>

上面总结性句子的后半句话，似乎会使那些认为斯密是完全反政府的人感到吃惊。在斯密时代的背景下，国家主要是从事战争的；英国在1688年和1815年之间，在不断同欧洲大陆进行规模不等的战争（有时也同美国和印度作战）。那时，国家是腐败的，它的大部分行政人员都是十足的官僚。



国家处于严重和可耻的债务之中。它很可能受到了代表商人利益的“游说议员”的影响。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发出过警告：“有时所谓的国家体制，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利益；有时左右政府的特殊阶层的利益，会使国家的成交法偏离自然的正义准则。”<sup>[7]</sup>

因此，不可能永远相信，政府会遵从自然正义的过程——不论是18世纪的英国政府，还是任何其他同时代的欧洲政府，或者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洲或非洲的政府也是如此。斯密对于政府有一个基本设想，其中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政府的主要工作是主持正义。这是交往性正义——防止人们受到伤害，防止他们的财产受到不法侵犯。对于斯密来说，正义意味着个人之间彼此采取合适的行为。这尤其重要，因为在一个独立的个体通过交易方式被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中，你不可能依赖任何手足之情或同情心，使人们彼此采取合适的行为。他赞同审慎的行为，但是并不认为它是必然发生的。因此，还要有法律框架和对交往性正义的管理。先有肉体安全的自然权利，然后才有财产的权利。这是顺理成章的。

一个纯粹按照自身利益来运行的社会，无疑是有效的。虽然斯密并不喜欢这一点，但是他知道，善行必须是自愿的：它不可能是被要求的。如果我们全都是审慎的并且能够做到自制，最好是有一种非常克制的气质，那么一个良好的社会就会出现。但是善行是靠不住的。但是，如果它适用的话，它将会使一种运行着的社会变成一个良好的社会。

最后，剩下的要点是：平等的社会很可能是贫穷的社会。商业和私有财产会导致不平等，但也能带来了繁荣，给群众带来了适当的生活水平。在尊重人的自然权利和财产方面，商业社会也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这不是乌托邦，而是进步。

### [注释]

[1] 在这一章中，我受两本书的影响相当大：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eds) (1993),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两篇评论对于说明本章的背景比较有用：Hont and Ignatieff, “Needs and Justice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这是一篇引导性的论文，and Donald Winch, “Adam Smith’s ‘Enduring Particular Result’: A Political and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and Donald Winch (1978), *Adam Smith’s Politics*;

*An Essay in Historiographic Revi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最新的亚当·斯密的传记，见 Ian Simpson Ross (1995), *The Life of Adam Smith*, Clarendon Press, Oxford。所有涉及亚当·斯密的著作都来自非凡的《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六卷本。是由格拉斯哥大学编辑的，参与这次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论文集编撰的学者有：J. C. Bryce, R. H. Campbell, A. L. Macfie, E. C. Mossner, D. D. Raphael, I. S. Ross, A. S. Skinner, P. D. Stein, W. B. Todd 和 W. P. D. Wightman。这是格拉斯哥大学非常文明的举动。出版工作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完成的。我特别地使用了：*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ed. R. L. Meek, D. D. Raphael and P. D. Stein (1978)；当然还有：*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ed.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该书的编辑是托德 (W. B. Todd)。

[2] 引自约翰·穆勒为《法学讲座》所撰写的导言，第3页。

[3] I.] (A) 14 指的是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摘自讲演笔记第1762~1763页，在格拉斯哥大学编辑的版本中为A卷第14页。

[4] 《国富论》的部分早期手稿被作为附录包含在《法学讲座》中。

[5] Cited by Donald Winch in *Adam Smith's Politics*, p. 71.

[6] 参见格拉斯哥大学编辑的两卷本的《国富论》，Part V, p. 50, vol. 2.

[7] The quotation fro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p. 340 - 341 of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eds),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art VII, Section 4, para. 36.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3章 黑格尔和理想的国家<sup>[1]</sup>

因此，亚当·斯密提出了现代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保护财产权利的形式上的自由带来的是不平等，但同时也带来了繁荣。这种繁荣来自劳动分工以及对效率和创新的激励。在现代社会中，它甚至为那些最贫穷的穷人也带来了一种体面的生活标准，从而使得他们比早期的富翁还要生活得好。早期的社会是贫穷的，尽管存在很少不平等。那时人们在行使权利时更加随意，对财产权的尊重得不到保障。在这些早期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依附，因此谈不上真正的自由。

现代社会出现了许多相伴而来的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是人的行动创造出的无法预料的结果，而这类行动却是为生产商品结果而设计的。劳动分工

导致许多脑力劳动者不得不进行重复性的工作。在这方面，国家不得不保证，教育是阻止敏感性衰退的解毒药。批发商和生意人永远酝酿着通过贸易限制来损害公众的利益。政治集团为狭隘的经济利益所驱使，试图影响公共政策。自由贸易与竞争因此被以怀疑的目光防范着。仅仅靠政治家还无济于事，立法者——由更高贵的有杰出的政治才干的人组成的俱乐部——并不能确保公民人与经济人的平衡。

这是一种18世纪的观点：一种前资本主义的、只能保证前工业社会的——实际上，正像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所指出的，甚至是前民主主义的——观念。<sup>[2]</sup>但是，甚至在斯密写作的时候，他和他的同时代的哲学家所普及的观念，就是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从18世纪清除出去，以迎来民主的时代。一对孪生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斯密的自由与平等的二分法采取了两种相对应的立场。这两种立场影响了欧洲大部，并通过帝国联系而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在许多人看来，在斯密1790年去世之后的210年间，这个问题似乎是以赞成美国革命和反对法国革命而得到解决的，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斯密的唯一严肃的批评者：卡尔·马克思。如果我们理解马克思，我们就不得不理解这两次革命。

如果早期的社会是不平等的，那么它是在地位和财富上不平等。当我们今天讨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年龄歧视时，是因为我们不再容忍某些人一生下来就优越于其他人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地位的等级制恰恰是18世纪欧洲社会（事实上，就我们知道的而言，还包括所有的其他地区）得以组织的基础。美国大革命的爆发，是要反对英国支配着美国这个殖民地而向英国宗主国支付费用的权益。美国并不反对英国征税过大，而是反对这样的事实：所提出的税额并不是通过对外贸易（在这方面英国是得到承认的），而是国内活动。为了赢得战争，美国殖民地高高举起了平等的旗帜：“我们坚信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的。”用我们现代的观点，很容易挑剔它对妇女的不言自明的忽视，以及对奴隶和印第安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实际上忽视。可是在18世纪晚期，建立一个国家而非一个王朝——一个事实上没有贵族等级的国家——是革命性的一步。不过，美国革命反对的不是异种民族，而是它的同种民族，仅仅是殖民社会内部的一种分裂。它容许新的共和国废除地位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它并未触及本土精英的财富。事实上，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受阻碍地享用其成果的权利，恰恰是这个社会平等主义革命的一个核心。



然而，法国大革命并非如此。这里的敌人则是来自本土——国王所统治的封建制度。在法国，地位的不平等被财富不平等所维持的经济苛税所加强。因此，法国革命的平等主义的呐喊，追求的不仅仅是反对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反对封建贵族，它还作为一种类似于共产主义的平等所吸引——而且这种平等在恐怖时期的经济困难中也简单地实行过。尽管后来以某种地位不平等和地位平等的理想一旦被宣告，将不再会消逝。因此，法国大革命要求攻击地主的财产权利，同时拥护中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但这就意味着，相对于地位平等，私有财产权利是第二位的。你可以拥有财产，但仅仅是作为市民，而不是作为地主才拥有。

温和的斯密博士甚至死后还遭受谴责，说他煽动了法国大革命。他的思想被谴责为危险激进的。他的学生们——特别是他的第一本传记的作者杜加尔·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不得不给他披上保守的外衣以反驳这些攻击。<sup>[3]</sup>自由在 18 世纪是一个激进的口号。私有财产权利导致两个国家赶走了君主专制。这些约翰·洛克在光荣革命时期播下的种子，终于导致了血流成河。

法国大革命的消息由拿破仑的部队传遍欧洲，引起了欧洲各种社会更进一步的动荡，首当其冲的是德意志版图上大大小小的诸侯王国。从耶拿（Jena）到滑铁卢（Waterloo），德国——土著城邦最多的国家——开始经受剧变和羞辱。德国贵族的世界被推翻了。这个沉睡的小王国，还有他们的居民被“全球化”了——和他国的领土与陌生的思想联系起来。向对如此快速的革命变革的理解，同时也向把这种变革纳入到一种合理的可理解的体系之中提出挑战的，是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阅读和解释黑格尔的方式有很多，误解他的方式甚至更多。在英国的思想生活中，黑格尔在 19 世纪晚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那时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属于黑格尔派。但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黑格尔派的影响落到了最低点，这时卡尔·波普尔对黑格尔的攻击变得时髦，以至于任何有自尊心的左翼自由主义者都不再阅读黑格尔的著作。然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一股回归黑格尔的浪潮开始在英国掀起。这些人不顾波普尔反对，开始继续认真阅读和对待黑格尔。事实上，是弗朗西斯·福山把黑格尔带进了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学术沙龙，并使他名声大噪。

黑格尔为亚当·斯密关于进步的阶段理论补充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层面：

随着进步依时间而发生，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对进步而言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人类观念的长征（我只是打个比方，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原意的）。当我们尚不能在整体上自觉控制我们周围的环境和事件——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将会随着时间的进展而越来越清晰。因此，不仅像斯密所断言的，我们的生存方式不仅改变了其他制度，不仅对其他制度产生了魔术般的吸引力，而且还产生了某种超出物质进步之外的影响。

作为矛盾斗争的结果，进步不会平稳地发生，而是适应性地发生，矛盾为事物和观念提供了动力激励。辩证法并不神秘，它不过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辨别出变化的可能性并揭示这种可能性的方式。当人们自鸣得意地满足于某种成功的时候，当这种情感达到某种顶点的时候——事实上就像柏林墙倒塌时某些人所具有的心情——辩证的哲学家会发觉进一步变化和事物上会发生逆转的种子。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彻底完结和解决了的，除非走到尽头。

轨道需要有目标。哲学家们，正如普通人一样，喜欢有结尾的优雅故事。斯密停止在商业与自由上，没有看到更远的阶段。当完美的自我意识成为人类的普遍特性时，黑格尔看到了未来的终点。通过人们的行动，理念赢得了自身的自我实现。

大卫·休谟是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他在这方面是毫不犹豫的。他的朋友亚当·斯密只是一时坚持了怀疑论，当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对造物主表示空洞的虔诚。黑格尔就不同了。他关于社会进步的宏大图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未来主义的，如果可能的话，它在一个仍然为宗教所统治的社会是极其合理的。因此，他很不情愿地赋予基督教在人类进步的传奇中以十分显眼的角色，并且如果人们把历史的终结和理念的自我实现作为基督复活的话，情况可能就是这样的。黑格尔让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有人说这是故意的——为的是适应他的这种感受。但是，如果把黑格尔看成愤世嫉俗的人，也是没有道理的。把他从符腾堡（Wurttemberg）学习岁月引入哲学王国的核心问题的，是虔诚的丧失——一种到那时为止在他看来已经界定道德共同体的积极的新教精神的丧失。这种道德共同体受到了腐蚀的威胁。因此，他不得不与德国社会在拿破仑手中遭受的带有创伤性的震动相适应，不得不退回到普鲁士已经采取的威权主义的改革。事实上，在黑格尔时代，官僚制度的合理性在普鲁士可能已经被创造出来。

黑格尔不是怀疑论者，也从来不是无神论者。他毕生的追求是要发现，



市民社会中的公共行为何以可能是伦理的。他把法国革命这一事件以及后来的进展视为对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挑战，简单地说，就是古老的道德共同体如何能够在社会交往中复活。确实存在一种断裂；私人道德和公共行为之间的理想的统一体，已经被扰乱了。因此，现代生活已经把个人——在其作为人和公民的双重能力上——分裂为个体人格和公共人格。这种分裂是一种通过有关虔诚的实践就能克服的偶然事故吗？或者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正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黑格尔发现了亚当·斯密和苏格兰的哲学家们。他发现了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在古典哲学的形态上黑格尔是第一个认真对待经济学的哲学家。

黑格尔面临的问题，几乎正是18世纪早期英国和苏格兰思想家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似乎已经凝固并成为永恒。现在它又开始流走，但在这些思想家回忆起来它却又是何等美妙。尽管这是一种受支配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却关心其他人——领主要关心他的奴仆，如果后者需要的话；教会制定善行的规则；人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而现在，突然之间，金钱颠覆了一切，在社会关系中引来了新的流动——事实上是新的情调。事物要用金钱来衡量；关系建立在非人格的社会交换的基础上。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情境中，什么才是坚实的？

正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亚当·斯密的回答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商业和非人格交换的激进辩护。尽管人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匿名”的特征，只是受自身利益驱动，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以一种复杂但却看不见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的。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彼此独立、毫不相干的，但实际上似乎在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亚当·斯密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道德层面，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第一部著作，也就是《道德情操论》得到证明。但是，在他对个人行为的同情中，在他对自身利益和自由的颂扬中，他本人并没有发现什么矛盾。黑格尔并没有像后来的一些德国作家所认为的那样，详细研究了斯密那里存在的矛盾，发明了所谓“亚当·斯密问题”。矛盾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如果不能把握社会生活中经济层面的重要性，黑格尔就不能实现自己重新发现道德共同体之根源的计划。

在某种程度上，黑格尔的计划是一种向后看的，甚至带有怀旧情绪的计划。我们怎样才能回到那个黄金年代呢？在那时，人们因某种共同体的感觉而联系在一起，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人与市民——是一个领域。法国革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分裂信号，当然，苏格兰开创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家们同





样清楚，现代与古代是一种断裂，根本不需要回到亚当·斯密，至多是到达未来稳定状态中的静止状态。但是，黑格尔希望走得更远。他想为进步的长征找到一个更好的目标，一个尽管在未来并不存在、但是只要人类欣赏就会复活整体性的目标。（当我试图传达这位特殊作者的思考，而不是传达我喜欢他说什么时，男性的术语仍在这里保持着。）

在苏格兰的哲学家们所概括的需求的物质领域，这种理论并没有被那些崇尚禁欲的基督教徒所拒绝。黑格尔则是成长于由那种虽说是活跃的天主教徒但却是世界公民组成的传统之中，这些新教徒一度生活在天主教的王国之下，他们的市民生活与宗教和政治是紧密相连的。这样，问题就成了要理解物质进步的主要动力，再找到把这些物质进步转化为自由的力量所在，也就是说，找到实现道德共同体的力量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理解人们如何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和自己周围的环境是进步——就是说，理性能够伴随物质增长走多远。如果历史可以被看作是理性的长征——而黑格尔是一个作为哲学家的历史理论家——那么你可能会同意，最近所表现出来的进步，尽管从它的商业化和非人格化方面来看可能有些令人讨厌，但这却是理性运作的狡诈方式。从历史阶段的内部来看历史有时会偏离真理的轨道，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它的对立面。克服这两者的矛盾，可能达到更高的综合。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简单的魔术箱，但黑格尔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改写历史的阶段理论。通过历史，他看到了自我意识的增长：某种尽管绝对算不上完美，但却允许行动者有更多自由的知识的增长。

法国大革命是这种理性的狡诈的一个例子。启蒙运动鼓励人们把自己视为只代表自我的个人，他是理性的和自治的，不是复杂的等级制大机器的一个齿轮。人们甚至开始质疑宗教，要求一种合理的教义。自治的个人不接受任何清规戒律，他们需要的是自由。在黑格尔看来，把恐怖发展到顶峰的法国革命，是为那些个人获得绝对自由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得不到他人认可的情况下宣布自己是权威，每个人的统治权与其他人的统治权一样是善的，因此，法国革命其实是陷入了某种狂热之中。不论哪个政治集团上台，都必须声称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因此他们必定把每个竞争的集团作为怀疑对象来抨击，如果需要的话，他们甚至会从肉体上消灭它们。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恐怖证明，绝对的个人自由是一种妄想。

但是，随着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拆除了旧的秩序，德国的情形也变得更加严重，毕竟，后拿破仑的世界证明并不是一件坏事。这种恐怖及其影



响，拭去了石板上的污痕，为在共同体内实现个人自由准备了条件。只有通过个人的完全自觉和完全自愿的社会存在——通过意识到他们必须在共同体中内化生存的需求——他们才是真正自由的。当这种共同体通过个人实现自我时，它就是精神；人通过全面而合理地理解，为什么个人的自由不能是任意的，而只能生活在共同体中，精神逐渐接近了它的目标：完全的自我实现。

实现这种自由的共同体具有三个层面：家庭、市民社会和处于最高层次的国家。亚当·斯密生活的国家——18世纪中叶的汉诺威君主国——是一部战争机器，非常浪费与腐败。值得庆幸的是，它为自身保留了家庭的私人生活，也保留了一般社会的私人生活。国会方面代表为数众多的拥有少量财产者的利益，上议院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这不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但它也不是一个要求进步或者自我革新的国家。因此，亚当·斯密只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为经济活动单独留下一块领地——个人可以自由签约和交换的领地。亚当·斯密认为，如果能按设计留下这块领地，又没有国家的管制或干预，这块领地——市民社会——就会茁壮成长。当然，当代国家事实上一直在进行干预，但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充满激情的辩护，开创了人类思想革命的先河，他向世人表明为什么自治的实体在没有国家管制的情况下并不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而照样可以繁荣兴旺。

在亚当·斯密看来，相对于市民社会，国家还要承担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劳动分工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通过降低工人的反应敏感性使之蒙受损失，这就要求国家关心教育，以作为一种矫正的关系。国家必须设法提高市民素质，以保护个人免受黑格尔所谓的“异化”。

黑格尔对于国家的看法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的国家是后拿破仑的普鲁士王国。当他可以明确表达国家理论的时候，许多情况甚至在英国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更合理和更宽容的国家和更好的市民社会，已经在斗争中出现了。普鲁士王国通过使它的官僚体制合理化，已经在自觉地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也震撼了那些浪漫主义者，他们不满立法这种突如其来的新事物，因为它把旧的事物一扫而空。他们需要有机的，也就是缓慢的变革。他们需要的法律更像自然法。

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过于理性——事实上，也过于激进。尽管他不赞成法国革命的恐怖，但是事后他也看到了它的积极贡献。理性的狡诈已经准备行动。所有人都可以享有自由的理性国家的出现，时机已经成熟。当然，这个国家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国家范畴是不一致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的国家尽管拥有民主的多数选票 [像孔多塞 (Condorcet) 所明白的], 最终必然陷入矛盾之中 (这就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法则”, 这在现代社会选择理论中是已广为人知的)<sup>[4]</sup>。黑格尔想探索自主个性的局限性, 并把它纳入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中, 为的是使它具有一种不同意义的自由, 事实上是他认为的更加理性的自由。

在理性的秩序中, 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种三位一体中的每一个要素, 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家庭是私人的情感领域, 而不是理性领域, 是私人的情操领域, 而不是契约领域。在黑格尔看来, 私有财产是家庭关系的黏合剂, 这在那些确立了遗产法的国家尤其如此, 这样, 由于有了遗产法, 任何一代人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私有财产。家庭生活以直接狭隘的形式表现了一种共同体。另一方面, 市民社会则是这样一种处所, 在那里, 许多拥有自私利益的个人汇集在一起, 在订立契约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和贸易。这就是过去的100年中使生活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经济领域, 在这一领域中, 越来越多的关系不再以身份或等级制的关系为基础, 而是以契约、匿名制 (anonymity) 和司法上的平等为基础。

黑格尔承认, 市民社会的活动是带来繁荣的关键。通过扩大劳动分工, 刺激技术发明, 推进贸易扩张, 经济领域就可以迎合日益扩张的需求体系。但是, 黑格尔并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 对于经济的发展过程抱着乐观的情绪。一方面, 它通过使工人成为劳动分工中的一个纯粹的齿轮, 制造出异化; 另一方面, 由于它不能自我调节, 它可能造成贫富两极分化, 从而也加深了异化的意义。因此, 由于大多数自治的逻辑都很平常, 对一个真正合理和自由的共同体而言, 国家应该对市民社会进行监督。黑格尔绝不是放任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

同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相抗衡的力量, 是无私的公务员阶层。这些公务员组成了一个普遍的阶层, 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在市民社会中, 是解决争端的中立的仲裁者 (通过互订协议), 此外, 还承担着维护法律和监督法律实施的职责。公务员的行政职能是为国家的惟一化身——君主服务。君主并非从传统或者君权神授那里获得权威, 而是因为只有共同体的惟一化身才是合理的。一个领导人的当选是非常偶然的, 他更有义务承担来自下面的压力。只有世袭的君主才能同时既公正无私又能使共同体人格化。在黑格尔看来, 精神的这种人格化是基本的。

黑格尔关于代议制的看法, 也是前民主的。拥有土地的等级可以单独由



一家立法机构来代表。代表市民社会的自由民，要间接地通过它们的同业公会和社团由另一家立法机构来代表。个人不仅仅是自主的主体，他们也是集体的一个成员。因此，他们是一种不同的集合，而并非一种同质的集合。黑格尔不信任成年普选权和议会党团的选举，因为如果没有区别，一种抽象的同质的群众将变成一个危险的群体。法国革命的恐怖是不能忘记的。

作为立法机构，土地贵族的任务不是反对君主，而是要有意地、自愿地调和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种意志不能被分裂来反对它本身。共同体必须拥有惟一的、完全服从的自觉合理的意志。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自愿的内在的和谐。当然，由于存在劳动分工，现代社会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所有的公民都能表达公共利益。公务员是献身于公共利益的工具。但是，自由民和土地贵族的利益同样也反映着公共利益，甚至在他们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前民主的但却是1789年之后的乌托邦。不论是同时代的普鲁士，还是任何其他的国家，都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在市民社会的平衡方面，即在土地贵族的利益和无私的行政官吏的平衡方面（后者在为致力于后拿破仑时代之改革的君主服务），在19世纪20年代，普鲁士要好于英国或者法国。在黑格尔看来，英国的市民社会过于猖獗，而在法国，天主教消除了全部的合理性。

尽管从现在看来，黑格尔的思想已经过于陈旧，但在当时却是先进的。他对于个人主义和代议民主制的反对，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抽象的个人主义自由是空洞的。他认为，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个体。他还应该拥有其他的“认同”，这正像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因此，对于享乐主义的幸福和抽象民主的追求，从来都不会完全令人满意。福山所谓的黑格尔，毕竟不是黑格尔本人的黑格尔。应该存在一个共同体，人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经历自己的自由。人不仅是一个个体，他还是社会的存在。一个理想的国家，不仅能够容纳狭隘的个体，而且能够容纳这种社会存在。

这样，黑格尔在包容和处理初生的资本主义对于现代生活的破坏方面时，与斯密的方式是不同的。他的两家立法机构的设想——一个代表土地贵族，另一个代表自由民——与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的制度安排非常相近。一个中立的、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公共服务机构由此得到了发展。实际上，19世纪晚期英国政治哲学家中的新黑格尔派，在设想黑格尔的普遍阶层方面，甚至可能已经塑造出这种公共服务。国家必须确保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为了广大的利益而反对它本身。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更广阔的方面，自

由主义改革家和费边主义者从黑格尔那里〔也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sup>①</sup>等其他人那里〕获得了不同于亚当·斯密的观念。

但是，就立法机构而言，黑格尔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实施。法国革命开创的向抽象自由的驱动，一直在向前推进，直到普遍的成人选举权和代议制民主成为最向往的政治安排。黑格尔作为最高理想提出的君主政体，并没有被接受。事实上，平衡斯密与黑格尔对于经济自由的解决方案的，是马克思的观点。前两人把法国革命都概括为历史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在探讨资本主义时，既把它视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也视为一种最终自我毁灭的体制。这第三个解决方案将要塑造20世纪的历史。

在我们涉及这一点之前，需要先提及一下我们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讨论。首先，把西欧和新教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普遍的框架来关注，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视野。黑格尔的历史，像斯密的一样，忽视了伊斯兰教的动态进程，它正是在欧洲经历黑暗时代的时候繁荣起来的。这一辩证法并没有包括从罗马帝国衰落到文艺复兴之间的八个世纪，那时最进步的文明是伊斯兰文明。也没有对印度或中国的进步表示任何赞赏，其中有些黑格尔还是注意到了。现代性的故事是按纯粹的欧洲标准以排外和无知的方式编写的。在那里，世界其余的地方要么是根本不存在，如果出现的话，也只是作为一个牺牲品，而不是以另一种活跃形象出现。

但是，即使不算这些，年轻的美国革命几乎是完全被忽略了，而正是这场革命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并在当时确立了最广泛的选举权之一——而且实际上是依据欧洲哲学自觉地把它作为自己宪法的基础。如何平衡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1789年在费城就得到过认真讨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而且在《联邦党人文集》之类的著作中也得到详细的阐述。<sup>[5]</sup>对于欧洲人来说，它也许是太狭隘了、太遥远了，但是，后来很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斗争之所以走到了穷途末路的窘境，就是因为没有能够看到大西洋彼岸。但那是稍后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 [注释]

[1] 本章是以如下两本书为背景的：Laurence Dickey (1987), *Hegel, Religion, E-*

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儿子。

*economics and the Politics of Spirit 1770–180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Charles Taylor (1975) *Heg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 The reference is to Winch, *Adam Smith's Politics*.

[3] 杜加尔·斯图尔特对斯密的修补，见 Emma Rothschild (2001),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4] The reference is to K. J. Arrow (1951),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John Wiley, New York; 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ondorcet (1785), *Essai sur l'application à la probabilité des décisions rendue à la pluralité des voix* (Paris).

[5] James Madiso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1789), *The Federalist Papers*, ed. Isaac Kramnick (1987), Penguin, London.



## 第4章 马克思 I：准备行动

从亚当·斯密出生（1723年）到卡尔·马克思去世（1883年）的岁月里，不仅欧洲社会，而且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亚当·斯密出生的时候，蒸汽动力或纺纱机器尚未取得突破。到了马克思出生的时候，纺纱技术已经实现革命，不过编织依旧局限于手工操作。铁路——蒸汽动力的巨大表现——就像蒸汽船一样还没有出现。到马克思去世的时候，苏伊士运河已经开通，欧洲的旅行者开始深入中非腹地，加利福尼亚迎来了移民，电报技术已经广为人知。奴隶制度已经基本上在欧洲和美洲废除，尽管后者付出了血的代价。成千上万的人群开始从欧洲的中东部移向美国，还有一些人不列颠群岛被遣送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成群成群



的人从印度和中国迁移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各地——亚洲其他的国家、非洲和加勒比地区，还有许多中国人走进了加利福尼亚。人们对这个世界进行探险、绘制地图和殖民。他们还开发矿物——尤其黄金——谷物、奇特的水果和香料。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植物园，成了世界动物和植物尤其是花卉的大辞典。

从斯密出生到马克思去世的160年的岁月里，世界已经不可逆地告别了过去。即使是在18世纪50年代的格拉斯哥，人们可能会设想，当代政体应该以古希腊的政体作为自己的模式，但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世界已经远远不是孤立的城邦好比拟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崇尚古罗马的成就，并对关于中国和蒙古帝国的历史记载感到惊奇不已。但是，当马克思人到中年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被超越。中世纪世界在许多方面要靠自然界的恩赐，无论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是在频繁的危害和危机方面，都是如此。但是，19世纪的欧洲人却以这一事实而自豪，即他们已经主宰了工业技术。在其后的30年中，有更多的发明问世——电力、内燃机和空中航行。但是，历史已经摆脱了循环的命运，变成一种令人眩晕的盘旋上升式的发展。资本主义成了组织经济生活的既定规范，成为居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接受挑战，要对这种迅速转变提供一种新的总体理解。像亚当·斯密的情形一样，他曾生活在迅速变化的时空中 [如他从柯考尔迪 (Kirkcaldy) 来到伦敦或巴黎一样]。随着19世纪中叶的发展历程的变化，马克思目睹了自己周围的世界，并对它进行了思考。他整个成年时代都在写作，这个时期跨越了从1843年到1883年漫长的40年。今天我们把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诸多知识都归诸于他，其中有许多充满力量和技术性的词汇，诸如生产方式等。他曾生活在德国、比利时、法国，但在这些国家，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那时他还不满30岁。后来他来到伦敦，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34年，直到在65岁时去世。

然而，马克思并不仅仅从事研究和写作。与亚当·斯密和黑格尔不同的是，他一边写作一边战斗，一边还在策划着实行总的革命性变革的蓝图。他不仅要描述出与黑格尔不同的有关历史的目标，而且还积极地推动自己的世界接近这一目标。正如他所说的，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解释他周围的世界，还必须改变这个世界。马克思正是这种类型的哲学家。

不管怎样，这个世界在没有得到哲学家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就已经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事实上，变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在马克思年轻的时候，



他就曾想过，再也没有剩下什么可进行理论概括的，他整个一生试图掌握的就是资本主义的日益变化的剧目。他从年轻时以批评德国（黑格尔）哲学开始，到研究和思考土地使用及其对于变革俄国社会的潜能而告结束。在此期间，他就是这样来描绘同时代资本主义的解剖学的，以至于不管其他的社会科学家随后如何攻击他的理论，他都呼吁人民要变革那永远不会死去的世界，尽管他常常被宣布已经死亡。近来，同以往相比，他又被认为甚至是死了好几回。我们将拭目以待。

马克思是在滑铁卢战役后的第三年出生的。作为这次战后协议的一部分，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被划归普鲁士，马克思所出生的城市特里尔恰好在这个省份，自然，这就使马克思成了普鲁士人。<sup>[1]</sup>但是在这一地区法国的影响仍然占着主导地位。马克思的父亲放弃了犹太教，因为他确信，与新教相比，犹太教是一种落后的宗教，对此许多哲学家也表示赞同。这样，既可以说马克思是普鲁士人，又不是普鲁士人，既可以说他是犹太人，又不是犹太人，正像他的许多诋毁者所开的玩笑那样。法国大革命及其进一步的后果，显然对马克思的生活发生了主要影响，正像它们影响了黑格尔一样。

马克思开始在波恩大学学习法律时，还让他的父亲高兴。但后来，在完成学业之前，他曾经得了被描述为神经衰弱的症状。接着他转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开始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的影响。<sup>[2]</sup>这个团体以黑格尔的理论去对现存宗教展开批判。在1835年，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Strauss）出版了他的《耶稣传》，这是把耶稣作为普通人的第一部“传记”。鲍威尔写了一些批评新教的文章。这时，普鲁士国家开始显示其保守的一面，对黑格尔派的清洗开始在一些大学展开。马克思不得不到耶拿大学去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但由于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密切关系，不可能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这样他进入了新闻业，投身于热烈的写作活动中。他的朋友正在尝试操办出版一本文学评论，这意味着必须是激进的和具有“颠覆性”的，因此必须在普鲁士以外的地区发表。这是一份有点类似于《德法年鉴》的刊物。经常是只出版了一期，这个刊物就必须改名。

从今天流行的观点看来，19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的哲学活动，与1968年5月狂醉日子和反越南战争的抗议一样狂热。这里活跃着一个由引人注目的、智力超人和放荡不羁的个人组成的小团体，马克思曾一度是其中的一颗明星。当他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的时候，他曾经努力



要写出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法哲学》是黑格尔的最后一部完整的出版物），但是这部著作像他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在他生前并没有出版。它只是一部零碎的作品，但马克思对他的朋友承诺，这对黑格尔将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批评，因为它对黑格尔进行了总清算。像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常做的那样，他许下的诺言比他承允的多。然而，这部有意义的著作的引言还是发表了，它的力量和风格非常令人震惊。一颗新星在德国的哲学天空诞生了，这正像他的同学所预言的那样。

然而，在写作这部零碎的著作和另外两部主要著作的五年中——一部是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是一场哲学家家族中的争吵，发表于1845年），另一部同样是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他的观点做了一种实质性的发展）——马克思放弃了哲学，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sup>[3]</sup>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已经制造了麻烦，他的文章被普鲁士新闻检查官撤版。但是1848年在欧洲大陆爆发广泛的革命的前夕，他与恩格斯出版了他们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在此之前，曾经起草过宣言，而且有过好几稿，但是只有这一稿试图概括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主要生活，而且表明没有任何枯萎的迹象。即便不说别的，它至少应该列入欧洲散文的经典行列，而且它的法文、英文和100多种其他文字的译本也与德文原版一样优秀。

但是，1848年革命失败了。马克思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下回到伦敦，尽管情况是暂时的，但还得感谢他的实业界朋友和同志恩格斯的慷慨资助，是恩格斯为他以后的生活提供了支持。马克思花了19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光，从事他多次承诺的《资本论》的写作。由于为观念的力量改变现实所陶醉，他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期望，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世本身能够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马克思在一篇短小的著述中曾经提示过他的思想，这是一部与蒲鲁东进行辩论的导论性著作，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该书的导言本身常常获得更多的阅读和引用。在1867年，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他已经着手准备另外两卷《资本论》的草稿，并在经济思想史方面作了足够笔记和摘要，以满足三部巨著的需要，大约总共有一千多页。

那时，他一放下哲学就拿起了政治经济学，并且加快了研究的进度。他因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而受到谴责，尽管那时他在伦敦忙于写一篇直接“目击”巴黎公社的说明文章。<sup>[4]</sup>但是，在以后的12年中，他再也没有重新光顾这堆《资本论》草稿，没有像对待第一卷那样，对它们仔细推敲以备出

版。事实上在他 1883 年去世之前，他再没有出版任何重要的著作。他把时间花在指导《资本论》第一卷的再版和翻译工作上。他的名声迅速传播。俄文译本甚至比法文译本问世得更快，比英文译本的出版早 10 多年。马克思开始深入而广泛地阅读关于俄国土地制度以及“原始”社会的民族学方面的著作。他还和恩格斯抽空干预德国年轻而缺少经验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命运——在后来许多社会主义政党中，这是第一个信仰马克思的理论却又被他认为误解了他的思想的政党。他的读者和信徒试图使他的理论作为某种他所不承认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而流芳百世，但马克思所说的却是：“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按照死后出版的著作占生前出版著作的比率，马克思创造了一个记录。尽管斯密的《法学讲座》是在 20 世纪才发现的，但他禁止出版自己的著作，这点对我们今天来说只适用于《论哲学问题》（*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但斯密的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他生前就已经出版，从而给他建立了不朽的声誉。斯密去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名人了。当马克思去世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不为人知的。欧洲各国政府把他视为声名狼藉之人，尽管英国人不像德国人那样猜疑，把他作为潜在的弑君者。但是，马克思去世以后，只经过短短的 20 世纪，他就声誉鹊起。他的所有的著作被抢救出来并加以出版——尽管很幸运，新的新闻检查官是马克思的仰慕者，但他们绝不比马克思时代的普鲁士审查官好多少。我们现在看到的著作——曾经是删节过的，但最终恢复了原貌——如果不是他的全部著作，至少占其中的 98%，它已经达到了 45 卷，其中至多只有 1/50 是在马克思生前出版的。

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卡农格特（Canongate）的墓碑呈现出一种温和的格调。这里没有这位哲人的塑像，可以向我们展示他关于劳动分工和促进国家繁荣的理论；没有宽敞墓道，也没有把亚当·斯密的头像印在其上的飘扬的旗帜。这里现在是亚当·斯密研究所，有的是印有他的肖像的 T 恤衫。没有人因为以当时的统治者不赞同的方式引用、误引或者解释亚当·斯密的理论而去坐牢或进集中营。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了马克思的情形中。他在海格特（Highgate）的公墓是一座庄严的建筑物，常常引来那些喜欢破坏公物的人们的攻击。也许现在前来参观的苏联游客比以前少多了，但那时人们经常看到走出海格特地铁站的苏联游客，他们满脸迷茫地寻找通往马克思墓地的通道。但是，马克思在海格特的公墓还是那座公墓。人们一度因为



阅读或误读马克思，不得不进集中营，被开除出党，被驱逐、流亡、砍头、暗杀或清算。柏林墙的倒塌至少是终结了欧洲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幕。

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因为在马克思逝世后的40年间，马克思的思想不断地被辩论、反驳、修正，有时甚至被摒弃。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西欧同类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基础。但是，当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作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行动时，并没有权力去惩治持不同政见者。左翼和右翼派别都得到了大力发展。马克思的思想同样在大学校园中引起了争论。柏姆-巴维克（Böhm-Bawerk）、松巴特（Sombart）、韦伯（Weber）以及其他人在讨论这种思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过时的、甚至是没有任何新东西的观点，也都得到了推进。

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核心：第一，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也就是说，利润是如何从对工人的剥削中产生的。第二，资本主义的最近前景如何。稍后，我将比较细致地介绍这些思想，因为甚至在今天，它对于我们思考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我想稍微快速地大致介绍一下马克思思想所遭受的命运。《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制定了攻击的主线，在第7部分中，作者详细阐述了利润率周期和失业理论。但是，也还存在更长的视角——让我们称之为千禧年的视角：资本主义只不过是生产方式有规则链条中的一环。像亚当·斯密一样，马克思有自己的历史阶段理论，但是他也赞同黑格尔，可能存在着另外一两个更高的阶段要来临，它将超越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风格所显现出的力量，像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有些部分一样，使他的许多追随者认为，超越资本主义是近期的事情。甚至马克思本人在他写作《资本论》的一再延长的工作中，也担心（尤其是在1857年）资本主义会在他完成自己的批判之前消失。这种狂热的希望在1871年以后消退了，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资本主义的外围——尤其是俄国。但是，他的德国追随者——还有法国、俄国和某些意大利的追随者——都确信，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它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于1885年根据马克思的笔记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这一卷表明，同样的理论还可以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的扩张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危机的漫长的可以持续的时期。一场可怕的论战爆发了。《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于1894年，它谈到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令那些宣扬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人深受鼓舞。那么，人们应该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未来？尽管资本主义具有剥削的性质，它能够维持自身吗？它能逃脱各种



精巧的设计（例如殖民地）的惩罚吗？须知正是殖民地复活了这个患病的体制。<sup>[5]</sup>

柏姆-巴维克在维也纳经济学界处于领导位置，他撰文对《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简单论证和第三卷中关于对劳动的剥削如何将自身转化为资本主义利润的详细论述之间存在的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如他所看到的——进行了猛烈攻击。<sup>[6]</sup>爱德华·伯恩斯坦在英国考察多年之后，开始深信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马克思的观念已经不再适用。<sup>[7]</sup>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并不同意这种看法。罗莎·卢森堡这位左翼最优秀的理论家，写了一部长篇巨著，试图把这三种关于资本主义动力的看法统一起来，以实现对殖民地问题的整合。她至少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希望，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通过总罢工，或者某种类似的策略——可以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sup>[8]</sup>考茨基把赌注压在通过党来促进工人力量的稳定发展上，并认为可以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1914年8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存在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它认识的方式。在整个19世纪，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赞叹理性的发展，赞叹他们所谓的欧洲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速度。也许他们一直与进步的易受攻击的缺陷相隔绝。然而，战争的爆发向人们赤裸裸地提示：那种非理性的、好战的、充满愚笨暴力和阶级与种族划分的各种力量，之所以没有消失，正是因为部分欧洲地区的中产阶级已经具有了各种“风度”。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震惊了马克思主义者。工人们不但没有组成国际统一战线，反而显示了侵略主义的最卑劣的一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狂热地投票赞成战争贷款。欧洲大陆只有屈指可数的社会主义者——其中有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琼·杰雷斯（Jean Jaurès）和列宁——站出来反对战争，反对这种愚蠢的“爱国主义”。社会党国际——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创立的国际消亡后留下的后裔，于1889年恢复活动——分裂了。列宁和革命的失败论者离开了这个组织。

在这以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了政权，这使人想起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事实上也包括1789年的法国革命。不管怎样，从此以后马克思及其思想为这个党所垄断占有，并宣布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政权的。按照那时所承认的理论，革命不可能在像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发生，但是那种观点成了异端邪说。到布尔什维克的观

点成为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时候，各种学说都受到揭露、重新解释和修正。为了推行一致性，对各种不同信仰实行了精神上的和唯心主义的联合。马克思毫不含糊地成了一种新宗教的缔造者。从此，所有非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的读物都要受到中伤；它们的支持者要受到谴责。以至于口头上的粗鲁争辩也可能带来致命的危险，文字上的争论更是可想而知。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10年间，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西方，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公开诚挚的争论都停止了。各种活跃的政治运动并没有提供新的理论发明或者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退回到几所大学之中。人们热切盼望的西方的起义并没有爆发。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遭受一连串的问题——战争损伤，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萧条——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这一社会民主的新变种也不能取得胜利。对许多人来说，法西斯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另一变种却取得了成功，并兑现了真实的承诺。只有通过一场漫长的、血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苏联起初站在希特勒一边，后来不得不以巨大的代价击退他才最后打败法西斯主义。

冷战接踵而来，但是在此之前，苏联用20年时间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花100年时间才实现的国家工业化，使它赢得了尊重。它成了亚洲和非洲一些新的解除殖民统治的国家学习的榜样。中国和越南的革命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马克思观增添了魅力。尽管处于冷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大学校园和政党中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似乎又回到了19世纪80年代——但是又不太像，因为官方的正统已经确定了航线。各种离经叛道都受到谴责，但它们已不同于从前的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变种——铁托、毛泽东和胡志明。

接着，1956年再一次使幻想破灭。苏联入侵匈牙利，镇压了该国刚刚萌动的起义，再加上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秘密谴责斯大林，这对苏联正统显然是无情羞辱。它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最终联系，而马克思在这种传统中是有地位的。马克思所写的许多旧手稿——到那时为止没有出版过或没有传播出来的——开始重见天日。新左翼在西方也诞生了。在大学校园内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了一项严肃的、不断发展的事业。在其后的30年，马克思用过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受到仔细推敲、讨论和批评。有人发现，马克思偏离了他自己的理论，或者说他的理论在许多问题上都留下了巨大的裂隙，这些问题包括：阶级、国家、革命的行动者、性别、农民、第三世界、自动化的来临、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福利国

家、民主政治、民族主义、种族、族性，等等。

这是一个伟大而流动的宴会，几乎达到了狂欢的程度。在这个宴会上，人们阅读或重读着马克思的著作，修正或谴责别的修正主义，实现着伟大的综合，探寻着各种不同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想起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之间的争辩，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对这一幕予以嘲讽。但是，无论在持续的时间上还是在涉及的国家中，这都是一场非常广泛的争论。成千上万的树木被砍伐，以供印刷有关的评论、理论和预言。马克思被重新改写并找到了他应该拥有的地位。他对进步和技术的朴素热情——以赞同生产力的发展表达出来——因对其理论的另一方面的强调，即对生产关系的强调而得到缓和，当然这种强调是无止境开放的、富有弹性的和人道主义的。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详细阐发，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审查，往往被发现是不够格的，但并不是无可救药的。如果时间允许，所有这些国家都可以得到完善。

然而，灾难降临了。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及其在东欧的所有卫星国崩溃了，柏林墙的倒塌成为这种崩溃的生动写照。而在这个世纪之初，许多人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行将就木，可替代的方案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状态——在这个世纪之中，不管是布尔什维克式的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变种，确实是野蛮的。所有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歪曲性质——也许还包括中国、古巴或南斯拉夫变种道路的优越性——的争论，变得完全无关紧要。人们谨慎地审查1917年圣·彼得堡的社会学，以检查工人阶级是否真的支持列宁（就像列宁所认为的），或者是否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扭曲了的革命；人们还讨论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否是马克思的理论校正者——一切都变得毫无价值。

资本主义已经生存下来——非但如此，而且它还自1914年以来，首次重新变成一种能动的世界性的现象。这表明，一种带有更多承诺的促进技术进步的能力已经出现。在全世界，人们放弃了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自己问题的良方。他们对此毫不掩饰，资本主义才是他们想要的。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很大的潜力；它还没有准备躺下等死。不论是消费不足还是缺乏市场，不论是工人的组织还是他们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上升；不论是帝国的衰失还是石油短缺，或者是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冲击——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东西都有可能对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进行重新审查——但是都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谁还会做出那种预测呢？



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简短的序言中（也就是他提出资本主义可能终结的两年以后，那时他还没有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写道：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sup>[9]</sup>

实际上，自马克思去世后，特别是自1917年以来，所有关于他的评论都试图否认这一点。这一论断，曾经被谴责为粗糙的——事实上是天真的一一“理论”，但它在20世纪末被证实了。社会主义是早熟了，因为资本主义还没有把它的发展能力发挥到尽头。我们忽视了这一简单的真理，仅仅是因为偶然的因素——幸运的是，现在这些因素已经消除——凸现了短暂的20世纪，1914—1989年。为了认清马克思，我们必须不再让这段不幸的插曲纠缠我们的心灵，而是出于所愿望的目的去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即把它作为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的动力、优势和极限的方法。

因此，我们需要清理我们头脑中许多关于马克思的前概念，并运用他的理论，以便理解21世纪之初我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能够永远存在下去吗？抑或它会走向终结而为另一种生产方式所代替吗？这种生产方式是更符合穷人的利益，更符合普通人的利益，更符合当前富国的利益，还是更符合穷国的利益呢？资本主义扩张有没有任何极限呢？如果有，这些极限是什么？资本主义有没有内在限制或外在限制；工人的不满或者实际工资的通货膨胀，生态的限制，复活保护主义的民族主义对抗和区域性集团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等，哪一个看起来是反资本主义的呢？未来是否存在根本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安排——按照它的不同变种来界定——尽管这种未来在下一个或者两个世纪不会到来？

但是，在我继续展开讨论之前，还有一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我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个事实：马克思在他有生之年出版的著作，仅仅是他以书稿形式遗留下来的著作的一小部分。他准备出版的著作具有鲜明的风格——这里有讽刺、反话、隐喻；我们到处还会碰到许多出自古典和现代的文獻、《圣经》、



莎士比亚、海涅和莱辛的引语。<sup>[10]</sup>他留下的往往是一些为自己准备的笔记，阅读过的著作的摘要，对其他人的论点的总结，自己对问题澄清和一些闪烁着才气的分析。如果马克思不被神化，他的许多这类手稿就永远不可能问世。或者是即使出版了，也只能是为了表示尊重。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文献中，存在着一条反向的规则。他的未出版的著作比那些已经出版的著作，通常要受到更大的尊重。他年青时期写的东西比他成熟时期写的东西，更能获得人们的称赞。然而，这里更多地涉及他的理论的政治命运——尤其是在1917年之后，再一次是在1956年之后，正像我上面所讲述的——而不涉及理论本身的内在价值。但是，正是这些他的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是他著作中的一小部分，影响了一些事件。他的那些没有发表的著作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被梁赞诺夫（Ryazanov）系统地找回。他是专门管理这些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移交到苏联的手稿的，这些手稿当初是被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财产保存的。尽管这些手稿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经“流出”一部分，但了解的人仍然极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手稿作为一种理论教规，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但是，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弱点，这些手稿对于事件的影响并不大。（一个主要的例外就是在欧洲大学普遍发生的1968年事件。）因此，在这里我想把讨论的重点放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上，对于他去世后出版的著作，只在必需的时候才涉及——如在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和出版的《资本论》的另外两卷。这意味着更多关注马克思“经济”方面的著作，但这正是我的重点。当我讨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未来时，我将首先要弄清楚，最近50年，我们究竟了解到什么，因为这将对我们的思考方式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马克思像亚当·斯密一样，有一个历史的阶段理论作为背景，但是在有生之年，他并没有出版太多的这方面著作。事实上，他关于一般历史的沉思主要集中在他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这部著作已被用来“让老鼠去咀嚼”。（尽管直到这些手稿被发现，老鼠应该是效率低下，或是不乐意打扰这些旧纸片。）除此之外，他只是以一种破坏性的但是非常紧凑的总结来讨论自己的理论，在19世纪50年代，他一直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他亲自出版的第一部篇幅较长的专题著作，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那年他41岁。这离他承诺的第一部伟大的著作，即继续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展开批判，已经过去了

15年。

但是，1859年的这部著作仅仅起到刺激胃口和防止剽窃的起用。像通常一样，他正在准备的巨著也是从粗略的草稿开始的。而这些草稿，是经过了一遍又一遍的修改的。这些草稿，后来变成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学手稿》，同样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有些观点认为它的价值超过了《资本论》。《经济学手稿》涉及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讨论。一些人认为，这些笔记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的已发表的结论存在着矛盾。因为马克思甚至在拥有这些粗略的手稿之前，就在准备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我的结论是，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因此，我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所做的这个简短提示，是十分简略的——对有些人来说，甚至可以说有点粗糙和机械——但这些看法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但愿讨论马克思也能像讨论亚当·斯密那样轻松随意！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上面提到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顺便说一下，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处使用过“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个词。这个词出现在他晚年写给一位俄国通讯记者的信中。对他而言，资本主义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是从批评黑格尔最成熟的著作《法哲学原理》开始的——这是在他长达6个月的蜜月里写作的！但是，正是他作为新闻记者的工作和一个重要的经济事件，改变了他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事件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所描述的全球化的冲击。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纺纱领域的工业革命并没有立即带来织布领域的类似突破。随着纺纱产出的上升，纱的价格也开始直线下跌，从而导致对于纺织工人的需求迅速增加，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英国，而且发生在整个西欧。其中包括位于德国与波兰交界处的西里西亚。但是，当19世纪40年代织布实现机械化的时候，手工纺织机所创造的长达50年的繁荣瓦解了，纺织工人的收入也随之下降。这就引起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军队应邀镇压了这次起义。一些人认为，需要有更多的慈善事业，另一些人认为应该加强教育，以使人们掌握生产劳动所需的技艺；与此同时，有些人则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缺乏责任心。此时，关税保护的需求也提出来了。今天，面对全球化，这种需求甚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开始寻找国家与它的法律框架、市民社会以及追求经济成就与工人的困境之间的联系。他把德国视为经济上和政治上落后的国家。实际上，

贫困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当他观察英国时——这个国家早在10年之前就已经改革了它的《济贫法》——他知道，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越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他并不赞成关税保护，因为这意味着倒退。在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不包括社论上的文章以及其他类似的文章），即一部从未发表的批判黑格尔的著作的导言中，他写道：

工业与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的一般关系，是现时代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德国？是**关税保护，建立一个封闭的国家经济体系**。因此，在德国，我们将从这样一个起点出发，这就是英国和法国得出的结论……由此看来，法国和英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废除垄断，这是它们进步的最终结果；德国要解决的进步问题是推行垄断，这是它发展的最终结果。<sup>[11]</sup>

黑格尔坚持认为，私有财产是秩序的堡垒，在这种秩序中，代表拥有私有财产者（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等级以及监督公共利益的官僚体制，全部都受到君主的统治。马克思挑战的是这一论断，即官僚体制是超越特殊等级的，因而能够值得公共利益信任，用黑格尔的术语说，是一个普遍阶级。马克思用一种先验的三段论反驳了这种论断。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受到过很好的训练：进行一种内在的批判——一种从内部进行的批判，就是说，把他正在试图进行的研究作为前提，并通过指明它的矛盾性而摧毁这个前提。由于官僚阶层是从有产阶级中征募的，因此它不可能超越阶级利益。惟一能够具有普遍性而且超越特殊利益的阶级，就是那些不代表等级的阶级，就是说，一个没有财产的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正像罗马人所习惯于称呼他们的。马克思用犀利的言词，推翻了黑格尔的逻辑，这听起来确实让人感到敬畏：

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

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sup>[12]</sup>

从风格上看，这是一篇有力量的散文。和黑格尔的历史目的相反，它确定的是社会的完全的自我解放。它同样意味着一种自由观——与斯密的相反——这种自由观的寓意是，如果有一些人没有自由，其余的人也同样不会获得自由。自由不是一种个人的条件或状况，而是一种联合的集体的状况。无产阶级在解放自身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们的压迫者。

这就是说，这里仍然保留着一种哲学的花招，这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常常会以炫耀的风格容易暴露出来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毕竟，正像开头一句话所承认的，德国必须形成自己的无产阶级。当然，英国和法国有它们的无产阶级。但是，那就意味着，你必须通过私有财产、工业化和贫困化去发展生产力，以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直到无产阶级准备解放我们全体。

马克思意识到，在1844年这个临界点上，他对于无产阶级是怎样形成、怎样成长以及怎样组织自己的，知之甚少。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于是，在写完上面——现在被大量引用——的词句之后的20多年中，他都在为这些华丽的辞藻寻找某种坚实的理论。当他写作一些辩证性的小册子和大量未出版的资料时，只是到了1859年，他才勾勒了自己理论的大致轮廓，到了1867年第一批丰硕的成果才成熟。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有难度的科学。

然而，在接下来的5年，他的观点仍然带有明显的德国色彩。正是在从理论上把德国概括为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一个落后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关注到与英国和法国的对比，并以此作为一种告诉德国人他们错在哪里的方式。他很快与黑格尔派划清了界线，并与恩格斯一道迅速阐明了自己的历史理论。这个尚未出版的著作的题目后来披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有着600多页的大部头著作，是包含着对一些旧账的冗长的清算，对于其他青年黑格尔成员也进行了大量幼稚的嘲讽。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能够被人们记住，即使马克思不蔑视他们。但是，在这部书的开头的百余页的篇幅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勾勒了自己历史理论的轮廓。由于他们



的兴趣是解释现在以构想未来解放的前景，因此，他们不需要去严格解释所有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马克思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雄心具有普遍意义，可能就什么也不是了。但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他很快把这些丢在一边，开始去研究政治经济学。

然而，只有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才能算得上马克思认为值得出版的第一部主要的著作。尽管如此，这部著作相对于其后8年才出版的另外一部大部头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只不过是一种正餐前的开胃品。《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今天被人阅读的主要是它的序言，因为它包含了马克思认为读者应该了解他的全部历史理论。不仅如此，实际上它还包括了对马克思是如何达到这个临界点的传记性描述。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亚当·斯密的阶段模式非常相似。亚当·斯密用生存方式时，马克思用生产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庞大的法律和政治体制的结构都是在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的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的生产方式阐述得稍微清楚一些。当斯密用下列术语时：

- 猎人/采集者
- 田园的/游牧的
- 农业
- 商业

马克思则用：

- 原始共产主义
- 古代的/古典的
- 封建制度
- 资产阶级

为了肯定所包括的范围不只是涉及欧洲，马克思还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sup>[13]</sup>无论如何，这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了黑格尔影响的结果。他对宗教做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分类——犹太教、经典的古希腊/古罗马宗教和基督教。他在别处对亚洲宗教做过评论，但没有把它们整合到朝着理念的螺旋式上升进程中。同样，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显得有点异常。正如马克思所做的那样，我也暂时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放在一边。（后来，当每个人都认真对待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斯大林为了表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错误的，把好几百人投进了集中营。1927年在煽动中国革命方面，他的赌注失败了，他为此不得不找个替罪羊。）



除此之外，在亚当·斯密的模型中，基本的思想是解释现在；过去不过是一个讨论的背景。对于斯密来说，背景之所以有用，还在于对研究财产权和法律的发展有帮助。对马克思来说，在每个早期的形态中，之所以必须追溯传说，是因为要确定能够煽动变革的阶级。他们想解释的历史始终是——这对马克思和斯密都是一样——西北欧的历史；法国、德国和英国，以及我们如今所说的班鲁克斯（Benelux）国家，即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联盟。希腊和罗马在古代时期塑造了欧洲形象，但后来模糊了。伊比利亚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东欧不在此列。这是一个历史理论，不管后来对它提出过什么要求，它总是设制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即解释西欧是怎样走向现代的。

这一理论也完全没有考虑外部的影响。斯密与马克思都注意到，在所谓的黑暗时代存在着一个技术衰退的长期裂隙：从罗马帝国的终结到高度封建主义的时代——长达4个或5个世纪之久。西北欧又回到了自然的——也即实质上是非货币的——经济。进步真的是停止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还相信进步的必然性呢？这些细节困扰着斯密，这正如我们从《国富论》第五卷中所看到的；但是，就我个人的观点，一般历史的理论并不是斯密和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他们想研究和改变的是当下。马克思基本上没有为这种技术衰退所困扰。但是奇怪的是，伊斯兰社会的动力机制在这里被完全忽略了。在公元7世纪和14世纪之间，伊斯兰社会无论在军事还是在科学方面都主宰着欧洲。这种动力机制带来的结果是，阿拉伯人统治了西西里（Sicily）、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十字军东征是主要的外部接触。中亚大平原把他们的游牧军团输送到维也纳的大门口。所有这些都被忽略了。欧洲的变迁好像完全是内生的。它之所以具有意义，只是因为斯密和马克思从事著述之前，几乎是真实的：西北欧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这些生存或生产方式显然是千禧年的插曲。斯密的农业方式，介于出园时代与商业时代之间，覆盖了欧洲几千年的历史。马克思的古代的/古典的方式显然覆盖了希腊和罗马时代，同样记载了一千年的历史。封建时代，又把历史延伸了另外的一千年。单个的王朝和国家的历史，等等，都被包容进去了。这不是描述的历史，这是分析的历史。如果这样的话，就有必要完成两项任务。它必须解释，任何独特的生存/生产方式是如何运作和如何持续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要解释是什么使它生产和再生产了自身。在这些方式中生存的人们是如何获得生存资料，并且在这样做时，为了使自己能



够继续生存，又是如何使这些条件存在下来的？因而，就不得不解释从一种方式到另外一种方式的过渡：事物的变化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怎样使一种方式取代另一种方式的？当然，后来的方式发展了早期的方式。因此，在商业时代，你可能仍然拥有与之并存的田园的、农业的甚至狩猎的方式。在这种分析的故事中，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商业的方式和田园的方式可以同时存在于田园时代。时间只有一个方向：不断向前。<sup>[14]</sup>

在马克思的情形中，相关的故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释得既严格又简略。在某一生产方式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sup>[15]</sup>这句话无论如何没有偏离关于苏格兰人斯密生存方式的范畴。人们形成的这种关系可以表现为奴隶/奴隶主、农奴/地主、购买者/销售者、纳税人/征税人。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人们为了日复一日地生存下去，这些社会关系是必需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sup>[16]</sup>这句话的前半句仅仅是一个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定义——例如，在现时代的背景下谈到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引起人们许多争论的是后半句话，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类比。亚当·斯密的一个学生，约翰·穆勒在《行业的起源与差别》(*Origin and Distinction of Ranks*)一书中第一个从苏格兰哲学中梳理出如此宽泛的结论。<sup>[17]</sup>马克思承袭了这一传统，尽管他对后来研究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这里的问题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是存在一种单线的连接还是一种双线的连接呢？如果两者之间存在反馈，那么经济基础仍然被认为是首位的吗？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并不妨碍我从马克思那里获得需要的东西。

马克思真正离开苏格兰方式的时候，也正是他接近社会过渡的时候。可以再次援引他的一段话以说明问题：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18]</sup>



让我们回顾一下亚当·斯密所发展的财产权的历史。随着事物的进步，新的财产权必须被界定下来。狩猎方式下从事的工作在田园方式下不再从事了。定居农业导致了多种形式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在广泛意义上说，在生产力和技术与权利的框架之间存在某种一致。这种感觉与这一观念是符合的，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权利的框架会落后于生产力，变为一种桎梏，就需要变革这种权利的框架。然而，由于这是千年的历史，这种变革涉及的并不仅仅是立法的问题或是习惯权的变革。因此，这是一种比社会革命更大的转变。因此，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甚或必然的联系。“或慢或快地”这个条件句提供了可机动的空间。但是，如果欧洲离它所阐述的权利和法律的结构很遥远，如果又要使变革成为必要，就必然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时期，到那时，事物的变化足以标明要与过去彻底决裂。

当然，这个序言没有提到阶级的作用。在另外的文本——《共产党宣言》的最著名的一段话中，马克思指出，随着它从旧的结构中吸收成果，有一个阶级要承担抵制权利的框架变革的责任。因此，另一个坚持要获得成果的阶级将会挑战并推翻这个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对于马克思来说，最近的例子当然是法国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了。（据我所知，这样的分析很简化，并不是太不准确。这自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这种革命并没有在德国发生，而在英国则比法国早发生了一个世纪。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必须遵守的规则，也不是一个精确的代数公式，就像后来人们把它所弄成的那样。

社会过渡的正面是这一观念，即一种生产方式只有在它消耗尽自己的潜力时才能消失。这个观点前面已经引证过。在引证时我曾说过，这一点被那些持有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观念的人忽视了。毕竟，我们必须返回到资本主义这个初始条件。但在我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对19世纪90年代广为流行的对于资本主义灭亡的预期给一个结论性的说明。由于古代的/古典的生产方式像封建生产方式一样，都延续了一千多年，为什么会有人认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在一两个世纪之内就会消失呢？

#### [注释]

[1] 参见 Leopold Schwarzschild (1948), *The Red Prussian: The Life and Legends of Karl Marx*, Pickwick Books, London.



[2] 有关鲍威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背景，见 David McLellan (1969),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Macmillan, London; Harold Mah (1987), *The End of Philosophy and the Origins of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Daniel Brudney (1998), *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Karl Marx (1844/1970),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由约瑟夫·欧马里 (Joseph O'Malley) 编辑并撰写序言 (19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序言首先发表于 *Deutsche-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Paris), trans. included in O'Malley (1970), pp. 131-142, also reprinted in Karl Marx (1975), *Early Writings*, Pelican Marx Library, 卢西奥·加罗蒂 (Lucio Colletti) 作了序言,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and Gregor Benton, Penguin, Harmondsworth, pp. 243-25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5/1956), *The Holy Family, or Critique of Critical Criticism Against Bruno Bauer and Company*,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845 by Literarische Anstalt, J. Rutten, Frankfurt; trans. Richard Dixon and Clements Dutt,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56.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6/1964), *The German Ideology; Critique of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Its Representatives*, Feuerbach, Bauer and Stirner (vol. I); and of *German Socialism According to its Various Prophets* (vol. 2). 德文版于 1932 年由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首次出版。俄文译本 (没有标明翻译者)，于 1964 年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Progress Publishers) 出版。

[3] 关于马克思离开哲学的情况，见 Brudney, *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8/1888), 《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由共产主义者同盟出版，并由海伦·马克法兰 (Helen Macfarlane) 首先译成英文，并于 1850 年 11 月在《红色共和》(*The Red Republican*) 杂志上连载。最广泛采用的版本是由萨姆·摩尔 (Sam Moore) 和恩格斯合译的 (1888)。

有关《宣言》出版和被接受的最近记录，见 Mark Cowling (ed.) (199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Interpretation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especially articles by Terrell Carver: 'Re-Translating the Manifesto: New Histories, New Ideas', pp. 51-62; and Ian Thatcher: 'Past Receptions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p. 63-74.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199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ow: Socialist Register 1998*; 最好看一下 Shelia Rowbotham, 'Dear Mr Marx: A Letter from a Socialist Feminist', pp. 1-17.

Karl Marx (1859/1904),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eisner, Hamburg. English translation (1904) by N. Stone, Charles Kerr, Chicago.

Karl Marx (1867/1887), *Capital Volume 1: Capitalist Production*, German Publication Otto Meisner (Hamburg), trans. from the third German edition by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in 1887, Swan Sonnenschein, Lowry & Co., London. Since then several editions, including Pelican Library.

[4] Karl Marx (1871/1951),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Workingman's Association (London). 英文译本为 *Se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51。这是我所能发现的最早的英文译本。

[5] Karl Marx (1885/1919), *Capital Volume 2: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 ed. Friedrich Engels, 德文本由奥托·梅斯纳 (Otto Meisner) 首次在汉堡出版, 第一个英文本于 1919 年由查里斯·克尔 (Charles Kerr) 在芝加哥出版。其后, 各种版本分别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和伦敦的劳伦斯和威夏特出版公司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Lawrence & Wishart) 出版。也包括鹈鹕出版公司的马克思文库 (Pelican Marx Library)。

[6] Eugen von Böhm-Bawerk (1896/1949) 'Zum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 in O. V. Boenigk (ed.),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Arbeiten: Festgaben für Karl Kneis*, Berl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Paul M. Sweezy (ed.) (1949),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Augustus M. Kelley, New York.

[7] For Edouard Bernstein, see Peter Gay (1952),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o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Edouard Bernstein (1899), *Die Voran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J. H. Dietz, Stuttgart; trans. (1909) *Evolutionary Socialism*, Huebsch, New York.

[8] Rosa Luxemburg (1913/1951),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首次以德文版出版于 1913 年, trans. Agnes Schwarzschild (1951),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9] Karl Marx (1859/1971),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S. W. Ryazanskaya, ed. Maurice Dobb,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P. 21.

[10] 关于马克思的文体风格, 见 Stanley Edgar Hyman (1961), *The Tangled Bank: Marx, Darwin, Frazer and Freud*, Atheneum, New York; S. Praver (1976)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1] Marx, *Early Writings*, p. 248.

[12] *Ibid.*, p. 256.

[13] 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存在着大量的文献: Stephen Dunn (1982),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Brendan O'Leary (1989),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Blackwell, Oxford; Lawrence Kradner (1975),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ssen, New York; Karl Wittfogel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

[14] 有关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的问题，在斯威齐 (Sweezy) 的文章以及其他由保罗·斯威齐编和洛得尼·希尔顿 (Rodney Hilton) (1978) 作序的文章中都有过探索：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Verso, London。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见 Maurice Dobb (1946),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5] Marx, *Critique*, p. 20.

[16] Ibid.

[17] John Millar (1806), *The Origin and Distinction of Ranks*, Edinburgh, 4th edn, also published in William C. Lehmann (1960), *John Millar of Glasgow 1735—1801: His Life and Thought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Sociological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See also Michael Ignatieff (1983), "John Millar and Individualism" in Hont and Ignatieff (eds) (1983), pp. 317—344.

[18] Marx, *Critique*, p. 21.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5 章 马克思 II：利润

马克思感兴趣的基本问题，是什么秘密因素导致资本主义突然之间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反抗是一个例子；他的朋友恩格斯所描述的曼彻斯特工人的贫困，是另外一个例子。<sup>[1]</sup>综合考虑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不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地带还是边缘地带，资本主义体制创造的，同样是一种繁荣与贫困的混合物。只不过在中心地带，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双重性的过程，而在边缘地带，看到的只能是贫困。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边缘地带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变成中心地带的样子。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趋势？实现这种趋势需要多长时间？

当马克思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的著作时，他自然知道，他们并没有答案。斯密看到了劳动分工的重要性，把它视为大幅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原因。大卫·李嘉图把斯密的价值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向人们展示，地主所得的地租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来，完全是由于地主所不能控制的力量造成的经济增长。在19世纪早期，当李嘉图指出地租属于非劳动所得时，地租还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他还进一步指出，取消这部分所得，不会对土地种植以及其他活动产生不利的影 响。托马斯·马尔萨斯为这种基于土地的非劳动所得提出了辩护，认为它是奢侈消费的一个来源，这种消费对于缓解由于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萧条是必需的。李嘉图对此提出了反对的理由，认为任何产品的供给都会同时创造收入，以满足这个或那个部门的需求。他认为不会出现过度繁荣与不景气。他解释说，一个部门的过度增长，将引起其他部门的相应下降，但是最终这些不平衡将变得平稳。不同部门驱使活动的过程就是追逐利润的过程。如果一个部门的利润高于另一个部门，资本将从利润低的部门流向利润高的部门。正如水总是要找到自己的水平面一样，利润率——资本利润率——总要找到同样的水平面。<sup>[2]</sup>

李嘉图——或者，事实上也包括其他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没有讨论利润的来源问题。斯密提出，工资、地租和利润大致代表了收入的三个门类，它们分别属于三个阶级：工人、地主和资本家。工资一般与劳动者的生活费用相关，在确定能够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时，还要考虑某些道德的和历史的因素。李嘉图认为，地租来源于土地最初的和固有的财产。当人口增加时，那些最贫瘠的（边际的）土壤将收不到地租。因此，地租是越来越多的土地得到耕种因土地肥瘠不同造成生产成本不同而引起的粮食价格之间的差额，土地肥沃，生产成本就低，土地贫瘠，生产成本就高。

因此，工资是由劳动者的生活费用决定的，地租是由纯粹的剩余产品决定的。但是，利润是怎样决定的呢？不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对此都没有太多的说明。他们所说的，无非是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利润的平均化趋势。但是，如果不考虑这种平均化，利润率水平是如何决定的，仍然是不清楚的。

马克思把此视为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提出了一个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这似乎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价格是如何决定的理论。因此，如果价格是由劳动价值决定的，工资是

由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费用决定的，那么利润能否在这个框架内得到解释呢？

马克思所受的黑格尔哲学的训练，使他可以在更深和更一般的水平上来表述这一问题，而这种方式与英国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是完全不相容的。他使用了内部批判的方法。这意味着完全把握古典政治经济学，接受它的逻辑，并提出一种更好的内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来揭示和解决内部矛盾。

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一个劳动价格理论，但并不是关于工资或者利润的劳动理论。如果某种商品的劳动含量可以解释其价格（就像那时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的），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关于工资的劳动理论？为什么把利润放到一边，而不把它纳入同一个价值理论中？

如果不考虑地租，产品的价格将是由工资、物质资料的投入成本和利润组成的。马克思从这样一个简单假设开始，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它的价值决定的——换句话说，就是由它的劳动含量决定的。当然这个假设也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可。他接着推论，如果价格与产品的劳动总含量相等的话，那么人们可以把它分解为劳动投入的劳动含量、原料投入的劳动含量和利润的劳动含量。但是，什么是劳动投入的劳动含量呢？——这不正是一种同义反复吗？难道劳动投入的劳动含量不是一定数量的工作时间吗？工资恰好是一定工作时间的价格。原料投入是先前阶段的产品，它们的贡献可以由生产它们的劳动含量来衡量。然而，什么是利润的劳动含量呢？

马克思用一个优美的概念装置，巧妙地解决了这一棘手难题。劳动时间当然是从量的方面衡量价值的一种方式。但是，不能把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内的劳动，与衡量价值的劳动混为一谈。工人的时间也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实际上，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那里，劳动时间第一次无所不在地被卖。于是，劳动时间的价格和原料投入的价格，必须由同样的价值理论来解释。

马克思接着在政治经济学中，用众所周知的技巧实现了自己的突破。每个商品都包含两种价值：在使用中表现的价值（使用价值）和在交换中表现的价值（交换价值）。价格是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交换价值的理论。商品是以它们的交换价值出售的，但是购买者买的是它在使用中表现的价值。现在，尽管使用价值被认为是无法衡量的，无论如何，它从来就不等于任何商品的交换价值。购买者要得到比交换价值更多的使用价值，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不会购买这种商品。最坏的情况是，使用

价值会等于交换价值。对于出售者来说，这种不相等又有了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交换价值会超过——或者最少要等于——使用价值。这是因为，当交换价值对于购买者和出售者来说是相同的时候，它们的使用价值可能是——根本就是——不同的。

因此，商品被购买是因为它具有使用价值，但需要按交换价值支付，而这两种价值可能不相等。劳动力作为商品具有它的交换价值（工资），但它也有自己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被资本家作为生产投入而购买——是工人花在工厂中的工作时间量，这样，当使用价值不能按照通常的方式进行计量的时候，在劳动力作为投入而使用的情况下，其使用价值正是通过其花费的时间来衡量的。（马克思还考虑了其他方面，例如劳动强度，分别体现在对工厂程序的管理所做的开创性分析方面。一个简单的定量方法，足以最低限度地满足这一目的。）

这样，如果使用价值是一定量的工作时间，那么交换价值又是什么呢？这里马克思实现了另一个突破，因为他预见到了20世纪广为人知的投入产出分析法。被界定为交换价值的工资花费在购买一篮子的商品：食品、衣服、住房、取暖和交通，等等。现在，对于花费工资所购买的所有这些商品的劳动含量，可以按劳动时间增加一个工资的尺度。这样，同工人的工作时间相比，就有一定量的用来生产商品的时间被以工资形式购买了。注意，这里并没有假设工资仅限于维持生存的水平，也没有假设工人作为消费者没有自己的选择。

因此，马克思通过提供一种惟一的价格、工资和利润的理论，破解了这一基本问题。区分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以及确定其同等的量化尺度，构成了这一突破的核心。<sup>[3]</sup>

当资本家从工人那里购买劳动力时，要按交换价值——表示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来支付工资：工人的工作能力。这是劳动力的出售者（工人）与劳动力的购买者（资本家）之间进行的自愿交换。但是对于购买者来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大于资本家支付的交换价值，这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这样，工资的劳动含量（一篮子物品所代表）就明显地——事实上也必然地——要少于购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所包含的劳动含量。

迄今为止，马克思所使用的只是古典的劳动价值理论。他的创新之处在于把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者）作为一种商品，并派生出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量化表达方式。这使他能够对利润作出自己的解释。正是这种按劳动价



值理论来解释利润的做法，使马克思的经济学自此以后永远地成为有争议的对象。

引起这种争议的原因之一，是马克思在这个时期所使用的语言。工资的劳动含量被马克思称为必要劳动。使用价值（总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之间的差额被他称为剩余劳动或者剩余价值。这样：

$$\begin{aligned}\text{剩余价值(劳动)} &= \text{使用价值} - \text{交换价值} \\ &= \text{总劳动时间} - \text{必要劳动时间}\end{aligned}$$

以通常每周工作 40 小时为例。让我们假设工人的周工资是 200 英镑。我们需要知道用 200 英镑所购买的一篮子的典型商品——食品、衣服、房租和娱乐。用一张投入—产出表，就可以统计出生产这一篮子商品所需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劳动时间。农场生产出的食品，花费了农民的劳动时间，外加种子、拖拉机、收割机、肥料和杀虫剂，等等。这些东西转而又是由劳动生产的，外再加上机器和其他投入。这些投入中的每一项东西转而又是由劳动生产的，外加上机器，等等，依此类推。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投入—产出分析用适用的数据来测量。马克思的理论预言，当这些测量最终完成的时候，工资的劳动含量将证明少于 40 小时——比如，通常是 20 小时，而另外 20 小时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

通过这一简单计算，马克思导出了另两个衡量指标。其中之一是剩余价值率，或者称为剥削率。对道德上受谴责的“剥削”一词的这种用法，在马克思看来，是有“科学的”内涵的，但它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

$$\text{剩余价值率} = \text{剩余价值} \div \text{必要劳动时间}$$

当然，迄今为止，其他投入的贡献还没有讨论到。毕竟，劳动的生产力依赖于机器。机器的贡献在哪里？这被计算在总价值的分析中。可以认为总成本等于工资成本加非劳动投入的成本。机器、原料、能源等的贡献，可以用投入—产出表中同等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这样，一台机器对最终产品的贡献将等于它的损耗（一般称为折旧），这种损耗可以用一定比例（百分比）的机器的总价值来表示。机器作为一件完成的商品，它的总价值可以用包含于其中的总劳动投入来衡量，就像在所有其他情形中一样。因此，如果一台机器包含 100 万劳动小时的投入，它每年损耗 2%，那么 2 万小时将是机器对最终产品的贡献。

马克思把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非劳动投入放在一起归为一类，并给它贴



上了不变资本的标签。由于资本家也需要提取货币（资本）以支付工资，马克思把这种劳动投入的交换价值称为可变资本。这样，总产出价值就可以表示为：

$$\begin{aligned} \text{总产出价值} &= \text{劳动的使用价值} + \text{不变资本的使用价值} \\ &= \text{剩余劳动(剩余价值)} + \text{必要劳动(可变资本)} + \text{不变资本} \end{aligned}$$

这里要注意，对非劳动投入而言，马克思假设，其使用价值等于交换价值。这是因为，在非劳动投入的交换中，购买者与出售者双方都是资本家；因此，任何剩余价值都已经在售给购买者之前，被出售者攫取。即使存在差异，它们在整个经济中也被抵消了。对于劳动力而言，使用价值超过了交换价值。这是因为，资本/劳动的交换是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的贯穿一种阶级划分的交换。这样，当所有投入赋予产出以价值的时候，劳动力只对剩余价值作出了贡献。

在进一步讨论这点之前，让我说明一下马克思对于利润率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利润率就是剩余价值对所消费的总资本的比率。因而：

$$\begin{aligned} \text{利润率}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总资本}} \\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可变资本} + \text{不变资本}} \end{aligned}$$

现在，我们可以把剥削率与利润率联系起来，因为这样可以阐明非劳动投入的重要性。稍微变动一下可以得出这样的公式：

$$\begin{aligned} \text{利润率}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可变资本}} \times \frac{\text{可变资本}}{\text{总资本}} \\ &= \text{剥削率} \times \text{工资占总资本支出的份额} \end{aligned}$$

这样，利润率就成了一种剥削率与不变资本占总资本支出的份额的产物。马克思把不变资本（非劳动投入）与总资本的比率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这样，可变资本与总资本的比率就等于1减去资本的有机构成。因此，便得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

$$\text{利润率} = \text{剥削率} \times (1 - \text{资本的有机构成})$$

就马克思所关注的而言，他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一种关于利润率



源的解释，而这一解释并没有违背劳动价值理论的任何原则。通过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引入一种差额，资本家由此获得了剩余价值。

资本家在劳动和机器方面的投资决定了利润率，但关键的东西还是劳动力贡献的。

尽管现在看来，解释马克思的计算并非一件难事，但当初他得到这个结果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事实上，在19世纪整个50年代，他从战场回到图书馆，就是为了寻找这个结果。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即他写作有关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事情将近20年之后，他找到了这种解答。他最终把资本主义的秘密追踪到它剥削劳动的诡诈的方式，但是，他做到这点，并不是通过对资本的道德谴责，而是通过使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劳动价值理论。他创新了劳动力的概念，并表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额是可以测量的。他接着把剩余价值与利润联系起来。这是一个“科学的”剥削理论。

当然，一旦马克思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就立即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这种争论从来就没有减弱过。甚至到了今天，马克思的利润理论仍然是充满争议的。

这种争议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但它的核心是围绕这一观点而展开的，即只有劳动力——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源于活劳动。非劳动投入拥有价值，但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如果这是正确的，为什么任何人还使用机器？按照这样的推理，任何比对手更多使用机器的人将会失败，因为他的有机构成将会提高，如果投入的可变资本少，他就可能拥有较低的剥削率。

这种强烈的反对意见很早就面临着——甚至在1867年之前就面临着。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就写出了所有《资本论》三卷的草稿。然后他着手整理出版他的《资本论》第一卷。当恩格斯读到《资本论》第一卷相应部分的清样时，就曾立即提出了这种反对意见。马克思的回答是，他已经预料到这样的批评，但是在第一卷中，他只能使自己的分析简单些，让价格与价值彼此相等。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如果他的批评者说他错了，那么在最后一卷中他应该说明，为什么他是正确的，而别人是错误的。<sup>[4]</sup>

马克思从来没有准备出版另外两卷。事实上，他在1867年之后的16年

生命中，几乎没有为它们做任何工作。监督把《资本论》第一卷翻译成不同的文字，对这个版本进行小的修正，占用了他的工作。他也转而研究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并做了大量的民族学方面的笔记。他变得很出名，因为人们（错误地）赞扬他煽动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他与世界各地的人通信，大声抱怨自己的痛苦（他有痔疾），但他并没有修订或更新《资本论》的另外两卷。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两年后，也就是在1885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在序言中，他对马克思的评论者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些批评者试图着手解决这一马克思计算制造出的难题。如果只有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利润只来源于剩余价值，假如给出我们观察到的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不同比率，利润率在不同的资本之间是如何趋于相等的呢？换句话说，（非劳动）资本与利润率有没有关系呢？

当马克思的解决方式在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中发表的时候，并不让人满意——事实上，它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知道的（所谓的）“转化问题”。像其他有名的难题一样——例如费马大定理，或者变圆为方——这种“转化问题”在1894年以来的100多年中被“解决”了好几次。在展开这一问题和它的解决方法之前，让我先说明使这一问题获得了神话般地位的原因。

马克思曾经认为，寻找利润率的线索将产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理解，这种批判性理解转而会有助于摧毁资本主义。马克思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对这部著作的出版所抱有的希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部著作几乎使他的家庭经历了20年的大量不幸。马克思对于他年轻时写下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抱有严肃的信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由于发现了打开资本主义大门的钥匙，他以像黑格尔解释世界同样深刻的方式，完成了解释（理解）资本主义的哲学任务。既然已经追踪到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剥削工人，那么，改变世界的任务，即推翻资本主义，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马克思找到的解答是有缺陷的，那么任何以此为基础的变革方案也都是有缺陷的。对于有着某种哲学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正确解决“转化问题”的方式，已经成为类似推翻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这也许言过其实，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一直在于它的科学基础。据说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剥削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证明”甚至使马克思主义者更加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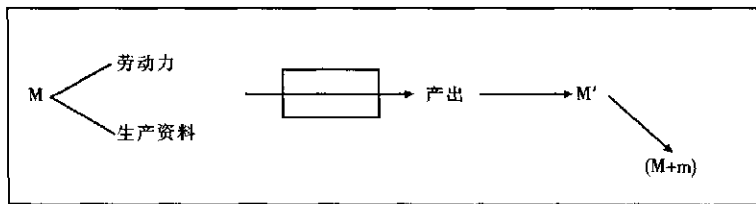
信，他们的事业是正当的。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漫不经心。反驳马克思，或者推翻他关于利润源于剥削的论点，几乎成为一场智力上的十字军东征，遍及欧洲和北美，尤其是德国和澳大利亚。尤金·冯·柏姆-巴维克，这位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的著名文章。他一直等到三卷《资本论》全部出版。如今他指出，马克思提出的解答，与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给出的，是前后不一致的。从那时到现在，反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把这一看法作为定论：马克思的体系是不连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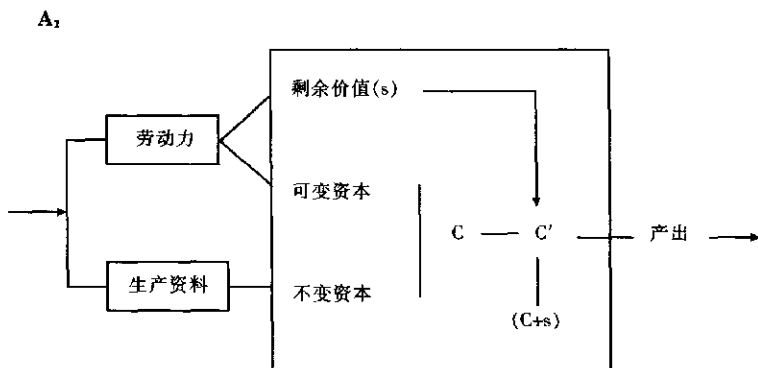
那么，马克思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他设定了两个彼此独立的“说明”——一个是价值上的，它是肉眼看不到的；另一个是价格（或货币）上的，它是肉眼看得见的。（这种程序在经济学中并非罕见。消费者从消费中获得的效用，是不能观察和基本上不可测量的；但是以此为起点，就能够推演出可测量的商品与服务需求曲线。）

A<sub>1</sub>

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一个资本家愿意预付（投资）一大笔钱  $M$ ，他用这笔钱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设想资本家在租用而不是自己拥有所有的机器和建筑物），由于有了这些投入，产出自然就生产出来。这些产出出售之后获得的那笔资金  $M'$  通常要大于  $M$ 。这样， $M'$  就等于  $M$  加上利润 ( $m$ )。这些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



马克思的解答是，当  $M \rightarrow M'$  循环就是你所看到的东西的时候，这种可看得见的过程背后，恰好隐藏着一种创造价值的过程。为了看清这一点，让我们透视上面图表中的空盒里装着些什么。



这个图表呈现了空盒的内部，它介于物质投入和物质产出过程之间。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被分成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这已经解释过了。马克思称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和为  $C$ ；价值上的产出为  $C'$ ，也就是  $C$  加上剩余价值  $(s)$ 。因此，从物质形态上看，产出是在物质投入—产出过程结束时才出现的。看不见的剩余价值  $(s)$  是看得见的货币利润  $(m)$  的来源。

马克思的利润理论就这样把看不见的价值过程与看得见的货币过程和物质投入—产出过程联系在一起了。

在价格领域，利润率是相等的，它们都是用利润与资本的货币价值的比率来衡量的，正如现代簿记所做的那样。在价值领域，并没有任何强制力量让利润的价值率彼此相等，因为这样的不等式既看不见，也不能把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

于是，《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微积分，它假定价格完全随价值而变化，就不得不被一种更复杂的微积分所取代。价值是经济学家作出的心理估计，而价格和货币总量则是显而易见。因此，必须建立一座沟通价值和看得见的价格的桥梁。一个方案是，假设一个经济中所有利润的总和  $(\sum m)$ <sup>[5]</sup> 等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和  $(\sum s)$ 。这样，尽管一个单个公司的利润与它的剩余价值不相等，但是从整个经济来看，所有的利润都来自剩余价值。这样，在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便架起了一座桥梁。另一种方案是，假设所生产的所有价值的总和  $(\sum C')$  与所有产出的货币总和  $(\sum M')$  是相等的。这两种方案中的任何一种方案，它们建立的这两座桥梁，都是要创立一种方式，把



按劳动时间衡量的价值转化为货币总量。它们都盯住了单位劳动时间的货币价格，不管是包含在活劳动中还是包含在机器中。

无论用哪种方案，马克思的解决方式是想说明，利润的货币率具有能够被某些商品的价格平均化趋势。当一些商品的价格超过价值时，另外一些商品的价格会低于价值。含有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总资本的比率）的商品，它的价格/价值的比率大于1。对那些有机构成低的商品，价格/价值的比率就小于1。

表述马克思的解答的另一种方式，是要说明，当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时候，也存在着对这些公司（资本）的补偿，这些公司使用了高于平均水平的机器劳动，因为它们的价格/价值比率大于1。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价格形成过程中的这种不平衡，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割让给机器密集型产品。

如果上面的讨论过于复杂，我不得不说，它已经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中的论述要简化得多。马克思的解答是杂乱的和不完善的。他举了一个涉及五个公司（资本）的例子，这五个公司的有机构成是不同的。但是接着，为了证明他的解答，他又通过它们的价格/价值比率增加了产出，但是忘记了投入也是商品，同样需要进行类似的“转化”。

无论如何，当马克思在细节方面是错误的时（他留下了未修订的、未整理加工的手稿，等待恩格斯出版），他的解答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尽管价格偏离价值，但并不显著，而且是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偏离。我们现在可以表明，由于某些方面的发展，例如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许多比马克思做得更优雅的研究，都是由马克思自身的观念开创的。在1907年，德国统计学家拉迪斯劳斯·冯·波特基维兹（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就提出过一种较早的解答。<sup>[6]</sup>从那以后，各种解答开始增多，它们对于马克思阐述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提出了新的反对意见。

在表述逻辑上说，利润仅仅源自剩余价值方面，存在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有简明的、无可辩驳的假定。但是，即便同意这一点，马克思的问题还是太错综复杂了，因为对任何商品的价格的解答，都不能独立于对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的解答而计算出来。把机器投入还原为劳动含量无疑是一场噩梦，这场噩梦是由有关机器的寿命等诸如此类的思考所引发的，这种思考还有，例如，新的发明会使机器变得无用或无价值，等等，尽管劳动时间已经变成了它的产品。（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对耐用资本的思考也受到类似问题的纠缠。在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大约15年的光景里，这导致了大西

洋两岸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参加了的著名的“资本论战”。<sup>[7]</sup>

令人吃惊的是，尽管存在着这些逻辑问题，这一理论却得到了经验的有力支持。如果你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劳动价值，并把它们与有代表性的产品目录中的价格相比较，就可发现，价格与价值并不匹配，但是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偏离非常之小，而且它们正好是向着马克思所预言的方向走的。这一有力的经验结论首先由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安沃·谢赫（Anwar Shaikh）教授确立。他采用了意大利（1959年和1967年）和美国（1947年和1963年）的投入—产出表，并审查了两个时期中同一时段的价值与价格的相互关系。他分别检查了25个和83个部门，发现两者之间有着令人吃惊的密切而稳定的相互关系。这些结论在1987年进一步由彼特洛维奇（Petrovic）用南斯拉夫的数据所证实。<sup>[8]</sup>因此，价格—价值的联系一直是密切而稳定的。如果价值下降，价格也随之下降；而且幅度都惊人地一致（例如，都有一致的弹性）。于是，尽管存在着各种异议，但经验的结果支持了马克思。

一个人可以承认价格与价值成比例，但却会拒绝承认，所有的利润都来自对劳动的剥削的结论。首先，马克思的微积分忽略了创新的重要作用，这些创新在许多产业领域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了技术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作用，他还强调持久的竞争压力迫使资本家降低成本，寻找生产旧产品的新方法，甚至制造出全新产品。他用这些论据来解释利润率的运动变化，然而在他看来，利润率水平在任何时间点上仍然完全独立于资本的贡献。

本书不是要为马克思做最后的防卫性辩护，因此，我并不准备详细说明，为什么马克思没能把他对利润率的动力的定性分析与他对价格/价值和利润率的定量分析结合起来。然而，从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观点，它对理解作为当代资本主义重要特征的全球化，是至关重要的。

## 倒置马克思

让我们把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见解颠倒过来。也就是说，让我们使马克思来个倒立，像他曾对黑格尔所做的那样。真实情况是，没有一个资本家雇用这样的雇员——他或她生产的价值少于资本家雇用他们时所支付的费用。这样，如果工资上升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雇佣工人的支出与工人生产的价值非常接近，资本家很可能选择迁移工厂，以免遭受损失。



这种倒置的结果是影响深远的。马克思把整个过程都看作充满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冲撞。他意识到，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就业将会增多，失业将会减少。这可能给工资造成压力，从而提高工人在总利润中所占的份额，降低资本家所占份额和利润率。马克思指出，在这样的时期，资本家将会引入节约劳动的技术，抵制就业和工人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降低。10年至20年这将产生一个商业周期。但是，马克思也同样确信，恢复利润的努力不仅会产生商业周期，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利润率将趋于下降。利润率下降是所有传统经济的永恒论题。但是，在马克思的世界里，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变得与维持资本主义生存的盈利能力本身纠缠在一起了。

下面，我将回过头来讨论商业周期以及利润率的长期趋势，但是，如果我们运用了自己的倒置的话，上述分析中有一个结果是十分清楚的。如果就业率依赖于高利润率，工人将与雇主合作以维持高利润。这同那种认为资本和劳动始终处于对抗状态的学说是直接对立的。如果工人明白“没有利润，就没有就业”的规则，他们就会起来斗争，但不是为了提高工资在总产出中的份额，而是为了分享使自己的就业机会最大化。如果对高利润率的替代方案所带来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资本的外流，从而为其他国家创造就业机会，使本国工人失业，那么上述为争取就业机会而进行斗争的局面将可能出现。<sup>[9]</sup>

即使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诋毁马克思的利润理论的时候，剩余价值的基本思想在当代的讨论中仍然被经常应用。因此，如果我们称剩余价值率为  $e$ ，那么  $(1+e)$  就是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与工资的比率。现在，我们说一个公司、一个部门或一种经济有竞争力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以产出的单位劳动成本来衡量的。单位成本越低，产品/部门/经济的竞争力越高。另外一种表述方法是：剥削率越高，单位成本越低，经济越有竞争力。这是因为， $(1+e)$  的倒数是与产出的单位劳动成本或者竞争力的程度相等的。

$$\text{产出的单位劳动成本} = 1/(1+e)$$

因此，不管你给支撑它的经济理论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它所表述出的信息是一样的。利润率涉及的是降低每个工人的工资与产出的比率的问题，或者涉及的是提高剥削率的问题。要变得更有竞争力，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得不提高它的利润率——就是说，提高剥削率。

这样，对于任何有关资本主义的诊断来说，利润率的长期趋势的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经济保持赢利，资本主义就会前景看好。如果利润率下





降，资本主义经济的激烈变化——有时甚至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激烈变化——对恢复利润率就是必需的。有时也许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没有出现变化，而实际上又恢复了利润率。这需要等到资本主义竞争结束之日。

资本主义会由于内部的矛盾而最终走向灭亡吗——例如，如果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话？或者需要那种会颠覆它的革命力量来推一把吗？或者仍然存在着一个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生产方式，就像西欧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本身所取代一样吗？

如果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三种方式都是可能的，这取决于你所引用的文本。但是，让他的追随者非常吃惊的是，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还有着这样一个片断，在那里，马克思列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危机的几种模型。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这些对资本主义最终前景的不同倾向呢？

在三卷《资本论》中，存在着关于资本主义动力学的三条分析思路。由于三卷手稿是在同一时期写作的，也就是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写作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假定，这些并不是修订的错误，而是同一模型的一以贯之的不同方面。还存在——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一种启示录式的见解，它实际上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就不断重复，并且一直不安地与《资本论》中的其他见解相处着。

这样，对于资本主义的动力问题，马克思提供了三种彼此并不完全矛盾的解答。

## 周期性增长

这是一个由利润率波动方式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模型。资本家雇用工人是为了获取利润，当他们雇用更多的工人时，失业就下降了。这给实际工资带来了压力。当实际工资连同就业一起上升的时候，利润的份额开始下降，利润率也开始变得吃紧。在这个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资本家通过投资节约劳动的技术、放慢——甚至减少——就业的增长，就能进行回击。随着失业的增加，实际工资的压力减轻，实际工资甚至可能会继续下降。这就是衰退。接着，利润率得到改善，这就鼓励资本家立即着手用新技术扩大他们的企业，经济周期就会继续进入上扬的过程。

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中所作的简要描述，该章的标题是“资



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章的最后三节展示了上面概括的理论，接下来涉及的是关于英国 1846—1866 年城乡经济的详细的经验资料。

马克思是发展出经济周期理论的第一位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并不存在普遍的供给过剩的可能性。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仅仅开始怀疑李嘉图的这一学说，这是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和大卫·李嘉图本人在他孩童时代曾经向他灌输的（约翰·穆勒上第一堂经济学课的时候才 12 岁，那时他与李嘉图一起散步）。但是，供给过剩与周期并不是一回事。一个世纪后，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表明，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供给过剩的高度可能性——不充分就业的均衡，但他自己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周期理论。（许多凯恩斯主义者这样做了——关于这点后面在合适的地方还要谈到。）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周期理论，在这种周期理论中，经济从来没有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处在均衡之中，即使在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也是如此。在一个受利润率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就描述一种周期模式来说，存在着固有的导致不均衡的趋势，不过它表明利润是由雇佣工人创造的。

马克思所说的周期大约为 10 年，在他写作时，也就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从 19 世纪 20 年代算起，人们只能描述出 4 个期限为 10 年的周期。法国统计学家克莱蒙特·朱格拉（Clément Juglar）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发表过一篇关于经济周期的论文，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引证他的观点。<sup>[10]</sup> 马克思关于周期的机制的基本思想，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 20 世纪 50 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 A. W. H. 菲利普斯发表了一篇关于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具有启发性的文章，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线。<sup>[11]</sup> 菲利普斯仔细检查了英国 1861—1913 年间的经济数据，发现在这 52 年的时间内，出现了 6.5 个为期 8 年的经济周期。这种周期揭示了货币工资率和失业率的波动——非常类似于马克思的描述，尽管菲利普斯没有提及马克思。当然，更为引人注目的并不是经济周期，而是菲利普斯把适合他的数据演变成了表示货币工资变化率（工资膨胀）与失业率之间长期（整个周期）稳定的关系的曲线。菲利普斯的文章发表于 1958 年，大约在这之后的 20 年时间内，经济学家们认为，通过解读菲利普斯曲线而选择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组合，他们找到了对付通货膨胀的圣杯。所有这都要以哭泣而告终，但是这要等到稍后的章节才能谈到（见本书第 14 章）。

马克思理论的实质是，周期产生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基本对立，与此同时，他们之间又相互依赖——工人需要就业，这只有资本家才能提供；资本



家需要工人去生产，以便他们能够创造利润。《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整整100年之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格德温（Richard Goodwin）为马克思的理论设计了一个雅致的数学表达式。<sup>[12]</sup>他用生物学上众所周知的捕食者—被捕食者模型，建立了一组微分方程，以阐发马克思的周期理论。这组方程使马克思的思想在一种发展经济学的背景中压缩了，它的周期拥有两个变量——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或者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两者之和为1）和就业劳动力的比例（或者失业劳动力的比例，两者之和也等于1）。这两个方程式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两块基石：

- 当就业率上升到一定限度时，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从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会上升。

- 当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时，就业的增长率就会下降。

这种格式化的经济学理论具有有趣的“均衡”性质——一个不变的增长率足以吸收不断附加的劳动力，一个不变的利润率可以维持那种增长率和就业。但是，经济从来不是处于均衡之中。它不断围绕着这种均衡状态上下波动，要么高一些，要么低一些。格德温做了几个简化的假设把他的模型简化为两个方程式：一个不变的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力增长率；一个不变的投资回报率，其中资本家把所有的利润都投资出去，工人一点也没有节约。他没有涉及税收、对外贸易、公共部门和福利国家等方面。

这些简化的假设可以放宽条件，但是如果这样，将会失去格德温理论故事的简洁和优美。本质上，他表明，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可以用数学来阐述，没有必要接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以及其他的附加手段。工资和利润是国民收入中的两个份额；劳动和资本是它的两个争夺者。但是，他们在争斗时也不得不承认彼此之间是相互依赖的。格德温提出的数学公式所表达的周期，具有不变的波长和振幅。因此，在这个理论方案中，“危机”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大或越来越频繁，就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利润率在整个周期中保持不变，尽管它在周期内会出现或高或低的波动；失业率在整个周期中也是一个常量，尽管它年复一年有所波动。因此，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动力答复应该是：它将永恒地围绕着利润率和失业率的某种稳定的平均价值而不断循环。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资本主义不是永远也不会终结了吗？

### 均衡增长

马克思的信徒和他的诽谤者一样，并没有把这种关于资本主义长生不



老的信息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来阅读。在这一卷的其他章节（尤其是倒数第2章，也就是第32章，关于这章以后还要谈到）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中，已经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但是，在《资本论》的后几卷中，却又承认，要热切等待有关资本主义具有不断增长的严重危机的传奇发生。

在1885年，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在这一卷的最后一章中，所隐藏的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动力问题的第二个回答。这个回答是以一系列的图表，或者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以“图式”<sup>[13]</sup>来阐述的。设计这些图式，是要举例说明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中产出、收入和支出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是国民收入核算的先驱，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日常事务，但是在早期要进行理论概括还是非常困难的。

先看一个没有增长的经济情形。很明显，就资本主义经济而言，这是一个抽象的例子。但是，为了阐明一些概念，我们只好进行简化。正如上面所举的例子，把资本主义经济设想为只生产机器和工资产品，而且两者都是非耐用品。为了使问题进一步简化，我们把机器和工资产品转化为它们的劳动价值，于是我们就不用担心增加不同的项目。

我们在下面列出了一个简单的图表：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总价值
I (机器)	4 000	1 000	1 000	6 000
II (工资产品)	2 000	500	500	3 000
总价值	6 000	1 500	1 500	9 000

第一部类（如马克思所称呼的）生产机器的价值为6 000单位。在这个过程中，它消耗了4 000单位的机器投入和价值1 000单位的表现为可变资本的劳动投入。作为回报，劳动创造了100%的剩余价值。同样地，第二部类消耗了2 000单位的机器投入和500单位的表现为工资的可变资本。也得到了100%的剩余价值。

在生产结束的时候，生产新机器的价值（6 000），与两个部类消费的价值是相等的。两个部类的可变资本（1 500）加上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1 500）可以用来购买工资产品。然后，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再一次重新开始。这里没有生长，没有变化，只是不断地重复。当然，关键在于，通过横看第一行数字和往下看第一列数字，你可以明白，产出是如何来自投入然

后又变成下一阶段产出的投入的。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的互相联系便显示出来了。

在现代的国民收入的分析中，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费的 6 000 单位的机器投入，并不作为收入加以计算。它是作为“附加价值”入账的。这种“附加价值”也不仅仅是剩余价值 (1 500)，还包括可变资本。因此，在现代的说法中，我们有：

工资：1 500 (可变资本)

利润：1 500 (剩余价值)

但是，就支出而言，净产出仅仅是 3 000 单位的工资产品。在这个经济中不存在净投入。只有消费等于收入。

消费：3 000

净投资：0

在这个经济中，总投入是 6 000，但是所有这些全部都被用来替换在生产中消耗掉的资本。国民总收入将会是 9 000。在一个拥有耐用资本的现代经济中，替换只是总产出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我们把国民生产总值而不是把国民生产净值作为一种便捷的衡量收入的尺度。

现在考虑一个有增长的经济，在这里，机器的产出超过了机器作为替换投入的使用。如果上面的例子是一种简单的再生产，现在这是一种扩大的再生产。在下面的表格中，我们使用相似的数字，但是你必须把它当作不同的经济，而不是处于不同的时期的前一种经济。

	投入—产出			总价值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第一部类	4 000	1 000	1 000	6 000
第二部类	1 500	750	750	3 000
	5 500	1 750	1 750	9 000

在这一经济中，6 000 单位的机器被生产出来，但是再生产相同水平的产出只需要 5 500 单位的投入。这样，500 单位的机器是剩余的，它们不能够被消费。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 3 000 单位的工资产品，对应着 3 500 单位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均衡。

马克思用一条简单的规则着手解决这个不平衡。让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一半投资出去，同时使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保持不变。接着，让第二部类的资本家“吃掉”过度供应的机器。这是一条机械的规则，而且听起来使人感到迷惑。当然，马克思并不试图像思考应该怎样看待一种有增长的经济的国民收入核算那样，去构建一种经济模型。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出版之后近乎 50 年以来，他的简单规则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因为这条简单规则的后果是要表明，这样一种经济可以永远增长，从来不会遭受危机。

让我们探寻一下几个时期来的这种结果，并看看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现在让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在自己的产业中投资 500（1 000 的一半）单位的剩余价值，4/5 用于增加额外机器的投资，1/5 用于增加额外劳动的投资。

收入-支出			
4 000+400	1 000+100	500	6 000
1 500+100	750+50	600	3 000
6 000	1 900	1 100	9 000

上面的收入-支出账单显示，在这个经济中，有 3 500 单位的收入，其中 3 000（1 900+1 100）被花费在工资产品上，500 用于机器产品的净投入。但是在下一个时期，我们将会有更高的投入和更高的产出。

投入-产出			
4 400	1 100	1 100	6 600
1 600	800	800	3 200
6 000	1 900	1 900	9 800

我们再次回到这一情形，即机器多于需要替换的数量——实际上，与前一时期相比，是 600 单位的剩余而不再是 500 单位的剩余。但是，同一规则会再次起作用：

收入—支出			
4 400+440	1 100+110	550	6 600
1 600+160	800+80	560	3 200
6 600	2 090	1 110	9 800

再深入推导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在这个阶段，某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从这个时期开始，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投资了他们剩余价值的1/2，而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投资了他们剩余价值的3/10。他们从来不得改变这些比例。他们从来不得改变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资本主义经济将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这里没有周期，没有危机，没有问题。资本主义永远生活着，没有任何的周期，只是在持续稳定地增长。

正如我们能够想像的，这对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猛烈的冲击，他们非常郑重地对待这一信息。资本主义如何能够在没有麻烦的状态下永久地增长呢？难道对于这种体制的增长潜力不存在极限，对于它不断前进不存在障碍？资本主义将会永远生存下去吗？

今天，我们把这个图式看作是一种划分为两个部类的计划经济的模型。实际上，这个图式变成了苏联的第一个计划模型的基因，这一模型是由俄国经济学家格里戈伊-亚利山德罗维科·费尔德曼（Grigorii-Alexandrovic Feldman）建立的。在这个世界上，计划者能指示第一部类以50%的速度进行积累，指示第二部类以30%的速度进行积累。在这个计划模型中，相应地既不考虑价格，也不考虑盈利能力。

但是所有这些都以后是以后的事情。在19世纪80年代，没有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其他人有着别的更宽泛的经济模式可以与马克思的模式相媲美。马克思不仅成功地向他本人也向他的读者（这要感谢恩格斯）解释了国民收入核算，而且他还努力描绘了我们今天所称作两部类模型的平衡增长的轨迹。<sup>[14]</sup>直到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才用相同的机器/工资产品分类，回头研究这两部类模型。在所有诸如此类的模型中，马克思碰巧建构了不仅是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曾两度描述一种均衡增长的道路的模型。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模型；它是非常独特的模型。

我将在本书第6章中谈到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令人苦恼的争论，但是有足够的论据说明，马克思主义神庙中的博学者——列宁、罗莎·卢森堡、布哈林和许多其他人——参加了那场辩论。当今天的人们问及全球化是



否存在极限或者它能否永远继续下去的时候，仍然能够听到那场辩论的回声。

为了我们的目的，请注意，可以把《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周期增长模型看作是围绕着不变增长率而发生的周期，很明显，尽管现实的经济不会精确地遵循什么模型。当我们到达《资本论》第二卷的时候，马克思把这一不变增长扩充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两大（所有）部类，而且完全消除了周期。是什么给利润率造成了压力呢？是否存在着无限的剩余劳动供应，从而使得工资从来不上升而利润从来不下降呢？抑或我们正在描述的是一条能够保持永久的——如果不是持续的——增长的漫长轨迹，而周期会沿着这条增长路线而发生变化呢？毕竟，近 200 年来在资本主义中存在着永久的一一尽管是动荡的——增长（至少是 200 年，但收入数据只能追溯到那么远），并且周期最终并不能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足够的影响以导致它的崩溃。我们可否把马克思倒置（再一次！），并从他的著作中获得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一个乐观的信息呢？无论如何，还不能。

### 利润率的下降

马克思一直计划把《资本论》写成一部三卷本的著作。第一卷在高度抽象的水平上从基本概念开始。提出各种简化的假定——举例来说，在第一卷中，价值和价格是对应的概念；对资本主义经济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的，好像它生产的是一种单一商品；资本是非耐用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简要说明了货币资本、实物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循环，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在最后一个部分中，马克思探讨了资本的耐用性问题，接着他从两大部类的划分的角度探讨了国民收入核算问题，正如上面我们所看到的。

在《资本论》最后一卷中，所有这些都将被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在这里，马克思探讨了（多少有些散乱，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价格—价值的转化问题；他也探讨了历史上出现的不同类型的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他提出了自己的地租理论，以向李嘉图的著名理论挑战。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还陈述了利润率下降的规律。这是有关资本主义的动力力的第三种思考。

从亚当·斯密以来，每位古典的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利润率会随着经济进步而下降的思想，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尽管



不同的作家对于发生的理由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可以用尽能够获得利润的机会（斯密）；或遭遇到硬性土地供应的障碍，这样地租就会吃光利润（李嘉图）；等等。在这种情形下，最终达到的稳定状态，究竟是值得庆幸还是让人感到可怕，这涉及个人偏好。

马克思运用内在批评的方法，意味着他是在古典经济学家自己的基础上与他们斗争。如果古典经济学家们有一个利润率下降的理论，马克思也有一个。当然，在假定资本主义将最终崩溃的预测的前提下，他的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肯定不能导致一种稳定的状态，只能导致另一种生产方式。当然，马克思在他一生最伟大的著作中，避免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任何思考。但是，利润率下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标准原理。

《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利润率下降的故事，与《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周期分析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经历了过度就业/劳动力缺乏/实际工资增长的各种插曲之后，资本家都要为恢复盈利能力而进行斗争，他们必须采用某种以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技术，或者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要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但是，如果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能充分带动剩余价值率的上升，那么利润率将会下降。这是简单的、初级的道理。既然我已经在上面解释过这些概念，一个简单的公式应该足以说明问题：

$$(\text{价值})\text{利润率}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可变资本} + \text{不变资本}} = \frac{s}{c+v}$$

再写为：

$$= \frac{s}{v} \left[ 1 - \frac{c}{c+v} \right]$$

$$q = r[1 - g]$$

在这里， $q$ 是按价值来测定的利润率而不是按货币来测定的利润率， $r$ 是剩余价值率，而 $g$ 是资本的有机构成。

现在，如果 $g$ 上升，那么 $q$ 将下降，除非 $r$ 上升能够进行补偿。但是，当资本的有机构成上升时，将导致剩余价值率的增加。它不但必须增加 $r$ ，而且必须通过充分消除 $g$ 在 $q$ 上升时所产生的压抑性效应来增加。简单地说，技术必须能够充分提高劳动生产力，以降低劳动的单位成本。否则，利润率将会下降。这恰恰是报纸的财经版面和被围攻的财政部长经常谈到的观点。工资不能比生产力增长得更快。

但是，对这个简单的公式，人们当然可以加进许多复杂的因素。这样，



我们就能拥有耐用的固定资产，一定时期只能消费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以“股票”的形式衡量不变资本，而不仅仅以现金流来衡量。我们所处理的是价值，而不是货币量，我们要关注的是货币形态的利润率，而不是价值形态的利润率。当马克思和所有的古典（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家假定利润在所有部门具有平均化的趋势时，我们可以先看看一个部门内部利润率的情况。

核心问题是，马克思被认为预言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1870年之后，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主义出现之后，任何关于利润率的讨论都过时了，除非否认它有下降的趋势。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表明，在充分竞争的经济中，一个处于均衡状态的工厂或产业的利润率将会是零。这个理论的另外一部分认为，利润率会在所有处于均衡态的工厂或产业之间出现平均化趋势。事实上，正如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所说，人们对利润率的关注曾经一度消失，因为马克思把这一概念弄得臭名昭著，把它和剥削联系在一起了。<sup>[15]</sup>经济学家们开始使用自然利率来代替利润率，给红玫瑰取了别的名字。

我并不想在这里攻击或保护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它对于训练头脑非常有帮助，但只适合于研究实际的经济。然而，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具有下降趋势的预言，应该说些什么呢？它会下降吗？如果会，我们为什么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不会，难道是马克思错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部分发展利润率下降的主题时，他称之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注意，是一种趋势，并不是一种确定性。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即使要表述一种简单的机制，也必须作出限定。工资可以降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以下。生产方法可以进步到这样的程度，它不仅普遍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且可以在机器制造和另外一些部门发展得更快。机器制造等部门又可以生产出可以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原材料、能源），于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增殖就不会像它的物质总量那么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机器和原材料被工人使用掉，但是从价值角度看，资本的有机构成可能并没有提高。现代计算机技术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因为在过去的30年中，计算机的价格已经惊人地下降了。尽管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从物质角度看，每个工人拥有的计算机比率已经上升，但从价值角度看情况并不是这样。

一个主要的制约因素是对外贸易——输出资本的可能性和进口便宜的原

材料及工资产品的可能性。这同样与今天的全球化有很大关系，这很像19世纪的英国曾经有过的情形。如果利润率在发达国家较低而在欠发达国家较高，那么，输出资本和返回利润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利润率下降问题的答案，因为，欠发达国家的有机构成较低。

这种负面效应“妨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利润率的）下降”。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就此退让认输。在他看来，这些负面效应“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用”。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经济资料的精明观察者，他必须注意到，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利润率的下降并不十分迅速，因此，他从我要引证的那段话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否则，不能理解的就不是是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反而是这种下降的相对缓慢了。所以，这一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Capital Volume 3*, p. 239）

下面我们看看长期的利润率变化趋势是怎么回事。不过，在抵制利润率下降的过程中，马克思扼要提到两种机制。一个是新发明，可以使商品更便宜，或者发现新的需求，提高盈利能力。另一个是加速资本集中的合并和接管过程。这一过程消除了小的资本家，创造了更大的统一联合体。当然，这种合并是作为一种并购联合体的方式发生在周期过程中，也许会导致个人盈利能力的降低，但是这种降低可以被合并所扭转。

顺理成章，由于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这当然会形成周期。毕竟，利润率的变化轨迹是投资周期（或者像马克思所言，是资本积累）这枚硬币的反面。这样，通过考察资本过度生产，就是说通过考察过度投入和商品的过度生产，《资本论》第一卷中讨论的周期，在这一阶段就被扩大了。这是一个推动积累的贪婪过程的组成部分。接着，当危机到来时，就会导致价格大幅下跌；资本会贬值并迅速侵蚀成本；失业率上升。这样，再次恢复繁荣的种子便蕴涵于危机之中。资本的价值降了下来；因而，现在一定量的利润就会拥有较高的利润率。

对这场关于利润率下降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提出了三种观点作为结论。这三种观点看来与早期的讨论并没有联系，也可能是被恩格斯武断地放到这个地方来的。从马克思留下的手稿中寻找它的顺序，是恩格斯从事的一项艰苦工作。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些观点是十分有用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



(1) 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是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

(2) 劳动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从这两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取消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取消的。

(3) 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的增长，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相比人口增加得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Capital Volume 3*, p. 226）

令人对这三种观点感到迷惑的是，尽管它们在理解力上是有悟性的，但是它们既没有把盈利能力的破坏作为“利润率下降”这一部分的一个可能的结论而提到，也没有提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最终崩溃。不仅在这里，而且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出现《共产党宣言》中或者《资本论》修订本第一卷第32章中具有启示录式的观点。资本主义在发展，而且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即通过危机和周期的方式在发展。利润率存在着下降的趋势，但是也存在着打破这种下降的相反趋势。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头脑发热的年轻人的作品。它作为一个非凡的、充满灵感和幻想的上等散文流传至今。即使过了150年，它依旧是争论的起源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的通行版本就来自《共产党宣言》。列宁弄错了：在欧洲，工人阶级的“圣经”是《共产党宣言》而不是《资本论》。

《资本论》是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它既不是一个梦想，也不是一部千年史诗。它并没有覆盖宏大的历史时空，《共产党宣言》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几章却覆盖了。它把资本主义运作机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进行批评式的研究。这是一种既迫切需要却又充满困难的工作——这不仅因为这个主题所具有的内在的困难，以及马克思在描述材料上的不妥协的方式（这方面一点没有讨好读者），而且还因为，最后两卷不得不由恩格斯依据未出版和未

完成的手稿进行重新建构。但是，正是这项工作占去了马克思1851年以后的大部分生命时光——直到1867年，他的这项工作一直都是在紧张中进行的，尽管他生命的最后16年中也曾有过时断时续。

然而，《资本论》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动力方面，并不是只提出了一个惟一的传说：它无论如何——甚至以各种附着的条件——预测资本主义终将衰败。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资本主义永远不会达到它的极限，但是这些极限是逻辑性的，没有特定的时间限制。存在着周期，存在着危机，但是这些都是以稳定的经济增长为衬托的，利润率也仅在部分程度上趋于下降。

在《资本论》第一卷倒数第二章，即第32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有一段被大量引用的话，的确再次点燃了《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之火。《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部分，即第八部分，是对资本主义起源于封建制度的历史描述，用的是英国的例子。整个部分题为“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设计这一章，是要追踪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说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出现，说明这两大阶级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生产资料的不对称的所有制，无产阶级必须要出卖劳动力，正是这些成为工资/剥削关系的要害所在。

紧接前6章之后的第32章，叙述了圈地运动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在15世纪和16世纪，英国的农民被剥夺了一切，被迫从可耕地迁移出去，从而出现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然而第32章之后，主要涉及小规模、独立的生产者的破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这样，“小商品生产”（这种经济生产模式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被使用）被摧毁了，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了。这或多或少已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过。

最后三个段落接着描述了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远看法。这一长远看法甚至在今天，还时常被许多左翼的周刊所引述，但是，它同我一直讨论的分析资料相比，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更“普通的”思想。这可能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人民阵线出版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它是《资本论》中被收录的惟一一部分内容。<sup>[16]</sup>这部选集或许是第一部被广泛使用的马克思的著作集。它也是第三国际要人们读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



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sup>[17]</sup>（在最后一段结束的地方，有一个脚注，引证《共产党宣言》中一段意思相同的话。）

很明显，第一个段落是马克思著作中被广泛引用的一段话。这是一种给马克思提供了预言图景的千禧年式的观点。它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但是，在资本积聚的无情的进程中，由

于资本家相互吞并，资本家的数量也在减少。工人的不幸也在增加，而且存在着“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然而，这就是资本与劳动的辩证的纠缠关系。我们然后可以找到不断增长的资本积聚过程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预言之间的联系：“资本的垄断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在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垄断的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势不两立的矛盾。而垄断的资本主义肯定会被破坏资本主义本身。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就已经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这段话虽然是以辞藻华丽而著名的，但是与我所勾勒的《资本论》中的那些分析部分并不是很协调。资本积聚是如何增加的，它的增加能够终止增长周期的机制或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吗？如果情况如我们在第二卷中所知道的，利润率的下降是不可能被终止的，而只能通过资本积聚的增长使其延缓，那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最终是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还是会导致工人阶级的起义，或者是两者都有可能呢？

不过，这个革命的观点给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带来了坚定的乐观主义。在我看来，《资本论》中的那些科学的部分和这个启示录式的观点相当不协调，因为这里的分析并推不出这个结论。毕竟，马克思很可能是在1848年，也就是在他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之前，写下了这个段落。如果他仅仅是重复了《共产党宣言》，那么他所有的研究和三卷本《资本论》的结论又是什么呢？

这些思想并不是在我们的讨论中附带提出的。在我看来，它们对我们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马克思把他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更复杂的、在我看来也是更有创新性和独特性的分析当作其科学的基础提出来的时候，他却沉迷于革命的信息，而这些分析是推不出这种革命的结论的。于是，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张力。这种张力存在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他的追随者的头脑中。

要认识这点，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的那一章，当时它可能是要继续讨论的一份详细笔记。但是，马克思在它之后却又完全直接地讨论起“现代殖民理论”。正如情况所表明的，既然在第32章中已经揭示出从资本主义的起源到它在未来灭亡的完整历史，为什么还要讨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但却预言资本主义的终结的问题呢？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情况是，由于马克思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监督了《资本论》的几种译本而并没有改变这一顺序，人们不禁疑虑，为什么他把



他的启示录式的观点放在倒数第二章呢？还存在着关注这种张力的另外一个理由。在第32章中有两个以上的段落对剥夺者被剥夺充满着向往之情。我们首先应该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并不依赖于所有者的劳动，而是依赖于工人的社会化劳动，这与小商品生产是不一样的。这是对个人所有者的否定之否定。

因而，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谈到，从起源于个人劳动的分散的私有制——一种约翰·洛克的世界——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一个长久、艰苦和困难的过程。这毕竟是马克思在前六章中所追踪的过程，是一个占据了四至六个世纪的过程。然而他自信地感觉到，下一个阶段——“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将花费较少的时间。很难说马克思是以此意指这种变革即将来临，还是只是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左翼/右翼的分界都是依照这个含糊的观点而界定的。这篇充满激情的散文，使这种变革看起来像是即将来临的；而《资本论》中的另一部分——不是那么华丽但却更具分析性的部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充其量也只是支持这种变革的不可避免性。

100多年过去了，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动力有帮助的，正是《资本论》中具有分析性的部分。不可避免性没有为这种变革设定一个时间表。它可以像基督复活。对于日常政治和经济行为来说，最密切相关的事情，是对周期的进程和增长的轨迹以及不平等与贫穷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冷峻的分析。以这种“温和”的方式阅读《资本论》，无疑会使许多读者感到奇怪和震惊。很少有人通读过《资本论》所有的三卷。关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已经写得太多，但是，关于《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则相对要写得少得多。即使在写到《资本论》时，近百年来，有关价值—价格问题的争论也比有关资本主义的动力问题的争论要多得多。恩格斯宣称，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这已经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没有人会问及，这些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都说了些什么。甚至一些高级权威也赞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的崩溃提供了一种具有分析性的论证。

然而，我们却发现，如果阅读《资本论》，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将通过周期以及缓慢的周期性利润率下降趋势而生存着。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它将遍及全世界，而且它的危机也将是世界范围的危机。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对于资本主义长期生存，马克思比他的诽谤者或者他的信誓旦旦的追随者提供了更好的论证呢？



## 〔注释〕

[1]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2] 大卫·李嘉图文集是由皮埃罗·斯拉法编辑的，其中得到了莫里斯·多布 (Maurice Dobb) 的帮助。在其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所做序言中，斯拉法认为，在李嘉图的理论中，边际土地的利润率可以看作一个独立于市场价格的纯粹的比率。工资被以谷物的形式支付，产出也是以谷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固定资本不重要的话，那么利润和资本（工资资金）都是由谷物来衡量的。因而，农业的利润率可能成为所有其他利润率平均化所围绕的一个中心。其他研究李嘉图的学者——例如，S. 霍兰德 (Samuel Hollander) 教授——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斯拉法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扩充了这一论点，这反映在《经由商品的商品生产》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中，这本书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论战的一个源泉。我将在本书第17章中讨论这些。

[3] 马克思测量商品的劳动含量的方法是一种直接的方法。现时代的统计学家测量工资应得的劳动含量时，他们会问，例如，平均一个工人要工作多少小时才能购买面包或者自行车。这种测量方法现在已经被广泛采用。

[4] 恩格斯的异议与马克思的书面回答很便利地收集在下列书信集中：Marx and Engels (1954/1983) *Letters on Capital*, 首版为德文版，名为 *Briefe über Das Kapital*, Dietz Verlag, Berlin, trans. Andrew Drummond (1983), New Park Publications, London. 我在下面的文章中讨论过“转化问题”中的价格—价值转化的前史：“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G. Caravale (ed.) 1991, *Marx and Modern Economic Analysi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5] 对于那些不熟悉数学符号的人来说， $\sum$  代表加和。

[6] 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 (1907/1949) *On the Correction of Marx'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原版于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 Ökonomie und Statistik*, July 1907, trans. in Sweezy (ed.),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pp. 199–221. 我在下面的书中讨论了波特基维茨的解决办法：Meghnad Desai (1979), *Marxian Economics*, Blackwell, Oxford.

## 解决价格—价值之谜

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恩格斯取笑了许多马克思的批评家，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理论是前后不一致的。如果剩余价值只来自可变资本，那么不变资本又是如何像可变资本那样挣得相同的平均利润率的？马克思要么与他的价值



理论相矛盾，要么在所有的行动中挑战相等利润的法则。（当然，从经验的角度来说，所有的公司并不创造相同的利润率，甚至在进行多次调整后也是如此。但是在经济学中，战斗是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并获胜的，从来都不是通过引证经验数据。）恩格斯要求人们在他出版《资本论》最后一卷之前赶快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人接受了这一挑战，但是没有人被认为解决了这一问题。当马克思自己的解决方案出来的时候，它并不使任何人感到满意。维也纳的经济学家尤金·冯·柏姆-巴维克于1896年在他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文中，就曾抨击马克思的系统是不连贯的。

11年之后，波特基维茨，一位德国统计学教授发表了一个优雅的方案。相比而言，柏姆-巴维克的批评占了100多页，内中充满了浮夸乏味之辞，而波特基维茨的解决方案所占篇幅只不过25页，并且其中只是些简单的代数和数字表格。但是，作为一个数学家，他能够从一般性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并开创了一个能被解决的先例，而且通过提供数字的结论来证明他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

他是这样开始求证的，假设有机器生产、工资产品和奢侈品三个部类（部门）。他使用了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的图式作为一个基础，但是把马克思的两大部类扩展到了三个部类。他按照价值对每个部类进行了说明： $C \rightarrow C'$ 的循环，（在上面第66—67页提到的空盒中进行）而且按照货币进行了相应的说明： $M \rightarrow M'$ 的循环，惟一相连的环节是，总剩余价值必须等于总利润。这样，他就必须解决三种价格和一个平均利润率的问题。接下来请看：

价值说明

$$C_1 + V_1(1+r) = C_1 + C_2 + C_3$$

$$C_2 + V_2(1+r) = V_1 + V_2 + V_3$$

$$C_3 + V_3(1+r) = S_1 + S_2 + S_3$$

第一个方程表示，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r$ 表示利润率），生产出机器产品的产出，以供三个部类中的每个部类购买使用。第二部类生产工资产品，以供工人用工资账单购买，而第三个部类生产奢侈品，以供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购买。

货币说明

$$[P_1 C_1 + P_2 V_1](1+Q) = P_1(C_1 + C_2 + C_3)$$

$$[P_1 C_2 + P_2 V_2](1+Q) = P_2(V_1 + V_2 + V_3)$$

$$[P_1 C_3 + P_2 V_3](1+Q) = P_3(S_1 + S_2 + S_3)$$

在这里，第一个方程是这样来确立投入费用的： $P_1$ 表示增加的机器投入， $P_2$ 表示劳动投入，接着加上利润率 $Q$ ， $Q$ 必须符合按价格 $P_1$ 出售而获得的收入。对于工资产品的计算，也是一样。奢侈品不能用作生产的投入，但是它们

的生产费用必须能够回收。最后一个方程是：

联立方程

$$(S_1 + S_2 + S_3) = Q[(P_1 C_1 + P_2 V_1) + (P_1 C_2 + P_2 V_2) + (P_1 C_3 + P_2 V_3)]$$

也就是，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

这样， $P_1$ ， $P_2$ ， $P_3$  和  $Q$  是未知的，而  $C_s$ ， $V_s$  和  $r$  是我们已经给定的。为了减少自己的工作复杂程度，波特基维茨假定  $P_3 = 1$ ，或者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以奢侈品的价格来规范所有的价格。（许多人设想，奢侈品是黄金，因而也是货币。但那是不必要的，也没有标准化。它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出发点）因而，可以表明，利润率可以从一个二次方程中求出解来。我将为你提供有关细节。

下面是数字的例子：

部类	不变 资本	可变 资本	剩余 价值	总价值	机器 费用	工资 账目	利润	总收入
I	225	90	60	375	288	96	96	480
II	100	120	80	300	128	128	64	320
III	50	90	60	200	64	96	40	200
	375	300	200	875	480	320	200	1 000

当然，数字是任意给定的，没有什么强加在上面。我们在上面看到，总剩余价值（200）等于总利润（200）。但是，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在三个部类中分配是由不同的价格决定的。第一部类创造的利润高于它的剩余价值，而另外两个部类则出现了损失。不变资本的价格的比值为  $1^I/25$ ，可变资本的价格的比值为  $1^I/15$ ，利润率是 25%。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知道价格和利润率，需要回到利润率。波特基维茨的解答过于简洁、过于客观，以至于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满意。原因是，如同我在本文中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想从这种练习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对一个技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想找到摧毁资本主义的钥匙。因此，他们对此保持观望态度。

[7] 有关资本论战，见 Geoffrey C. Harcourt (1972),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Christopher Bliss (1975) *Capital Theor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North Holland, Amsterdam.

[8] 有关经验结果，见 Anwar Shaikh (1984),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rx to Sraffa", in Ernest Mandel and Alan Freeman (eds), *Ricardo, Marx, Sraffa: The Langston Memorial Volume*, Verso, London; P. Petrovic (1987), "The Deviation of

Production Prices from Labour Values: Some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1, 197-210. 我在下面的文章中讨论了这些论文: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Quantitative Marxism”, in Paul Dunne (ed.) (1990), *Quantitative Marxism*, Polity Press, Oxford.

[9] 公式是这样推导出来的。如果  $W$  是实际工资率,  $L$  是总就业率,  $Q$  是总产出(附加价值), 那么  $WL/Q = \alpha$  就代表工资占总产出的份额, 但是  $Q/L$  指的是每个工人的产出, 因此我们可以重新写作:

$$\alpha = W/[Q/L]$$

现在,  $W$  指的是每个工人的可变资本,  $Q/L$  指的是每个工人的附加价值(剩余价值加可变资本), 因此有:

$$\alpha = v/(s+v) = 1/(1+s/v) = 1/1+e$$

[10] Clément Juglar (1862), *Des Crises commerciales et de leur retour périodique en France, en Angleterre et aux États-Unis* (Paris).

[11] A. W. H. Phillips (1958),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Rate of Change of the Money Wage Rate and Unemployment”, *Economica*, new series, 1-18.

[12] Richard M. Goodwin (1967), “A Growth Cycle”, in C. H. Feinstein (ed.),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Maurice Dobb*,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可参见 Meghnad Desai (1973), “Growth Cycles and Inflation in a Model of the Class Struggle”,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December, 再版于 Desai (1995d) *Macroeconomics and Monetary Theory: Selected Essays of Meghnad Desai, Volume 1*,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格德温的文章导致了許多延伸观点, 其中一些收录在 R. Goodwin, M. Kruegar and A. Vercelli (1984), *Non-Linear Models of Fluctuating Growth*, Springer Verlag, Berlin.

[13] 我在下面这本书中讨论过这些图式: Meghnad Desai (1979), *Marxian Economics*, Blackwell, Oxford.

[14] Michio Morishima (1973), *Marx's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该书讨论了平衡增长的结果。他是第一个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指出马克思的结论是如何强大的人。

[15] Friedrich von Hayek (1938),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p. 4.

[16] 我手头的这份复印件没有出版日期, 但有如下标记: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in Two Volumes: Prepared by 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 Moscow*, ed. V. Adoratsky, Martin Lawrence, London.

[17] 《资本论》, 中文1版, 第1卷, 831~832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6 章 资本主义的前景 I： 何时结束？

### 引 言

当马克思在 1883 年去世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处在一个长时期的衰退中。在这一时期存在着价格长期下跌的趋势。这应该归功于交通运输的便利化——汽船的出现、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和新的通讯技术的突破——电报、横穿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先前对于欧洲来说尚是未知的地域，或者在他们看来很边缘的地方，现在开始进入了他们的掠夺范围，成为食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变成了原材料的供应来源。铁路已经横跨欧洲各国，并且正在北美延



伸。印度在 1853 年首次有了铁路。纺织工厂——纺纱和织布——就像遍布西欧和北美一样，也在印度扎下了根。

英国开始鼓吹自由贸易学说，并且使它的食品进口政策自由化了。这是 19 世纪 40 年代吸引该国家关注的耶场《谷物法》辩论的根本之所在。并不是所有的“新工业化”国家都遵从自由贸易的原则。美国和德国阻止自由贸易，而法国则一直是一个不情愿的自由贸易者。自由贸易符合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的利益，它需要为本国的制造品提供市场，为本国的储蓄提供投资机会。伦敦城变成了向世界其他地方有利可图的通道疏散财富储蓄的万能工具。从西欧吸收的存款开始流进美国、中欧和东欧。西欧把触角伸到了亚洲最偏远的各个角落，在其后的 25 年，非洲也成了它的殖民地。

任何一个渴望加入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国家，都要接受金本位制。1897 年俄国像日本一样，也接受了金本位制。<sup>[1]</sup>“黄金十字架”受到美国农场主的诅咒，他们在内战的通货膨胀岁月所欠下的大笔债务，如今却要让他们产品降价并折算成黄金来偿还。<sup>[2]</sup>但是，随着黄金变成普遍首选的通货，白银也成为仅次于黄金的通货。印度发行银制卢比，白银货币广泛流行于从美洲西部到欧洲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广阔领域。

人口开始从欧洲腹地向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大量迁徙。印度人则迁向东南亚、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他们绝大多数是契约劳工，也有商人和放债者。甘地于 1891 年应邀前往南非，以律师身份接受他们的案子。中国劳工前往美国的西海岸、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当然，劳动的流动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欧洲过剩的白人移向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亚洲的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则移向外围地带——非洲、亚洲和美国的边缘。这种迁徙模式直到 100 年以后才被打破。

然而，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对非洲的掠夺在马克思去世后不久就达到了顶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同劳动的自由流动一样，资本在全世界也是自由流动的——尽管从来不是均匀的。技术进展拉近了空间的距离，也缩短了时间。查理斯·纳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在 1843 年侵占信德（Sind）时，已能够向居于怀特霍尔（Whitehall）的主人发送一个单词的电报信息——罪过（我犯罪了）。整个地球已经能够用精致而全面的地图绘制出来；没有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发现的地区被遗漏。

1870—1913 年经济增长的加速，拉开了现代全球化的序幕。有关这个较早时期的收入数据一直是缺乏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靠的。在那时，

甚至国民收入的概念也是新的，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马克思曾经努力要与国民收入账目保持一致。不过，我们现在有了某种良好的结果，应该感谢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开创性努力。<sup>[3]</sup>这些数据聚焦在较为“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再加上加拿大、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这 16 个国家的人口在 1820 年达到了 1.5 亿，1870 年为 2.95 亿，1913 年接近 4.95 亿。随着人口在这 93 年中增长了 3 倍，收入也得到了相应的增长。在第一个 50 年中（1820—1870），人均实际收入每年增长 0.9 个百分点。余下的时期（1870—1913），这一数值增加到 1.4 个百分点。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增长过于缓慢，因为如果以每年 0.9 个百分点计算的话，收入增长一倍大约需要 80 年的时间，而如果以每年增长 1.4 个百分点计算的话，收入增长一倍则需要 50 年的时间。<sup>[4]</sup>

在人均收入大约增长了 3 倍的同时，人口也同样增长了 3 倍，因此总收入——这 16 个国家的 GDP——在这 100 年中增长了 9 倍。当然，这个成果是空前的。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有的国家——加拿大、美国、德国和瑞典——增长得更为迅速，与此同时，先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则要缓慢一些。当然，这里存在着经济周期。长波 [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于 20 世纪 20 年代首先在文章中提到它们，因此又被称为康德拉捷夫周期] 的跨度一般为 50 年，其衰退期大约从 1810—1817 年至 1844—1851 年，上升期大约从 1844—1851 年至 1870—1875 年；接着又是 1870—1875 年至 1890—1896 年的衰退期，然后是 1890—1896 年至 1914—1920 年的上升期。这些数据虽然粗糙，但用起来还是简便的，而且康德拉捷夫断言的他的“浪潮”比现代研究公认的周期更具有规则性。<sup>[5]</sup>但是，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的意义是，它给出了一个周期增长的图像，这种图像正如马克思首次指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痼疾。当然，这种增长并不是平衡的——不管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整个或是任何时代。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在封建时代是非常严重的。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不平等并没有扩大，但是，由于城市化和新的奢华的利用，使这种不平等显得更加突出。<sup>[6]</sup>都市人口的增加，带来了拥挤的住宅群落和纵横交错的城市街道，也带来了富裕阶层对于“暴徒”的恐惧。关注这一现象的中产知识分子和激进的改革者，开始对导致这种明显不幸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性质提出了质疑。在英国，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就是



批评这种新秩序的先锋，与此同时，拉那克郡的罗伯特·欧文在1813年提出了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主张第一次成为可能：应该消除贫困。伦敦的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和纽约的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所进行的研究，揭示了穷人的低生活水平。<sup>[7]</sup>正如亚当·斯密所预言的，随着资本主义的传播，收入和财富方面的不平等会进一步扩大；但是，即使与前几个世纪的富人相比，最贫穷的社会阶层不是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水平了吗？

这种思想很少出现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如果欧洲的中产阶级和统治精英担心什么的话，那就是工人的骚动。工会形成了，政党声称要为工人说话。到处都是要求扩大选举权的运动。统治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贵族们（除了法国和荷兰）已经难以满足资产阶级暴发户对于政治权力的要求，更别说应付工人大众的要求了。在这一时期（1870—1913），存在着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改革，它意味着，统治贵族的谱系开始出现平稳的由上到下和由里到外的移动：从贵族阶层到资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出权力让步。随着资本主义自我防御的壕沟越挖越深，追求政治权力和经济福祉的工人运动也愈演愈烈。

### 德国社会民主党<sup>[8]</sup>

1875年，受到广泛支持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德国形成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无论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还是按照政治参与，德国在那时都不是一个最先进的国家。这个政党是两个小集团合并的产物，一个自称效忠马克思，另一个追随拉萨尔。拉萨尔是一个公众式的浪漫派人物，他相信铁的工资规律，并认为只有通过废除资本主义才能消除它。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不诚实。不过，拉萨尔的过早去世，促成了两个政治集团的合并。在哥达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被建立起来。这可以算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后来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但是，它的纲领并不能让马克思满意：他认为它太拉萨尔主义化了。事实上，马克思的这一看法是通过一封信表达出来的，这是一封写给这个新政党的领导人之一——威·白拉克（Wilhelm Bracke）的信，信中谈到他和恩格斯的共同感受，明确表示：“我们同上述



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sup>[9]</sup>他不想让任何人认为，他和恩格斯从遥远的地方控制着这个政党，他也认为这个纲领是“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sup>[10]</sup>。他指出其中的几个缺陷，认为这个纲领声称反映了他的理论，而实际上是拉萨尔的。正是第一句话的前几个字——“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是错误的。劳动并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且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sup>[11]</sup>马克思指出，下面这句话所说的也是不合理的：“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sup>[12]</sup>在批评中，马克思还把这种主张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分配的可能的蓝本，而进行了深刻的讽刺：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加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代替明确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概念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拉萨尔的“不折



不扣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中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无论如何根据公平原则是无法计算的。<sup>[13]</sup>

马克思的信产生的直接影响非常之小。拉萨尔集团在社会民主党中占据多数，而他们的观点不管在马克思看来是多么的混乱，却依然十分流行。但在当时，俾斯麦看到了广大工人阶级与各种中产阶级的改良政党相结合的危险，以及它们推进工人利益和民主的危险。那时，德国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的比例高于其他先进的国家——德国的比例是33%，欧洲12国的平均比例是17.8%，英国在1869—1873年仅有14.9%。只有法国（43%）和瑞士（38.7%）拥有更大比例的选举权。因此，俾斯麦于1878年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组织；它的大部分领导人被放逐，只是到1890年，关于禁止该组织活动的禁令才被撤销。在这期间，社会民主党继续参与竞选，它的选票从1881年的312 000张上升到1890年的1 427 000张。

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禁令以及对其领导人的放逐，使得这个党变得更加激进；它变成更加公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精神领袖卡尔·考茨基，与恩格斯有密切交往，依然被作为宣传马克思的权威而得到拥护。<sup>[14]</sup>《哥达纲领批判》在1891年正式出版，尽管有少量删改，但还是照顾了那时几位仍然健在的领导者的面子。可是在那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所有初出茅庐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已经成为最大和最受尊重的政党。它的学说融合了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融合了改良和革命的双重思想。1889年7月14日，许多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而聚会巴黎，创立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曾经创立了第一个这样的代表大会，但于1874年解散了。因此本次会议是当年那次代表大会的复活和重建，

它拥有更多国家、更大政党的代表。他们致力于通过民主的方法取得政权，他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

社会党国际（或第二国际）因这次代表大会而闻名于世，它在 1889 年 7 月 14 日宣称：“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工人，废除雇佣劳动，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性别，也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将享有所有工人创造的财富。”这些充满感情的重复性话语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批判的言论非常相似，例如“所有工人创造的财富”。<sup>[15]</sup>但是，像最近一位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当这个运动的长期目标变成“推翻资本主义，建立产品由生产者联合控制的社会”时，其许多直接的、短期的目标（它是改良主义的）变成了“使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更有尊严”。然而，这正是马克思曾向他们警告过的问题——事实上，在马克思的各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分析性论断中已经明确指出：“这些社会主义者越是成功，他们越是发现自己置于资本主义的繁荣之上。”<sup>[16]</sup>

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也体会到了这一悖论。它的建立和成长几乎与这一时期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增长是同步的。人均收益每年增长 1.6%（在 1870—1913 年翻了一倍），德国人口增长了 70%。在 1891 年，当社会民主党明确提出它的新的——特别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爱尔福特纲领》时，主要立足的是长期的革命目标，直接固守的却是改良主义的要求：成人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官吏直选，提高所得税，每天 8 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 14 岁以下的童工，等等。

但是，革命的要求和改良的要求之间的张力并没有消失。社会民主党能够对抗一个尽管还存在着危机但却保持着资本集中不断增长的体制，从而为眼前的短期利益而斗争吗？抑或是它要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为加速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而斗争呢？这种张力——正像我们在第 5 章中看到的——来自马克思自己的模棱两可的表述。《共产党宣言》中的革命的观点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章中被反复说明，但是对于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复杂的分析理解，把马克思引向了一种具有细微差别的理解。应该相信哪一种理解呢？

政党——一旦其达到一定的规模，拥有大批成员和选举议程，就不可能建立在意识形态的明晰性之上。社会民主党没有选择马克思思想的这种或那种倾向，而是选择了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话就是无可辩驳的权威，不过，由于这些话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因此，另外的权威人物——主要是卡



尔·考茨基——不得不解释这些不一致之处，并设法使它们显得和谐。把一个人的思想抬举到无批判的地步这种行为，后来只能带来麻烦。但是，社会民主党后来变得以严肃的方式固守于马克思的著作。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政党。它随后不仅与德国统治阶级斗争，而且还在自身队伍的内部，在工团主义者与理论家之间，在理论家内部以及在左翼与右翼之间进行斗争，左翼赞同革命的路线，右翼赞同改良主义的路线。当然，这种争吵都是围绕资本主义动力问题进行的。

构成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工团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为他们的成员争取更高的工资和看涨的就业。这些要求在经济繁荣时期比经济衰退时期更容易实现。他们把罢工更多的是用作一种手段，而不是用作政治。但是，“政治家们”——左翼的知识分子，甚至某些右翼的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崩溃和丧失功能。拉萨尔强调，工会不可能挑战铁的工资规律。所需要的措施，就是通过民主的手段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不断出现的危机变得越来越严峻，那么就将证明左翼为摧毁资本主义体制而斗争的战略是正确的。然而，当资本主义持续下去时，危机带来的是工人的不幸而不是他们老板的不幸。

但是，即使对于左翼，也存在着一种为资本主义的迅速成长而进行辩护的倾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通过在大规模的工业公司中工作，可以形成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大军——公司规模越大越好。如果工人的革命组织要变得强大，资本主义也不得不发展。在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它的早期阶段时——换句话说，当资产阶级仍然与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时候——如果反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这在“客观上”就是破坏了这种斗争。梦想着快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并没有任何好处。这种梦想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正如我们后面要看到的，是列宁运用的马克思的理论击败了他们，这一理论“证明”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得到完全的发展之后才能到来。当然，约摸过了25年之后，列宁夺取了政权。

## 讨论资本主义：德国人的争论

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进程的争论之火，首先是由爱德华·伯恩斯坦点燃的。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被放逐期间，伯恩斯坦失去了瑞士，

但是在1888年他又从那儿去了英国，尽管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就已经合法化，但他在英国一直呆到1901年。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构建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对以革命结束资本主义的预言提出挑战。作为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恩格斯的密切联系者，以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评论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伯恩斯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正如他后来给社会民主党的老领导、老战士奥·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他那时“试图通过扩展马克思的教导，使这些教导与现实更加一致”。这些现实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商业周期具有相当温和的性质。

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在英国的不同变化，伯恩斯坦意识到，新的社会发展和新的技术已经让资本主义有了一种迎接挑战的调节能力。于是，他想要做的并不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进行局部性的批评，而是要做根本性的修正。在1896和1898年间，他在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Neue Zeit)上发表系列文章，题为《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 des Socialismus)，开始对“资本主义不断产生危机和工人阶级不断贫困”的理论进行质疑。他认为，作为一种替代方案，可能存在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进化的改良主义的道路。

伯恩斯坦是马克思主义新教会的第一位变节者，这个教会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去世后建立的。马克思是否认为他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马克思在对待第一国际的联系者时，常常表现出独裁的作风——这正如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所抱怨的。但是，在他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维·伊·查苏利奇的通信中，他对自己的历史理论的适用范围所持的态度，比他的信徒所宣称的要谦逊得多。马克思的个性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一切都非常普通，因此也难免会犯错误。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卡尔·考茨基、奥·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作出决定，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即是真理。这个学说的基础更多地建立在《资本论》第一卷第32章的一个单独的段落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资本论》的所有其他论述的汇总之上。据此，1891年所采纳的《爱尔福特纲领》中有一条原则规定：

对于无产阶级和正在消失的中间阶级，对于小商人和农民，(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不安，意味着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和剥削有增无减。

无产者的人数增长得越快，劳动储备军就越庞大，剥削者和被剥削



者之间的对立就越尖锐……

有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鸿沟，由于经济危机而日益扩大。这些在资本主义体制中都可以找到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会越来越扩大并具有毁灭性质。<sup>[17]</sup>

这是流行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已被用来为全世界数百万的社会主义者服务。这幅资本主义的景象并没有得到《资本论》第一卷第7部分所勾勒的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得到《资本论》第三卷中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支持。这些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确，一个不断增长的劳动储备军并不是这个理论的必需的组成部分；人们至多可以预言从一个衰退期到另一个衰退期存在的劳动储备军的生长，但即便如此，在19世纪晚期，要连续在几个时期中做到这点，从经验上看也是很困难的。伯恩斯坦的回答是：“我自己反对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我们应该期盼资本主义经济在最不远的将来会崩溃，社会民主党应该为即将面临大灾难的前景所驱使，而使自己的策略去适应这一假设。”<sup>[18]</sup>

考茨基——作为火种护卫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教主——对这些言论发怒了：

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崩溃了。你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更高的形态，而是在批评者面前投降认输了……你决定成为一个英国人——那就接受这一结果而成为一个英国人吧……你所经历的发展……已经远远背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试着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寻找一个位置，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代表吧。<sup>[19]</sup>

这里，考茨基无意中暗示了一个对于所有的社会主义派别都显得越来越严肃的问题。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发展。它在不同的国家得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这种不平衡性业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民族性，因为其关注的焦点是夺取政治权力，不管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还是通过革命的手段。社会主义运动被法国大革命的夺权模式牢牢拴住了。但是，如果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那么，单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如何能够成功地挑战资本主义呢？

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继续艰难地进行着，由于他们都把马克思理论视为

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不是把它运用于特殊政党已经发展起来的特殊国家。然而，革命的左翼是国际主义者——德国人、波兰人、俄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在他们之中最颖悟的一位是罗莎·卢森堡，一位波兰经济学家，她活跃的一生奔波于社会民主党之中，并于1919年死于几个心怀不满的德国士兵之手。罗莎·卢森堡在比伯恩斯坦或其他任何人更深的理论水平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动力问题。

当然，这里涉及的问题之一是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到来的日期问题。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社会民主党在这一点上的言辞是模棱两可的，但它坚持了这样的观点，就是危机越来越严重。正像我们在本书第5章中所说的，我们甚至在《资本论》的启示录式的第32章中，也找不到关于资本主义立即灭亡的预言。所有社会民主党要说的，都是以迂回的方式来表达，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比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但这也可能意味着，无论如何也要等上4至6个世纪。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这样向它的信徒允诺并且能够生存下去。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得不缩短这个时刻表。

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后面，还存在着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这些模型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的或可能的进步——一种永远摆脱危机的稳定增长，还是它们代表对这种结果不可能的证明？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相信，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总可以找到市场呢？由于假定工人们随着经济的扩张而越来越穷，因此，他们将不能提供消费品市场。因此，从工人方面看，不能提供市场，就会破坏资本主义体制。毕竟，投资的惟一目标是生产可以出售的产品，以获取利润。如果东西卖不出去，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不断投资呢？

这一问题的正命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像很多人认为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自我毁灭？伯恩斯坦认为，大的组织的出现——资本的集中——改善了资本主义控制产出和避免生产过剩的能力。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集中就导致了与马克思预言相反的结果，而不是像他所认为的排斥了竞争，加剧了阶级斗争。因此，资本主义越过整个19世纪仍然能够继续存活，已经成为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热烈讨论的焦点。在这场辩论中，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击中有效需求的问题之后，这些问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但是当他们著述时，那时的主流经济学著作并未涉及消费不足或投资过度的问题，特别是像门格尔（Menger）、杰文斯（Jevons）或马歇尔等主要经济学家的著作都没有涉及。



在这个方面，最好的大部头的然而有些凌乱的文献，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罗莎·卢森堡是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是考茨基的尖锐批评者，考茨基把革命的理论立场（与伯恩斯坦相对立）与改良主义的实践（与左翼相对立）结合起来。卢森堡著作的价值在于，她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的模型提出了内部批评，因而是这些年来惟一个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反对马克思的。在马克思的模型中——这需要回忆一下——马克思主义者生产机器产品和工资产品，在没有工人短缺、需求短缺或信贷短缺的情况下，两者都能以同比例增长。确实马克思在这种情境中甚至没有提出货币的问题。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在他们相信能够售出所有产出前——也就是说，在能够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前，在哪里去获得投资所需要的货币呢？（可以回忆本书第5章和公式  $M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M'$ 。）马克思是如何忽略了出售产出、寻找工人，或者需要获得资金以购买物质投入和劳动力的问题的呢？

在她的著作中，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她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需求问题与它的帝国主义外围地区结合起来。当然，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迅猛发展起来，但它们的视野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当然，他们自称为国际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德国谈不上是什么帝国（这是它与英国和法国争论的话题之一）。卢森堡说，帝国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尤其是它们的机器产品（铁路就是一个例子）的市场。它为第一部类的继续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殖民地地区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和食品。这些供给使工资产品这一篮筐中的内容不再增长。因此，在工人的货币工资没有增加和利润也没有降低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工资按照他们的工资产品计算却是上升了。这样，在按照工资产品计算的实际工资和按照工人生产的产品计算的实际工资之间，就存在一个裂隙。这种裂隙对英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管这种论证具体的技术细节如何（卢森堡对马克思的内部批评曾引来了激烈的争论），卢森堡恢复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全球视野。社会民主党坚持的国家视野被拓展了。经济史学家们从来都拒绝承认，帝国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来说是可以获益的，但是那种把资本主义的寿命延伸到它即将灭亡的彼岸的帝国主义的观点，成为左翼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作为帝国的剩余产出的接纳地和原料的输出地，殖民地被以表面上依附于核心国家的逻辑同帝国连接在一起。当然，罗莎·卢森堡当时没有预见到的，这些边缘国家可以成为剩余资本的配置地，因而可以雇用廉价的当地劳动力。因此，资



本向国外转移会损害本国工人的利益。然而，这些现象在当时还没有出现。

第二，卢森堡引入了另外的主题，就是在马克思的模型中加进了一个“第三部类”。这个部类的作用，是吸收剩余的产出，并生产那些不为工人或其他消费者所需求而为政府所需求的产出。这就是军事装备工业。这样，军事装备工业可以从第一部类中吸收剩余的机器，并制造政府购买的军事装备。

因此，这里的看法是，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接纳”部门，以便吸收机器的剩余产出。（可以回忆一下马克思在他的模型中是如何解决机器的剩余产出问题的。）当然，军事装备部门，像其他部门一样，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当然，它将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不论如何，剩余价值在这个部门将不复存在。稍后，当这种看法被扩大成一种浪费部门的范畴时，第三部类可能就变为公共所有，甚至不需要创造利润（后面还要更多谈到这点）。可问题依然存在：政府如何支付这笔买卖？一种方式是对利润或工资征税。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工人的消费可以通过征税转成军事支付的财政。在德国就是这样，直接征税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然后用作军备方面的财政支出。在英国，有所得税，甚至还有遗产税。

由于卢森堡批评并改进了马克思的理论，所以她对自己的批评也十分严厉。<sup>[20]</sup>许多作者都为马克思作了正统的辩护。但在这里我们再次不涉及更多的细节。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接受了这一信念：资本主义的继续存活是一个待解之谜。卢森堡用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联系来对它进行解释。帝国主义在此并非意味着政治统治：它是某种交换关系，其中核心国家出售机器产品，并购买原材料。当然，这种进程并非永久性的：或迟或早，边缘国家将会饱和，市场将会干涸。按照卢森堡的观点，这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自身的能力将是一个限制。

其他对于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存活问题的回答，更多地采取了修正主义的路线。他们没有对马克思提出内部的批评，承认他的假设，然后推翻他的结论——他们提出的是一种外部的经验的批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假定作为一种竞争的经济，很像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大部分工业公司大致具有相同的规模，许多公司都是如此。资本可以自由地从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不存在垄断——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是现在，在20世纪之交，人们所谈论的钢铁公司、化工公司和电力公司都是无比巨大的。在任何一个产业中，都是由几个大单位和许多小单位组成。在这些部门中，美国和德国是主导性的国家。英国落伍了。对在这些新的工业化国家中



形成的卡特尔，有一种谴责的倾向。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卡特尔预示着一个没有竞争行为的新世界。

大的工业组织形成卡特尔的趋势，被附加给德国特殊的形势。当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的时候，工业企业得到了国家银行和私人借款的金融支持。在19世纪末，地方银行被兼并，演变成几家大的结算银行，并从工业融资中撤了出来。取而代之，活跃的股票市场得到发展，英国的工业实质上是由股票提供资金的。然而在德国，银行在公司融资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银行拥有工业公司的股份，银行经理也加入了董事会。银行成为德国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伙伴。

大单位结合成的卡特尔这种组织形式——它转而受到大银行的金融支持——导致鲁道夫·希法亭发展了他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观念。<sup>[21]</sup>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据说不像马克思所做的理论概括。于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就被搁置一边。利润率的下降可以延缓，银行所具有的最高统治者的重要作用是一种新要素。还存在着对于市场的控制，当情况变得更加有利的时候，就可以为销售剩余产品库存提供大量的信贷支持。

希法亭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价值理论，甚至没有提出任何例证，以说明由银行支持的大单位的存在是怎样修正了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中所进行的计算，或者使这些计算变得无效。如果一些单位获取了难以置信的利润，这是否意味着偏离了马克思所讲的所有部门将拥有相同的利润率的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不平等的利润率是如何维持的？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理论问题。卢森堡排除了在马克思理论结构内部碰到的困难。希法亭引进了对马克思描述的校正，但他没有改进这个理论结构。

## 一个资本主义或多个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是一种专门针对德国资本主义的看法——或者说，最多是针对西欧大陆而言的。英国的经历不符合这种模式（尽管在19世纪前后，一些英国的评论者开始用妒忌的眼光看待德国经济的动力机制）。美国与德国共同分享了卡特尔现象，大约在这个时期，美国国会信用破产方面进行了微小的尝试。但是当涉及银行在工业融资中扮演的角色时，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德国模式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股票市场在美国和英国仍然

是重要的。现在看起来似乎不止存在惟一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存在好几种模式。

马克思主义对于美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吸引力也是微弱的。在这些国家中虽然存在着马克思的信徒，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任何一个重要政党的政治哲学。事实上，盎格鲁—撒克逊的社会主义者故意地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反古典经济学的边际主义学说兴起，并很快就得到流行。费边社会主义者讨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很快相信，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理论能够对价值和分配问题提供更好的解释。<sup>[22]</sup> 商品之所以有价值，并非因为它们包含着一定的劳动含量，而是因为它们相对于劳动需求是稀缺的。消费者把边际效用（衡量使用价值的尺度）等同于价格。生产者购买不同数量的要素投入——劳动，机器，等等——每个要素都获得了自己的边际产品。对生产者而言，这就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然而，在生产者的竞争过程中，这些利润将被减少到一个不能再降的最小值：正常利润。异常情况下，利润可以为零。这时，利润和利润率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开始在新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消失。

但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辉格党中的激进派——直到约翰·拉斯金和托马斯·卡莱尔就生活质量问题——以及我们今天所谓的工人的异化——而批评资本主义的缺陷时，都还一直活跃着。他们倾向于改良主义。费边主义者对影响市场经济变化的中立的、专家治国的公共服务，有着强烈的信念。就是在这一时期——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英国的新黑格尔派关于国家的观点是最有影响的。回想一下，黑格尔并不相信放任政策，认为市民社会必须接受国家的干预，接受官僚政治的指导，以对抗它自身的无节制。当新黑格尔派的政治哲学家在牛津大学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主要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他的继承者如政治经济学教授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sup>[23]</sup> 发展了通过税收和津贴干预市场的经济理论。经济福利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市场运行的有限但却适当的行为而得到提高——对冒烟工厂、噪音和空气污染进行课税，并为工人的教育提供津贴。其目的是缓和资本主义的危机。

马克思并没有谈到市场干预的问题。在这方面，他是地道的古典经济学家，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如出一辙。资本主义体制有它自己的逻辑，其发展轨迹可以归因于资本家寻求利润的行为。诸如缩短工作时间的改



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这在不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马克思注意到，当英国一个又一个产业在雇主和工人之间就缩短工作周进行谈判时，在法国的所有产业中缩短工作周的做法已经被立法化。

在20世纪中叶之前，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早期著作并没有广为人知，马克思主义者把所有这类对资本主义的批评都视为浪漫主义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适应英国社会主义的基督徒的和新教徒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他们坚定地相信这样的观点，不论资本主义的将来如何，不论它带来了多少不幸，资本主义同它之前出现的所有生产方式相比，是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他们认为，罗曼蒂克不过是对从未有过的过去的“怀旧”——或者说，即使它确实存在过，如今却早已不再。

## 俄国的辩论

同样的辩论以另外一种姿态在俄国浮现。<sup>[24]</sup>俄国只是在最近的1861年才废除了农奴制，而且在马克思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把沙皇俄国视为欧洲的反动堡垒，从未忘记它在击败德国1848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俄国拥有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之一。《资本论》在出版5年后，就被译成俄文，其甚至比法文版的出版还要早。译者尼古拉·弗兰塞维奇·丹尼尔逊(Nikolai Frantsevich Danielson)翻译了所有的三卷，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过通信。丹尼尔逊笔名为尼古拉(Nikolaion)，是民粹派人民党的领导人。民粹派走进俄国农民之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且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方案。民粹主义的一个主要纲领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由于俄国乡村的制度安排是以土地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并且在村庄中进行周期性的重新分配，因此应该避免破坏这种制度而导致私人土地所有制。事实上，俄国可以跳过可怕和悲惨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要求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他们引证马克思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可以跨越的不受欢迎的阶段。这将是俄国的独特的道路。

另一个更坚决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是由普列汉诺夫领导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争夺对俄国具有政治头脑的年轻人的领导权而向民粹派挑战。当然，这两个团体的活动都是被禁止的，他们的出版物必须在秘密状态下发行。他们的领袖时常被放逐或者被投进俄国沙皇的监牢。马克思在1881年收到

被放逐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维·伊·查苏利奇的信。<sup>[25]</sup>信中要求他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之间的争论给出一个裁定，前者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预言，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相同的前后相继的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后者认为，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请问先生，你能解决我们的争论吗？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写了一封简洁的回信。他为这封回信曾拟了四个草稿。这些草稿自从20世纪20年代被梁赞诺夫出版之后，一直得到仔细研究。通常，在草稿中比在最后版本中能找到更多的真理。但是在我看来，所有的草稿显示，马克思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编辑者。从这些冗长的草稿中，他形成了简洁的答复。首先，他谦逊地否认了任何关于发现历史一般规律的主张。他的理论只能适用于西欧。他一直在认真研究俄国的情况，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了解，以至于能对这两派作出判断。俄国的村社作为一种允许财产集体所有制的组织，的确是十分强健的，但是很难说它将如何存活下去。他不排除俄国会不遵从这种趋势，但是不管怎样，他对其中的任何一种道路都不能作出预测。俄国可以走任何一条道路。这正如他针对一个俄国人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所说的：“如果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受那些铁面无私的规律的支配。”<sup>[26]</sup>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晚期”马克思：不存在所谓必然的历史规律。但是如果进入资本主义——正如俄国在那个时期所经历的那样，这是官方的政策——那么这个体制就有它自己的“铁面无私的规律”。恩格斯几乎没有时间来谈论这种“具有可能性”的观点。俄国的革命不得不排在西方发达国家革命的后面。因此，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签署的《共产党宣言》俄文本序言中，后一种观点似乎是更占据优势：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



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7〕

这一俄文译文是由维·伊·查苏利奇翻译的，但是马克思前些年答复她的信件，那时并没有广为人知。这一明确表述对于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俄国革命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早期阶段，明显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不得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补充。只有这样，俄国才能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此外别无他途，尽管恩格斯并没有讲清楚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在那个阶段还不存在俄国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俄国正在一个劲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进军。沙皇已经决定，自上而下地推进现代化是最好的赌注。外国的资本——主要是法国的——被吸引过来。铁路必须建造起来，港口必须发展起来。俄国要变成欧洲西北部工业化国家的主要粮食输出国。通常，棉纺厂开始兴起时都要相应地带来同样的污浊，就像 50 年前的曼彻斯特一样，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也是这样描述的。民粹派非常讨厌俄国强烈发生的深远变化。他们的论点是，资本主义是一个从国外输入的温室植物，不适合俄国的土壤。它在俄国没有前途，因为贫穷的俄国农民无法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市场，而这种市场是维持工厂大量生产所必需的。资本主义很快会变得无利可获，而且与此同时，会导致大量的不幸。因此，民粹派赞同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抵制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这种行为的，而且看到了民粹派的分析的缺陷。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列宁，在 19 世纪 90 年代写了一系列的小册子和书籍，驳斥民粹派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批评。〔28〕其中第一本出版的著作叫作《评经济浪漫主义》。民粹派是经济上的浪漫主义。他们的领袖丹尼尔逊，试图使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扩大再生产的模型来证明他的论点。但是在一篇长文，即《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列宁表明是丹尼尔逊错读了马克思。马克思实际上是要表明，为什么不存在国内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对于资本主义的限制。在这篇文章中，列宁通过追溯自然经济存在的情形而扩充了马克思

的模式——非市场的生活资料生产，有剩余就进行易货贸易，因而他表明，随着这种自然经济被市场交换的引入摧毁，如何形成了一种近似的国内市场。农民变得富裕起来，开始向城市迁移并被工厂所雇用。[在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54年发表了那篇经典文章之后，现在的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刘易斯发展模式。]<sup>[29]</sup>这样，“农民”已经不再是同质的，而是有差别的。

由于时下许多反对全球化的人们像民粹派一样认为，从生活资料作物（subsistence crops）转到现金作物（cash crops）导致第三世界农民的破产，在这里有必要引证列宁的结论。列宁首先引证了丹尼尔逊的观点：“农民因需要钱而过分扩大耕地，于是遭到破产。”然后他给出了答案：

但只有殷实的、有种子的、有足够役畜和农具的农民才能扩大耕地。这种农民（大家知道，他们是少数）的确增加了播种面积，甚至把自己的经济扩大到没有工人帮助就不能应付的程度。多数农民则根本无力用扩大经济的办法来满足对金钱的需要，他们既没有任何储备，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这种农民要弄到钱，就得去找“外水”，就是说，他拿到市场上去的，已不是自己的产品，而是自己的劳动力了。出去找“外水”自然使农业经济更加衰落，这个农民最后的结局就是把自己的份地租给本村社的富户；这个富户扩大自己的经济，当然不是把这种份地出产的产品自己消费掉，而是把它送到市场上去。结果是“人民贫穷化”，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扩大。但不仅如此。这个富裕农民一心经营扩大了农业经济，已不能像从前那样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了，就拿鞋子来说，买鞋穿对他更合算了。至于变穷了的农民，他也得买鞋穿；他不能自己做鞋子，原因很简单，他已没有自己的经济了。于是产生了对鞋子的需求，产生了粮食的供应，这是善于经营的农夫所生产的余粮。

接着列宁同样地分析了手工艺的衰退和市场的成长。然后说：

结果又是人民的贫穷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这又推动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这个运动到何处为止呢？这谁也说不上来，正如谁也说不上来它从什么地方开始一样，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活生生的有机过程，即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增



长的过程。农村中的“非农民化”向我们表明这个过程的开端，它的萌芽，它的早期阶段；城市中的大资本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个过程的结尾和它的趋向。若想把这两个现象分割开来，若想把它们看作孤立的互不依赖的东西，那你就不能使自己的论断前后一致，就不能说明人民的贫穷化和资本主义的增长这两个现象。<sup>[30]</sup>

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成长，并不存在有效需求方面的限制。稍后，无产阶级可能会随着资本主义一道大规模发展，并且为资本主义挖掘墓穴。但是，对于列宁来说，在19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的选择，尽管他完全意识到它具有导致穷困化的后果。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看法也是很有意思的。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列宁引证了马克思1848年1月在布鲁塞尔所做的关于自由贸易方面的演讲。

全部论证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提高生产力**。假如工业在增长，假如财富，生产力，一句话，生产资本，扩大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即工资就会增高。**资本的增长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状况。必须同意这一点**。假如资本停顿，工业就不是停顿而是下降，这时工人就会成为工业下降的第一个牺牲品。工人会比资本家先灭亡。可是在资本增长的情况下，即在对工人有利的上述情况下，工人的命运会怎样呢？他同样要灭亡。<sup>[31]</sup>

然而，撇开最后一句话不论，马克思是支持自由贸易的——正如列宁在这个小册子中也赞同自由贸易一样——因为它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

马克思不是把资本主义与某种应该怎样的抽象社会（实质上是空想）加以比较，而是把它与社会经济的**以前各阶段**相比较，把依次相继的资本主义各阶段加以比较，并肯定社会生产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事实**。<sup>[32]</sup>

这就是我所谓的古典马克思主义，一种在19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形成的观点。那时，资本主义正在向新疆域和古老国家扩散，国家从不试图调控经



济，资本和劳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当马克思主义者辩论资本主义的未来时，即使所面对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还在充满活力的扩张，他们并不寻求逆转这种发展趋势，或者甚至寻求使它减缓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是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之尽快地走到它的尽头。因此，不管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是在50年后列宁关于“废弃的村庄”的著述中，并不存在浪漫主义：手工艺被抛弃，农民迁移变成工厂工人。历史在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与它一起在发展。

然而，突然之间，理性的狡诈——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又一次光临。正如它在欧洲的黑暗时代所表现的那样，历史决定不再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而历史车轮令人感到出乎意料。在其后的75年（1914—1989），在短暂的20世纪，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同一的。

#### [注释]

[1] 德国于1871年把它的马克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之上，法国是1878年，而美国把它的通货完全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之上是在1879年。

[2] 189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W.J. 布赖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 的完整引文是：“你不要让这顶长刺的皇冠遮住了劳动工人的眉毛，你不要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尽管如此，布赖恩仍然在选举中败给了共和党员候选人威廉·麦金利 (William McKinley)。

[3] 大部分有关收入和价格的数据引自 Angus Maddison (1991),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Long Run Comparative 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该书包含的数据之丰富，超过了有关收入、人口、生产力、资本构成和价格等方面的最可靠的和最丰富的统计资料。它也是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性著作，在许多方面对于我的工作给予了启发。

[4] 使数量加倍的年数，依赖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是，假设使数量加倍的年数  $n$  能够加倍为  $x$ ，则有  $n=72/x$  的年增长率。因此，6%的增长率增长1倍的时间是12年，等等。

[5] 康德拉捷夫是俄国经济学家，作为莫斯科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他在长波研究方面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他首次发表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题目是“Die Langen Wellen der Konjunktur”，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December 1926. 他的工作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讨论，见 J. A. Schumpeter (1939), *Business Cycles*, McGraw-Hill, New York.



[6] 要计算一个持续时期的收入不平等的数据是极其困难的。关于英国和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数据的一个很好的摘要，见 David Hackett Fisher (1996), *The Great Wave: Price Revolutions and the Rhythm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在一个题为“维多利亚均衡”(The Victorian Equilibrium)的表格中，费舍尔设计了一个基尼系数(Gini ratio)(一种衡量不平等的方法)，以测量1801—1913年间北美与南美财富的不平等，以及英国收入的不平等。在不平等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与我们今天的情况相比它是非常之高的。英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为0.50，而今天的评估将是0.35左右。基尼系数为0时代表着完全的平等，基尼系数为1时代表着完全的不平等，也就是意味着一个人拿走所有的收入而其余的人则一无所获。

[7] 罗伯特·欧文的 *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Human Characte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to Practice*，是在1813—1816年之间写成的。他首次使用了“排斥”(exclusion)一词，如今人们在形容使人变得贫穷时常常时觉地大量使用这个词。在他最初的评论中是这样描写的：

现在看来非常明显，资本主义体制通过让被排斥者看其他人享受不允许他们占有的东西，彻底摧毁了被排斥者的幸福；而且为了与排斥的程度相适应，它还通过在被排斥者的受伤的感情方面制造与“真正人”的对立，甚至也消除了特权者的幸福……

Robert Owen [1991] *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Other Writings*, ed. Gregory Claeys, Penguin Harmondsworth, p. 15.

John Ruskin (1958), *Unto This last and Other Writings*, ed. Clive Wilmer; Penguin Harmondsworth.

查尔斯·布思详细描绘了伦敦在1887—1897年间的贫穷状况。他所发现的一条非常狭小的“贫困线”(poverty line)，见 Alan Gillie (1996) "The Origin of the Poverty Li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XLIX, no. 4, 715—730. Gillie 为布思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参考书目，包括他的9卷本的《劳动与人民生活》(*Labour and the Life of People*)，也可参见 B. Seebohm Rowntree (1922), *Poverty: A Study in Town Life*, Longmans Green, London. 此书首版于1901年。

[8] 存在着大量的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献。经典性的著作是 Carl Schorske (1955),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9] 卡尔·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5月，1891年发表在社会民主党的期刊上。其英文译本，见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pp. 315—335 (p. 317)。

- [10] Ibid.
- [11] Ibid., p. 319.
- [12] Ibid.
- [13]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4),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und After*, ed. David Fernbach, Penguin, Harmondsworth, pp. 344-345.
- [14] 一项有关考茨基的分析性的和富有同情心的研究, 见 Massimo Salvadori (1979),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Verso, London.
- [15] Donald Sassoon (1996),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 B. Tauris, London, p. xx.
- [16] Ibid., xxii.
- [17] Karl Kautsky (1891/1910), *The Class Struggle (Erfurt Programme)*, trans. William e. Bohm, Charles Kerr, Chicago, p. 8.
- [18] Peter Gay (1952),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o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CP, New York, p. 63.
- [19] Ibid., pp 67-68.
- [20] 主要的评论家是布哈林。见布哈林的批评与罗莎·卢森堡对其批评的回答, Rosa Luxemburg and Nikolai Bukharin (1972),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 Rudolf Wickman, ed. Kenneth Tarbuck, Allen Lane, London.
- 范围更广的讨论记录在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1989),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 I 1883-1929, and (1992) Volume II 1929-1990*, Macmillan, London.
- [21] Rudolf Hilferding (1927/1981), *Finance Capital*, 德文版由维恩 (Wein) 首次出版, 英译本是 T. 博托摩尔 (T. Bottomore) 翻译, 伦敦卢特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公司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出版。
- [22] 费边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受到了诸如威克斯第德 (Wicksteed) 和埃奇沃思 (Edgeworth) 等经济学家的影响。我在下面这本书中描述过这些: Meghnad Desai (1974),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Gray-Mills, London. 也可参见: Eric Hobsbawm "Dr Marx and the Victorians", in E. Hobsbawm (1964),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Weidenfeld & Nicolson, London.
- [23] Alfred Marshall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London; A. C. Pigou (1920),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Macmillan, London.
- [24]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1, 很好地讨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
- [25] 关于 V. 查苏利奇的信与马克思的答复, 一共有四篇手稿, 见 Teodor Shanin (ed.) (1984),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



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26] Karl Marx, letter to the editorial board of *Otechestvenniye Zapiski*,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1955),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p. 293.

[27] Laski (e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 104.

[28] 有关列宁所有经济学著作的清单, 见 Meghnad Desai (ed.) (1989), *Lenin's Economic Writing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enin (1893/1937), "On the So-Called Question of the Home Market", 写于 1893 年, 首版于 1937 年, 重版于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I*, also in Desai (1989); Lenin (1987), *A Characterization of Economic Romanticism; Sismondi and Our Native Sismondists*, first published in four issues of *Novoye Slovo*, April-July 1897, signed K. T. . . 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 我引自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于 1971 年出版的小册子。

[29] W. A. Lewis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vol. 22, pp. 139-191.

[30] Lenin in Desai, *Lenin's Economic Writings*, pp. 81-82.

[31] *Ibid.*, pp. 134-135; original emphasis.

[32] *Ibid.*, p. 135.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7章 战争与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4日爆发。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近百年来欧洲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达成的一切认同。它动摇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理性和不断进步的信念——对于像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萧伯纳（Bernard Shaw）等人来说，1914年是通往非理性的世界的入口。<sup>[1]</sup>同时，它也终止甚至背离了全球化的航线。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已经享受了无限制的权利——资本和劳动的流动，自由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金本位制维持着通货原则。这是一种自由的秩序。恰恰在世界大战前夕，一些人还在议论，自由贸易将使战争成为不可能。

战争打断了像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那样的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资本主义在其后的75



年中，进入了不同的时期，但很少有人预测到了这一点。没有人真正认为战争要爆发。毕竟，两次摩洛哥危机——1905年和1911年——都通过外交途径得到了圆满解决，德国对于北非的野心受到了遏制，尽管它一直都在建设海军和武装力量。我们现在才知道，德国早就制定了战争计划，直到列车时刻表这些最后的细节。然而，没有人预料到这场战争的到来。

对于战争，马克思主义者有足够的理由不感到吃惊。他们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议论，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如何对付这种战争的议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1907年它在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比社会民主党所能接受的程度更加激进的反战决议，但更符合社会党来自东方的社会主义新浪潮的口味——罗莎·卢森堡代表波兰，列宁则是1905年俄国革命中新涌现出的人物。法国社会党认为，应该将未来战争转变为工人的起义。社会民主党在1907年的选举中刚刚失去一些席位，因为德国公众正沉浸在一种侵略主义的情绪中。社会民主党中的修正主义一翼，主张不要理睬法国暴动，谴责它索列尔式的无政府主义。然而，当辩论结束时，通过的决议仍相当激进：

在面临战争的威胁时，各国工人和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有义务卷进去，在国际总部的统一领导下，竭尽他们所有力量采取一致的行动来阻止战争。他们应该使用一切在他们看来最合适的手段，并根据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来变换斗争手段。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他们有义务使之尽快结束，并充分利用战争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唤醒民众，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sup>[2]</sup>

这是一条国际主义的路线，然而它也允许个别国家有不同的特点。罗莎·卢森堡明确提出运用大罢工的武器，正如法国所做的那样，但是，德国采取的是“看来最合适的手段”。然而，这意味着不存在战争方面的相互合作。工人没有祖国。他们将利用战争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

不过，一旦敌意出现了，这种国际主义就烟消云散了。对于第二国际的最大震动，就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行为。众所周知，修正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成员是实用主义的，并愿意与资本主义体制一起工作，他们构成了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大多数。在这之前，即在1912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独立团体，拥有445个席位中的110个和400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一直是：“为了这个体制，不出一分钱，不出一个人。”它的《爱尔福特

纲领》每一步都是用来反对政府的，尤其是拒绝一切军备预算。但是，尤其是在1907年遭受挫败之后，社会民主党最终不得不正视任何议会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选举需要侵略主义者的响应，一个一心想赢得席位的政党能够继续抵制战争吗？一个以获得选票为目标的政党能够表现出反国家主义的形象吗？

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朗兹·梅林和克拉雷·蔡特金是社会民主党左翼激进分子的代表。处于中左位置的是考茨基，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进化的通往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sup>[3]</sup>但是，其余的人则愿意为眼前的收获而工作——这是工团主义者的想法；或者甚至不想摧毁资本主义体制本身——这是修正主义者的想法。这个不稳定的联盟被分两步走的《爱尔福特纲领》黏合在一起：立即进行的是改良，但最终要进行的是革命。社会民主党囊括了议会社会主义政党所经历过的一切方案，这只不过是第一步。在活跃的政党与官僚体制之间，在总部与地方支部之间，在领导层与会议之间，都存在正常的斗争，每一方都把另一方谴责为宗派主义和布道集团。

但是，随着和平的持续，选举也在激烈地进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席位处于稳定上升之中。它在1903年获得了81个席位，到1907年下降到43个席位，1912年又上升到110个席位。不过，社会民主党仍然是德国社会的贱民。保守的和以土地为中心的政党，国家自由主义党和进步党——最终都是赞成资本主义体制的，只有社会民主党反对资本主义体制。正如保守党人士赫·冯·奥尔登伯格·奥弗·贾纳斯彻恩（Herr von Oldenburg auf Januschan）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面对清脆的掌声时所说的：“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必须一直能够对任何军官发布命令，‘带十个人来，向国会大厦射击’。”<sup>[4]</sup>当然，他的意思是向国会大厦中的社会主义者射击。

尽管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妥协，也很难说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道路策略能使它们成功地取得政权。作为第一个和最大的效忠于马克思主义的议会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在这个转折关头提出了各种令人迷惑的与现实相矛盾的问题。

战争把所有进退两难的问题一下子提前摆在了这个政党的面前。1914年8月4日，当即将摊牌之际，社会民主党全体一致地投票赞成军事贷款，它这样做是第一次。根据以前的协议，社会民主党总是先在党内进行讨论，然后再作为一个党团参加投票。尽管有大多数成员的赞同，但是少数人坚定地认为，赞成军事贷款的投票违反了《爱尔福特纲领》，也违反了斯图亚特会议关于反对战争的决议。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对社会民主党的投票

成票表示震惊。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政党已经走向了沙文主义。欧洲的社会主义再也不是一致的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将永久地分裂了。

关于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引起了无穷的争论，但是自那以后我们知道，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从来不是实际的政治，同时，做一个议会政党，实质上是妥协的同义语。在当时，震惊和被出卖的感觉是十分明显的。在整个战争时间，社会民主党分裂了，1917年1月，它的左翼——激进和核心的成员——着手组建了自己的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考茨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加入了这个党。当这场战争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并且宣告成立一个共和国时，它的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克·埃伯特（Friedrich Ebert），是前社会民主党的总书记，右翼的重要领导成员。在随后发生的起义中，他以前的同志，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军官的大头短棒击死。这之前，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德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在我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其他方面的主要后果——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让我先引用卡尔·肖斯克（Carl Schorske）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对于社会民主党议员团投赞成票的原因所做的解释：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投票赞成战争贷款，某种程度上是在追忆另一个8月4日——1789年的8月4日的气氛中进行的。就在1789年8月4日，法兰西的贵族，由于被恐惧的突发所征服，投票否决了自己的特权，其结果是，公开放弃了它自己的社会组织原则。正如在1789年一样，政治生活的艰难现实——首先是反贵族力量的威胁——的运转使第二等级的左翼得到加强，于是在1914年，残酷的事实也有益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sup>[5]</sup>

第二国际的混乱是全面的。在法国，琼·约雷斯（Jean Jaures），一个反战的社会主义者由于坚持自己的反战原则而被暗杀。在英国，初出茅庐的工党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反战主义者。然而，当他们的领导者之一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坚持参战时，该党也加入了欢呼的行列。全球资本主义与各个国家经济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在战争中暂时退回到几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经济，而且当和平来临之际，却不能回复到一种全球体系。这是“一国资本主义”阶段，“一国资本主义”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带有复仇的非全球化。

几乎从一开始，德国经济就被迫处于孤立状态。德国在原材料方面非常



依赖进口，而且也没有帝国网络可以依靠。沃尔特·拉瑟诺（Walter Rathenau），一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商人，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就向德国军事当局提议，他们应该以恰当的协调方式分配稀缺的原材料。他立即被吸收到德国战争机器中，成为它的第一个中央计划者。经济学家对于计划的思想并非一无所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著书论述过一种全面的计划经济，另外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恩里科·巴伦（Enrico Barone）把帕累托的思考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我在后面还要回到故事。拉瑟诺的努力在计划配置资源方面开创了一种实验。

认为经济可以像机器那样加以控制的观点，对19世纪的多数思想来说是陌生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认真讨论过它，因为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也许会有一天，“社会”可以有意识地运作经济，但那是将来的事情。古典和新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经济视为一个自我调节的有机体。社会主义者已经写作关于建立孤立的自治共同体的方案。查尔斯·傅立叶已经计划要建立一系列公共所有的工厂（空想的共产主义村庄），但是尚不清楚资源应该如何配置。马克思狠狠地嘲笑了蒲鲁东关于以劳动一价值为基础的经济的无政府主义计划。资本主义市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配置系统，尽管它结果可能是不公平的。

德国把他们有计划的战时经济的实验称为“战时社会主义”（war socialism）。<sup>[6]</sup>这是第一个通过一个中心有意识地运行一种发达经济的例子：在这里，社会主义者用含糊的语言要表达的东西，变得生动而又具体。德国战时社会主义的经验在俄国引起了极大关注，尤其是当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开始迷恋德国成就之际。列宁在战争期间流亡苏黎世时，读了尤里·拉林（Yuri Larin）写的一些介绍德国战时经济的文章。他对德国经验的羡慕，在后来左右了他有关思想的形成。这些影响反映在他1917年11月之后在俄国执政的时期，后来的影响更为明显。

但是，其他的一些交战国也开始思考对生产计划和分配稀缺资源进行中央协调的问题。工会在第一次通过了权力的入口时受到了欢迎。存在连续的充分就业。金本位制被搁置一边。经济开始由官僚、军事人员和商人组成的委员会运作。国际贸易受到严厉的破坏，资本流动干涸了。

一种新的经济逻辑突然诞生了。以前也出现过战争，军队一直就像计划经济一样。但这一次是一场全面的群众战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战争动员。虽然企业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而资本主义市场已经不再遵守资本主义

经济的逻辑。这是一个新的王国。这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在战争中期发生的两起事件改变了西欧资本主义的注意力。第一个事件是美国作为同盟国加入战争。这就产生了盎格鲁—撒克逊联盟，该联盟在整个 20 世纪一直占据优势。美国的人力、资源和价值观念开始显示出他们在旧世界中的重要性。美国从来没有封建制度，它惟一的帝国经历，就是西班牙—美国战争。它的资本主义不能被视为成熟到可以革命的地步。实际上，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了解美国，也不把它纳入到自己的思考范围。美国涉足欧洲政治，对于资本主义的动力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另外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就是俄国二月革命，后来演变成十月（十一月）<sup>①</sup> 革命，那时布尔什维克从克伦斯基（Kerensky）政府夺取了政权。俄国革命令人回想起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它是一场突然的政变。强大的和贵族的沙皇统治倾倒了，但是代之而起的不是一个自由民主政府或者寡头执政集团，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俄国掌握了政权。布尔什维克像他们的敌人一样，也对此感到惊讶。

但是，那时看来，布尔什维克并没有什么持续支撑政权的前景。他们自己也认为，要保持俄国革命，需要德国，也许还要法国发生革命。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德国向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提出了屈辱性的条约，严重的饥荒又在这块土地上蔓延。然而，布尔什维克对自己的前提深信不疑，即德国一定会发生起义。在德国 1918 年被战败后，它还是这样认为的。<sup>[7]</sup> 在基尔有过一场海军兵变，独立社会民主党中持不同政见的斯巴达克集团，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参加了德国的革命军队。布尔什维克愿意用货车运载短缺的粮食去德国，以支持革命。事情远不止如此。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出现了起义，在那里，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政党夺取了政权。意大利北部也不平静。在 1918 年晚期至 1919 年早期，一时间好像又回到了 1848 年，欧洲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

到处都有工人委员会，有时是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苏维埃，正如 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时所称呼的那样。但是接着，他们都像开始来得突然那样，结束得也突然。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消失了。到 1919 年晚期，只有布尔什维克仍然继续掌权。更有甚者，他们还在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在饥荒中进行的内战中存活了下来。

俄国革命的存活，以及它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极大地改变了 20 世纪

<sup>①</sup> “十月”是按俄国旧历所说。



的面貌。<sup>[8]</sup>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从社会民主党过渡到布尔什维克。考茨基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高等教会，现在变成列宁（后来是斯大林）的更加褊狭的加尔文教会。马克思的话即使是在受到曲解时，也变得一贯正确。从成为一位巨大但却并非完美无缺的思想家开始，马克思被神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30年中曾经广为流行的对马克思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被宣布为非法。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得不隶属于布尔什维克创建的第三国际，并且都必须承认某些基本的原则。从成为有长期革命目标的议会政党开始，马克思主义政党变成了反民主的、阴谋的和中央集权的政党。这是列宁的革命政党的模式，是在俄国已经实行的东西，因此它也将世界其他地方实行。

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是：在俄国资本主义落后的状况下，它是怎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言截然相反的革命，如何能够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在一个无产阶级还十分幼稚弱小的国家，怎么可能出现无产阶级革命？难道列宁的革命不是驳斥了马克思而是实践了马克思吗？如果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出现马克思主义革命，发达国家是否能够同样地摆脱攻击呢？或者是否可以认为，俄国革命仅仅是历史上的一种反常现象，一种偶然事件？

今天看来，在苏联崩溃之后，要取消这些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的问题，是很容易的。一些人会认为，如果马克思的理论在1917年没有失败的话，它在1989年毫无疑问是失败了。但是，搁置这种后见之明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许多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于马克思和市场的思考方式，都受到了对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的深刻影响。俄国革命的发生、存活，它在斯大林统治之下犯下的罪恶以及后来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之下的暴行，都应该得到理解。因此，让我们根据其后发生的事情来辩论俄国革命的性质，就好像我们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崩溃一样。把我们的注意力聚集在比如说1980年吧，我们应该怎样才能理解俄国十月革命呢？

#### 俄国革命：一场历史的误会？

俄国革命，即使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也将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这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

[托洛茨基：《战争与国际》，20~21页，  
引自克利夫（Cliff）：《列宁》，第二卷，21页]

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争论也许永远不会结束。“被背叛的革命”是一种不断的呼声，但是对于它在什么时候发生和由谁领导，却存在着大量的分歧。包含着偶然的、结构性的和历史的原因的各种解释——它把背叛的根源如果不是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至少也是追溯到几十年之前——已经又向前推进了不少。

那些希望俄国实行议会制的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的话）民主政治的人们，把这种背叛定在了1917年2月和10月（旧式日历）之间。沙皇从前信守于杜马的弱点，中间阶级的脆弱性，地方政府的缓慢发展，克伦斯基或许其他大臣的临时失误，社会革命党（一个农民党）的分裂，等等，都可以进一步增强这一观点。大部分白俄罗斯人的争论是沿着这些线索展开的。

另一种不同看法是把时间转移到1917年12月，指责主要集中在布尔什维克拒绝了立宪会议的决议上。在这里，那些渴望议会制社会民主的人们，即孟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都参加了这场争论。但是，布尔什维克并不致力于议会民主政治。布尔什维克虽然在1917年10月晚些时候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赢得了微弱的多数，但是到12月，却并没有保持这个记录。他们那时应该辞职。事情本该如此，但是，我们下面将看到，任何了解布尔什维克的人，都不会对它紧紧抓住政权不放感到惊讶。然而，只是在事后的环境中，这似乎成了一个关键事件。不论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没有持续太久。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应该享有任何更大的幸运。事实上，在紧接十月革命之后的时期，这似乎是其他政党的态度。他们并不希望布尔什维克继续下去。问题仍然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存活？这里的关键是列宁。

十月革命爆发前的6个月，即1917年4月，列宁进入俄国，3个月之后他进入隐匿状态。但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一致同意解除另外一支双重政府——听天由命的内阁——的武装。冬宫甚至已经经不起暴风雨的侵袭——内阁只好改组。时不我待，——以前没有人能够给布尔什维克这样好的成功机会。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形下所做的与众不同的关键点，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知道如何维持下去。列宁在1902—1905年期间的著作《怎么办》，主要是作为这样一种论据来阅读：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应该是一个小的、守纪律的和密谋的政党，它应该避免议会道路。许多人相信，这些观点为列宁1917年10月革命的

成功所证实。但是我宁愿相信，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以多数票获胜与列宁的政党模型并没有什么联系。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以后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地招募新党员，使自己成为一个群众政党，因而是对列宁政党模式的否决，这种做法到十月革命时获得了不断的成功。这个政党的党员在1917年2月为2.4万人。到1917年8月增加了10倍，达到24万人。斯维尔德洛夫（Sverdlov）——当时该党的主席声称，在10月16日已经达到了40万人，但是对这一声明存在疑问。在1918年的第七次党代会上，他声明的是30万人。<sup>[9]</sup>甚至接近1917年7月时，这个政党还缺乏中央集权的结构和纪律，那时它发动过一次冒险主义的起义，并在起义中丧失了许多威望。是临时政府的分裂，导致了一场全面的混战，科尔尼洛夫（Kornilov）进军首都，再加上内阁的可悲的回应，使布尔什维克在7月之后（最终是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迅速得到了大多数的支持。

是的，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并非借助列宁政党的结构。但是，列宁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机器就能够帮助他们维持政权。严明的纪律，精英领导的观念，坚决要求献身于党的事业——所有这些都助于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到内战结束（1921年）这一段时间内能够经受任何风雨的侵袭。他们甚至能够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叛乱<sup>[10]</sup>和左翼反对派出现的不利情况下生存下来。这是列宁紧密编织的政党结构发挥作用的地方。列宁一旦获得多数，他就控制了俄国，就像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所做的那样，当时在竞争政党的刊物《火星报》（*Iskra*）的编辑部时，为了对另一派进行无情攻击，直至他们辞职，一票的多数一直被奉为神圣的。毕竟，在1902年及其稍后一段时期，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是多数派，但是在以一票之差获取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宣布自己是多数派。

对于列宁主义者来说，1917年12月发生的事件算不得什么。他们确信，十月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从那时起就出现了。他们把这看作是马克思1848年证明了的看法，当然这也归功于列宁的天才般的政治组织能力。目的论是难以避免的。1902年发生在尚不知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分裂，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性；后来孟什维克被击败的种子已经在那时种下；列宁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哲学等各个方面的正确性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且要永远持续下去。

这种列宁主义的“倾向”（解释？）将是我们在全论中应该着重讨论的。这种解释接着需要更深层次的说明。最具有影响的说明——至少在西方，自从出现反斯大林主义之后——是托洛茨基的解释。这种解释说，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背叛了十月革命，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教条；以政党官僚机关取代工人运动活动分子（替代主义 [substitutism]）；分裂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尽管这一点最后没有实施）；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这一观点一直到1956年的岁月，代表着少数人的观点：“托洛茨基分子”被认为是十月革命的背叛者。多数人的观点是这样的：说一千道一万，斯大林仍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苏联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的策略（列宁主义的策略）仍然是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学习的范例。俄国的肃反使不少人感到迷茫；当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Molotov-Ribbentrop）签订时，使更多的人陷入迷茫；但是，对于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人来说，在人民阵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1—1945年期间，还是有很多人加入共产党。正是这种力量导致法国共产党（PCF）分享法国政权，甚至使美国的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人们的尊重。在英美联盟中，当冷战恢复了共产党在战前的状态时，共产党在欧洲大陆却受到尊重。不是冷战，也不是麦卡锡（McCarthyite）的政治迫害，而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打破了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大体上，共产党作为一种代表左翼的严肃的政治力量是结束了。拉夫·沙姆（Raphael Samuel）动情地回忆了1956年之前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意味着什么。<sup>[1]</sup>如今，已经不可能再生这种地位。1956年之后，西欧列宁主义的火炬已经传给了托洛茨基集团。他们现在吸引了那些声明自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真正继承者的人们。列宁主义，第三国际，以及1917之后的年代，曾经为欧洲社会主义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形势：不存在任何非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如果你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你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 托洛茨基分子的故事

为了赢得激进的青年人的忠诚和获得对新左翼的领导权——也即为了能够继承俄国十月革命的优点和列宁的衣钵，又不至于因赫鲁晓夫所承认的各种恐怖行为（无论如何这些恐怖行为对于西方来说已经广为人知）而招到指

责，托洛茨基分子不得不使用了某种优雅的骗术。这是通过接受托洛茨基所谓“被背叛的革命”的口号而做到的。但是，俄国革命是怎么可能被个人所背叛，不管他是如何强大？的确，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需要对背叛革命进行阶级分析。官僚体制是如何获得力量的？工人革命是如何堕落为一场波拿巴主义的灾难的？在这个方面，可能找出无数的著作、文章、小册子和辩论。集团分裂了；人们被斯大林的政党放逐了。无休止的谢罪至今仍然充斥着期刊和书籍。

如果你同意1917年发生的是工人革命，你就不得不解释工人阶级是如何彻底而迅速地失去了它的力量和革命的传统，因为这场革命在十年（大约如此）之后就遭到了背叛。对托洛茨基来说，捕获新左翼的一种重要的版本，出现在艾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的有关托洛茨基的传记中。<sup>[12]</sup>除了把托洛茨基刻画为俄国革命的具有浪漫气质的伟人（“预言家”，在犹太人惨遭大屠杀之后的岁月，利用托洛茨基的可以褒扬的犹太人身份）之外，多伊彻还提出了他自己关于俄国革命之所以退化的解释：最初发动革命的工人阶级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俄国内战造成了它的损失。工人阶级的成员——一代多人被都市化的、被布尔什维克教育成社会主义的政治新人，他们非常熟悉理论上的争论，能够经受艰苦的革命考验——在新政府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俄国内战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由于饥饿，由于战斗中的死亡，由于彻底的疲劳。这批工人阶级的精疲力竭和在内战中遭到大批杀害，为斯大林的官僚体制力量的取胜提供了机会。新的工人阶级不得不从农民中征募，他们并没有接受工人阶级的文化洗礼，没有工会斗争的经历，没有理论知识和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面临斯大林对于最初的列宁主义革命的腐化时，他们显得十分被动。这样，在击败白匪的反革命进攻的同时，尽管赢得工人国家在物质上的保存，但俄国革命也失去了它的灵魂。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主题，因为它从外部因素谴责了这种退化，认为所有的左翼派别都是邪恶的——是白俄。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勇敢的、坚强的工人们保卫俄国革命时死去，而当他们如此奋斗的时候，却失去了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它避免了任何涉及俄国革命的内在因素的问题。列宁和托洛茨基看起来好像是高高地立于批评范围之外，因为内战才是罪魁祸首。秘密警察的崛起；工会的军事化；反对派陷入沉默之后，党内的争论受到操纵；把权力集中在政治局的做法，为斯大林开辟道路；在列宁去世和托洛茨基被放逐期间，许多人背叛了托洛茨基；——所有这些，都没有在有关事件



的这一版本中得到分析。左翼反对派和左翼无政府主义集团对把工厂和政党的决策转向更大程度的集权的批评，在这种分析也被忽视了。这种解释过于简洁，也过于省事了。

多伊彻的这种解释可以得到其他解释的补充，但是也一直存在着另外的解释。如自由民主动力的脆弱被归罪于中产阶级的缺乏，社会民主动力的脆弱可被归结为工人阶级的缺乏或者规模太小。俄国是怎样从这样脆弱的资本主义基础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在数字上是小的，但很集中。人们希望能够希望，在资本主义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俄国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成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据说，只有小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声明，才能劝说人们相信，苏联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这大体上是孟什维克的路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派（卡尔·考茨基派）和该党的极左派（罗莎·卢森堡派）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得到反映。<sup>[13]</sup>

这是古典的（前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当资本主义完全成熟的时候，也就是当它的生产关系——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为利润而生产以及为增加利润和降低价值而进行的资本积累——不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率增长）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灭亡。在匮乏的条件下，在价值规律仍然起着制约作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成熟前夺取政权，其结果不是造成社会主义而是扭曲的发展。这种古典的观点的确是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与民粹派论战的时候所坚持的。按照这种观点，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曾预计要花“数十年，如果不是几代人的话”。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尽管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但是，直到它的潜力耗竭之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都是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这就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派理论的原因，因为民粹派曾经认为，在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居间阶段，在本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论证的问题是，它不能解释1917年10月所发生的事件，更有甚者，也不能解释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取政权的主张在当时无论多么脆弱，为什么却能够渡过内战、饥荒和经济崩溃，从而巩固政权？为什么直到1921年发生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时候，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

对于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取得成功的解释恰恰在于工人阶级规模小。它不仅规模小，而且主要集中于几个都市中心，在公开论战和通过合法途径进行





自由联合方面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像德国工人阶级所能够做的那样），这就使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集权制政党的政治策略变得可行。然而，给予布尔什维克最坚决支持的，并不是这些规模小的工人阶级。仅仅这些支持是不够的。是农民，既包括农村的农民，也包括城市里身着军装的农民，在支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而这个政党只在工人阶级中看到了革命的潜力。当这场使该政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发生时，它只能把这场革命理解为工人革命。

如果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他们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并在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夕发动起义赶走了影子内阁——理解为一个偶然事件，就必须了解某些类似的基础，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维持政权，并得到支持，则是工人阶级的天性、俄国农民的性格和列宁政党的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1917年2月爆发的是一场得到工人和农民支持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得到支持，因为它们不能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当它们宣布自己在新创造的自由环境中拥有的权利时，它们并不能维持对工人的控制。理论上，由于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资产阶级政党可以形成一种稳固的联合，但是，他们不得不满足战时环境和沙皇反对派（7月科尔尼洛夫就提供了一个例证）所提出的迫切要求。为了维持政权，他们需要士兵的支持，而这些士兵——大多数是农民——需要和平也需要土地。

1917年7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间占据了多数，通过许诺土地与和平，他们赢得了士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的支持。他们的土地、面包与和平政策，带有社会革命党纲领的因素，确实起了作用。工人阶级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支持——这在7月至10月的圣彼得堡是至关重要的——并没有坚持下来。甚至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发现，在10月末的时候花了4天的功夫才控制住局势。当内战的困难开始袭来的时候，孟什维克和左翼无政府主义者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支持，这是因为在1918年中期之后，随着工业的衰落和失业的上升，布尔什维克不断地丧失了工人的支持。不再执迷的工人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党。抓住1917年10月的关键时机是布尔什维克的能力，从此以后，如何利用它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前，一直有人提出农民对维持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困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论点。观察一场革命的性质的一种方法，就是看谁从中获得利益，最终谁的“权利”改变最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惊人地发现，农民

与工人的获利是如何的不平衡。农民立即获得了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数量减少了（原因之一是，布尔什维克组建的贫农委员会1918年在农村改善粮食流通时遭遇失败），小土地拥有者和中农的数量增加了。农民没有理由怀疑，白匪会掠走他们新得到的土地。既然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从根本上改进了农村的财富分配），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斗争就主要围绕着他们出售粮食的数量以及出售的价格来进行。在1918年到1920年期间，政府试图强迫他们向军队和城市输送粮食。军队的给养是可以提供的，至于城市，公共的分配系统就不能提供即使是减少了配额那个总量。城市居民的粮食靠城市的公开市场，以及工人私下在城市旁边的农村寻找粮食来解决。农民通过减少种植，贮存食物等取得了胜利，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内战结束，那时强制输送的政策被抛弃了。到1921年，农民成功地将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变成了真实的经济收益：大范围的土地私有制和粮食方面的自由市场。

工人的地位则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声称是工人的国家，但是工人既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实惠，也没有得到政治上的实惠。对工厂工人实行控制的法令在革命之后立即颁布出来。在1918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之后，工人开始失去他们特殊的地位。工人管理模式被应用于控制工人，工厂委员会于1918年底被解散。工人管理工业的权利——无论在工厂层次上，或者通过工会在集中的层次上——再也没有得到承认。最后一次代表工会的尝试于1921年3月由工人反对派所发起，但失败了。正像列宁所认为的：

这个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带领着非党的工人群众……使他们最终能够用他们的双手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如果工业管理被委派给……十分之九都是非党的工人所组成的工会，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政党呢？<sup>[14]</sup>

工人在工会中的种种特权也大大地削弱了。在1921年著名的关于工会的辩论中，列宁的折中方案战胜了工人反对派的工团主义观点和托洛茨基使工会军事化的提议。尽管早在1922年新年到来之前，工会已被国家化，正如托洛茨基所提议的。工人阶级被布尔什维克国有化了。

与此同时，在收入方面，工人也遭受了损失，他们在1922—1923年的

实际工资只有1913年50%的水平。在1918—1923年间，失业人数与工厂关闭的数量不断上升。当党员工人受到政府的特别认同，甚至可以配备一间二流的办公室时，布尔什维克中工人党员的数量仍是在减少。工人的许多怨恨在1921年初逐渐达到高潮，并在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中达到了顶点。但是，相对于农民的抵抗导致了对于他们的让步，工人的抵抗则导致了共产党对城市地区的进一步控制。经过1921年第十次苏共代表大会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之后，不同政见被宣布为非法，工人反对派被取缔。由于无产阶级规模很小，使布尔什维克很容易粉碎其任何抵抗。农民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为数众多。

这样，通过审查谁从革命中获得利益和谁在革命中失去利益，我们可以看出，农民明显地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随后他们又提高了他们的所获，到1921年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土地和自由的粮食市场。虽然他们仍然缺少自己可以用钱来购买的任何工业产品；不过，他们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政府和党的官僚制度的发展明显地有益于城市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支持布尔什维克，但是它们从一个长期的经验中明白，如何使时局变得符合自己的利益。当工人被告知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他们始终是损失巨大的群体。他们的损失并不仅仅是暂时的，也不仅仅局限于内战期间。在新经济政策下，他们还是无法弥补自己的损失。他们之所以不能获益，是因为他们没有数量上的优势。即使是集中在几个城市地区，也没有任何帮助——部分原因是1918年6月以后就业情况急剧恶化，部分原因是，正是这种集中，才使布尔什维克比较容易通过他们的苏维埃、工会和党支部对其实行控制。

没有任何理由说布尔什维克是玩世不恭的。他们深信，他们代表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是俄国革命的先锋。但是，它们几乎从来没有为了工人的利益而起用过不断协商的机制。在掌权之前，布尔什维克从工人的罢工和停工等提供的支持中懂得，工人的支持是多么强大。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的首要工作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得党的权力。他们在1917年10月26日的多数地位，使他们永远获得了授权。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代表工人，直到内战期间，工人阶级被战争和经济衰退所斃命。在1921年，布尔什维克发现，他们领导的是一个没有工人的工人运动，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工作，而不需要不断的反馈、选举和所有其他辅助做法。因此1921年之后，他们继续如此。这个党变成了一个由特工人员组成的政党，



这种特工人员占据了该党成员的大多数。后来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能改变这个基本的转变。

因此，可能有人会认为，二月革命是一场在农民、士兵和工人的压力下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拥有凝聚力和决断力去利用那一关键时刻，那时他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获得的多数，认为对他们是有利的。一旦掌握政权，他们真诚地认为（a）对他们来说，维持政权是生死攸关的事情；（b）他们的党代表着工人阶级。为了维持政权，他们不得不安抚农民——通过为他们提供切实的经济利益，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他们代表工人阶级的假定，甚至当他们分析到，这个党已经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时依然如此。他们认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惟一的）革命阶级，一定会发动革命，这充分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仰。因此，甚至当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眼前瓦解时，他们也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他们领导着一个工人的国家。

物质现实是另外一回事。农民——与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士兵一道——为十月革命和内战提供了主要的支持力量，尽管工人在首都的作用显得更重要和更突出。农民由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想巩固自己的所获，他们只是在1929年之后才受到挑战。在政治斗争中不断强化国家的强大的活跃因素，是由这个党提供的。甚至在1921年之前，该党就已经存在一种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追求名利的成员关系。

把十月革命描述为一场显然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其意义在于，人们可以不再为一个工人国家的堕落或者退化而苦恼。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无论从任何实际意义上看都是如此。除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任何东西使这个1917—1923年及其以后的政体成为一个工人国家。因而，也就没有什么背叛可言。人们只能思考，为什么认为它是一个工人国家的信念能够持续下来，尽管它与公认的事实相矛盾。但是这里确实存在着农民占优势的经济基础。内战使农民掌握了更多的权力，这是他们在通常的岁月所不具有的。当出现战争和饥荒（像时常的情况一样，这部分是由于战争造成的）时，粮食变得至关重要，而这时，粮食的生产者/销售者就有了更大的经济影响。当这些粮食的生产者形成了人口的多数，并为军队提供人力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权力就可能是令人敬畏的。作为一个国家，俄国

在内战中能够存活下来，所依靠的工业产量只有战前水平的1/6；它也不能拥有同样奢侈的食物。与农民相比，工业无产阶级在物质上是不重要的，在数量上也是弱小的。在1917年2月至10月，工人是在首都作为一个政治群体被动员的时候，才变得重要起来，但是在经济方面，俄国是在没有工人的经济援助的情况下打了一场内战——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事实确实如此。（这当然没有贬低工人作为应征入伍的战士所起的作用，也不否认一些群体——例如，铁路工人——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人阶级不断受到忽视。

俄国工业部门即使在达到完全生产水平的情况下（比如说，1914年），仍然是十分弱小的，这一事实不仅不可否认，而且还构成了列宁分析的重要部分，即在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到俄国时，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是一个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1890年与民粹派的辩论中，列宁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1917年之后，他又重新回到这种分析，因为需要加速俄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是靠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在这方面，列宁坚持了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模式的扩张是一个进步的现象。当然，他认为，在建立了工人的国家之后，不得不对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等级决策制（一人制管理）；经济（利润）核算的重要性；泰勒制和能够维持高剩余价值率其他技巧（如计件工资）；雇佣劳动——进行某种程度上完全不同的辩护。当政治背景发生转变时，这种对从经济上推进到资本主义前线的需求的满足，直到布里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签订之后才实现。在1917年10月革命之后的头6个月内，布尔什维克试图按巴黎公社的模式运作经济——在工厂委员会中实行分权制，工人控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创造性让群众参与，等等。但是从1918年5月开始，实际的经济出现混乱现象，列宁重新回到集中管理的模式。

列宁的选择不仅受制于小规模工业部门，而且受制于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工人的大批牺牲。事实上，不管有关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争论如何，工业生产只是到了内战之后才复苏。像后来所发生的，正是这一决定支持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工业化，这引起了俄国经济的第一次结构性变化。但是，在这一时期之前，也很清楚，只有农民才拥有剩余产品。如果产业工人阶级要扩大，人们不得不寻找一些方法，以从农民手中夺取剩余的物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的《新经济学》对此说得十分清楚。<sup>[15]</sup>但即使在那时，第一个五年计划不是靠从农民榨取剩余产品

而提供财政支持的，而是靠减少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

农民集体化是统治精英——党和它的官僚机构——借以摧毁农民政治力量的一个方式。但是，农民立刻以大量毁坏资本贮备（尤其是家畜）和持久保持低生产率来作为报复。因此，即使从农业的剩余产品中可以榨取更高的份额，其剩余产品的规模持久是低下的。这意味着，苏联工业化由于积累的问题而遭遇了持久的阻碍。这只能通过强迫产业工人阶级接受低水平的实际工资来维持。为了做到这点，在置换了农民所拥有的强有力的地位之后，根本的是使工人也没有获取政治权力的途径。

在新经济政策之下，布哈林主义者提出了一个使农民富裕和注重轻工业的发展的替代性方案。在经过 60 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之后，事情已经摆明，只有外国的贷款/援助才能保证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在 1978 年之后是转向了一条布哈林主义的道路，但是它有着公社所创造的良好农业绩效可以利用，但是正好在这时，似乎对俄国的封锁解除了，英国可能与俄国建立经济关系（1927 年通过 TUC 对俄国的访问），斯大林鼓励中国共产党尝试夺取政权。这一尝试失败了，把中国共产党送进荒野长达 20 多年。西方与俄国关系的解冻也停止了。因此外国投资也没有了。

因此，俄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模式取决于三个相关的因素：一个弱小的产业工人阶级，一个坚定而且能够夺取政权的小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及一个人数众多而有力的农民阶层。凭着农民的支持和工人的忍耐，这个政党击败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内战岁月里，它成功地征服了工人，因此，到 1922 年，它已经没有了政治对手。官僚政府然后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通过集体化征服了农民，但是不得不持续向它支付较低的实际工资。随着产业工人阶级数量的增长，必然增加压力，以否认它可以有任何获取政治权力的途径。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们怎样按照马克思主义来描述俄国的经济和国家呢？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序言视为一个概括一般普遍适用的历史图式，在解释俄国的发展方面就存在几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确定为一个简单的链条，问题就出现了：在 1917 年之后，在俄国是什么生产方式占据优势呢？在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统治政党把国家定性为工人的国家的前提下，它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只被给予很低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前提下，它也不可能是任何意

义上的社会主义。没有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个圈套。资本主义在俄国绝没有得到完全发展。实际上，它几乎刚刚开始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到1917年，工业资本主义大约有150年的历史，甚至在这样短暂的时期内，各式各样的国家行为与私人所有制结合的方式已经在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那维亚诸国、美国和俄国的经验中都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战争动员的经验，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模式给列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它为资本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的可以相互协调，提供了另一种证明——尽管它经历的时间很短，而且只是在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

但是，不仅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而且也没有必要假设，历史的运动总是向前的——向一个“更高”的生产方式前进。在历史进程中也可能存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退步。因此，如果资本主义被废止，随之而来的不一定必须是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不管这个国家是否退化。那些认定俄国在1917年后变成了工人的国家的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把非资本主义的俄国经济描述为某种后资本主义模式的方式。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是要区分列宁所界定和为之辩护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斯大林所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前者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妥协；后者是一种退化。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以至于很难区别它们。人们不得不宣称，国家当时改变了性质——在某种意义上退步了——但这只是回避了问题。实际上自从1918年5月起，俄国生产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改变。因为我们曾经认为，俄国的政治形态从一开始就不是工人的国家，因此，没有必要区别各种国家资本主义。

通过减少农业剩余产品而进行的集体化，需要工人阶级作出更大的牺牲，但是，甚至在整个内战期间，牺牲也主要是由这个阶级付出的。在新经济政策期间，都市工人的消费水平有了一点的改进，但是很快就丧失了。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官僚统治阶级反对农民的政治强制，以一种无效的和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俄国引入了一种困境，对工人的压迫和无限制的剥削超出了积累的需要。

对我们的讨论来说，这种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考，只有作为引出这些结果——即又不再把后革命的俄国看作工人的国家——的一种方式，才是合适的。一旦这种观点被放弃，关于背叛俄国革命、工人的国家退化为一种官僚制度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变化模式的争论，便消失了。但是，也许1917



年之后欧洲发展的国际背景也就变得易于理解。布尔什维克真诚地相信，他们的革命只是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众多工人革命的首例。

事实上，苏联的外交政策——以及1918—1923年第三国际的政策——都预言了这种事件。德国革命的失败应该归罪于——在其他因素中——第三国际的建议和德国共产党（Kommunist Partei der Deutschland）的领导。但是，既然俄国革命不是一场工人革命而是一场农民革命（也就是一场农民的支持占绝大多数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工人的先锋政党只是偶然冲在最前面，我们为什么还要期待在许多更成熟的资本家国家工人会孕育革命呢？欧洲工人阶级要发动起义，需要什么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条件呢？这些条件在1918年会出现吗？如果欧洲的工人阶级在1914年不是革命的，为什么在1918年就成为革命的了呢？这是我们下面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 欧洲无产阶级的失败

按照列宁的分析，欧洲的无产阶级失败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14年，他们受沙文主义的驱使，在战争中支持它的主人，工人阶级的领袖在各国议会中投票赞成战争贷款。第二次是在1918—1923年，他们没有利用旧的政权制度崩溃的机会，建立起工人的国家——也就是，没有仿照俄国革命的例子。让我们以恰当的方式来分析这两个时期。

如果我们阅读从拉萨尔派的起源经在哥达达成的统一以及随后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就会惊讶地感到，任何人，并不是所有那些像列宁一样机敏的政治家，都期望社会民主党反对德国的战争努力。

社会民主党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它的议会活动，可以被视为对在德国造成一种和平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德国在1914年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在这方面，它甚至远远地落后于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德国，贵族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是非常强大的，资本家—企业家仅仅被明确为次要的伙伴。马克思把法国资本主义革命的时间界定在1830年，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间界定为1832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序文，第二版）。但是，这在历史上是不准确的。从把贵族赶出政治舞台（而不是经济舞台）而言，法国可以说只是在1789年与





1871年之间经历四次革命之后才取得成功。只是第三共和国，才在法国形成市民政治统治，清除了贵族的影响。事实上，人们可以说，巴黎公社，甚至当它被击败时，也加强了资产阶级对贵族的控制。现在看来十分明显，在19世纪的任何时期内，这种情况在英国并没有发生。尽管选举权在1832年、1867年和1884年都得到了扩大，但只是在1911年英国上议院改革之后，人们才可以宣称遏制英国贵族的政治影响（虽然不是废除）。（美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是从一个土地的/贵族的共和国开始的，在19世纪20年代杰克逊任总统时采用了一种更民众化的形式。）

另一方面，在德国，1848年革命没能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产业工人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以至于拉萨尔甚至把普鲁士君主视为改善工人状况的最好的保证（在今天看来，这也许并算不上有多少幻想，如果考虑到俾斯麦不久后的举措，开创了一个家长制的福利国家，给工人提供社会保障，等等）。在各种分散的领主辖区内，投票权受到了限制。德意志帝国一旦被建立，就会比某些地区拥有更进步的选举权。社会民主党在促使德意志帝国民主化方面走在了最前列。

俾斯麦和统治政党中普遍存在的对于工人及其领袖的敌意，使社会民主党回撤到它自己的原初状态。现在很难想像，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工人阶级与社会的其余部分处于隔离状态。工人被禁止进入社会机构和运动场所，被禁止进入银行，等等。这并不是德国独有的现象，只是这里做得更极端。正是这种隔离政策，使社会民主党不仅仅是一个政党，更是一个运动。它组织了工人俱乐部，组织了他们的体育活动，组织了他们的假日，它还印刷他们的报纸。由于警察拒绝为他们的会议担当日常的保护，该党不得不组织了自己的志愿者守卫队。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进步在德意志帝国是如此壮丽，但它继续被德国的贵族垄断政权所贬低。社会民主党不断推动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认可各种权利保障。它尽可能地避开了排斥主义的政治。除了要获得它惟一坚持的工人阶级的选举权之外，它还试图暂时与自由主义者进行联合，这只遭遇到右翼实施的联合政治的阻挠。社会民主党——至少它的大多数——从来不是和平主义者或反军国主义者。事实上，它在国防预算上的政策不是减少军费开支，而是通过累进税筹集它所需要的资金。它希望军队招募新兵对所有人开放，包括对工人开放。它想使工人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

在俄国，情形有所不同。议会政治甚至更虚伪，而且它只是在1905年



才开始。布尔什维克从不指望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从民众支持来看，他们落后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他们可以站在失败主义的、反对军国主义的立场，因为它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在那时，列宁还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以传播他后来于1917年4月被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所接受的失败主义政策。德国的情形有根本的不同。如果我们按照俄国的情况去类比，社会民主党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副本，而是孟什维克加上布尔什维克，再加上各式各样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它一直比较强大，而且比俄国的所有派别加在一起，获得的民众支持还要大得多。

甚至在1916年在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持有不同政见者的会议上，列宁与极少数有类似观点的集团仍然属于少数派，即使在持不同政见者中，他们也是极端派。社会民主党中的分裂有着类似的结构。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成员都在坚持战争努力，正如其他交战国家中的工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所为。少数派在1917年发生分裂，并且形成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其中包括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中左集团，以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集团，后者构成了斯巴达克联盟。

战争改变了工党领袖的社团法人地位，因此，也改变了所有交战国的工人的地位。在英国，政府、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达成的三方调解开始制度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派别积极地在战争努力中参与合作，而且赢得了对社团法人地位的认可。战争，以及社会民主党在其中的行为，虽然被布尔什维克所诅咒，却改善了德国工人的社团地位。由于战败，一旦德国皇帝政权失去了它的可信性，德国在1918年11月就见证了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但是，这次具有资产阶级特征的革命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社会民主党是可以组建政府的惟一力量。这场德国革命与俄国二月革命具有同等的意义，但是不像在俄国，这里有一个拥有议会传统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在这个紧要关头，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压倒性的多数的支持，实现了它自1891年起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

德国的十一月革命被工人突然促成。许多工人和士兵的委员会在大城市成立了。甚至与俄国情形更为类似的是柏林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联盟赞同这一制度安排（以及内阁成员的名单），在这一制度安排下，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将联合执政。在这个紧要关头以及后来，流行的口号是“团结”，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由于长期坚持社会民主党的教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刻并没有到达。这只有在资本主义进一步

成熟之后才会到来，只有当社会主义政党能让绝大多数人口自愿赞同它时才会到来。对罗莎·卢森堡和斯巴达克联盟来说，与对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一样，多数人的民主要求都是强烈的。所不同的意见是，这是否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在卢森堡看来，资本主义已经毁灭了它本身，它自身已经没有更进一步的创造性活力。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取代它，那么野蛮将会取代它。但是，即使是社会主义，也必须得到工人和委员会的多数支持。

但是，在俄国，面包、土地与和平纲领导致了工人和农民/士兵之间的联合，而德国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给农民以土地——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项政策，从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从来没有出现在社会民主党的议程上。他们把它视为反革命复辟的捍卫者，像法国革命之后发生的情形一样，并不是一个前进的步骤。卢森堡之所以批评布尔什维克突如其来的运动朝该方向发展了，恰恰是因为她看到了独立的小私有的农民对于社会主义政府所具有的危险。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派别都同意这一点。

然而，甚至在工人委员会中，社会民主党也拥有多数。独立社会民主党拥有少数，斯巴达克联盟所能控制的仅仅是极少的支持者。斯巴达克联盟从来没有像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会议上一样，加速成为多数派的步伐。第一次全德工人委员会大会至迟在1918年12月以绝对多数支持了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政府。因此，在12月下旬，当政府动员军队与斯巴达克联盟对抗时，斯巴达克联盟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斯巴达克联盟成员被视为一个反叛集团。在1919年1月9日之后暴风骤雨般的日子里，李卜克内西甚至简单地认为，他们有可能夺取政权。这与斯巴达克联盟的政策是相反的，使得诸如卢森堡和利奥·乔吉切斯(Leo Jogiches)等人感到震惊。但是，即使在斯巴达克联盟可以夺取政权的柏林，根本不存在机会。那里甚至没有一座冬宫可以接受暴风雨的洗礼。工人惟一能够长期占领的建筑物，是社会民主党的新闻大楼。

斯巴达克联盟起义的失败，是充满血腥的，也是极其迅速的。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残忍地杀害了。许多保护社会民主党新闻大楼的人也被杀害了。在这些日子里，国民大会的选举照常进行，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多数。尽管起义受到群众支持的程度后来被第三国际夸大了，但是在起义的时候，卡尔·雷德克清醒地认为，斯巴达克联盟应该使自己限于暂时夺取政权的要求。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牺牲，对第三国际来说是有用的，因为第三国际可以宣称，是他们没有遵循列宁主义者的策略，甚至也没



有遵循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即只有俄国式的起义才有可能成功。的确，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曾向斯巴达克联盟指出，他们应该如何劝阻急躁的工人不要起义。接着列宁不得不隐藏起来。他的德国同伴几乎没有有什么运气。

尽管1919年1月是一个不合适的起义时刻，第三国际仍然期待德国革命可能成功。新生生的共产党在其后的四年中进行过两次尝试，一次是在1921年3月，接着是在1923年9月——两次都失败了。原因是同样的，当卡普（Kapp）暴动——很像科尔尼洛夫事件——受到威胁时，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能够动员工人进行总罢工反对政变。卡普暴动失败了。

布尔什维克真诚地——而且几乎是明显地——期待德国的工人阶级能够发动一场革命。从战争爆发的那天起，列宁对第二国际行动的分析就要求这样的一场起义。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辩论中，一些人，例如布哈林和雷德克还坚持不应该投降的政策，理由是，除此之外的别的做法都会伤害德国的革命。列宁不得不提醒他们，对于一个几乎可以确定的革命的预期，与它已经发生时的所作所为，这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在德国革命的第一次决定性的测试中，列宁主义的这个预言失败了。从1918年11月到1923年9月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德国的工人阶级非常愿意以举行压倒一切的罢工来保护国家的合法性，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政变。同样清楚的是，不像在俄国，工人和军人不能被认为达成了同盟；他们的利益是有分歧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像俄国那样通过一次左派政变尝试推翻国家的做法，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从这样一个分析中可能会引出一个人们要询问的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甚至在战败以后的环境下还要捍卫国家的合法性？是否可以认为，它担心卡普政变会带来某种更糟糕的东西，正如俄国农民担心白军会给他们带来某种更糟糕的东西一样？是否这种对合法性的赌注的意识是一种虚假意识，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中央集权的领袖所实施的一种操纵，或是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成熟岁月才需要的某种东西？

列宁主义对欧洲革命的潜在性质的分析，以及它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的分析，都是极其狭隘的。用四个词来说是：走俄国的道路。尽管有许多有关灵活性的告诫可以引证，但是，追随第三国际的23项条件却规定，只有以列宁主义路线为模式的政党才能够取得成功：一个高度集权的、精英主义的政党，避免同议会社会主义妥协。实际上，俄国的道路被想像得是如此

普遍地适用，甚至在细节上都有规定，以至于列宁甚至预期，匈牙利革命已经为工人与农民的苏维埃诞生做好了准备——在匈牙利就像在俄国一样，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好了准备。德国也被预期到处都成立苏维埃，沿着俄国的路线召开苏维埃大会。其他国家不同的阶级结构和联盟，——或者毋宁说农民、士兵和工人的偶然结合——完全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因此，第三国际从一开始就对工人革命的紧迫性、对认为俄国党是唯一正确的模式这种僵死的必然性缺乏耐心。人们很容易责备第三国际的官僚主义错误（像克利夫在《列宁传》第4卷中所说明的），但是，所制定的革命理论——列宁主义的理论——本身就有问题。它没有正确评价，列宁主义政党自我确立的国家，只有少量的工人阶级、未经民主和公开的工会实践的训练、集中在几个都市的中心。而在那些工人阶级强大、并且在工会和合法政治参与中经历过拉锯式斗争和妥协的地方，工人的政党就只能通过开放、通过让人看到提供局部利益、通过玩弄政治游戏来维持优势，如果不想垄断工人的忠诚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这样的政党。在德国工人阶级政治的历史前提下，列宁主义的政党不可能突然像变戏法似的夺取政权。像上面已经讨论的，甚至在俄国的背景中，列宁主义的政党赢得政权，并不是由于它的组织特性。它取得政权完全是偶然的，但却是凭着谋划而获得的。对于德国共产党来说，问题不是夺不夺取政权，而是在一个视政府为合法化的国家，举行少数人的起义是否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 [注释]

[1] 萧伯纳的传记作者斯坦雷·温特罗伯 (Stanley Weintraub) 在研究萧伯纳的《伤心之所》(Heartbreak House) 时提出了这一看法。Stanley Weintraub (1973), *Bernard Shaw 1914—1918: Journey to Heartbreak*, Routledge, London.

[2] 这一决议引自 Schorske, p. 83.

[3] 马西莫·萨尔瓦多里 (Massimo Salvadori) 在他的一本书中对茨基作了这样的评价：

是什么把社会民主党整合到德国社会……不是错误的意识形态；它是现实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在19世纪末和1914年之间，社会民主党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无法预料的形势，尽管这种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把它整合到德意



志第二帝国 (Second Reich), 基本上是由客观进程决定的, 这种客观进程与社会民主党以及另外一些反对派的某些部门积极达成的协议是相符合的: 首先是在贵族军国主义和精英官僚制度的同盟的基础上, 实现一种强大国家机器和保守国家机器的奇特组合, 并实现由疯狂的金融资本所支配的空前的工业发展。在这些情况下, 整合的真正“动力”实际上是工会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被迫要公平和坦率地应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大工人政党, 它的理论曾经让它期望资本主义体制尽快终结, 不料这种体制却以帝国主义形态成爆炸式地发展起来, 并重新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Salvadori [1979] p. 19)

[4] Schorske, p. 106.

[5] Ibid., pp. 290-291.

[6] 有关德国战时社会主义的讨论, 见 Paul Auerbach, Meghnad Desai and Ali Shamsavari (1988), “The Dialectic of Plan and the Market: On the Transition from Actually Existing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70, September-October. 有关经济学家对于计划编制的争论, 在本书第 12 章中有讨论。

[7] 对于德国左翼起义历史事件的富有同情心的叙述, 见 Chris Harman (1982), *The Lost Revolution: Germany 1918-1923*, Bookmarks, London.

[8] 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献非常丰富, 难以引证所有的相关材料。当然, 这里包括以下著作, E. H. Carr (1950),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3 vols, Macmillan, London. 这至今仍是一流的著作。也可参考 Alexander Rabinowitch (1968), *Prelude to Revolution: The Petrograd Bolsheviks and the July 1917 Upris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最近的著作包括: Orlando Figes (1996),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Jonathan Cape, London.

有关背叛俄国革命的论点是由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提出的, 但也包括孟什维克。见 Tony Cliff, *Lenin* 4 vols (1975-1979) [vol. 1, *Building the Party*, vol. 2, *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vol. 3, *Revolution Besieged*; vol. 4, *The Bolsheviks and World Communism*], Pluto Press, London; Tony Cliff (1989), *Trotsky: Towards October, 1879-1917*, Bookmarks, London.

[9] Cliff, *Lenin*, vol. 2, p. 156.

[10] 有关喀琅施塔得叛乱, 见 Paul Avrich (1970), *Kronstadt 192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这是 1921 年 3 月在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发生的水兵叛乱。喀琅施塔得是 1917 年俄国革命的“光荣与骄傲”, 它在“自由苏维埃”的口号下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16 天后, 它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列宁随后很快宣布了他的新经济政策。

[11] Raphael Samuel (1994), *Theatres of Memory*, vol. 1,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vol. 2, *Island Stories: Unravelling Britain*,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2] Issac Deutscher (1954—1963),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1929*;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托尼·克里夫 (Tony Cliff) 的讨论与多伊彻采取了相似的路线, 见 Tony Cliff in *Lenin*, vol. 4, chs 8—9.

[13] Karl Kautsky (1919),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rans. H. J. Stenn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1964年再版时加上了一个新序言。

Karl Kautsky (1946), *Social Democracy versus Communism*, ed. and trans. D. Shub and J. Shaplen, Rand School Press, New York.

Rosa Luxemburg (1935), *Leninism or Marxism*, Anti-Parliamentary Communist Federation, Glasgow; also (1961),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14] Cliff, *Lenin*, vol. 4, p. 127.

[15] E. Preobrazhensky (1966), *The New Economic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Michael Ellman (1975), "Did the Agricultural Surplus Provide Resources for the Increase in Investment in the USSR during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Economic Journal*, December.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8 章 战争与帝国主义 (理论与实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受到影响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所有的人。自由主义者对此深感震惊，他们把自由贸易视为阻止战争爆发的灵丹妙药的信念动摇了。正如我上面已经提到的，对于伯特兰·罗素和萧伯纳这类的知识分子来说，非理性的狂热令他们感到震惊。中产阶级维多利亚式的举止行为，仅仅是一种优雅的表面现象，所存在的只是对理性和渐进式发展之必然性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只是启蒙运动所开创的这一传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独创性和科学知识的结合促进了技术创新，而且这种技术创新却导致了工业革命。创新不断出现，科学不断前进，工业不断增长——尽管中间也有过中断——这种状态持续了很



长的时间。大约从1780年至1914年，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和传播。为什么理性不能欢庆胜利，进步怎么能逆转呢？

如果19世纪信仰理性，那么20世纪则打开了发现非理性的闸门。问题的根源在于过去——事实上，在于19世纪本身。尼采对于那些关注问题的人，一直在提供例证。在维也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正在探究潜意识。在德国，国家主义的根源已经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古老神话。由于欧洲资本主义扩张时期人口增长二倍，“暴民”作为一个新的现实出现了。这存在着一种追求东方和古代事物的时尚。通神论者（theosophists）流行一时，瓦格纳用音乐唤醒了古老的神话。

强大的力量已经被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所释放。法国大革命导致了市民国家主义的诞生，并很快表现为帝国主义的形式。但是，法国大革命同样忠于理性，社会主义总自认为是理性和进步的一部分——也诞生于此。从那时起，理性与非理性变成了一种辩证的二部曲。与较早历史时期不同的是，技术方面的革命——运输、工业和战争的革命——以合理的技术武装了非理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发生在先进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一场全球化的战争。它在影响范围上是全球性的，因而是一场世界战争而不是欧洲战争。为了整场战争，大量动员民众和利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也是非同寻常的。许多城市被毁灭了，许多青年——包括欧洲、亚洲和美洲的青年——被屠杀了。

这是帝国之间的战争，殖民地卷入宗主国的争斗之中。但是，帝国主义是战争形成的原因吗？在所列举的导致战争的多种原因中，左翼把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视为主要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第二国际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作了准备。在这一事件中，民族的国家主义——甚至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义（其中许多希望遭到替换）——被证明是压倒一切的。欧洲人以国家和帝国的名义，准备而且愿意向对方实施难以置信的暴力。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还是带有返祖现象色彩的贵族的封建主义，导致了这种故意伤害？为什么欧洲这个理性的王座，在自由进步的辉煌世纪之末，如此沉溺于这种放荡不羁的残酷行为呢？为什么欧洲人之间竟如此凶残相待？

当然，对待人类同胞采取残酷和不公平的行为，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只是在19世纪的短暂时光中，在欧洲西北部的这个小角落，似乎——至少对于那些曾经有过这种行为的国家——这种兽行应该早就不存在了。在国外的欧洲人，在肩负传播文明的使命时除了慈善、人道和文明之外

无所不做，从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向外扩张开始，欧洲人与世界的其余居民之间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变得很平静过。亚洲，由于在印度和中国都有着古老的定居的都市文明，相对于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上著人，相对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定居王国，相对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及非洲的土著人，算是轻易地逃脱了。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后，随着基督徒之间的分裂，欧洲人的态度变化，引起了对前途的疑问和怀疑。到18世纪，启蒙运动激发了人们对于其他文化的极大好奇心，而且欧洲人开始学习和整理世界各地的语言，记录其他民族的习惯和组织机构。伏尔泰把中国视为值得法国效仿的有着良好治理的典范，卢梭赞美了高贵的野蛮人。欧洲的确在不断地变得文明起来。<sup>[1]</sup>

工业化的到来，改变了欧洲海外扩张的背景。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一轮在亚洲和非洲建立帝国的新浪潮已经粗具雏形。海外寻找的已经不再是黄金、香料或优质纺织品，而是市场和原料。领土的占有仍然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控制贸易。这样，印度实质上是处于英国统治之下，而中国承受的只是失去对于几个重要港口之控制的痛苦。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自由之后虽然仍保持着独立，但如今却变成了从伦敦和巴黎延伸出来的商业网络的组成部分。

帝国主义，在领土占有和经济渗透的两种意义上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奇怪组合。对于英国激进的自由主义者J. A. 霍布森 (J. A. Hobson) 来说，当土地不再是财富的来源时，帝国主义的卷入是前资本家贵族渴望土地的一个征兆。他希望英国不要在世纪之交卷入南非的一场毫无结果的战争，在丛林中作战，那里并没有很多可以得到的东西。英国工业的潜在市场是在欧洲西北部不是在亚洲和非洲，因为那里是有购买力的地方。霍布森因此把帝国主义视为一种返祖现象，认为随着理性和经济核算占据优势，它很快就会消失。<sup>[2]</sup>

约瑟夫·熊彼特，一位在哈佛大学执教多年的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在1919写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sup>[3]</sup>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马克思有很深的研究，而且非常仰慕他的工作。事实上，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相当自觉地提出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利润理论。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将要讨论。但是对他来说，资本主义是有效利用资源和追求利润的理性王国。仅仅拥有领土不一定代表着财富，除非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偏爱多愁善感的地主追求土地；

因此，帝国主义有着返祖性的特征。它变成了以求生为特征的大型

集团，从很早的年代开始，这种集团曾在每个具体的社会环境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源于过去的而不是现在的生存环境的因素——或者用对历史的经济解释来说，是源于过去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源于现在的生产关系。〔4〕

这样，熊彼特将帝国主义归为古老的生产方式。他的理论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尤其在1919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是这样。但是，他还大胆预测：“如果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各种帝国主义在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历史上出现得越晚，它的衰落就越剧烈。”〔5〕

在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帝国主义时代过去了。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欧洲帝国主义君主政体之间进行的最后一场战争。然而，这种对非理性作为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解释原因的依赖，与时代的理性精神是不相符的。当激进的英国自由党中存在着一些反帝国主义者时，帝国一般被认为是好的和能够带来利润的。考茨基与霍布森有着相似的看法。他同样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意识到，共谋而不是斗争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德国和英国共谋邀请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加入超级资本主义俱乐部，以便共同剥削世界的其他地区。当这件事情最后发生的时候，法国和德国于1960年以《罗马条约》为基础，开办了一家超级资本主义俱乐部。

马克思——虽然他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和理性的坚定信仰者——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资本家理性地追求利润和积累资本的生产方式，可能导致诸如危机之类的非理性的结果。因此，当亚当·斯密认为个体行为的合理性会导致一种仁慈的集体结果的时候，对马克思来说，情况则恰恰相反。在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原因时，列宁拾起了这种观点。对他来说，战争虽然是非理性的，但却是资本家竞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1916年，他在瑞士流亡的时候，写了一部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该书直到1919年才被出版。在某种意义上，这本小册子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在战争期间的争论，也没有在第二国际的分裂中起任何作用。但是，在其后的70年中，它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看法的形成，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许多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是如此。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综合了希法亭关于卡特尔和银行（金融资本）的观点和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的理解。但是，列宁的看



法与霍布森完全相反。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是非理性的和无利润的，但是他也用“帝国主义”来指称领土占有——在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垂直关系。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不同国家的相互竞争的卡特尔——它是被银行信用和军备制造者的贪婪所喂养的——不顾死活竞争的结果。它粉碎了边缘地区的经济。尽管如此，列宁还认为，这个扩张过程是自我毁灭性的：一方面因为世界见证了残暴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还因为边缘地区将变得无产阶级化，并最终会起来反对资本主义。

尽管它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列宁的最有说服力的著作。在这里，他开始对那些认为“大就是坏”的左派有了一些糊涂想法。因此，大的公司和托拉斯，以及高度集中的资本，都变成了邪恶的。技术方面的迫切需要使建立小规模的钢厂变得不经济（正如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所发现的），这实际上暗示着钢厂应该大而少，就是说，不能像棉花纺织厂那样。但是无论如何我看不出，为什么会改变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逻辑。当卢莎·卢森堡已经试着把帝国主义包含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中时，列宁——像他之前的希法亭一样——让经验的描述数据遮蔽了他的判断。虽然它写得很有气势，但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活力。的确，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相比，列宁与民粹派的论战表现了更高的活力水平。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还存在着具有讽刺意义的另一面。列宁在反驳民粹派时强调，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俄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不发达，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度了。（这很类似于马克思对普鲁士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政策方面的批评：德国人寻求保护，而英国和法国已经超越了这种保护）在俄国革命之后，像我在上面所说的，一旦最初的欢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之后逐渐消逝，列宁就开始赞美国资本主义的优点——这个体制他曾经作为德国的战时社会主义来加以解读。这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它比私人资本主义好。目的是要在俄国加速积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是通过良好的会计、等级制管理和工人守纪律。工会必须服从于积累的需要。因此，列宁又回到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在社会主义能够实现之前，必须发展资本主义。这在 1919 年之后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对德国革命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列宁执政之后，在许多小册子中都使他的这一观点更明确。主要的一个小册子是在 1918 年 12 月发表的《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左派”幼稚病和小

资产阶级的幻想》<sup>①</sup>。3年之后的1921年，这种观点在《论粮食税》中又重新得到详细论述，后者还开创了新经济政策。这是这一时期内列宁的典型劝告：

合格与诚实地保持资金账户，讲究成本地进行管理，不要懒惰，不要封闭，严格劳动纪律——这些资产阶级作为隐秘的剥削阶级时使用的监督工人的口号，随着资产阶级的被推翻而恰好演变成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即和主要的口号。<sup>[6]</sup>

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描述为从私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对他来说，俄国是处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在1918年12月，他把德国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缩影：

这里我们拥有“最好的”现代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程学和计划组织机构，仅次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Junker-bourgeois Imperialism）的。国家仍然是国家，但这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你们将拥有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

社会主义没有以现代科学最新发现为基础的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程，是不能想像的。没有在生产 and 分配中按统一的最严格的标准对数千万工厂进行全国范围的规划，也是难以想像的。<sup>[7]</sup>

国家资本主义后来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用来描述苏联斯大林主义社会形态的带有贬义的标签（见本书第7章）。我想强调的是，列宁发现工人控制国家可以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组织及计划结合起来。这里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并不是否定的，而且在1921年，列宁仍然很赞同地重复他1918年的小册子中的这段话。在这一武装干预时期，俄国参与了战争而且赢得了内战，但是代价沉重。在1921年5月之前，俄国需要从新受到鼓励的农民手中哄出粮食。列宁赞扬自由贸易——也即城镇与乡村之间进行交换，而不是强制征收——的益处，认为可以作为获得剩余粮食的一种方式。他想要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撤退，这是一次短暂的在没有货币或贸易的条件下创造一种经济的乌托邦实验。这只能是内战期间所采取的一项紧急措施，可怕的饥荒却伴随它降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5卷收入的列宁1918年12月的著作中没有此篇，但第34卷收入了1918年5月5日所作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临。现在，在1921年5月，他带着自己挑选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回来了：“所有的问题——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是要寻找直接发展资本主义的正确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和在一段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以保证在最近的将来进入通往社会主义的轨道。”<sup>[8]</sup>

这证明，给外国专家支付额外的高工资是正确的——要作出“让步”（就是说，允许外国或者国内的私人资本进入，以扩大企业规模）。关键是要摆脱“小经营者”（包括小家族式经营和小资产阶级经营）的经济状况，推进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这一论点完全体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好；大规模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比小商品生产好；因而，很自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鉴于德国没有出现革命，列宁强化了国家资本主义对俄国的必要性。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因为德国战时经济曾经是一种创新——一种服从于战时计划的大规模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经济发展还没有成熟到资本主义之前，俄国已经通过农民和工人获取了大量权力进行了创新。所以，列宁把德国资本主义的中央经济集权论的观点同俄国情形实行了嫁接，并且赞扬国家资本主义的优点。

稍后我将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如果没有资本家，我们是否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甚至国家资本主义。现在，我想将列宁对待资本主义的积极方面——包括战前他在与民粹派的辩论中所持的观点，以及他在革命后作为实际决策者的日子里所持的观点——同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消极的和黑暗的观点作一比较。

这种黑暗的和消极的观点，被看成是列宁的遗产。的确，它被看成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正统，提出了一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同观点，这种观点与1883年至1913年间广泛流行的观点是有区别的。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处于最终的危机之中。它没有未来，尽管工人阶级中各式各样的叛徒——主要存在于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当中——可能会试图否认这一点。在它面临死亡的阵痛中，资本主义将会摘掉自由主义的面纱，露出它的掠夺本性，然后诉诸武力。但是，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将赋予工人阶级以革命的领导权，击退社会民主党的联盟。社会主义即将来临，这正如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成功所表明的。一场世界革命迫在眉睫。

在这种观点看来，资本主义既不存在进步的特征，也没有什么未来。关于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时间表——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辩论中已经被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缩短——现在已被抛弃，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短时期

内能解决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即将衰落的看法，影响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熊彼特就是其中的一位。甚至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他的《非共产党宣言》（1960年）中，也只能设想未来会出现苏联和美国两种模式的趋同。<sup>[9]</sup>美国激进的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收集了大量的感性素材，并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从苏联回国时说：“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它是如何运行的。”

未来属于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观点曾经流行一时。当最大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生分裂以及德国革命这一世界革命的前卫走向失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仍然自我确信——而且许多其他人也确信，就像其后几十年显示的那样——未来属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即完结。历史的判决又将如何呢？

撇开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不说，现实的帝国也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在战争结束时，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保留了他们的帝国，但是战争也唤醒了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反应形成了有意思的对比。海上的、受商业驱使的帝国，与基于陆地的、与土地/封建制度有关的帝国，有了不同的结果，这证明了——至少部分地证明了——霍布森/熊彼特关于财富的旧来源已经过时的洞识。那些幸存下来的帝国都是远距离投放了占有权的海上帝国。然而，在欧洲大陆和西亚，两个大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了。他们在欧洲东南部和中东的殖民地，成了冲突的剧场（不妨想一下科索沃或巴勒斯坦）。再一次，西北欧战胜了中欧和东欧的竞争者。沙皇也被摧毁了，尽管俄罗斯帝国被重新组成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但是，在这些幸存下来的帝国本身，一股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不断高涨。大多数殖民地人民起来反对自己的宗主国，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意识也在发生着转变。他们的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不可战胜的主人，并不是真正如此强大。他们的经济是如此受制于工业生产，以至于它们并不能提供支持。那时，英国开始考虑印度的工业化，并承诺实行宪政改革，以便逐步过渡到自治。澳洲的军人在加里波利（Gallipoli）的牺牲仍然激怒着这个国家，认为自己受到的宗主国的不公正对待。

在欧洲各地，战争加速了民主化进程。成年人的选举权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都迅速扩大了——特别是妇女在整个西欧赢得了选举权（英国是在发生了一次武装投票运动之后）。自由主义已经受到了战争的检验，但



是它在老牌的工业化国家都幸存下来。不过，在从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走向普遍的选举权时，它的矛盾便显示出来了。在黑格尔的模型中，无财产者没有代表资格。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中，他借用了这一事实，即无产阶级——那些无财产者——被排除在黑格尔的国家的代议制机构之外。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被颠倒过来。不管男人还是妇女，不管有没有财产，都被赋予选举权。（妇女获得与男人同等的选举权，花了大约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起点却始于1914—1920年这一时期。）

自相矛盾的是，西北欧国家对中欧国家的胜利，得到了前殖民地的援助。正是美国1916年介入战争，才倾覆了有利于同盟国的平衡。美国曾经为从宗主国获得独立而战斗。1776年的美国革命是约翰·洛克和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产儿。它把自由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自由是在一场反对强大军队国家的战争之后赢得的。英国错误地判断了美国人对其违法征税的怨恨。他们也错误估计了——不是最后一次——这种反叛的性质。例如，厄尔·高尔（Earl Gower）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向上议院说明，这场叛乱中，忠于英国的人比主张独立的人要多得多，他们“通过体验英国自由和美国暴政之间的不同，将会高兴地回到效忠英国的轨道上来”<sup>[10]</sup>。

但是，不言而喻，美国独立不过是英国自由的另一个翻版，只是不存在封建贵族统治。关于黑人奴隶，却存在着盲点，但是在1776年后，甚至基督教教堂还把奴隶视为合法的私有财产加以保护。处理奴隶制度的失败，使美国付出了内战的代价，即使如此，美国花费了另一个世纪，才使美国黑人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个完整部分。不过，除了这一毫无疑问的重大缺点之外，美国是一个在社会方面均等的社会。它在经济方面存在差别，但在身份方面是平等的；没有领主、公爵或国王。当欧洲的穷人涌进美国时，他们被整合在一起了；如果不是立刻整合的话，至迟也会在第二代完成。当他们到达美国的时候，这些移民便生活在贫穷的都市环境中，正如恩格斯所看到的曼彻斯特的工人所生活的那样。但是，他们的孩子并没有在相同的地方或相同的工作中逗留。还有土地可以移居，还有繁荣的经济。一旦北方赢得内战，美国便作为一个工业国起飞了。大批杀害美洲本土印第安人的时代，在19世纪晚期才到来。

美国内战与俄国废除农奴制始于同一年：1861年。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广袤的大陆、相对稀疏的人口和巨大的潜力。但是在其后的50年中，这两个国家走过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美国在19世纪末期成为工业国，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证明了它的实力。正如事实所证明的，它可谓挽救了



1688年革命和1766革命——约翰·洛克革命。它后来提出了——在伍德罗·威尔逊个人方面也许多少有些天真——解决战后问题的自由的一民主的方案。因为在此之前，愤世嫉俗的欧洲外交官已经在维也纳会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争夺势力的解决方案和各种其他战后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威尔逊的方案是一个激进的起点。那时，美国佬还是一支不为人知的力量，但是在战后，他们还有剩余的资源。美国对欧洲内战的干涉，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治的前景。

首先，虽然战争意味着经济领域内全球化的结束——从1870年至1913年间普遍盛行的劳工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开始向后倒退——但是，它开创了政治的全球化。从那时起，战争被看成是世界（不仅仅是欧洲）大国的关注重心。但是，美国人过于天真地在国际事务中服从于民主原则——这样，要求不仅把大国而且把每个国家引向全球治理之任务的，就是国际联盟，而不是欧洲剧场。这是早熟的观点，而且流产了。

第二，美国在欧洲内部事务中，对于自由秩序给予了支持。它对民主政治的忠诚是绝对的。在其后的25年中，当欧洲实验各种非民主政治的形式而自由主义在那里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时，是美国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执著坚持——与宗主国英国一道——才使它的传统保存到今天。尽管有些欧洲知识分子本能地具有反美精神，这一点并不是一个能够事后否认的真理。

第三，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地道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革命和它的平等主义的经济要求，从来没有渗透到遥远的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30年，也许是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的时期。马克思的去世为在纽约库珀联合广场（Cooper Union Square）举行的大型聚会提供了一次契机，在那里，对于马克思丰功伟绩的颂词被多种语言所表达。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是一个带有欧洲风格的革命工人联盟。欧洲移民为他们带来了许多意识形态的过时货，在东海岸和芝加哥的市中心，他们大量地聚集在一起。但是最后，美国坚持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它的政治领域仍是一个意识形态中立的领域，如同他们今天所做的一样。这不是说，不存在政党之间的差别，但是，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没有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它的市民（除了南方的黑人市民）不需要像欧洲人那样，必须为投票而斗争。他们相信，他们拥有公民地位所固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需要得到政府的同意并且是为了对抗政府而设定的。与同一时期的欧洲相比，美国在1916年是一个

自由的一民主的乌托邦。而且它是富足的。

美国例外论是否有理由呢？马克思那里有一个。在他的一生中，马克思对美国的发展非常熟悉，尽管那时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美国还没有呈现很大的繁荣。他偶尔为《纽约论坛》（*The New York Tribune*）写一些文章，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还想移居美国。但是，这里谈谈他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系统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章——紧接着启示录式的第32章之后——马克思勾勒了“现代殖民理论”。为什么这一章要放在最后，是我稍后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在他描述殖民地及其特征时，马克思在下面这段话中，把旧世界的资本主义与新世界的资本主义进行了对比：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

因而，这是宗主国中旧世界的资本主义。马克思继续写道：

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像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

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sup>[11]</sup>

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句话，在那里马克思把美国的剥削程度说成是“低得不像样子”。当然，需要问的问题是：如果剥削程度（剥削率）是低的，那么，美国企业是如何获得利润，而这些利润又是如何转而吸引外国资本到它的口岸的？当然，问题的答案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3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第4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绝对剥削和相对剥削的论述，形成了对比。在第一种情况（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下，工人的生产力较低，资本家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在后一种情况（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下，资本家能够把高工资与甚至更高的生产力结合起来。高工资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但是，就劳动价值而言，新世界的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率，要高于旧世界，尽管美国工业比欧洲工业投入了更多的资本，但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

用更现代的说法，高工资而且是更高的生产力，意味着在工资占总产出的份额方面，美国要比欧洲低。如果剥削率是低的，那么1加剥削率的反比就是高的。读者可以回忆一下，这与工资所占总收入的份额是相同的。美国工业的资本密集度是很高的，但因为美国人的独创性，它的生产力则更高——1851年在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美国的创新产品给英国的参观者留下的印象是如此之深。

下面的有用数据可以揭示这一点。当然，马克思的手头没有这些数据，但是仍然有必要检验一下他的直觉是多么准确。假设在1870年，美国的生产力——人均每小时GDP——是100，而其他1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值是62（德国为50，法国为56，英国为104）。在1913年，它甚至更加遥遥领先。如果再假设美国的水平为100，15个国家的平均值为54（德国为50，法国为48，英国为78）。（确实，迄至1973年，这项平均值再没有高于过1870年的平均值。）

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1820—1870年间为4.5%，在1870—1913年间为3.9%，而同一时期所有15个国家（也就是说，包括美国）的平均值分别为2.4%和2.5%。这样，在第一个50年中，美国的GDP增长了8倍（每16年翻一番）。而在其后的43年中增长了4倍多（每18年翻一番），而且，美国一开始就具有有利于自然资源/人口的平衡的优势。这样，在1820年美国人均收入为1048美元（1985年的美元价），而当时的英国为1405美



元，德国的为 937 美元，法国的为 1 052 美元。到 1913 年，尽管美国人口有了巨大的增长，相关数字变为美国 4 854 美元，英国 4 024 美元，德国 2 606 美元，法国 2 734 美元。这样，美国——一个相当高收入的国家，尽管在 1820 年它还不是最富有的国家——在 1913 年超过了最富有的工业国，即英国，而且把德国和法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到 1913 年，美国不仅是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 9 700 万人口，与英国的 4 560 万、德国的 6 700 万和法国的 4 000 万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就 GDP 总量而言，美国的是 4 600 亿美元，而德国的是 1 750 亿美元，法国的是 1 080 亿美元，英国的是 1 800 亿美元（所有数据都是粗略的加总）。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当于三个最发达的欧洲国家经济实力的总和。当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与欧洲在国际关系方面至少是旗鼓相当的。

马克思并没有深入到所有的这一切。也许他应该这样做，因为美国的盈利能力预示着一个新型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高工资/高盈利能力成为一种现实。高工资/高生产力→低工资份额与高资本生产力并存，不是一种偶然现象。缺乏封建贵族统治意味着，在向西部扩张的过程中，美国的土地不是被垄断而是被打包发给各个大农场主，就像南美洲那样。这使劳工市场比较吃紧。但是，与欧洲相比，美国还拥有高水平的文化普及。要成为一个公民，一个移民必须证明自己有阅读能力，并拥有一些关于美国宪法方面的知识。因此，美国的高水平的文化普及，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件礼物。

其后的 20 年是自由政体与威权主义政体相互竞争的时代。但是，资本主义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国内，面临着来自竞争的经济组织模式的挑战。这样，当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对民主政治的控制时，它开始以自己的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面貌出现，并向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提出挑战。但是，也存在着来自右翼威权主义政体的挑战——特别是来自法西斯的挑战。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事情。

#### [注释]

[1] 欧洲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遭遇战，是长期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但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可以满足许多读者：Mark Cocker (1998), *Rivers of Blood, Rivers of*

*Gold: Europe's Conflict with Tribal Peoples*, Jonathan Cape, London.

[2]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1st edition 1905, Archibald Constable, London; 3rd edition 1988, Unwin Hyman, London.

[3] J. A. Schumpeter (1919/1951),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 trans. Heinz Norden, Augustus Kelley, New York.

[4] 这篇文章，我是引自 Kenneth E. Boulding and Tapan Mukerjee (eds) (1972), *Economic Imperialism: A Book of Reading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p. 39.

[5] Ibid.

[6] Desai, *Lenin's Economic Writings*, pp. 29–30.

[7] Ibid., p. 306.

[8] Ibid., p. 317.

[9] W. W. Rosto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0] John Wells (1997), *The House of Lords: From Saxon Wargods to a Modern Senate*,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 p. 155.

[11] Marx, *Capital Volume 1*, Lawrence & Wishart eds, p. 72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9章 战争之间的岁月： 返回常态，1919—1929

### 引 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消除欧洲各地的贵族统治给予了极大的推动。霍亨索伦王室的（Hohenzollern）君主政体被共和政体取代，它的总统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弗里德里克·埃伯特（Friedrich Ebert）<sup>[1]</sup>。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左派现在形成了斯巴达克联盟，并在1918年末和1919年初举行的传奇般的和冒险主义的起义中耗掉了自己的力量。旧的右翼和修正主义的传统工联主义领导保持了它的权力，并重新控制了局势。罗莎·卢森堡，这位最有才气的理论家和煽动者，惨死于惟利是

图的德国官吏团体弗赖科普（Freikorps）之残暴手中。<sup>[2]</sup>自那以后，布尔什维克宣称她为烈士，而旧的社会民主党却把她视为革命传统的叛逆者。

但是，社会民主党从贱民状态成为执政党的事实——旧的欧洲君主政体已经粉碎，被共和政体取代——是一桩非常革命的事件。哈普斯堡皇室帝国崩溃了，被奥地利共和国和独立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南欧其他国家所取代。贵族也从英国政治权力中撤退下来；自从索尔兹伯里侯爵1902年退休之后，没有任何一位20世纪的英国首相坐进过上议院。上议院的权力在1911年——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被剥夺了。<sup>[3]</sup>

贵族在军队中拙劣的和有时显得麻木不仁的领导，结果也只能使它声誉扫地。到处盛行着民主的平等精神。在领导选拔上，将来更受重视的是能力而不是出身。随着选举权的扩散，责任政府将完全通过选举产生。工会在整个战争中在提高工资方面已经显示了足够的耐心；现在他们正在继续前进。在整个欧洲，劳工的不安状况变成了一种强大的可怕力量。甚至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受到了联盟力量——铁路员工、码头工人和煤矿工人的胁迫。霍布森和熊彼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正确：战争对于到1914年还紧紧地抓住政治权力不放的封建贵族统治，可能是最后的返祖性的一击。现在他们被战胜了。<sup>[4]</sup>

### 社会主义：一个或多个？

战争转换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地位。当然，第二国际的分裂和第三国际的创立形成了一种教会分裂状态，但是也澄清了问题。<sup>[5]</sup>改良主义的、议会中的社会主义政党仍然留在第二国际，乐意在政治和经济体制内从事工作。政治形势在朝着反君主制和更民主的方向发生急剧的转变。经济体制仍然停留在原来的阶段。资本主义幸免于难，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也发生了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并没有帮社会主义政党的忙。问题不在于他们；问题在于资本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它们给那些在这一时期生活着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充满危机和崩溃的深刻印象。由于第三国际预言了资本主义即将灭亡，这些年像是一种早期的圣诞



节。改良主义者看起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而革命者则是正确的。由于改良主义者坚持自己的适度政策，并受到衰落的资本主义的不利影响的挤压，共产主义者谴责他们阻止了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资本论》第一卷第32章中启示录式的观点，比其他部分更细微的结论，看起来更中肯。马克思这位天生的反资本主义者，这位预言资本主义终结的预言家，被用于宣传战，以取代那些在他之前或之后都更理解资本主义的动力的人。

两种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就这样出现了，相互竞争抢夺政治地形。一方面是第二国际的观点，我将称之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SwC）。这里的目标是使资本主义更富有人情味，缓和它的不利影响，改善工人和贫民阶层的状况，创造更好的公共服务——保健和教育、运输、对老年人和失业者提供保护——通过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可以实现这种目标。但是所有这些只能在不对资本主义的利润体制进行基本挑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所想像的最激进的步骤，是对一些产业——常常是步履蹒跚的产业——实行国有制。对于第二国际中最激进的派别来说，国有制和国家控制的不断扩张，可以成为一种悄悄地征服资本主义的方式。英国工党兑现了它的承诺，在1917年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写进了它的党章，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条款（第四部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它的成功必须建立在一种繁荣和运行良好的资本主义之上。正如我们看到的1914年之前社会主义党的情形，那时，工会和社会主义党成员在高就业和经济繁荣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也是在那个时期，亲资本主义（pro-capitalist）的政党——自由党、保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社会主义政党通常取得政权——特别是在1919至1939年这一时期——都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出现麻烦的时候：罢工、高失业率和过度的通货膨胀，等等；而正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变成保存资本主义，并使它运行得更好。这可能就是布尔什维克所谓的背叛，但是它自有它的道理。当资本主义发生故障的时候，工人是第一个受害者。认为每个危机都充满着革命的机会，是一个浪漫的谬误。

第三国际的布尔什维克想要的是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SoC）。由于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工人政府（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它们走上了一条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未曾料到的方向。俄国资本主义是不发达的，这正如列宁自1890年以来所一直认为的那样，但是在这里，



它们建立了工人政权以实现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任务。这不是《共产党宣言》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甚至也不是《哥达纲领批判》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即使这样——与布尔什维克所设想的它的终极目标是在德国相比——它在俄国不过是一个病弱的创造物。随着欧洲革命开始衰退——至迟在1921年——布尔什维克坚持的是要建设一种不同寻常的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的前景，它将实现俄国经济的发展。他们从不沮丧，并把他们的方案定义为真实的社会主义——不是拼命跟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后面，而是同它进行顶级竞赛。既然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执行过计划经济，俄国人在一种广泛的经济基础上也决定执行计划经济。为了原始积累，他们把计划经济应用到广大乡村：通过交换，如同列宁设想的那样；或者沿着圈地运动所走过的没收道路，如斯大林所实践的那样。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10余年充满着暴力和贫困，谁有理由指责国家资本主义采取同样的措施呢？以加速的步伐建设一种发达的经济，使用资本主义历史上所使用过的同样技术，但是没有资本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

当然，还存在着第三种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过这种观点从来没有机会付诸实践——或者至少，至今还没有实现过：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SbC）的观点。如同黑格尔的轨道所规定的，这是一个自觉的社会，如今已清醒意识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从社会的劳动分工中获取利润的私有财产的体制，不可能进行任何更深层次的改良，只能进一步发展到控制这种经济——社会，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国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这一点谈得并不多，但是毫无疑问，他谈到应该采取自觉控制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马克思并没有勾画出它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模式运作，因为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适当的时间内，社会将找到它自己的解决办法。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消灭阶级差别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中，存在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一旦人们自觉地把握到他们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一旦对于每个人来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变得能够看见——那么，他们就可以依照这样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经济事务，即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成为首要的任务。人们将会继续工作——不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是成为一般化的社会交换的一部分。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那里 [尤其是奥托·纽兰思 (Otto Neurath)]，就存在某种因素，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将会被废止。事实上，到那时为止——由于成熟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它才会被社会主义所取



代——那里甚至根本不存在任何匮乏。每个人都在为他自己或她自己而工作，就像为社会工作一样。对于经济将如何运行，每个人都参与自觉的决策。

在双重意义上，这都是一种乌托邦的观点：它既没有详细的规划；它也从来没有面对日常生活的严峻的现实。自觉控制怎样才能够被“社会”所行使，人们的需求和设想怎样才能够被沟通，这样的社会是如何决定节约和投资的，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里甚至没有一种假设性的蓝图——对这一观点的模拟或方案构想。在托洛茨基集团与正统的（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之间的争论中，这点偶尔被简要地提及，但是任何一方只不过是喊喊口号而已。在上述三种观点中仍存在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全球体系，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发展不平衡，那么社会主义不就不能在一种国际的水平上——如果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吗？然而，如果按照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必须等待资本主义完全成熟（直到它耗尽最后的进步动力），这是否意味着在资本主义被征服之前，在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直到最后一个发展中国家，1883年和1913年之间的这场辩论，展示了一种非常狭窄的西欧的视角。甚至美国也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的视野中。情况似乎是，最发达的国家——英国——或者发展最快的国家——德国——将首先进入社会主义。所假定的却是（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不明确的），资本主义的欠发达地区因而会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个问题被令人困惑地搁置下来，因为这种言辞是国际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即使在西欧也是如此，意味着随着社会主义的来临，它的前景有着本质的不同。

如果假定它所提倡的中期的改良主义前景和唯一的长期的革命目标，第二国际就不会遇到这种麻烦。当多次大会（例如1907年斯图加特举行的会议）试图通过一项统一的决议的时候，总是不得不承认，不同的国家应该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当权，因此，也就没有力量去强制其他政党。自己要生存，也要让别人生存。在其后的80年中，情况一直是这个样子。

第三国际则完全不同。首先，它由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来领导，这个政党不仅享有第一次成功进行革命的声誉，而且还拥有强制推行它的意志的资源。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不是一个民主协商的政党，而是一个具有等级制度的、自上而下的和由领导支配的政党。因此，第三国际也是由俄国共产党

进行等级制的领导的。但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还坚决信奉这样一种国际主义的学说——当社会主义到来时，它将在很多国家同时到来，并受先进的国家领导。到1921年，现实显示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不得不与社会民主党精心编造的充满背叛辞藻理论相调和。然而，俄国突如其来的革命是正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的确同时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北部和俄国同时发生了，但是只有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把握住了这场革命，其原因在本书第7章中已经解释过。托洛茨基，连同帕沃思（Parvus）[亚历山大·赫尔法特（Alexander Helphand）]一起，发展了这种观念，即资本主义国家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最可能首先被突破，然后革命将得到扩散。托洛茨基甚至在1923年之后还抱有这样的观点，尽管那时无论哪里都不存在举行起义的希望，而且最后一次绝望的革命尝试也在德国以失败而告终。事实上，虽然第三国际在理论上不承认这一点，但它像第二国际一样，必须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革命速度来生存。“一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one country）<sup>①</sup>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是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或者布哈林实现了它，但是，那是一种偶然的結果，而不是一种体制性的或结构性的结果。斯大林很轻易就战胜了另外两个人。

### 破裂、恢复和破裂

那时，存在着“一国社会主义”，但在不同的国家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在两次大战期间是非全球化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减少了。金本位制在战争期间被中止了，而交战的欧洲国家不得不痛苦地尝试着恢复它。美国作为一个最强大和最繁荣的国家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并且拥有最多的黄金储备。英国——迄今为止一直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领导者——不得不出售它在国外的资产以支撑战争经费，并且用了6年时间才恢复金本位制，但是只过了7年又不得不放弃它。英国在国外投资的能力变弱了。英国政府像其他每个交战国家的政府一样，在享有近60年的坚实的公共

<sup>①</sup> 按照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而不是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表现为一个单独实现了社会主义，故有此称。



财政之后，积累了巨额的公众债务。法国在物质上也受到了损伤，并在凡尔赛会议上坚持对德国实行足以使它受到削弱的赔款裁决。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两次被击败：一次是被他自己的国会，它拒绝美国依附于国际联盟，以某种方式证实了美国民主政治的活力。而另一次，是《凡尔赛条约》，它实际上更像古老的欧洲条约，含有土地割让内容，远远超过了威尔逊老式的理想主义。对法国来说，这并不是是一场世界战争，只不过是又一轮的法德斗争。

从1919年到1939年的20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多少有些武断）。第一时期（1919—1925年）是返回常态，虽然不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由的全球化秩序的常态。接着的一个时期（1926—1930年），对这个新的非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是一种常态。第三个时期（1931—1939年），是灾难深重的大萧条和无效恢复的时期，直到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背景。资本主义几乎接近了死亡的边缘。它不仅面临着来自左翼的挑战，而且面临着来自右翼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以一种“一国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one country）<sup>①</sup>的非自由的威权主义的变种进行着实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挑起的，却使资本主义能够杀一个回马枪，并在美英的领导下，重新建立“一国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的翻版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模式来确立。只是在1939年之后又花了另外的50年，全球化才重新回到它在19世纪开创的航线。在这之前，一国社会主义的威权主义翻版也崩溃了。

### 返回常态（1919—1925年）

但是，我现在已经跑到了故事的前面。在两次战争之间的20年中，政客和政策制定者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1914年之前的世界并没有逐渐地被恢复。紧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通货膨胀遍布了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在英国，工资在1919—1920年平均上涨了20%。战争岁月是充分就业的岁月，工会也变得强大起来。法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德国承受着沉重的战争赔款以及来自战败的疲惫和劳工正面冲突。在英国，负责通货和外币交易的坎克利夫（Cuncliffe）委员会报告说，尽快返回金本位制直接关系着伦敦城市的命运。这要求对通货膨胀进行控制，而在1921年，英国政府在

<sup>①</sup> 由于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资本、货物和劳工的流动，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被认为具有全球性质。在这种全球自由流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故有此称。

预算中采取了严厉的通货紧缩措施；工资下降了20个百分点，失业率迅速上升。一剂更为严厉的紧缩通货的药方于1925年被付诸实施，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不情愿地签署了财政部专家建议，恢复战前英国货币与美国美元的汇率：1英镑合4.86美元。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此感到震惊，因为他宁愿选择一个更低的汇率。在10年间所剩的时光中，英国经济承受了英镑定价过高的苦楚。在20世纪20年代剩余的时光中，英国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0个百分点。<sup>[6]</sup>

但是，1919年到1925年的岁月，也是英国出现政治骚动的岁月。在一次内战之后，爱尔兰独立之后，是把阿尔斯特（Ulster）分割出去，还是把它作为英国的一部分保留下来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在印度，1919年4月戴尔（Dyer）将军针对和平示威者的阿姆利则大屠杀，引发了圣雄甘地领导的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许多由全体白人国民组成的国家都对政治自治的尺度——统治地位——提出了不同要求。关于巴勒斯坦的鲍福尔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打开了盛满蛆虫的罐头瓶，它所造成的影响至今还能够感受到。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被保守党粉碎，但是保守党无力组织一个政府，于是1924年一个工党政府诞生了。对工党的成功而言，形势并不妙，不到一年的时间，保守党又卷土重来，夺得了政权。三年内换三届政府，在英国政治中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德国则遭受了更大的创伤。魏玛共和国是社会民主党值得骄傲的创造。它是第一个潜在的现代福利国家，建立在俾斯麦主义的基础之上，但要变得更具有普遍性。但是，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问题；德国经济承受了对它的资本的巨大破坏，而且政府的收入一直很低。<sup>[7]</sup>外国的投资还没有开始恢复。当德国无法支付战争赔款时，法国占领了鲁尔（Ruhr），并强制德国输出煤炭和钢铁以补偿战争赔款。德国政府面对如此的公开侮辱而被激怒了，决定破坏这一地区的通货。对所有鲁尔地区的德国官员继续支付工资，由于这一地区的产出甚至比整个已经穷困的德国的产出还要低，通货膨胀开始变成天文数字。马克的价值直线下跌，直到几万亿马克只能购到一美元。在这些年，德国还面临着左翼的谋反，1924年在慕尼黑，纳粹党的新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试图发动政变，实现巴伐利亚（Bavaria）独立。所有这样的尝试都被共和国击败了，但是政治暴力在迅速升级。一项以美国干预的国际为首对赔款债务进行了重新修订，美国承诺提供贷款，帮助德国恢复经济。1925年之前，一切看起来都比较顺利。引进了承诺保证稳定的新的通货，



但是，1923—1924年的极度通货膨胀使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倾家荡产，他们本来是希望靠储蓄维持生计的。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惟一一个经历了10年经济繁荣的国家。在1925年，没有用太长的时间就返回了常态或改变了异常状态。禁酒令除了使政治腐败之外，效果不大，然而，农民却没有充分分享繁荣，但制造业和金融业倒是兴旺起来。股票市场比以往更多地成为人们特别感兴趣的主体，华尔街品尝到了繁荣的滋味。美国成为欧洲经济的银行老板。英国和法国不得不偿还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贷款，而与此同时，美国又再次把信贷投向欧洲，尤其是德国。纽约正在取代伦敦，作为国际金融的重要中心浮现在世人的面前。不过，美国中央银行并不具备19世纪英国银行所具备的全球视角，那时英国银行通过在短期利率方面细小而微妙的变化“经营”着金本位制。美国政策的焦点更多地是在国家层面，并非国际层面。美国在准备承担经济领导职责之前，还需要一代人的工夫。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不能行使这种领导职责。

远离西欧、中欧和北美洲的地方，也存在着激动人心的事件。日本早在1905年击败俄国之际，就登上了20世纪的世界舞台。它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至于可以加入金本位制。它征服了朝鲜，使自己成为一个帝国，而且相当清楚，日本的领袖想要日本像帝国主义的俱乐部的任何其他成员一样去行动。亚洲在缺席一个半世纪之后，开始进入全球性的政治社会。中国在1911年已经成为一个共和国，而国家主义政党国民党，开始承担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尽管在中国仍然存在着许多反对外国势力控制通商口岸的怨恨，但是，中国——像另外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印度一样——犹豫不决地走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海是一座现代城市，正如加尔各答正在成为现代城市一样，拥有现代的运输模式：轨道电车、公共汽车和火车。<sup>[8]</sup>

共和主义——虽然不是民主政治——已经到达从前西班牙的拉丁美洲殖民地。在那里，农业依然是主导产业，工业部门非常脆弱。阿根廷是这一地区经济的领导者，通过发展它的农业资源，成为一个主要的肉类和粮食的输出国。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极为相似，在阿根廷，农业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这不同于西欧模式。只有俄国维持了这种模式。俄国的内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农民——新近被革命化了，在数十年间第一次拥有了土地——被布尔什维克控制着。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政府在1921年承认了他们的影响力。俄国工业经济的任何复兴，都是以农民愿

意放弃自己多余的粮食为前提的。工业部门用于交换的产品少得可怜，贸易条件受限制对于农民有利。列宁开创了新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有一些余粮要作为“税种”来生产，而剩余的部分则可交易。那里没有强制性的余粮征收，就像在战争期间（1917—1920年）尝试过的那样，它曾引发一场俄国所经历的最严重饥荒之一。<sup>[9]</sup>

到1925年，俄国工业与农业之间不稳定的休战协定才建立起来。贸易条件摇摆不定，但是那时政府已经消除工人方面所有的反对派。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的所有政党已经被禁止，他们的领袖或被监禁或遭放逐。工会被“军队化”（用托洛茨基常用的术语来说），服从于政府的目标，而不是服从于其成员中的某些人。国有化被停止了，一些私人企业被允许发展起来。列宁在1924年已经去世，但是领导暂时是集体进行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处于权力的顶端。来自西方的访问者——萧伯纳、伯特兰·罗素和H. G. 韦尔斯（H. G. Wells）——对他们看到的事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回去进行了报道。俄国将要成为国际共同体的一名正式的成员。

#### 常态（1925—1929年）

随着战争期间岁月的流逝，跨越了20世纪20年代后半段5年，在逐渐接近于常态。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明白，再也不可能回到1914年以前的日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在那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家在经济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拥有具有国际货币原则的规则和谨慎的国内财政政策——永远不复存在了。国家仍然通过贸易和信贷关系而互相连接，但所呈现的是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的经济，而不是全球的经济。国家（时常被误认为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战争已经使国家担负起对公民福利的责任。如今出现的“社会国家”（social state）<sup>[10]</sup>把它的公民与外国人区分开来。整个欧洲都引进了护照，以阻止人员的自由流动。人们期望国家把福利只传送给自己的公民。其余的则是不能享受这些福的外国人、移民和难民。不论在什么地方，需要的都是“一块英雄用武之地”——当然是我们的英雄，而不是别人的英雄。

魏玛共和国由于经历了自己的创伤，成了传送这一梦想的最好装备。它的福利立法，它的扩大工会权利，它冷静处理国际关系的行为，使它成为一个旗手。虽然它在下一场暴风雨中消失，但是社会民主党传送了改良主义的《爱尔福特纲领》中的部分内容（当然，现在这部分内容已是被否认）。毫无



疑问，尽管面临许多经济问题，但是社会民主党在执政之时还是表达了它的诺言。

由于以 4.86 美元/英镑的汇率回归金本位制，导致英国经济进入第二的通货紧缩时期。出口损失给煤炭业造成了压力，矿工开始罢工。在英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英国劳工联合会宣布了总罢工。这也许是最惨痛的时刻。工党被削弱；自由党分裂了。从公开的阶级斗争来看，保守党政政府毫不动摇，罢工决不妥协；随着它进一步向过去隐退，它的浪漫主义色彩也显得越发突出，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只能对实际工资造成挤压。鲍尔温（Baldwin）政府却坚持了他的全部任期——这在 20 世纪 20 年代是惟一一届能够做到这点的政府。

法国在致力于重返金本位制时，比英国做得好一些。法郎兑换黄金的价格被固定在允许法郎贬值的基础之上，这帮助了法国的出口。法国第三个共和国完整无损地度过战争，并能够继续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主要是因为它战胜了宿敌。巴黎成了艺术和文学的国际中心，甚至是英国文学的国际中心，许多爱尔兰、英国和美国的作家拥挤在法国大道两旁的咖啡店里。法国社会党也已经分裂为第二国际派和第三国际派。但是无论如何，法国社会党并没有社会民主党强大，在被召唤执掌政权之前，它还得稍事休息。

俄国，也同样有幸度过了正常的 5 年，尽管对经济战略不断有争论。托洛茨基想要从渐进主义者的新经济政策（NEP）——它赋予农民以很大的权力——转向加速工业化的方案，靠农业剩余（向工业部门）的更有利的转移来提供资金。布哈林要继续巩固新经济政策，保持农业与工业的均衡发展。曾几何时，俄国甚至似乎能够得到外国的援助。来自英国的一个英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团在 1927 年访问了俄国，就恢复贸易和信贷举行过严肃的谈判。然而，接下来，第三国际开始释放能量，鼓励羽毛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广州和杭州等中心城市发动革命。革命被国民党政府无情地镇压了，这个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就在莫斯科接受过训练。这次行动，是 1919 年和 1923 年间德国共产党的冒险主义的重演，尽管德国共产党有着比中国共产党更充分的理由。英国代表团有利的报告被苏联政府忽略了。苏联被视为无赖国家，而不是国际共同体中的一个正常的、值得尊敬的国际一员。

如果德国在战争中的损失更少一些，它会是俄国天然的经济伙伴，但是



德国在资本输出方面没有任何地位。法国曾在沙皇时期对俄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苏联拒绝承认这笔债务。英国也匆忙后撤：俄国不得不孤立地解决资本积累问题。这不是选择的结果。列宁欢迎外国专家和让步。如果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危机，布尔什维克将可能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尽管他们对待外国政党具有教条主义色彩。面对孤立，强制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已经隐约可见。斯大林通过与布哈林联合挫败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遭到放逐。现在，斯大林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的政策，而且把布哈林从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又有两个浪漫的殉教者被托付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众神庙。

在设计一个使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计划经济方面，斯大林处于无人敢挑战的地位。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模型，成了苏联设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具箱。<sup>[11]</sup>两大部类的划分——机器产品和工资产品——被当作基础使用。机器产品的生产——基础工业——被赋予优先性。消费被以铁的规律的韧性控制着；所有的剩余都被投资到扩大机器产品部门。第一部类处于驾驶室的位置。新招的未经训练的工人，多数是从乡村迁移到城镇的，仅仅付给很低的工资。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人们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但是，实际上，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到1929年，斯大林已经加固了他的权力，把苏联推向加速实现工业化的轨道，并成为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共产主义教堂中列宁的继承者。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中，被放逐了。每一本关于马克思的读物，每一部关于马克思、列宁或俄国的著作，必须严格地与斯大林的观点保持一致。甚至是，如果马克思的著作偏离了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著作也要被忽略、被压制或者被删节。人们不再需要阅读《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被认为是标准的教科书，仅次于《共产党宣言》。所有的关于价格—价值转化、再生产的模型，或关于利润率与预想的下降趋势不相符合的辩论，都被作为索然无味的烦琐哲学排除在外。答案是已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捆教义问答集。

但是另一方面，第三国际比第二国际做得要好一些。第二国际的领袖，如果他们执政，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统治。他们将与反殖民主义妥协，并为本国的利益服务。第三国际，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摆出了大胆和不妥协的姿态。就亚洲和非洲的国家而言，第三国际尽管独断，却是站在他们一边。这样，在第三国际领导下召开的布鲁塞尔反对帝国主义大会上，年轻



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受到了简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美景的吸引。这是在 1927 年, 甚至在他 20 年之后当上印度总理时, 马克思主义给他造成的印象——以其多少有点粗糙和教义问答的形式——都没有被忘记。大部分现在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创造者的领导人, 都是通过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而作为新兵招募到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他们被告知,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成为一名反帝国主义者, 就是要成为反资本主义者。他们被告知, 资本主义——在马克思论述殖民地著作的许多滑稽描述中——是造成殖民地的迟滞或扭曲发展的代理人。马克思欢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摧毁印度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惟一的抱怨是, 它们没有在 1857 年适当地完成这项工作, 那时公司已被英国政府接替。他和恩格斯都认可法国接管阿尔及利亚。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要摧毁古老模式的进步力量, 即便这种摧毁受到了殖民统治力量的影响, 也还是进步的力量。马克思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这笔令人困窘的遗产受到了压制或辩解。马克思成了类似于坚定的反帝国主义作家的角色, 同时也成了反资本主义作家的角色。民粹派关于完全跃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幻想, 现在被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俄国已经实现了民粹派的纲领, 而且跃过了一——据说是信心十足地——剥削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中间阶段。现在每个国家都可以这样做。[12]

不管它们的经济信息有什么优点, 共产主义者坚决支持所有的反殖民运动。苏联的教义问答式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普及, 是对这种支持的小小回报, 特别是在欧洲核心国家没有谁愿意提供帮助的时候。不论是英国的工党, 还是法国、荷兰或比利时的社会主义政党, 在这方面的记录都是十分可怜的。

1925—1929 年, 印度正在经历一段比较安静的时期。甘地已经撤回回到他的僧修所, 国大党已经开始参与立法机构, 该机构是作为 1919 年改革成果的一部分而创立的。在中国, 国家主义的领导通过镇压共产党起义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在其中的一些国家, 农产品出口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工业化进程, 都比较看好。强烈要求自由贸易的倾向有所减缓, 到处都在利用关税保护来促进工业化或者帮助农民致富。自由秩序受到很大损害。

对于自由秩序的现实的——而且是大得多的——威胁还没有到来, 但是, 如果看得仔细一些, 它的预兆在意大利已经隐约可见。像每个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 意大利在战后的岁月遇到了麻烦。社会主义者为数众多, 但他

们过于分散，在工业化的北方，共产主义者参加了自发的罢工。但是，在意大利也同时存在着主张威权主义和君主制度的右翼政党。在《凡尔赛条约》中，意大利确实得到了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但是，它要得到阜姆（Fiume）的要求并没有被接受。一位意大利诗人，加布里埃尔·丹纽泽尔（Gabriele D'Annunzio），领导一群混杂的冒险家，为意大利夺取了阜姆。丹纽泽尔把自己幻想为一位领袖，他在宗教仪式中，为自己的成员准备死亡勋章和黑色衬衫。他还为威权主义的领导设计了流行的标识。执政的自由联盟是软弱的，而且不能处理这些问题。因此，贝尼托·墨索里尼，一位意大利社会党的创造者，组建了一个由左翼和右翼组成的联盟。这个政党的哲学是左派社会主义情操与右派国家主义的混合物，但是主要的信息是，议会民主已经过时，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来处理意大利的问题。墨索里尼已经成功地使他的追随者在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而他也被邀请进入联合内阁。到1925年，他已经成为政府的首脑，这因为他的追随者在进军罗马时制造了危机氛围。法西斯政党是一切阶层的大联合，包括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富人。但是主要的需求是为了满足简单的口号和激烈的解决方案。墨索里尼很快确立了他在政府中的全权控制地位。的确，是他的政府中的一个知识分子，乔维尼·金泰尔（Giovanni Gentile），创造性地把他的政府称为“整体主义的”——或者像我们所说的“威权主义的”——政府。但是不要把墨索里尼当成一回事；他只是在预告，一个更坏的时代即将到来。<sup>[13]</sup>

美国的繁荣继续使世界感到惊讶。欧洲人在克服对于美国的傲慢和无知方面，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但是好莱坞电影已经开始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生活和美国文化的详情。电影是第一种工业化的文化媒介，甚至比收音机和电视更早，后两者对于民众曾具有普遍的吸引力。<sup>[14]</sup>好莱坞的无声电影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查理·卓别林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丑剧演员，也许他是这一类人中的第一位。欧洲电影始于19世纪90年代，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经吞并了欧洲的电影业。好莱坞把电影视为一种产业，并把资本主义的赢利逻辑运用到电影——生产、销售和展览。形形色色的欧洲电影业——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瑞典人的电影——只把电影视为一种手工艺或者一种艺术形式，像歌剧一样。他们偶尔生产一些著名的作品，但在市场的战斗中却不断输给好莱坞。对于欧洲的演员、导演、摄影师和电影作家来说，好莱坞像磁铁一样拥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它属于美国所有，但是好



莱坞通过它的电影创造了第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工厂。美国文化开始竞标全球文化的王冠。对于欧洲来说，文化是一个高贵的概念；它是某种下层阶级所不能拥有或者不能享受的东西。任何流行的东西，都很可能被贴上俗气的标签。美国没有贵族，它只有富人和穷人，中产阶级在美国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欧洲。无论如何，甚至工人也可以获得高收入，而且有余钱看电影、外出就餐或从事体育运动。正是这种文化，这种大众消费的文化，才是好莱坞输出的文化。它立即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欧洲仅仅可以用保护主义的隐讳战术进行反击，或者嘲笑美国人的俗气，或者在自己的地盘上试图与美国进行无用的竞争。所确立的模式是：好莱坞拥有电影产业；欧洲拥有艺术电影。印度、中国和日本都跟随好莱坞的例子，发展了庞大的和可以获利的电影产业。拉丁美洲却跟随了欧洲。

的确，对美国来说，常态的岁月是超常态的，使人暖意洋洋。共和党赢得所有的三届总统选举：1920年、1924年和1928年。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被加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取代，加尔文·柯立芝又被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取代。一个工程师转变为成功的商人，成了一位国际知名人士，因为他在俄国革命后的大饥荒和内战期间，为提供救济做出了成功的努力，胡佛是一位新型的政治家——对那些通常按照腐败的政党机器运转的政客来说，他是一个精英治国和技术专家治国的例外。在管理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方面，甚或在调节资本主义的局部的小维修方面，他都表现出了令人称奇的能力。但他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总体崩溃。永远不会有一个人精英治国或技术专家治国论者，能够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第一股大众消费的浪潮就是在这时期来到美国的。收音机、电炉，甚至洗衣机，现在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家庭器具迅速增长，办公设备也在迅速增长——打字机、计算器和点钞机。由于亨利·福特和新的装配线技术，中产阶级的技术收入完全能够承受新的汽车价格。黑色T型汽车在整个美国随处可见。这里重新又出现电影业中的一幕，欧洲汽车工业执著于贵族化的、手工艺的和奢侈的产品。等到这种新的工业革命被欧洲掌握，又过去了许多年的时间。曾几何时，美国保持了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第一梯队的领导地位。美国的建筑变得更高，公司变得更大，股票市场飞蹿到了先前做梦也不敢想像的高度。这是两次大战期间资本主义深秋季节的小阳春。

然而，在1929年，灾难降临了。

〔注释〕

〔1〕 Chris Harman (1997), *The Lost Revolution: Germany 1918—1923*, Bookmarks, London.

〔2〕 Alfred Döblin (1983), *Karl and Rosa: November 1918, A German Revolution, A novel*, trans. John Woods,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ew York.

〔3〕 George Dangerfield (1980),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4〕 Arno Mayer (1981),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Europe to the Great War*, Croom Helm, London.

〔5〕 有关著作对第二国际的分裂和第三国际的形成进行过很好的描述，尽管是从列宁主义者的观点，见 Cliff, *Lenin*; an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6〕 关于欧洲1918年之后的通货膨胀过程图，见 J. M. Keynes (1923),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London, Macmillan.

关于回到金本位制，见 J. M. Keynes (1925), “The Economics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此文作为小册子出版，收编在 (1972) *Essays in Persuasi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ume IX*, Macmillan, London.

〔7〕 德国的过度膨胀，见 Gerald Feldman (1993), *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hyperinflation 1914—192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关于魏玛共和国，见 Anthony Kaes, Martin Jay and Edward Dimendberg (1994),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8〕 两战期间的金融史，见 C. P. Kindleberger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Macmillan, London, A. J. Brown (1938),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Re-interpreted*, 2 v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9〕 列宁的政策，见他的小册子 “The Tax in Kind”，再版于 Meghnad Desai (ed.) (1989), *Lenin's Economic Writing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见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对工人反对派的镇压，见 Robert V. Daniels (1960),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0〕 “社会国家”的标签应用，见 Nigel harris (1995), *The New Untouchables: Immigration and the New World Worker*, I. B. Tauris, London.

〔11〕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源，见 Meghnad Desai (1979), *Marx-*



*ian Economics*, Blackwell, Oxford.

[12] 关于马克思论述帝国主义的非正统观点, 见 Bill Warren (1980), *Imperialism, the Pioneer of Development*, New Left Books, London.

[13] 关于意大利与德国的法西斯, 见 Stanley G. Payne (1995),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 UCL Press, London.

[14] 关于电影业, 见 David Putnam and Neil Watson (1998), *Movies and Money*, Alfred Knopf, New York.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10 章 战争之间的岁月： 危机和大灾难

现代研究动力系统的数学，有一种新的方法，叫做灾难（catastrophe）理论或者混沌理论。用数学术语来说，混沌理论是研究系统的某种行为可以改变系统本身性质的理论。一个系统甚至可以用两个方程式和两个变量来描述；如果用三个方程式，就几乎会引起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有趣结果。我在本书第 5 章中用理查德·格德温的两个方程描述马克思的模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动力系统。这样的系统可以用变量（两个或三个）和它们之间的系数——其中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要强一些——来描述。一个系统有可能是稳态的——就是说，不会是从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运动；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的模型就属于这一种。或者这个系统



可以呈现出稳态的增长——以每个时期都有的一种不变的比率。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模型，是从一种任性的观点开始的，但却与这种稳态的增长是趋同的。对于变量系数的微小变化来说，这种系统在展示增长时还能展示有规律的周期，这正如格德温系统（Goodwin's system）所做的。如果把把这些变量系数做一个稍微的改变，这个系统就会陷入灾难之中，其行为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所有这些可能性都被包含在一个简单的二元或三元方程的非线性动力系统中。<sup>[1]</sup>

1929年，资本主义体制从它正常的循环增长模式，一下子跳进了不景气的大萧条之中。在其后的战争之间的岁月，资本主义一直没有从这种大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相对于它通常具有的能力而言，在这期间，产出和就业下降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低的水平。危机撞击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即最坚固的美国。<sup>[2]</sup>失业率高达25%~30%。数百万农民破产了。股票市场的瓦解——大崩溃（the Great Crash）——毁灭了许多新近富裕起来的人们。人们用各种办法尝试恢复经济——通过关税阻止外国的进口——更是使经济雪上加霜。在几个少有的例外中，例如英国，关税起了帮助作用，代价是其他国家的出口比以前大为减少。

1929年的大崩溃<sup>[3]</sup>之后，紧接着便是大萧条。到1931年，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同时陷入谷底。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萧条的国家——如英国是首选的例子——比那些像美国或法国这样的已经享受繁荣的国家拥有更小的萧条空间。德国经济在1925年之前就已经得到恢复，其失业率低于英国，因此它的萧条更显得江河日下。这里还有引人注目的银行倒闭，维也纳克雷迪特·安斯塔特（Kredit Anstalt）银行倒闭，是最为声名狼藉的例子。工资在急剧下降，但是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得甚至更厉害。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印度、阿根廷、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曾享受出口带来的繁荣，如今却损失了巨大的出口收入。

关于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每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各自的争论——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它们在本土的历史中寻求原因。因此，在美国，人们在争论美联储（Fed）所起的作用，争论它在紧缩银根方面的失败是否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sup>[4]</sup>另外一种解释是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它尤其在英国盛行，它把骂名归罪于财政部对公共支出的正统做法，归罪于财政部因担心财政赤字而没有成功地解决失业问题。这里也存在对金本位制和过高估价英镑从而阻碍英国经济恢复的做法



的质疑。在德国，银行的失灵和魏玛政府的弱点，两者共同作用是导致德国萧条的主要原因，等等。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全球经济的衰落，以及资本和劳动的快速流动、商品的自由贸易和政府的不予干预政策，它们在一种活动的低水平上改变了战争期间的经济。然而，资本主义体制还仍然是国家性的，而且各种联系——这种联系相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形成的信贷和贸易时期，则显得更弱——仍然是重要的。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吸干了银行信贷，这使人想到了欧洲所欠的巨额债务，那里到处都存在资金短缺。关税战使情况更加恶化；美国是关税保护的最坏的表率，它通过的哈利—史慕德关税法（Hawley-Smoot Act）提高了关税。在英国，保守党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尽管工党和自由党是主张自由贸易的政党。但是即使是自由党，拥有一流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也变为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们谈论建立一个帝国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多少有点像一个共同市场），以便推进国内部的贸易，把另外的国家留在外面。法国为占有更多的出口份额而把法郎价值低估。把邻居变成乞丐的游戏，被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玩来玩去。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微弱联系，被进一步削弱了。经济的孤立主义取代了经济的国际主义。

一些历史学家将骂名归罪于经济治理的失败。在1914年以前的全球经济是英国享有霸权，据说，英格兰银行明白，应该由它来提供合适的货币流动。它通过对利率进行小幅度 and 灵敏的操纵而做到了这点。在两次大战期间，已经不存在霸主。<sup>[5]</sup>纽约银行是强大的，但是它并不认为全球经济是它应该关心的事务。它的关注焦点在国内。因此，解决在萧条发生之后，限制银行信贷纯粹成了本国应对国内问题的一种反应。（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反应，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作是那个时代的惯常智慧。）即便这一点被英格兰银行明确指出之后，国际方面的反应仍然被美联储忽视了。

后见之明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方便工具。我们现在知道，不景气可以通过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加以避免——通过提高公共财政开支或者放松银根扩大需求来实现。但是在那段时间——1929—1932年——并没有什么答案。甚至凯恩斯也没有指出从僵局中走出的方式，尽管在一般意义上，他已经提出预算平衡和担心赤字的学说来反对正统的财政学说。问题是（而且我这样说时，带有在资本主义再度全球化背景下从事著述的双重意义上的后见之明），很少有人能够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即对那些一国资本主义成为



一种规范的国家而言，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要求它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逻辑。在全球经济中，由于存在着自由贸易和广阔的市场，有效需求的不足对于任何国家都不成其为问题。如果它不是竞争性的——或者因为单位劳动成本太高，或者因为汇率定价太高——这将存在一个供方的问题。全球经济，在1914年之前的50年中，已不断扩大了市场和自由贸易。这个时期的最后阶段，1896年至1914年，已经有过一种具备康德拉捷夫长波的繁荣，可以为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找到市场。欧洲国家的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为农产品输出商提供了市场。美国和新西兰及澳大利亚地区为欧洲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的黄金，可以使世界的通货保持良好的流动性。一种拥有竞争性价格的开放经济，是不会遇到需求短缺的，如果存在着自由贸易的话。

这也是罗莎·卢森堡在理解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模型时使用的方式。她在问：对于所有这些额外的产出，需求从哪里来？在她看来，排除国内市场扩张的可能性是必要的——工人不得不陷入贫穷，接受剥削。但是还存在一个国外市场：她把它称为帝国主义。如果谁认为所有的工业化国家是一种孤立的、经济，那就只有外国可以进行交换。只要外国市场是具有接受能力的，资本主义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张。这就是隐藏在马克思模型背后的秘密。

但是现在，全球市场被关税所阻碍，被债务所压迫，而且面临着脱离金本位制的起伏不定的汇率变动。当一个又一个国家提高关税时，本来应该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如今减少了出口。为了获取利润，资本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这被证明只有国内市场。经济对于国内市场的依赖是在20世纪30年代被强加的。英国——令人惊讶地——首先摆脱了这种状况。在度过20世纪20年代高失业率（平均10%）的时期之后，它率先复苏了：关键的一点是它进一步切断了国际联系（至少，在帝国外面）。它摆脱了金本位制，而且大幅度降低了利率。关税提高了。公共开支并没有扩张，但是实行货币贬值，再加上一种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经济的复苏。对中产阶级来说导致这种经济复苏的是住宅建设，当然还应包括耐用消费品市场的繁荣——电饭煲、缝纫机、洗衣机以及一些其他的耐用品，甚至是汽车。它不是一种具有出口导向的复苏，而是一种具有家庭需求导向的复苏。

在人们的一般想像中，银行业自然应该是罪魁祸首。美国农民把他们的抵押品提前处理，小商业被迫申请破产，甚至富有股票投机商连同他们的股票经纪人的信贷也被缩减了——他们都知道，是银行否认他们有钱。美国人

的政治是想像，越往西去，怀疑银行的人就越多。得克萨斯的狭长地带或者牧场的平民主义者，很少想像过支票；他们信赖的是银元。但是事实上，在物价很高的时候，他们却经常陷入债务之中。对于美国来说，繁荣并不是在1914年结束的；它一直持续到1929年——现在他们不得不偿还过去所欠的一切，货币贬值了50%。

在欧洲，银行家被长期与犹太人达成共识。这是欧洲千百年来反犹太主义的根源之一。英国早在19世纪就开始学习如何宽容。天主教徒第一个得到了官方的宽容，然后，再过几十年，犹太人也得到了宽容。这并不意味着偏见已经永远走开，但是至少，它不能戴上官方的斗篷。法国、德国或奥地利的情形不是这样。左翼运动在战后的岁月已经增生扩散，右翼势力也是如此。他们时常共同分享着对于大商人、暴发户和银行家的仇恨。这些运动中，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在国内非常盛行。比起种族或信仰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阶级问题更加严肃，但是在通常水平上，各种口号抹杀了它们之间的界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其名称与1875年在哥达建立的政党是一样的，除了少了“国家”一词）上升到突出地位。在巴伐利亚举行的一次冒险起义失败之后，国家社会主义者只是在1929年以后才重新复苏。预算的吃紧和国际信贷的崩溃最后毁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心爱的魏玛共和国。各种不同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党试着形成执政联盟。建立一种可以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强有力的领导是非常流行的看法。国家社会主义党在1932年7月开始作为最大的单一政党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而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则处于其后不远的地方。但是，共产党却按照斯大林的命令与社会民主党对抗，而不是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党。尽管在1932年11月的另外一次选举中受挫，但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位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于1933年1月应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邀请出任总理。

领导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不管是为了正义或是为了邪恶。但是在20世纪，也出现了政治背景的变化。欧洲人口已经在19世纪增为后来的3倍，尽管存在着战争造成的损失，并且它仍然在继续增加。随着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的崩溃和民主政体推动力的加强，大众改变了政治。这种趋势由于新媒体——报纸、收音机和电影——的出现而变得更强烈。宣传是20世纪的发明。这些技术创新是由那些能够同样开拓了自己的商业可能性的个别天才发



明家——爱迪生和马可尼（Marconi），还有鲁米尔（Lumiere）兄弟等实现的。报业巨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诺思克利夫勋爵（Lords Northcliffe）和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在其他国家也有对手。印刷非常便宜，而且报纸是最低收入的人也能够负担的。小报在这时进入了它自己的时代，把黄色新闻带进了一个令人尊敬和广泛发行的世界。宣传式的政治家清醒地意识到收音机和电影的力量，正如列宁的著作和希特勒的行动所证明的那样。甚至一个独裁者也必须是受欢迎的——不像一个国王，仅仅期待和接受忠诚。

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观点，是一种由左翼观点与右翼观点组成的大杂烩。他们憎恨食利者阶层，但却不憎恨资本主义。他们讨厌银行家，但是并不反对金钱，就像一些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那样。他们在情感上憎恨犹太人，但那是他们纲领中确定的东西。希特勒热衷于凸现一种维护财政正统和货币原则的形象。他的财政部长康特·施沃温·冯·科斯盖克，是从党外调来的，而且一直担任财政部长到1945年。他选择的中央银行行长约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由于稳定货币而享有声誉。德国企业害怕国家社会主义党在他们的各种不同的选举宣言中提出的国有化议程。该党的一些人——如费德（Feder）——甚至对此非常认真。但是，希特勒从不相信任何经济理论。他需要为自己的政党筹集资金，而且他对大企业是友好的，它们愿意为了保全自己而承担一切后果。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党也需要企业的合作，以赢得他们面临的最基本的战斗——对抗失业。

国家社会主义党宣称，他们在1933年至1935年之间把失业降低了一半。从1929年至1932年，德国失业人数从190万上升到550万，增长了3倍；每月的数据显示出更大的增长幅度：1929年7月为125万，到了1932年为610万。从业人数从1929年的2000万，下降到1933年早期的1140万。减少失业的措施——主要是创造就业岗位的方案——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开始采取。经济在1932年也跌到周期的谷底，并出于正常周期的原因而开始进入复苏阶段。但是这些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当然要比当时看得更加清楚。失业的幽灵在缠绕着资本主义；自由秩序所赞同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和正统的财政/货币学说，并不能帮助消除失业。事实上，在1933年，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就曾警告新当选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如果他不能够平衡预算，就要当心通货膨胀的危险。

国家社会主义党在1934年使失业人数下降到280万，到1935年下降到



210万。像关于希特勒政权的其他任何方面一样，他们的成就引起了德国历史学家的许多争论。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一方面，其统计数据上的伪造（失业人数需要重新确定，等等）——与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作的相当努力相比，可能只是扮演了一个更不重要的边缘化角色。而且他们也没有安排庞大的财政赤字以建设大量的公共工程。在1935年这个接合点上，缩减税收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看来必须执行，以提高更大的收益增殖率。在希特勒的政权的统治时期，工会早就被捣毁，生意人精明地看到，与新政权合作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工人感到高兴的是，因为他们有了工作——不管有没有工会的帮助。

这种适度的通货膨胀不是希特勒的经济战略的主要目的。<sup>[6]</sup>在1935年之后，德国开始热衷于重整军备，经济全部动员到这个方面。希特勒把经济视为他实现政治目标的资源；为了未来进行扩充领土的战争——为了拓展生存空间，这些都是为重整军备所需要的。他为这个目标着手制定了一个四年计划。撇开细节不谈，在苏联1929--1933年的五年计划与德国人的四年计划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我们返回到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的批评，就可以找出这些类似之处。正如我在本书第9章中所说的，斯大林使用这个模型 [如俄国一位名叫费尔曼 (Feldman) 的经济学家所发展的] 突出了第一部类的优先地位：机器制造业。但是，让我们回忆一下罗莎·卢森堡曾经说过的，第三部类——军备——同样可以吸收剩余。对于苏联，正如对于德国，问题并不是吸收剩余，而是配置稀缺资源。斯大林选择第一部类，是因为苏联是一个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他没有一个庞大得可以依赖的第一部类。尽管存在着战争掠夺，但在生产机器产品——钢铁、电力、交通工具和工程技术方面，德国经济有着比苏联更强的能力。这样，希特勒的选择要么是扩张工资产品部门，要么是扩张军备部门。他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重整德国军备。

希特勒对同盟国在这一时期 [也就是在克里斯托纳赫 (*Kristallnacht*) 之前] 所代表的自由秩序提出的挑战，是要在拒绝自由市场的同时驾驭资本主义。他抛弃了自由贸易、资本和劳工自由流动以及放任政策的原则，但却不对资本主义和获取利润提出挑战。计划取代自由市场。关税和进口替代取代了自由贸易。劳工的自由流动受到否认；私人资本被告知要进行合作，如果他们想自由和获取利润的话。后来的战争和大屠杀的历史使国家社会主义声誉扫地，以至于现在也很少有人承认，1945年之后发展中国家所制定的

类似计划——例如，在印度——是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实验中的某些观念。尽管苏联经常被视为一种模式，但是无论资本主义与计划怎样并存，原始模式却是来自德国。

但是，希特勒挑战的不只是自由的经济秩序，他也挑战了该秩序的政治原则。欧洲 19 世纪的自由秩序被各式各样的社会力量不情愿地推向扩大选举权的方向。这样，它就能稳固地变得更加民主。当然，在西欧的确如此。在美国，自由秩序早就比欧洲更民主（再一次没有包括黑人和美洲本土印第安人）。在 19 世纪，大西洋两岸的妇女都不享有投票权，但是政府有义务对当选的立法机构负责，并且不同的政党都有执掌政权的可能性。法国、美国和英国，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没有完全达到这一步；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被允许可以执政，德国的皇帝也不对共和国负责。在 1919 年之后，魏玛共和国加入了自由主义俱乐部。希特勒通过在资本主义内部建立一党制国家，对这种秩序进行了挑战。苏联也拒绝了自由民主政治。

既拒绝自由经济学又拒绝民主政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一种时尚，但它却披上了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并被称之为——不准确地——社会主义。斯大林与希特勒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斯大林对于自由秩序的挑战，是在没有采取私有制和获取利润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把经济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它宣布获取利润的动机对于积聚和经济增长是多余的。希特勒的挑战是宣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市场对于经济增长是浪费的和不必要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已经有过计划方面的实验。那儿存在着一种悠久的拒绝自由贸易的传统，该传统认为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学说，而弗里德里克·李斯特更是一个地道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也曾引起美国的关注。马克思非常轻视李斯特，而且坚决支持自由贸易。李斯特支持在关税联盟内实现劳动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但认为应以关税反对外国的商品。欧洲共同体，它拥有唯一的内部市场和防止进口的关税障碍，更多地代表着李斯特的模型而不是亚当·斯密的模型。但是，希特勒拒绝了李斯特的放任政策方面。正是这双重的拒绝，使国家社会主义（除了他们的致命的反犹太主义）成为 1945 年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先驱。

对于自由政治秩序的再次肯定，是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的新政中完成的。<sup>[7]</sup>他也同样地拒绝纯粹的放任政策，尽管新政最终对自由的经济秩序

进行了一些侵犯。社会保险和工会权利被确立了；农民以保护价的形式得到了特别的优惠；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潜在的购房者，都存在比较容易地得到的抵押贷款。农业就这样与自由市场隔绝，以利于经济恢复。银行业得到改革，以限制它们在不同地域或不同服务领域内进行多元化经营的自由（格拉斯—斯蒂格法案）。但是，罗斯福对于自由市场的干预是最低限度的，尽管这样做还是招来了很强烈的反对。与稍后的印象相反——他并没有过多地偏离正统的财政政策。他通过财政部接管固定黄金价格的工作，证明了美国的实力。罗斯福的目标是，通过最低限度的修补来拯救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他再次肯定了自由秩序的力量，甚至当他柔和地对它进行挑战的时候也是如此。

但是在这10年中，自由秩序依旧面临最大的挑战。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好像是要将第三国际鼓吹的马克思主义的粗俗问答式教义所做的每一条可怕预言都予以实现。失业工人的储备军迅速地扩大，从业人员的工资也陷入不稳定状态。（食品的价格比现金工资下降得更厉害，而统计数据却显示这一时期从业人员的实际收入有所增加。）较低收入的中产阶级——自主经营的小规模的企业主、零售商、农民和自由职业者——都被抛到不再为社会所需要的境地，加入了失业储备军。产出降低了一半，如果不是更坏的话。并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复苏，就像19世纪70年代那样，这次失业人数众多，而且有着更明显的关联。

在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1919—1923），在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当然也包括俄国，出现了不少左翼的革命起义。如我在上面说的，除了俄国革命之外，其余的均以失败而告终。工人的选择拒绝了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而支持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甚至在那个时候，在英国和法国并看不出会出现任何严重的叛乱。对英国而言，它的问题主要涉及爱尔兰和印度，国内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大萧条时期，的确存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肥沃土壤，但是都发生在并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右翼威权主义政体为匈牙利、接着是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提供了模式。在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政党被禁止活动。在英国，工党于1929年执掌政权，但这一时期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却是最糟糕的时期。但在两年内，工党就被制服了。<sup>[8]</sup>它不能实现稳定资本主义的任务，也对它进行不了多少改良。但是，英国并没有倒向法西斯主义，尽管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对此雄心勃勃。接下来是一个国会的右翼政党，保守党，与拉姆齐·麦克唐



纳一道，组成了政府内阁的骨干力量。<sup>[9]</sup>正是这次联合，使得放弃金本位制成为可能——这正是工党政府在早些时候声明却又不能做的事情。在1931年的选举中，支持自由党的人数大为减少，而工党的席位也降到了很低的水准。但是，不管是左翼革命还是右翼革命，都没有发生。

法国的情形也是相似的。在那里，右翼运动迅速繁殖——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显得尤其突出。第三共和国照例是联合政府，同时也是短命的政府。社会党在1936年上台执政，而莱昂·勃鲁姆（Leon Blum）政府——尽管遭受了许多围攻——在改善工作状况方面努力要进行一项长期改革：带薪休假。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西班牙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它没能公开和大胆地支持共和主义者，而当时的法西斯政权却支持了佛朗哥（Franco）。然而，法国直到1940年都没有走上法西斯道路。

社会主义的新奇实验是在瑞典完成的。<sup>[10]</sup>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SAP）采取了一种与爱德华·伯恩斯坦的哲学非常一致立场。它感兴趣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衰败，而是紧迫的工作状况的直接改善。它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稳定保持了1/3的普选投票，并在1932年成为执政党。它与农民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其后的44年中，一直是工人与农民的联合执政，这使得它有力量成为最好的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SwC）。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通过征收累进税和维持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克服了失业，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过稳定物价的政策。通过住宅建筑工程和创造就业岗位工程来创造就业岗位，并为工人提供带薪假和妇女产期津贴。瑞典是在国家层次上建立三方工资议价结构的先驱：工会和雇主，由政府担任仲裁。它也同样得益于一些最具想像力和非正统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林达尔（Lindahl）、朗伯格（Lundberg）和俄林（Ohlin），所有这些人都在这个或在那个方面为克纳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所激励，后者是久享盛誉的瑞典经济学家。瑞典的经济学家相当正确地宣称，他们预见到了凯恩斯的理论。

在两次战争期间，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两度被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拒绝，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带有体制性。是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优先选择——现在是完全合法的选举——要坚持一种可能的改良的资本主义：一种尽管存在着不公平与剥削，但却提供工会权利的体制。经济主义，曾被列宁和卢森堡公开指责为工团主义的有局限的观点，证明完全有能力向工人保证，美好的日子将会到来。民主的政府，甚至是右翼政府，也在尝试减轻他





们的痛苦。他们面临着（也许是自我强加的）财政和金融的约束。也曾出现很多煽动和暴力。但是，19世纪政治家麻木不仁地对待失业者的状况，已经不可能再次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自由秩序民主化了。

也存在着受斯大林第三国际支配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愚蠢行动。他们竟然与社会主义政党斗争，并到处分裂工人。在德国，他们甚至宁愿与希特勒合作以清除自己的社会民主党对手。斯大林给这个政党贴上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social fascist）的标签。共产主义者孤立了自己，因而失去了机会。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在清晰分析斯大林对德政策所犯的错误方面是独具慧眼的。但他在放逐中，不能完成任何事情。<sup>[11]</sup>

当然，斯大林正好犯下了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和最不必要的错误。由于在动员农业剩余支援工业化的速度方面失去耐心，而且不愿意支付农民出售他们的剩余粮食所要求的价格，他在1931年发动了集体化运动。<sup>[12]</sup>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发动过一场如此无情地针对自己的人民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的说法只具有类比性质，绝不能只从字面来理解。

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1919—1921），曾经有过一个阴险的针对乡村的战争的例子。布尔什维克已经失去了那场战争，但不是内战——因为有农民的支持。现在斯大林着手制定了一个在含糊的立场上反对乡村的计划，它针对的不是普通农民，而是阶级敌人，即富裕的富农（kulaks）。事实上，在那里从来没有很多的富裕的农民——在1917—1918年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后，就没有了富裕的富农。只有一些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他们只是通过出售剩余产品才有可能赚回一点收入。正是这些农民，当水兵在1921年著名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中举行起义的时候，仍对布尔什维克保持了信心，同时，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左翼反对派也支持了他们。列宁和托洛茨基之所以能够粉碎喀琅施塔得叛乱和杀害大批左翼反对派，是因为农村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现在，在这场残忍的战役中，斯大林胜利了，但是俄国的农业却倒退了几十年。农民毁坏了他们的家养牲畜，以及其他类似的贫瘠的财产。俄国的农业生产力的骤然跌落，而且在40年内没有恢复。不是更有效地动员剩余——那是通过市场交换能够实现的，像列宁在1921年所做的——斯大林在可能预见的未来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减少了剩余。苏联在以后的40年中蒙受了低水平工资和物品短缺之苦。

实行集体化是一个不必要的恐慌方法。斯大林在党内是不会面临挑战的，俄国也不会面临外部的威胁。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在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者在任何其他的经济学中，就这件事而言——推荐过如此愚蠢的做法。它是向彼得大帝之前时代的倒退，使工业化的悲剧增长百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实行农业劳动集体化方面取得过成功，很少的国家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如果必须为私人财产做一个广告，它不是来自富有的工业资本家，而是来自俄国农村几乎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小佃农。

但是，斯大林设法把所有的不幸很好地掩藏起来，正如他可以使整个世界对于他的集中营一无所知一样。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于苏联所描绘的“新文明”的愚蠢狂热，为锡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里斯·韦伯（Beatrice Webb）所展示。<sup>[13]</sup>对于那些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先驱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他们的确热爱官僚制，这对于他们来说——像对于黑格尔一样——代表着无私的普遍的无所不知的阶级，因此，他们热爱官僚制的化身——苏联。但是，不赋予普通大众在他们的家园通过艰苦奋斗而赢得的、而又在苏联已经失去的自由以价值，是知识界的破产。他们甚至没有辩解便加入了共产党。许多其他人，共产主义者和同志伴侣，在整个斯大林主义时期都在重复着这种智力的破产行为，这只是到了 1956 年才结束。

到 1935 年，斯大林已经意识到德国威胁的严重性。德国在历史上一直觊觎着位于其东方边界的土地，而且——像法国位于德国西进的最前方一样——俄国是德国在西线上的主要敌人。魏玛政府与苏联有过平静的合作，即使是在军事合作的领域，但是希特勒是不同的。他现在掌握着政权，而斯大林在德国方面的赌博已经失败，正如他在中国进行的赌博失败了一样。斯大林改变了他的策略，并提出了人民阵线的观念。共产主义者要与社会主义者和“所有进步的力量”进行合作。这一时期导致了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当然，共产主义者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监护人而行动的。它们把马克思主义凸现为这样一种粗糙的版本：风力磨代表着封建制度，蒸汽动力代表着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编年史、社会学和哲学，也得到了巨大发展。翻译和出版迄至那时尚未出版的手稿——例如，《经济学手稿》就受到了鼓励。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德国传统，这要感谢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和法兰克福学派。<sup>[14]</sup>但是，到 1936 年，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向西迁移，最后到了美国。卢卡奇已经沉默下来——或者，至少已成了第三国际的奴隶。

无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很少有什么创新。<sup>[15]</sup>当然，苏

联已经放弃任何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严肃探索，甚至是对它的使用，除非用它来驱逐鬼怪和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在这一时期（1936—1939）之前，凯恩斯已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话题，这要归功于他的《通论》。人们进行各种尝试，以比较凯恩斯与马克思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对凯恩斯做出一种左翼的解释。就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项1936年之后的西方事业。在某些方面，有关马克思的争论——在1913年一度中断，并最后于1929年销声匿迹——于1936年又得到恢复。但是这次，在它背后并不存在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作为一种学院学科，而不是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回来的——当然，除了西方的共产党之外。但是，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对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来说，问题十分清楚，不论言辞上怎么说资本主义正在处于最后的危机中，在西方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错失。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革命是一种辞藻，而不是现实本身。

到1936年，人们已经十分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日本在1931年已经侵入中国东三省，到1937年，则继续向中国的其他地区推进。西班牙的内战，是对新式重型武器装备的一次测试。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美国和英国——依然固守它们对于和平的幻想。根据《凡尔赛条约》理想主义地设立的国际联盟已经不能维持世界的秩序，同盟国对战争并没有准备。在英国，只有丘吉尔清楚地看到了德国重整军备的危险，但是，他对印度的老牌帝国主义的态度，断了他的后路。意大利已经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而且侥幸成功，逃脱了国际制裁，就像日本在中国所做的那样。在国际关系方面已经没有法律的规则。希特勒利用这点，占据了非军事区的莱茵兰（Rhineland），强迫把奥地利并入奥斯科勒斯（Anschluss），而且提出捷克斯洛伐克是领土的一部分的请求，而这一请求被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毫不迟疑地承认了。

一个帝国主义的精神仍然在欧洲游荡。法国人和英国人承认，德国拥有一种对帝国的“合法的渴望”。但是，由于英国和法国的帝国是在海外，而德国想要欧洲的领土。自从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后，一个王国或者政府的主权，必须得到欧洲外交方面的承认。这并不能避免战争，正如18世纪英法关系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然而，在欧洲大陆扩张领土是不会被赞同的，甚至会出现对抗。拿破仑堂而皇之地要实现一个欧洲帝国，但最终在滑铁卢被英国领导的欧洲各国联盟所挫败。希特勒重新开放了



为德国在东方谋求实现陆地帝国的可能性。西方盟国——英国和法国——的反应是承认捷克斯洛伐克，但当它接近波兰时就受到阻止。斯大林通过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承认了希特勒的要求。这为希特勒的两方面的敌人赢得了一些重整军备的时间，但是，欧洲帝国主义的未完成的议程，却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之所以成为一场世界大战，是因为日本计划取代欧洲各帝国占领亚洲。日本的帝国主义分享了希特勒提出的关于生存空间的逻辑，惟一的目的就是为日本经济的增长寻找市场和原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后战争，但是，现在是没有君主扮演积极的总裁角色而开战。德国于1941年6月通过侵略苏联而卷入了苏联战场。日本于1941年12月通过袭击珍珠港将战争演变成全面的世界战争。在一个世纪中，美国是第二次卷入欧洲战争，但是这一次它的后院遭到了日本的袭击。

#### [注释]

[1] 关于混沌动力学，见 Richard Goodwin and Lionello Punzo (1987), *The Dynamics of Capitalist Economy: A Multi-Sectoral Approach*, Polity Press, Oxford, especially Appendix A3.

[2] 关于美国的大萧条，见 Arthur Schlesinger (1957),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1919—1933* vol. 1 of *The Age of Roosevelt*,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MA; Charles Kindleberger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Macmillan, London.

[3] 1929年的大崩溃，见 J. K. Galbraith (1980),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1955), *The Great Crash, 1929*, André Deutsch, London.

[4] 对于美联储应对大萧条负责的说明，见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z (1963),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5] 有关霸权，见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6] 希特勒的经济政策，见 Richard Overy (1994),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Clarendon Press, Oxford.

[7] 关于新政 (New Deal)，见 Arthur Schlesinger (1959),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vol. 2 of *The Age of Roosevelt*,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MA.

[8] 工党在1929—1931年的命运，见 Robert Skidelsky (1967),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The Labour Government of 1929—1931*, Macmillan, London.

[9] David Marquand (1977), *Ramsay MacDonald*, Jonathan Cape, London.

[10] 关于瑞典社会主义者的成功，见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11]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见 Deutscher, *The Prophet Outcast*. 关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史，见 E. H. Carr (1958),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3 vols, Macmillan, London.

[12] Moshe Lewin (1975),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A Study of Collectivization*, Norton, New York.

[13]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1935),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Longman, London. 自从1935年出了第一版之后，它又在1937年和1941年出了修订本——就是说，是在展示性的审判已经暴露之后。

[14] 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见 Martin Jay (1984),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5]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见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1989, 1992),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1, 1883—1929; vol. 2, 1929—1990, Macmillan, London.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11 章 治疗资本主义：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

如今，尽管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争论，但是经济学已享有着很高的声誉。经济学家时常被报纸引述，时常被政府和国际代理机构请教。在许多国家，经济学家担任财政部长——一种技术官僚<sup>[1]</sup>——去进行深层改革或者结构调整：巴塞罗维茨（Balcerowicz）在波兰，阿斯普（Aspe）在墨西哥，曼姆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印度，均扮演了这一角色。经济学家作为预言家、圣人和救星，可谓是无处不在。

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两次大战期间，当经济世界处于严重危机时，经济学既没能预测这场危机，也不能在麻烦发生时提供解决方案。正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职业中占据着

绝对的优势——相信，考虑到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政府应该尽量少干预，那么经济是能够自我矫正的。他们没有看到，全球资本主义中基本的结构性破坏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继续主张应该回到战前的常态的政策，但是另外部分也是因为，在1870年和1920年之间建立的经济理论——边际革命理论——是一个既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扮演决定性角色的理论。与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一般均衡理论，是一个非常典雅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逻辑建筑，它表明，为数众多的分散但却相互联结的市场，包括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土地和资本市场，如何能够达到一种同时的——因而是总的——均衡状态。经济被视为一种稳定的、不变的现象，或者至少是被视为平稳地（自然地）发展的，没有突然的结构性破坏。英国皇家学院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指导下，花费了很多精力，尝试要了解经济的运作，并开始承认，市场可能需要边际的修正，因为在那里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可能是统一的。以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为首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十分留意防患自由的经济秩序。他们不需要任何干涉。尤金·冯·柏姆-巴维克建立了一种精致的理论，以证明资本的回归不是来自对劳动的剥削，而是来自采用更精致和更时新的技术。时间没有带来不确定性，它代表的是过去（体现在机器上），而不是未来。所有这些经济学学派都猛烈地反对通货膨胀，鼓吹平衡预算的原则。但是，他们都赞成一个前提：不用管它，经济会为充分就业制造出资源。

在此，考察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如何考虑问题的实例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奥地利学派的领导成员，柏姆-巴维克的学生，20世纪拥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开创性的著作《社会主义：一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1923）<sup>[2]</sup>对这一问题做了全面的考察；即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一种带有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中止了市场的社会主义，是否是可行的？我将在后面讨论他的思想（本书第12章）。不过，他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种自由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且他在1932年不加修改地重复了这段话：

哪里生产是完全平衡的，哪里就不会出现失业。失业是经济变化的结果，哪里生产不受主管当局和工会的干预的妨碍，它就永远只能



是一种过渡的现象，是工资率改变倾向于消除的现象。借助于适当的机构，通过——例如——劳动交易，将会在一个不受阻碍的市场中——即在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和改变自己的职业的地方和在他工作的地方演化出一种经济机制——分散的个别失业所持续的时间将会大大缩短，以至于不再把它视为一种严重的罪恶。<sup>[3]</sup>

因此，失业是一种过渡性的或由摩擦引起的现象，如同今天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如果它持续下去，那是“主管当局和工会的干预”所造成的错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不少重要的经济学家或多或少地重复着相同的词句。经济只是暂时失去了平衡，尽可能少地进行干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像我已经说过的，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50年，是经济稳定增长、物价稳定或者有所下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50年。但是，在那个时期也存在着经济周期。马克思是第一个把经济周期作为自己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学家，不过他把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中增长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周期并没有被纳入到一般均衡理论之中；事实上，即使在今天，把周期纳入一般均衡理论，仍然是一个多产的研究领域。对于周期有不少统计学上的记录，许多“怪人”也提出了关于周期为什么会发生的理论。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威廉·史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试图以太阳黑子的频率为基础，建构一种对周期的解释，这种周期转面会影响农业产出和价格。一些人认为，周期是由剩余或缺乏银行信用引起的，并为此而责备犹太人。一般均衡理论清除了货币或现金；它把现实经济模拟为一整套的易货贸易，其中货币不起任何作用。

这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例外，这就是瑞典的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sup>[4]</sup>维克塞尔稍微晚些才从新闻界进入经济学领域，因为那时他被“人口问题”搅得不安——这是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他认为人口过剩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因而主张计划生育。他写了一个小册子，名为《有关社会悲剧（尤其是醉酒）的最重要原因及其药方的几点建议》（*A Few Words on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of Social Misery and its Reme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on Drunkenness*），那时他才29岁。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认为如果俄国侵入，瑞典应该有条件地投降，但是他对于基督教并不虔诚。他本人精通瓦尔拉斯的理论，并且掌握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他也非常精通古



典经济学，很熟悉马克思的著作。不像许多其他同行，维克塞尔有着社会主义情结。

维克塞尔关注的焦点是利率——投资者面对的借贷成本和他从这项投资中可以获得的回报率。马克思把后者称为利润率，但是——正如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所解释的<sup>[5]</sup>——这使得利润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维克塞尔把回报率称为自然利率。一些人节省开支并把它投入银行，或者是购买金融资产——债券，股票。但是大体上，储蓄者是被动的，他们乐意得到稳定的回报率。因此，银行固定了自己的借款利率，以保持利率稳定，不要经常改变它。但是，自然利率可能因为一项新发明或者一个新市场而突然升高。如果自然利率超过了借款利率，企业家就会受到激励去借款。这会导致出现新的工厂、商店或者铁路，而且会增加就业。这些特别的活动本身会在需求方面产生积极的效果，其他人将会发现，他们可以借钱和赚钱。这是一种将成为一种积累性动态过程的繁荣。经济不景气的情况完全相反，对于企业家来说，银行信用实在太贵，因为他们不能指望获得足够的回报，以支付借款的费用。商业并不开张，或者如果它们真的开张了，它们也会很快停工。破产开始上升，它们转面会进一步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活动。因此，周期是投资者/企业家与他们对于回报率的预期和保守的银行家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这些银行家在心中想稳当地固定利率。

维克塞尔的理论比在它之前的任何正统的经济学所提出的东西都更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在瓦尔拉斯的理论中，企业家为零收入而工作：慈善事业！但是，维克塞尔并没有解释，繁荣是怎样变为不景气的——也就是说，周期是怎样到达转折点的。

约瑟夫·熊彼特是奥地利学派比较独立的成员。他非常有自信，声称他要成为欧洲最好的骑士，最好的经济学家，或者是最好的情人。他在晚年承认，他实现了三个野心中的两个，但没有详细说明是哪两个。他是在30岁之前，写了自己的最有影响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sup>[6]</sup>这本书到1934年才翻译成英文，但他的论点已经广为人知。熊彼特熟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但是他也非常仔细地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的著作是马克思关于利润起源问题的谨慎而详细的回答。对于马克思的问题，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可以替代的答案：利润不是来自对劳动的剥削，而是来自创新。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

熊彼特远不只用创新来意指一种更好的捕鼠器。他的创新概念囊括了工业技术的新跃迁：18世纪80年代的蒸汽技术；19世纪30年代的铁路；19

世纪晚期的汽船和稍后的电力、钢铁和化学产品；20世纪早期的汽车和飞机。今天，我们会增加微芯片革命和因特网。它也包括像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之类的新交通线的开通，新大陆的发现，新的金融服务——支票和清算银行。多数的此类创新能够被科学或技术的发明所预见，但是，利用这些发明的商业机会只能被拥有洞察力和勃勃雄心的人士——企业家所捕捉。想到筹钱开发苏伊士运河的费迪南·德·莱塞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就是这样的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家，自然是开发计算机“视窗”系统的比尔·盖茨。

创新时常成群地一起出现，从而导致了产业革命。但是它们的出现只能是周期性的和不连续的，就像浪潮一样。一次创新的浪潮，会冲破旧有稳态经济的模式。先驱者会借钱，并开始自己的创新。他们会享受一种暂时的垄断，获得巨额利润（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因为在这种活动中，也存在着失败的可能）。这些创新能够把经济推向增长的轨道，经济增长期可持续20至25年。但是模仿者会很快跟上来，并侵吞企业家的超额利润。产出将成倍地增加，而价格会开始下跌，不言而喻，利润会随之下降。这样，一个经济衰落期将会出现，直到另一股创新浪潮拍打经济的堤岸，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总而言之，熊彼特认为一轮的创新浪潮能够持续50年，很像康德拉捷夫长波。

但是，创新同样具有破坏性。蒸汽动力的棉花纺纱，使家庭作坊纺纱变得多余；蒸汽动力在纺织方面的应用也是一样，这如同我们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中看到的。英国棉花纺织工业使那些产品变得如此便宜，以至于印度旧的手工生产方法被摧毁，这与欧洲国家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铁路的出现，使运河和马车成为多余。这是“创造性破坏的狂飙”。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大幅度跌落，产出扩大了，但是许多更老的商业毁灭了。

因此，资本主义是靠创新不断成长的，乘着一轮又一轮的创造性破坏的浪潮，利润迅速攀升，但接着，随着竞争的加剧，又开始回落到正常的低水平，直到另一波浪潮重新扬起。沿着这条道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既有跃迁，也有约束，原料可以从很远的地方以极低的价格运来，产品可以送至普通人的手中。进步发生了，但是也付出了摧毁旧技术和旧商业的代价。

因此，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的看法是辩证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如果你保护旧技术或是因担心损失而限制企业，你就不能创新和增长。他也承认增长和周期，承认利润率的起起落落。这恰似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资本主义的成就时所说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过于关注要证明市场会自动达到均衡——只要他们不考虑繁荣和破产的话。在用他们新的诡辩的价值理论给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提供支持方面，他们对于增长和不曾预期的结果的看法，都陷入了迷途。当他们优雅地证明——而且以后这种证明都是以越发精致的严格的数学方法进行的——市场可以“运行”以实现稳态的均衡时，自由主义的思想流派忘记了，市场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市场在资本主义中是到处存在的，但是它们是在一种动态的永远变化的不均衡的背景下运行的。经济学家的“市场”的目的是有效地配置资源。每个资本家的“市场”的目的是要赚取利润并且扩张商业——进行积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当利润被消除时，市场照样在运行。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将是灾难性的。不管市场是否运行，资本主义体制都汇合在了一个经济衰落期中，它必须是可获利的，也就是说，必须生产出足够的利润以使足够多的公司经营下去，以便提供就业和创造产出。

熊彼特把如下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了。最终，每个增长的波浪都会逐渐消失，到达一种稳定的状态，直到下一个波浪来临。在 50 年周期的康德拉捷夫长波之间，存在着马克思所谓的 10 年周期 [所谓朱格拉 (Juglar) 周期] 和更短的 3~4 年的周期 [所谓基钦 (Kitchin) 周期]。1931 年的经济大萧条符合所有三种周期类型。这是熊彼特的答案，但是对于经济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情况，他没有提出政策建议。在这里，他仍然是一位正统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sup>[7]</sup>

也存在着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大萧条远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现在需要的是要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健康的特性进行治疗。这样，要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按照它的常规去发展，而不要管它有多长的周期，也不要管它会带来多少不幸。周期是经济发展出现过度和不平衡的信号。繁荣是建立在投资者错误的乐观情绪之上的，这种情绪又被银行错误地加以助长，以至于投资的回报率不能支付信用的费用。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一位 30 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用《价格和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 一书俘虏了许多年轻的经济学者的想像力<sup>[8]</sup>，此书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次演讲的基础上完成的。哈耶克拓展了维克塞尔和米塞斯的洞识，认为繁荣是银行的信用扩张以较低的利率创造的。因而，这导致投资者从事于有较长还贷期的项目，所以资源开始从消费品生产转向投资品生产。这引起通货膨胀和



实际工资的料想不到的下降，导致生产者对得到更高工资和更多信用的需求，以继续他们已经着手的投资项目。如果允许项目得到完成，那么生产力就提高了，大量的消费品就可以利用，价格会再一次降下来。但是，典型的情况是，银行在投资项目未完成之前就已经陷入恐慌并紧缩信贷。然后，不景气就随之而来。项目未完成就被放弃了，而且所有这些资本都成了“不良投资”。答案是不要再为了完成项目而提供额外的信贷——使通货膨胀——而是要让经济从过度的信贷的后果中走出来，直到利率再次等同于自然利率——就是说，等同于可以赚到的利润。

哈耶克的理论实在令人振奋，因为他把银行信贷理论与“现实的”周期结合起来。他把英国和美国的整整一代学生引向了错综复杂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在他的演讲中，他使用了一些有趣的图表，展示了他高度抽象和严谨的风格。

年轻的保罗·斯威齐——美国后来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所以会从哈佛大学来到伦敦经济学院，他自己说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哈耶克拥有打开资本主义大门的钥匙”<sup>[9]</sup>。但是，哈耶克是一位旧式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在他的世界中，经济可以平静而稳定地发展，没有任何周期，只要市场被允许自然地运行，价格不被“扭曲”。正是因为银行家提供了太低的利率，才导致了需要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的经济繁荣。

哈耶克的理论无法提供一种治疗方案；事实上，他自己是反对任何快速治愈的。货币供给与银行信贷需要受到控制，以便它们既不引起通货膨胀也不引起繁荣。但是，即使是那个时候，哈耶克的整个哲学仍然是反对任何不是自然地来自市场力量之自由发挥的解决办法。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太严重了，以至于人们和政策制定者没有注意到他的严肃的忠告。在公众的心目中，哈耶克的地位也很快被凯恩斯取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才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凯恩斯用自己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完全改变了经济学。<sup>[10]</sup>当该书于1936年问世的时候，凯恩斯不仅没有使经济学革命化；他保持了它的声誉，实际上，是他使经济学变成一种在名声上可以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社会科学。如今，如果说经济学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需要的（甚至在人们拿他们开玩笑的时候也是如此），这还是要感谢凯恩斯。毕竟，凯恩斯给了人们希望：通过使用人类的理性和独创性，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市场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无论市场运行的结果可能是什么，都有可能做得

更好。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序言中，凯恩斯说道，他的著作是写给他的同行经济学家的。它不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它是一本困难的、写起很艰难却又为社会所需要的著作。书中的许多观点，自它出版之日起一直都在被争论，甚至在今天，争夺凯恩斯主义阵地的书籍和专论还在不断被人撰写。但是，其中大部分只能留给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就我现在的目的而言，注意到凯恩斯是怎样创立宏观经济学的就足够了。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世界经济脱节的一国经济的理论。凯恩斯非常关心英国的问题；他也同样重视向罗斯福提供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方案。但是，他选择对一种多少是封闭的经济进行了理论概括：同国际贸易或资本流动都不相干。对于“一国资本主义”而言，凯恩斯创造了调节和控制的工具。他找到的解决方案，既不是德国战时社会主义/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也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他的治疗方案并不需要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威权主义的控制，就像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所强制推行的那样。凯恩斯是自由政治秩序的天赐之物。他为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处方，以免国家陷入经济灾难。但是，作为代价，他要求放弃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

关于凯恩斯命题的最大的争论是（至今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如果听其自然，很可能以不充分就业的均衡而告终。这暗示着，充分就业并不是自动地受听其自然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保护的。经济可能会达到一种低于充分就业的就业水平，并维持在这个水平上。将会有人不愿意失业。这个命题与所有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是相冲突的，不管是基于劳动价值理论还是基于边际价值理论。至今，这个命题——自由市场将陷入不充分就业均衡之中，暗示着不愿意失业的可能性——仍然受到挑战。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如同我将在下面展现的那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这些命题，以便恢复凯恩斯曾经挑战过的自由经济理论 [好像是为了证实我关于凯恩斯仍然被争论的看法，在我第一次这样写之后，塞缪尔·布里顿 (Samuel Brittan) 又回到这个问题：《关于赞成还是反对凯恩斯遗产的辩论》<sup>[11]</sup>]

但是，50年来，凯恩斯一直在称雄——他不仅有理论，而且还有治疗方案。治疗方案就是政府出钱，以便提供最初的就业和支付收入。在注入了这笔最初的费用之后，会产生一个能够使收入和就业均相应增加的增殖过程。最初的政府开支可以通过追加的税收来补偿，而这部分税收来自新增收入。增殖过程依赖于凯恩斯所谓的心理学定律：消费与收入的比率小于1。



收入越高，比率越低。这样，人越富有，储蓄就越上涨。但是，消费是收入的稳定函数，政府也要依赖于它。私人投资对有关任何投资可能获得的未来利润率的预期变化，显得更不稳定和更敏感。如果投资者是乐观的，如果他们的“动物精神”是有扩张力的，那么经济甚至可以达到一种过度充分就业的状态。但是，如果投资者是悲观的，那么他们会延期投资。即使银行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会有所反应。因此，公共投资的角色，并不受利润率所驱动。公共投资缓和了储蓄和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表明，正统的经济理论的标准答案是无效的。如果存在失业，减少工资既是不可能的，看来也是不能奏效的。工人在工资方面拥有协议，不可能单方面减少他们的实际工资。（毕竟，实际工资在大萧条时期是上升的，因为当货币工资跌落时，价格跌落得更多。）而且，即使削减工资是可能的，那也只会导致需求的减少，因为较低的工资收入会使商业无利可图。也不可能裁减利率以复苏投资。商人更关心的是未来的利润率，利息成本是次要的。但是，对于利率能够降到何种程度也有某种极限，因为在困难的时候，如果利率不够高的话，人们会囤积现金，而且还会放弃他们对流动性的需求。这样，自由市场在每个阶段都会受阻，这在理论上是有令人信服的根本根据。

凯恩斯的理论使用了新的有效的测量国民收入、消费和投资的方法。他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平衡国民经济的账目方法，通过这样做，他也发现了提高收入和就业的方式。它不是一种不涉及商业周期的理论，而是一种只涉及经济能够达到的收入水平的决定因子的理论。它也培养了一批为数众多的专门经济学家，他们能够向政府提供如何实现高就业和高收入的建议。凯恩斯为世界增添了一种新的语言，一种与之配套的新语法。经济学的词汇表得到了改变，如同它的“行善”的名声得到改变一样。

凯恩斯的时间安排是完美的。他在大萧条时期一直在从事政策评估，并且提醒人们他拥有一种提出这些建设的新理论。他对萧伯纳说，他感觉自己的新理论很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彻底革命的。但是，1936年《通论》的出版导致了痛苦的争论，老一辈的人们对于他的主张的有效性心存疑虑，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则囫圇吞枣，全盘接受。为了回答他的批评者，他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战斗。这其中包括与一些瑞典经济学家的斗争，他们曾经实践过他所鼓吹的东西，甚至还推进了不相类的理论。经济恢复从1931年的最低点一直蹒跚到1937年。这证明了凯恩斯的论点，也就是说，尽管美国和英

国的失业率仍然保持在10%，经济本身也不能使它上升到充分就业状态，事实上是在下降。正统的平衡预算不得不被抛弃。甚至罗斯福也准备于1937年接受这种激进的路线。凯恩斯积极地鼓励英国政府借钱用于重整军备，并指出经济复兴本身就需要支出。他已经给政府一个完美的理由做他们所爱做的，但是政府害怕这样做：为公共开支而借款。尽管他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预算应该实现周期平衡——不景气时是赤字，繁荣时是剩余。他很愿意政府借款，只要利率，即借款的成本在降低的话。这要求对于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如果以这种控制为前提，储蓄者就不会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而把自己的储蓄出口到海外，投资者也可以不再到国外借款。凯恩斯利用了非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他最希望经济能够与资本流动绝缘，因为这样可以使政府管理经济的任务更容易完成。<sup>[12]</sup>

1914—1918年战争之后出现的各民族国家，可以被恰当地定义为“领土性社会国家”。<sup>[13]</sup>因为在1918之后的20年中，它们已不能兑现关照市民经济福利的承诺。它们的政治议程否决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僭越。资本主义的低迷将这种国家挤压得更加难受。一些国家，像德国，在一种威权主义政府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带有某种有计划和进行调控的资本主义的翻版的色彩。凯恩斯给予国家以新的工具，以便它可以不通过计划或实际控制而管理资本主义，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憎恶这些计划或控制。通过控制税收和支出，维持较低利率，切断经济与资本流动的联系，民主国家就可以赢得实惠。这是一种神奇的解决方案，而且在其后的40年中，它起的作用简直像梦一样。

一般认为，凯恩斯对于马克思的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但与熊彼特不同，凯恩斯并不怎么尊敬马克思，而且认为他的经济学华而不实。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凯恩斯发展了一个基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失业储备军不仅对资本积累不必要，而且肯定是有害的。如果缺乏有效需求，只要政府准备干预并增加这种需求，高水平的就业和高利润同时存在的现象是可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凯恩斯提出了一个问题。<sup>[14]</sup>当《通论》出版的时候，代表第三国际的人民阵线的策略是，要求共产主义者应该对之采取肯定和合作的态度，因为他们要培养“进步力量”。当凯恩斯对失业的挑战作出回答的时候，他得到了“进步力量”的爱戴。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赞美与批评两者之间摇摆，赞美凯恩斯，是因为他维护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危机趋势的洞识，批评凯恩斯，是因为他蛊惑人民，说什么通过通货膨胀性的金融

财政能够创造就业岗位。这种双重的既拥抱又拒绝的模式一直被持续着，只要凯恩斯主义还称雄于天下的话。

当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如果还存在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就会存在一种更细微的研究方法。凯恩斯指出了马克思所谓的“实现问题”<sup>①</sup>的重要意义：商品不单单由劳动生产——因为要转换剩余价值，等等——它还必须被出售，剩余价值必须作为利润来“实现”。如果不出售商品，剩余价值只是想像的，是没有实现的。因而对于劳动的剥削就是空的。用本书第 5 章的说法，就是， $C'$  必须变成  $M'$ 。但是，马克思像他一直批评的所有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在他的模型中，公共支出并不起作用。他的资本主义完全是私人部门的。凯恩斯并不是把公共工程作为医治失业的药方的第一人。然而，他是构建有关产出总水平的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其中，由于政府支出，产出总水平可能高也可能低。

那时，罗莎·卢森堡还没有出现在斯大林的优秀著作中，因此，没有人能够把凯恩斯的理论与卢森堡的第三部类相联系。可以回忆一下，卢森堡认为一个由政府税收支付的军备部门，可以解决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的“实现问题”。凯恩斯对政府支出的推崇，以及在 1937—1938 年也对政府重整军备的鼓励，完全适合于卢森堡的模型。当然，第三部类不一定必须是军备，它可以是任何一个不与第一部类产品的过度供给相竞争的东西。一位波兰的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 (Michal Kalecki)，他熟悉马克思和卢森堡的著作，曾经独立地提出了一个与凯恩斯相类似的模型。他的方程式是对于马克思—卢森堡模型的反映。

但是另一方面，凯恩斯远远超越了所有的这些。在所有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中，你要么消费，要么储蓄。如果你消费，你购买的是消费品（第二部类）。如果你储蓄，你就被假定会自动地去投资——购买第一部类的商品。凯恩斯发现，在货币经济中，你还有第三种选择。你可以以现金的形式持有你的储蓄，如同一笔银行的多余存款，或者并不把它花掉。只有当企业家有信贷需求时，银行才转而把钱拿出来。如果动物的精神像是老鼠的精神而并非老虎的精神，那么就不会存在信贷需求。如果人们想持有保持利息的存款，那么较低的利率是不会有什麼帮助的，确实，它们也不能再被降低。

---

<sup>①</sup> 原文为 the realization problem，是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资本论》所有的三卷，我们就会发现，对货币经济——一种这样的经济，在那里要求有货币处理债务，而其他要求和易货贸易都是不够的——为什么能够导致买和卖之间的差额，马克思有类似的洞识。在货币经济中，如果你出售什么，你就可以获取货币。在易货贸易经济中，每一次出售就是一次购买。正如我在上面所解释的，在1870年和1920年之间建立的一般均衡的优雅理论，是一种关于易货贸易的理论，在那里货币不起任何作用。不只是马克思，也包括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都有类似的保留。毕竟，这是个常识——尽管可能对该经济理论加以验证。

经济学家并不崇敬常识。一个理论所说明的机制，在他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事物可以在实践中而不需要按别的方式就可以运行——之前，对他们来说，事物就已经在其理论中运行。然而，凯恩斯主张的是，这种理论用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正统理论家所熟悉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完备的论证。他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是一个关键——他的理论的三个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支柱是消费/收入关系的心理定律和投资者对未来利润率的预期。人们比较喜欢持有现金；流动性是他们的首选，如果不提供奖励——利率——他们就不会放弃这种喜好。因此，利率不能平衡储蓄和投资，就像旧理论所认为的。利率是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于是，货币经济与以易货贸易为基础的经济，遵从着不同的规则。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在他的《通论》中处于防御状态。许多人觉得政府支出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最重要和最具有实践价值的部分。有关流动性偏好的理论装饰是无要紧要的。凯恩斯担心，会出现储蓄过度，但是流动性偏好可以阻止利率降低水平，甚至降到零。从战后的岁月来看，这种担心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看来没有人注意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足够的对于就业的调控。但是凯恩斯也小看了货币供应的重要性。对于一般均衡，一种免除货币的商品交换——供给和需求——取决于所有商品的相对价格；总货币的供给，通过货币数量理论，固定了价格的绝对水平。这样，易货贸易的比率，比如说，20只羊合1头牛，可以由一般均衡模型决定，但是一只羊的价格为10美元而一头牛的价格为200美元，则是由总的货币供应来决定的。如果货币供应增加一倍，那么20:1的羊/牛的比率不会受到影响。这就是“现实”的经济。但是绝对价格会加倍；羊会值20美元，牛值400美元。如果你增加货币供应，价格就会上升。因此，在正统的理论中，通货膨胀——价格的上升——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对通货膨胀比反对失业——他们认为失业只是偶然现象——要坚决得多。

到1936年，英国将近15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1924—1936年是一个价格稳定的或者下跌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1923）到处出现的通货膨胀的震荡，德国是出现在1919—1924年，是不能被正统的经济学家忘记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本书第10章中所提到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在1933年1月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发出的警告。凯恩斯看来并没有对通货膨胀表现出过度的担心。《通论》确实有一章（第21章）是讨论价格水平的，但是在将他的理论转换成一部处方式的著作时，凯恩斯忽略了通货膨胀，正如他忽略了货币供应。凯恩斯之所以不看重货币政策，是因为他认为，它根本不能有如此快速的行动，以至于可以治愈失业之病——如果它还有一些效果的话。

凯恩斯不是通货膨胀论者，这不同于后来他被描绘的那个样子。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如何支付战争》（*How to Pay for the War*）<sup>[15]</sup>，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运用《通论》的逻辑展示了如何在战争期间避免通货膨胀。但是，忽略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成了1945年之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特征。它对于公共债务的规模也保持着类似的冷淡。据说，公共债务，绝大部分为公众持有，很少一部分为债权人——食利者持有。因此，除了把收入从纳税人分配给食利者之外，发行公债不会有任何后果。只要利率可以保持较低水平，而且货币供给是充足的，债务对于凯恩斯主义者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或许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些问题又回来打搅凯恩斯主义者，但是，能够引发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攻击的最主要的主张，恰恰也是它最成功的主张——充分就业对工资需求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对持续的充分就业问题的担心，是件痛苦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还有米哈尔·卡莱斯基——看到了危险。当然，凯恩斯在《如何支付战争》中而非在《通论》中，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如果就业增加，或迟或早实际工资将会增加。因而将会出现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那时工资的上升会造成利润率减少。工资所占份额将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以至于足以侵蚀利润率的份额。利润的幅度——利润的量，像马克思所说的——将会很高，因为总收入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将会很高。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7部分已经指出的，资本家将不得不做某些事情以恢复盈利能力——利润率。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20年的充分就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资本家确实做了某些事情：他们跑到国外寻找更高的

利润。

但是再一次，我要回到我前面的故事。凯恩斯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药方，建构了一种“新经济学”。<sup>[16]</sup>用“诺贝尔奖”获得者（我的老师）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的一本书的标题来说，这是《凯恩斯革命》。<sup>[17]</sup>资本主义在它最坏的年代存活下来。曾几何时，它得到了重整军备和战争的援救。但是，凯恩斯给它在非集权主义背景下的和平发展开了一个处方。资本主义再也不会面对类似的崩溃了。资本主义再也不会像有人所说的处于最后的危机之中。列宁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失败了——尽管很少有人能够从中看到这一点，这要感谢 1941 年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

#### [注释]

[1] 技术官僚一词的提出，应归功于……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国际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

[2] Ludwig von Mises (1923), *Socialism*. 完整的参考书目，见本书第 12 章的注释。

[3] *Ibid.*, p. 51.

[4] 关于维克塞尔，见 Erik Lundberg (1996), *The Development of Swedish and Keynesian Macroeconomic Theory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5] 哈耶克把利润率更名为自然利率的说法，见 Hayek,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6] Joseph A. Schumpeter (1913/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7] 熊彼特试图从经验上证明自己的理论，但是到 1939 年他出版两卷本的研究商业周期的著作时，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问世，而经济学家们也失去了对于这个旧话题的兴趣：Joseph A. Schumpeter (1939), *Business Cycles*, 2 vols, McGraw-Hill, New York.

[8] Friedrich von Hayek (1931), *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5 年修订和扩充后的第 1 版，Routledge, London.

[9] 保罗·斯威齐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的纪念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教授的大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10] J. M. Keynes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London.



[11] Samuel Brittan, "Voices in the Air", *Financial Times*, 2 September 1999.

[12] 凯恩斯在写作《通论》期间的活动详情, 见 Robert Skidelsky (1992),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2, Macmillan, London.

[13] "领土性社会国家"的表达方式, 来自 Harris, *The New Untouchables*.

[14]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凯恩斯的态度, 见 Paul Mattick (1969), *Marx and Keynes; The Limits of Mixed Economy*, Merlin Press, London.

[15] J. M. Keynes (1940), *How to Pay for the War*, Macmillan, London, 再版为 J. M. Keynes (1972),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ume 9, Essays in Persuasion*, Macmillan, London.

*Essays in Persuasion* 的原版出版于 1931 年。这是一个修订过的和扩充的有关文集的版本。

[16] Seymour E. Harris (ed.) (1952), *The New Economics: Keynes's Influence on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Alfred Knopf, New York.

[17] Lawrence R. Klein (1947),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Macmillan, New York.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12 章 社会主义能运行吗？

奥地利，相对于它的领土面积，对 20 世纪的精神生活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布斯堡帝国被罗伯特·穆齐尔（Robert·Musil）嘲笑为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中的橄榄色的鸚鵡。但是，如果有人把奥匈帝国看作衰败者，另一些人则会在那里看到了艺术和哲学活动的繁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现时代都留下了他们的烙印。因为这些思想的存在，维也纳成为继续塑造我们生活的动力之源。

因此，毫不奇怪，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最重要和最广泛的争论会发生在奥地利。这应该归因于维



也纳生机勃勃的精神生活，同样也应该归因于那里的现实生活事件——物质环境，人们可能会这样说。在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许多欧洲革命中，奥地利是惟一一个发生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姊妹党，但是它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远远没有自己的德国伙伴那样教条。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奥托·鲍尔（Otto Bauer），时常在尤金·冯·柏姆-巴维克主持的官气十足的研讨会上发表他的看法，巴维克则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教鞭”。就是在这样一个研讨会上，卡尔·门格斯的边际主义理论得到了讨论和发展。在不同的时候，罗莎·卢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都参加过这样的研讨会。

边际主义理论是从三个中心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威廉·史坦利·杰文斯在英国，利昂·瓦尔拉斯在法国，卡尔·门格斯在奥地利——他们在1870年左右，先后提出了与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相提并论的替代性学说。大约10年之前，就已经有过几位这方面探索的先驱，瓦尔拉斯是其中的开创者之一。但是，边际主义革命使经济理论变得更加具有分析性，并且更加坚实地建立在个人行为的基础之上。它的主要观点就是，交换价值可由使用价值来说明，只不过是有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加以说明。个体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是如此地支配他们的资源，以至于他们会用自己愿意支付的价格（交换价值）来平衡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是指从所消费商品的额外单位中派生的效用（使用价值）。拥有的某种商品越多，来自所消费额外单位的效用就越低。因此，每个消费者——假定价格是既定的——只有在边际效用与价格相平衡的时候才愿意去消费。当然，不同的消费者往往消费不同的数量，因为他们的偏好是不同的，他们的收入也不相同。

在生产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生产者通过使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边际收入是指出售一个以上单位所获得的额外收入，边际成本则是指生产该单位的额外成本。对于每个消费者和每个生产者来说，产品的价格是既定的，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尽管这些价格是他们各种不同的购买与出售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被决定。更有甚者，瓦尔拉斯表明，所有的市场都可以同时获利。这里存在着一般均衡。

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与边际主义（后来被英国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称为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战场。然而，它们对自我组织、自我均衡的市场有着共同的看法。马克思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他预言，这种自我组织可能受到周期和危机的困

扰。但是从本质上说，随着资本主义体制再生产出自身，这种分析只是对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的旧话重提。隐藏在我们经济活动下面的结构性的互相依赖，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它依然待在那里，丝毫不减。我们不会有意识地计算边际效用，至多是商业关心边际成本。但是，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却像我们设计好了一样地执行着自己的功能。其结果是，一种自我推进的体制能够在没有——或实际上因为缺少——国家任何干涉的情况下，或者在没有任何对劳动或资本的垄断的条件下，生产出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

对于那些试图介入这项工作的人来说，经济学总是令人困惑和阻碍重重的。一方面，经济学家会谈到日常的生活活动——购物、销售、工作和储蓄。然而，他们是在一个否认现实的假设和推论的框架中谈论这些的。没有任何经验的证据可以证明所谓的效用、边际或另外一个经济存在。经济学家觉得没有必要去鉴别它，测量它，或者询问心理学家计算人们的行为是否有意义。令他们高兴的是，效用以及对它的数学处理，令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价格形成的理论。他们的研究方式往往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带有轶闻性而不具有实验性。然而，它对理解经济生活的看似复杂和混乱的本质却是非常有效的。

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面临着同样商品和服务的丰富陈列，决定购买商品或进行工作，决定改变职业——甚至有人会说，决定去诈骗和犯罪。所有这些都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简单框架加以解释，并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阶级、阶层或者文化如何，他们购买的是什么，出售的又是什么等方面的事情。为了要激怒读者，经济学家使用图表或者使用微积分来完成所有这些。

边际主义的确导致了扩张性的经济学的数学化。经济学家们通过赞美自己的抽象化的个人主义研究方法，击退历史学家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家。然而，他们的精细理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基础：假定在各种替代方案中有一种选择，有一种可以阻止完全拥有它的资源约束，人们便会节约。人们会敏感而理性地作出选择，以使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实现效益最大化。当价格改变或当他们的偏好改变时，他们会使某种东西去适应和替代另一种东西。如果这样，最好的结果将会出现——对个体与对社会都是如此。

这种经济学推理的先验的结构，不但省略了任何历史的、社会学的或政治上的细节，而且也保持着意识形态上的相对中立性。它的先驱者之一瓦尔拉斯，是一个终身都对合作社感兴趣的社会主义者。英国方面的分支——正



如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阿瑟·塞西尔·庇古的剑桥学派之下所发展的——是赞同在有选择的条件下进行温和的干预。这是卡尔·门格勒的奥地利学派的翻版，它以最大的热情支持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数学练习，对于维也纳经济学派来说，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哲学。

这种哲学的信念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受垄断和企业联合的阻碍，不受工会和爱管闲事的官僚的干预，并且由那种能够维持低税率和预算平衡、遵守金本位制的健全政治家来管理，那么对所有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来说，都是和平与福利的最好保障。任何一种试图比市场做得更好的尝试——减轻贫困，增加就业，通过课税提供社会保障，或者以任何方式抑制私人财产权——不仅会失败，而且会产生与其意图相反的效果。穷人会依旧贫穷，甚至更穷，就业机会将会收缩而不是扩展，社会保障的提供会使人们变得软弱无力，不能照料他们自己。让善行由市场来做吧，市场行善是不存在首要目标的，惟一的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和效用的最大化。

延伸到国际关系方面，这种哲学赞同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秩序。每个人都能够从市场中获利，不论种族、宗教、性别、阶级或社会地位。没有人应该被假定不能行使理性的行为。持续的非理性的行为，只能由外部的非经济的约束引起，这种约束主要是政治的主管当局强加的。这是应该得到广泛赞同的普遍主义的信条。

对这套观念的挑战来自奥托·纽兰思。<sup>[1]</sup>纽兰思在德国历史学派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以对抗门格勒和边际主义者。他研究了古典时代的经济史，研究了古代关于贸易、商业和农业的经济思想。他写了两部专题论文而不是一部——这是他一生的典型特征——在这两部专题论文中，他一边研究经济，一边研究哲学。他既是奥地利革命的一名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一个官僚。他曾编辑过一部德国文学经典，并且亲自为其写了一个长达500页的引言，等等。纽兰思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关键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按照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的原则来运行。金钱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当和不平等，因为以金钱表现的价格扭曲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德国所采取的战时计划使他感到震惊（这确实像列宁感到的一样），在直接的、不以价格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实验。战争赋予生产力（使用价值）而不是利润率（交换价值）以首要地位。这样，货币交换才可以被易货贸易所取代。

在奥地利革命期间，纽兰思进一步发展这一观点。这场革命在第一次世



世界大战点燃的革命中是独一无二的，它导致了社会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掌握了政权。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拒绝思索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的细节，因为马克思并不鼓励这种乌托邦式的思索。纽兰思是一个并没有听从这种忠告的人。他开始着手设计一种经济计划，它与实现利润最大化无关，而是与实现幸福最大化有关：“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个别企业的目的……幸福最大化，共同体中享受生活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sup>[2]</sup>

但是，幸福是难以衡量的，其难度并不亚于效用。因而，纽兰思开创了一种衡量生活水平的方法。他采纳了许多如今已为经济学家们所熟悉的变量，比如营养、健康、生活预期、住房、衣服和犯罪的方式。他也关心以一种惟一尺度把这些变量聚合在一起。而这一变量的水平和分配，也是社会主义的计划者要关心的。纽兰思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的计划。在那里必须有一个中央经济管理部，由一个下属的计算中心提供帮助。这个中心将把生活标准作为一种“普通的统计数据”来计算，并模拟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就像用这些统计数据测量他们所生产的总产出一样。[现在我们有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且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计算这些数据的统计部门。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一种在国际上具有可比性的衡量方法，它把生活预期、教育和收入都组合在一起。纽兰思的工作要领先于他的时代几十年。]

还需要其他的机构，可用来使生产合理化，并以增加“经济效率、工人的绩效和他们的健康及福利”，也可用来为地区的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服务和协调管理。一旦货币被废除，银行将成为生产设备的分配中心。生产决策要由工厂会议作出，在会议上，工人像家庭主妇一样就座（像是消费者的代表）。然后是地方的、地区的和联邦的会议，在那里这些决策将得到协调，还需要雇用各个层次的科学专家——营养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

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在于它的非货币的性质。正像纽兰思在1923年一篇文章中所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一个经理或生产者——社会——它在经济计划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并形成一定的生活标准，不需要计算损失或利润，也不需要以货币流通作为基础，如果它不采用铸币或劳动的形式。”<sup>[3]</sup>这样，那里就没有市场，没有购买和销售，只存在按照科学计算的感性需求对所有产品进行的直接分配。生产决策服从于民主控制，货币或利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起任何作用。在巴伐利亚革命和接下来的奥地利革



命的短暂生命中，纽兰思迫切希望实现他的某些理想，但是，它们最终仍然是一个纯粹的蓝图。

尽管它们没有落实，但是纽兰思的理想还是受到了他同时代的反社会主义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维也纳经济学家的认真对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1923年出版了《社会主义：一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一书，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专门论述到纽兰思。<sup>[4]</sup>米塞斯提出了“自然核算”的问题——以直接配置为基础的非货币交换。他认为，这种非货币交换将导致无效率和不合理。他说，这可以借助已经发展的经济学加以证明：“只有通过以货币使用为基础的经济核算所固有的合理化，人类精神才能理解和跟踪行动的规律。”<sup>[5]</sup>

米塞斯的攻击是非常彻底的。他的论点的本质是，直接计算使用价值既不可能也不合理。交换价值，正如在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所决定的货币价格中所反映的，是能够存在的衡量使用价值的最好尺度。消费者的偏好，工人的技能，各种各样的不同投入，都存在着无穷的变化，而要获得所有适当的易货贸易的价格，已经超出了人们的能力。为了最终消费，即使你可以对消费产品进行易货贸易的计算，要是没有市场的存在，你还是不能对资本产品进行易货贸易的计算：“在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财产权的分配以某种方式影响着精神方面的劳动分工，否则，不论是经济还是系统的生产，都是不可能的。”<sup>[6]</sup>

因此，当在两种不同的生产过程之间进行选择时——例如，大型主机电脑被个人电脑所取代——不可能进行自然的易货贸易方面的计算，以确定它们被交换的比率。社会主义经济可能坚持旧的方法，而不愿尝试新的方法，因为不允许有任何冒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因为新的生产过程中有企业家风险资本存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破产。一个人可以想像一种不变的稳定的经济，在这个经济中，所有易货贸易的比率最终都是可以实现的，但这只是一种虚构而已。没有任何真正的经济能够对变化拥有免疫功能。

与其认为米塞斯解决了在两次战争期间一直持续的争论，不如说他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哈耶克从米塞斯的手中接过了指挥棒，并在他于1931年到达伦敦经济学院之后，安排要把米塞斯的书译成英文。他也编辑和撰写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文集，即《集体经济计划》(*Collective Economic Planning*)，副标题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之批判性研究。”<sup>[7]</sup>共是四

篇文章，一篇是荷兰人皮尔逊（Pierson）的，一篇是德国人哈尔姆（Halm）的，一篇是奥地利人米塞斯的，再一篇是意大利人巴伦的，哈耶克把这四位经济学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并写了序言和结论。这是一个激烈辩论可供选择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时期，这种资本主义已经明显地失败了，因为世界仍然遭受着1931年大萧条的后续影响。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实验正在苏联进行，显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国家社会主义者自身已经效忠于控制市场体制以创造就业。罗斯福已经开始着手新政。政府到处都在放弃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的正统学说。从整个世界看来已经为社会主义作好准备。

奥地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发起的有关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辩论，导致了一个与他们的意图有所不同的结果。问题在于，自由主义者所使用的主要武器，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在社会主义的——或者，实际上是任何的——经济中，价格核算的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展示，这要感谢瓦尔拉斯的工作。恩里科·巴伦的确已经领先于米塞斯（尽管米塞斯并不知道这些），并在1908年他的文章《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门》中展示了这一问题。<sup>[8]</sup>在这里，社会主义经济被展示为一系列有关消费品、现存资本和新资本的需求和生产的方程式。我们知道（这要感谢瓦尔拉斯），市场能够解决这些方程式。但是，中央计划制定者怎么可能模拟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工人和生产者的独立行为呢？

在提出这一问题的这方面，存在着一个巧妙的但却是——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灾难性的重心转移，从而离开了米塞斯对财产权和在动态经济中冒险的关注。这一问题变成不是推动实际的经济运作，而是解决计算机问题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种讽刺——跨越了米塞斯。所有瓦尔拉斯的需求与供给的方程都是从货币中抽象出来的。事实上，货币在瓦尔拉斯的方程系统中所起的惟一作用，只是一个计算单位——就是说，表示10双鞋等于1台冰箱的交换价值，你可以说1双鞋子值30美元，1台冰箱值300美元。但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实际模拟的，是关于易货贸易的巨额计算——非货币的交换。所有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和历史的特征，都被排除在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数学计算的过程之外。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计划部门真的能够像市场事实上所做的那样，可以解决数以万计的方程式吗？瓦尔拉斯的经济学已经消除了人的行动，因为消费者可以用他们的方程来代表，生产者也同样如此。这些方程所模拟的经济，无论如何是一种稳态的经济，因为在一般均衡理论的这一阶段还没有

引入动力学。这些方程意味着用来反映每天，或者甚至每小时，要对被市场这只隐藏的手操纵的价格进行计算。自由、财产权、风险承受能力和企业家精神这些更大的问题，已经被作为对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必要的——如果说不是不相关的思考而被搁置一旁。

对于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回答来自美国。一个著名的资源经济学家——F. M. 泰勒，他绝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在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致辞中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他的方法是以经济学家作为科学家的身份进行“价值中立”（value-free）的探讨。在一个优雅的数学上的致命一击中——这是由波兰出生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完成的——泰勒的主张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兰格—泰勒（Lange-Taylor）对于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解决，变成了对于自由主义进攻的答复。<sup>[9]</sup>在他1929年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生产指导》中，泰勒提出了我在上面的段落中已经谈到的观察情况。如果你能记录一个方程系统中的所有信息——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代表计划者应承担关于消费者偏好、技术投入/产出的组合、自然资源的供给等方面的所有知识——那么计划者的任务就是解方程。总结所有的争论，哈耶克评论道：

现在必须承认，在某种意义上，逻辑上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以这种程序来决定价格，在逻辑上是可以想像的，但无论如何会使认为它是不可能解决的这一论点归于无效，它只是证明，问题的实质并没有被感知。惟一需要的，就是要尝试想像这个方法的应用所暗示的东西，以便把它作为人类不能实施和不可能东西排除在外……实际上，这里有关的东西不是这个系统的正式结构，而是所需要的有关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数量，如果一定要尝试数字的解决方案以及在任何现代社区中必须涉及这种数字的解决方案面临任务的范围的话。<sup>[10]</sup>

这种对无数的数字计算的不现实性的强调，证明是哈耶克的一个战术上的错误。虽然他谈到了几个其他的令人信服的事情，但是，可计算性问题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奥斯卡·兰格是最好的经济理论家之一，而且多少有点像瓦尔拉斯在一般均衡方面具有某种权威性。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回到波兰，在各种不同的波兰政府高级职位上任职）。兰格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设计，打破了实用性的僵局。

关于社会主义核算的所有辩论，已经假定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会演变成社会主义经济。这将涉及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但是不包括消费者选择以及职业选择的实质自由。这样，一个人可以完好无损地离开劳动市场和消费品市场——资本商品的市场却被排除了。因此，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在苏联面临的——在一个落后经济中进行发展和原始积聚的问题。它也不同于纽兰思提出的问题，因为一些价格可以被允许存在。这不是战时社会主义，这是市场社会主义。

兰格是通过这样的提议解决这一计算问题的，他认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可以采用现存的价格开始进行计算。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明显是均衡价格。所有的计划者必须从那时起，随着新的信息变得可以利用而开始调高或调低价格。因此，并不需要聚集所有的信息，因为现存的价格已经对它做了概述。这是瓦尔拉斯理论的一个毫不含糊的原则，而且保留了有效市场理论的一项核心假定。所以，市场均衡理论适用于推翻或战胜资本主义的秩序！

兰格进一步指出，中央计划者也不需要作出所有的生产决策。最需要做的点，就是命令单个生产单位的经理去模拟利润最大化的准则——让既定的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利润会走向社会，但是生产应该具有市场意义上的效率。社会主义不仅不是非理性的或不现实的；而且它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的逻辑是完全兼容的。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认为，由于收入分配会更加平等，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的一些缺点，将会被社会主义所排除。你需要社会主义，以观察瓦尔拉斯实际上是如何工作的。这样，从奥托·纽兰思完全拒绝市场价格出发，社会主义者已经如此成功地转移了辩论，以至于市场价格变成了社会主义的优点，而不是需要避免的东西。市场核算在计划经济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喜欢市场社会主义，但是，兰格—泰勒解答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把某种谬论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中排除出去。它并不是通过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日常运作设计一个真实的管理蓝图来做到这点，就像纽兰思已经试着去做的那样；这个解答也不从根本上对货币、价格或市场的角色提出挑战。由于瓦尔拉斯和他的信徒已经把有着无数问题的现实经济简化为一组方程，并假定所有的困难都不存在，因此，现实主义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需要斗争的基础。1940年，在兰格—泰勒的著作〔包括英国经济学家 H. D. 迪金森 (H. D. Dickinson) 的一本书<sup>[11]</sup>〕出版时，哈耶克试图



耐心地指出，这个“解答”没有解决任何现实生活中的难题。举例来说，商品按预期生产并被送到销售架上，就可以被认为具有供给与需求曲线。但是大的、体积庞大的产品——轮船、大型机器——是按预定生产的，并没有需求或供给曲线。而且，他还指出，那种认为工厂经理应该把价格视为“既定”的说法，并没有澄清，他们会保持多长时间的“既定”。因而，瓦尔拉斯系统并没有深入研究这种涉及事实真相的本质问题。正是数学经济学中现实主义的缺乏，曾被作为边际主义学派成就的顶峰欢呼过，这反倒证明了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是无效的。

问题是瓦尔拉斯模型与任何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任何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变化和不确定是常有的，始终存在着冒险者和破产，始终存在着新产品和新程序的试验。瓦尔拉斯并没有对这个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进行理论概括，奥地利学派也没有提供一个替代方案。门格尔与瓦尔拉斯存在着真正的哲学分歧，但是在庆祝新理论击败劳动价值论时，这些分歧被放到了一边。当马克思采纳李嘉图的竞争性均衡（competitive equilibrium）理论时（用不同的术语进行装扮），他落入了一个相似的圈套。因此，他对非均衡的动态性洞察，就这样闲散地停留在价格和价值的均衡微积分（equilibrium calculus）附近。观念，尤其是不切实际观念，在经济学的世界能够具有强大的真实后果。

很难夸大兰格的解答对于社会主义核算争论所造成的冲击。他的文章出现在193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该书也再版了泰勒的评论文章。<sup>[12]</sup>这一问题很快被认为得到了解决。在这之前，凯恩斯的《通论》已经出版，使哈耶克和许多其他自由秩序的拥护者处于守势。世界正在走向另一场战争。按照那时的理论，有关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辩论，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赢得了胜利。1945之后，当社会主义再次成为可能性的时候，有关社会主义核算的非实践性或不合理性就不能作为一种反对意义被提出了。对于所有拥护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的那些人来说，兰格—泰勒的市场社会主义就是答案。对于英国工党的新鲜血液——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埃文·德宾（Evan Durbin）、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和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来说，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他们理想的解决方法，如果他们能够推行它的话。人们可以在整个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中收集到同样的信息。

这场辩论以某种痛苦的方式证明，人类行为的这种无意识的结果是一所

自由主义哲学家偏好的救贫院。但是，如果以60年代的后见之明以及站在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崩溃（见本书第17、18章）的另一面来看问题，浏览一下这场争论还是很值的，它有助于我们发现社会主义的低效率到底是在哪里。哈耶克甚至在兰格的回应出版之前，就立刻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者的经济问题提错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提错了。然而，在另一个50年中，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洞识也被忽略了。

哈耶克1936年11月在伦敦经济协会的讲演，于1937年2月以“经济学家与知识”（Economists and Knowledge）为题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刊物《经济》<sup>[13]</sup>上发表。毫不夸张地说，这是20世纪写出的最具创新性的经济学文章之一。的确，它是如此具有创新性，以至于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受到欣赏。即使在今天，它的洞识还没有完全被经济学家所领悟。哈耶克强调，当经济学家理解劳动分工的重要性的时候——这从亚当·斯密时代以来就已经开始，他们没有意识到，知识的分化对于经济生活更是至关重要。瓦尔拉斯的理论通常假定，消费者拥有他们能够从中选择的所有商品价格的完备知识。生产者在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也知道全套的可替代的技术以及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对聚集这些知识的成本没有给予说明；实际上，市场的全部要点是，它在这些信息中实现了节约。

有关技术、偏好和技能的知识被分散给个人。每个人都知道，而且的确需要知道他自己的环境和当地的“近邻”。没有人能够知道一切。信息在持续地变化着，而且这些变化在当地的水平上可以被个人所感知。在这些分散的知识丛之间存在着非常微弱的联系——在知识的当地的“近邻”中，存在着某些轻微的重叠。

人们并不需要知道太多别的信息，因为所有这类信息都是以价格来标明的。人们以一种彼此并不协调的方式分别行动或者单个行动。相互协调的工作由市场来执行，价格具有远程传递的特性。人们可以在自己具有的当前知识的“近邻”范围之内，寻找更好的价位，人们可以从浏览价格中获得信息并作出调整。在最合适的交易达成之前，人们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从事大量的摸索。但是接着新的信息会又一次进来。这里不存在平衡——没有休息的地方，就像在稳态的经济模型中那样。这种由更多消费者永远不停地寻找更好价格或更好产品的图景，同瓦尔拉斯经济学中建立完全市场模型的方式恰好形成对比。哈耶克谈到：



在一个完全的市场中，每一个事件很快被所有的成员所知道。这里必须记住，完全市场是满足均衡分析的假设所必需的，它必须不能被限制在一个独特的由所有个别商品组成的市场中；整个经济的系统必须被假定为一个完全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每个人知道任何事情。因而，完全市场的假定至少意味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即使他们不被假定为无所不知，至少也会被假定自动知道所有一切与他们的决策有关的信息。这看来好像是，这个放在我们食橱中的骨架，这个“经济人”，被我们通过祈祷和禁食（用来驱邪），已经以半无所不知的个人的形式通过后门回来了。<sup>[14]</sup>

因此，许多关于均衡的理论模型都是一种同义反复，不仅提出了知识的实用性的过分要求，而且认为获得知识是件容易的事情。所有的理论模型都作出了否定现实的假定，而且这些假定即使在哈耶克的范畴体系看起来也是偏激的。一个较为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个人能够利用他所拥有的相关知识，作出最好的选择（也就是最优化）。随着他们从经验得知——从自己的偏好或其他有关事件中得知——他们所知道的与客观事实并不符合，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于与知识相关的均衡，每个位置都是一把小小的利刃。然而，变化继续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从来不曾处于均衡状态之中，因为它从来没有平息过。

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这看起来好像是常识。毕竟，当你去购物的时候，你有一个购物单，列出你想要买的东西；你去到一家超市自选市场，并一次性把东西买齐全。你可能从来不在意，如果你走遍所有的商店，你就会发现，一些商店的某些商品的价格比其他商店的更低。你并不清楚这样将会节省你的时间。你购买的是你想要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对于比较昂贵的买得少的项目——比如说房子——你将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搜寻，但是你并不操心所有地段的所有房子的价格，不仅不用操心今天所有地段的所有房子的价格，而且也不用操心将来预期是否划算。

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在尝试了解我们的世界的进程中，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思想受到了非常认真的对待。对各种竞争性的抽象思想的冲击，所达到的效果已经超越了任何可能发生的常识。哈耶克破坏了均衡理论模型的全部基础——尽管它仍然在经济学中得到讲授，但是他的思想在那时却被忽视了。整整一代人逐渐相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对称的；市场与计划



是同一种东西。这种忽视冒险、财产权利、破产和创新的后果是，苏联模式的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被他们的敌人、也被他们的拥护者同等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赛是按物质产出来计算的，而经济学的模型是评估相对成功的最好的向导。有一种观点被忘却了，即经济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在这个自组织过程中，在代表数百万个人的利益方面，存在着对于改善生活状况的不断探索，所有的行动都建立在当地知识的基础之上。而这是为马克思和哈耶克所共有的观点。关键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者不可以计算所有的那些方程。关键是即便作出最极端的假定，仍然不可能集聚知识。更何况，这种做法是无效率的——非常的无效率。在经历这场有关社会主义核算的辩论之后，半个欧洲在即将来临的后半世纪都接受了这个教训。

#### [注释]

[1] 关于奥托·纽兰思，见 Nancy Cartwright, Jordi Cat, Lola Fleck and Thomas Hebel (1996), *Otto Neurath: Philosophy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所有我的关于纽兰思的讨论都依赖于这本杰作。关于边际理论的发展，最容易理解的资料是 Mark Blaug (198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4th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 Neurath in Cartwright *et al.*, p. 29.

[3] *Ibid.*, p. 37.

[4] 关于米塞斯，我参考的是 Ludwig von Mises (1923/1936/1981),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首版于德国，名为 *Die Gemeinwirtschaft*, Gustav Fischer, Jean, 2nd edition 1932, trans. J. Kahane 1936, 版于 Jonathan Cape, London. 我引用了 the 1981 Liberty Classics edition (Liberty Fund Inc. Indianapolis, IN).

[5] *Ibid.*, p. 95.

[6] *Ibid.*, p. 101.

[7] Friedrich von Hayek (ed.) (1935), *Collective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Routledge, London. 这里包括两篇哈耶克的有关社会主义核算主题的评论：

(1)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pp. 1-40);

(2)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ebate” (pp. 201-243).

第三个评论是，“The Competitive Solution”; a review article on Lang—Taylor and Dickinson, *Economica*, vol. VII no. 26, May 1940. 所有三篇评论被整编在一起，见



Friedrich von Hayek (1948), *Individualism and the Economic Ord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pp. 119-208.

[8] 恩里科·巴伦的文章首先以意大利文发表于1908年,后来才译成英文: *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e State*, in Hayek, pp. 245-290.

[9] 有关兰格·泰勒的资料是 F. M. Taylor (1929),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这篇文章与兰格的评论再版于: B. E. Lippincott (ed.) (1938),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0] Hayek, *Collective Economic Planning*, pp. 207-208.

[11] H. D. Dickinson (1939), *Economics of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2] Lippincott, 1938.

[13] Friedrich von Hayek (1937),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 IV, pp. 33-54. 这篇文章同时被再版于: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the Economic Order*.

[14] Hayek,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pp. 45-46.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13 章 全球秩序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 1939 年 9 月在西欧爆发。日本于 1931 年侵犯中国东北，1937 年全面侵犯中国，接着侵犯东亚和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 1939 年 9 月似乎有些武断。即便在欧洲，西班牙内战在 1936—1938 年也已经进入白热化，那时希特勒已经开始侵犯奥地利。可以认为，法国从鲁尔区撤退和鲁尔区重新被德国占领——1924—1936 年——是欧洲惟一的一段“和平”的插曲。

但是，从另一种观点看，欧亚大陆的战争只是在 1941 年才演变成一场世界战争。希特勒进攻苏联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它减轻了英国方面的压力，英国当时是欧洲惟一一个与德国作战的国家。各种



不同的抵抗组织，不管是来自被希特勒击败的国家（例如，波兰），还是与希特勒合作的国家（像法国），同样在英国从事反抗活动。但是，正是由于日本对于珍珠港的轰炸触发美国的介入，才使得这一战争超出了欧亚大陆，演变为一场世界战争。尽管美国必须在两条战线作战，但是自从1941年之后，战争的结果已经是毫无可疑之处了。美国与苏联的结合，已经令希特勒难以招架。事实表明，日本是美国需要对付的凶恶敌人。在太平洋战争方面，由于没有其他盟军力量可言，这意味着美国人只能在单方面展开亚洲之战争（中国是值得提的，但也不过如此）。在东南亚，英国和印度的军队使日本军队不得进入印度边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解决了自由秩序不得不面临的两次战争之一。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法西斯主义——被打败了。它所具有的种族灭绝的倾向，被证明是难以想像的邪恶，它的不容忍远远不只针对犹太人，也包括针对同性恋者、吉普赛人以及许多被征服的民族。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是歌德最后拜访的地方之一，这一事实彻底显示了欧洲文明的悲剧。启蒙运动的所有人文主义方面都被法西斯主义消除了。反犹太主义绝不是纳粹党人的发明，也不是德国的独家专利。它曾是欧洲基督教的重要成分。但是，纳粹主义把反犹太主义发展到了极限，当纳粹党人用最现代的技术从事屠杀时，便展示了它最可怕的可能性。

当然，就接近野蛮的科学方面，斯大林一点也不含糊。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俄国的集中营已经人满为患——首先主要关押持不同政见的孟什维克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左翼反对派和斯大林从前的朋友，但是不久，增加了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想致富的农民，最后涉及从下到上所有冒犯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人。这里是另外一种对于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方面的叛离。遗憾的是，那个马克思，一个启蒙运动哲学中最优秀的人物，被祈祷支持这样的野蛮行径。罗莎·卢森堡在她的最后的岁月里，大声疾呼“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行径”。而这里出现的却是作为野蛮行径的社会主义。

然而，苏联是一个盟国，而且已经遭受纳粹的猛烈攻击。这对击败希特勒是十分关键的。毫无疑问，西方前线给予了帮助，正如在北非战斗中所做的那样。但是，作为战争的结果，苏联的声望无限地提高了，当然这也带来了苏联经济计划的声望的提高。苏德战争变成了两种计划模式的战争。在1936年之前，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模式几乎是专门为了备战。这种计划几乎从1918年德国被战败之日起，就在按照德国最高司令部所设计的那样进

行。动员所有的资源，把私有工业纳入战时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第一次全面落实计划。

斯大林的工业化是对战争经济另一条可选择的道路。他是从一个比希特勒更弱的基础开始的，而且也开始得较早。但是，12年的“国家资本主义”——1929—1941年——给苏联的第一部类产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其拥有了一种强大的能力，可以迅速转向军备生产：第三部类产品。在德国和苏联这两种情形下，消费者/工薪阶层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尽管这里是充分就业。

以巨大的生命代价——2500万人的死亡——和物资破坏，斯大林赢得了这场战争。苏联的计划，最初是从1914年—1918年的德国战时社会主义那里得到的灵感，被证明是一种比德国自己的模式更为优越的建设战时经济的方式，虽然德国的模式也受到同一经验的启迪，但却依靠私人资本与公有制的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恶意批评社会主义计划的自由主义者——米塞斯、哈耶克和其他人——失宠了。社会主义计划不是不可能的；它对实现1941—1945年所涉及的单一目标还是有效的。

但是，美国非计划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展现了它的生产潜力。在新政时期，一些对于“自由市场”进行干涉的措施已经付诸实践。英国对于为战争组织生产，可能使用了比美国更便于操作的手段。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正如我前面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时所谈到的——意味着美国可以同时两条战线上作战，而不会引起多少消费品的匮乏。在那场战争中，反英的美国人把鸡蛋投向哈利法克斯（Halifax）伯爵，他当时是驻美国的英国大使。他评论说，美国人很幸运能有鸡蛋可以向他投。鸡蛋、枪炮和黄油在美国是可以买到的。美国GNP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GNP总和的两倍。

战争也提供了“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的案例——私人经营加上政府的小心控制。英国模式在1945年之后走向“指挥中枢（the commanding heights）”的国家所有制。美国人拆除了自己的控制机构，但是这种思想却坚持下来：政府不得不——而且应该——驱使经济。采纳充分就业的目标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普通哲学强化了这种思想。经济不应该托付给市场。

因此，这场战争解决了这一有利于自由的政治秩序——宪政代议制政府加一般成人的普选权——的辩论，但是，为自由的经济秩序所作的辩论则没有什么推进。如果可能的话，它只是被过时的经济哲学的博物馆认可。经济学获得了声望，但不是作为道德哲学；它现在被建立在操作手段上。经济学



家建立了定量研究的数学模型，而且可以预测经济的结果。他们的技术方法被用于战争中确定航船运输、预测合理的食物需求以及计算生产的潜力和它所需要的增长率。

私人部门并不抱怨这些发展：战争订购合同给大的工业公司带来了繁荣。一种国家/公司共生现象得到了发展，其中，公司可以依赖国家而使订单不断膨胀。但是反过来，新政要求公司承认工会的权利。由于战争，美国的工会主义（unionism）得到了无限的加强，当然，从1933年到1952年，民主党仍然继续占据着支配地位。当然，这种共生现象也存在于大公司、有组织的劳工和联邦政府之间。在全国或地方经营的小商人，对于这些官僚政治的侵袭一直感到不悦。他们转向了共和党。

但是，他们只占少数。在1944年，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时，甚至在私人产业领域也出现了令人局促不安的沉默。<sup>[1]</sup>哈耶克走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纯粹主义路线，认为对于自由市场的任何干预——从对于地方商场的少量调控到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都是自由丧失的一种信号，代表着威权主义的朦胧前景。这是一本令人信服、精心创作的著作，关于这本书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但是，由于缺乏评判不同干预的明晰标准，这就减轻了它的直接影响。《通往奴役之路》一时间声名大噪，因为那时温斯顿·丘吉尔用它来谴责工党，认为该党如果掌握政权的话，很可能采用盖世太保的方法。保守党很少知道，哈耶克把他们也包括在被攻击的敌人当中。哈耶克已经选择了一条非常孤独的道路。

当然，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退却，原因需要追溯到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非殖民化。但是，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的国家；它信仰竞争，并通过了反对托拉斯的立法。当时有一股流行的看法——事实上是平民主义的看法——不喜欢大的企业和银行。从地理上看，这是中西部和西南部存在的现象。大萧条给予它一把锋利的刃剑和较广泛的声誉。当罗斯福执政的时候，他面对着解散卡特尔和恢复竞争的持续需求。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就作为反托拉斯运动的激进的拥护者而闻名于世。工业部门的结余似乎就可以反对干预和赞成实施竞争。

为罗斯福挽救时局的是凯恩斯及其理论。<sup>[2]</sup>凭着从宏观经济视角考察紧迫的失业问题，凯恩斯缓和了卡特尔与小企业对抗的棘手问题。凯恩斯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较高的就业水平上实现富裕——不管是大公司还是

小企业。随后不久，战争经济的逻辑强化了维护大公司的借口，因为要依赖它输送战争订货。计划者比较喜欢与少数大公司商谈，因为它们的管理更有效率。

技术创新同样使大公司的日子更加好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甚至可以说更多是在实验室和大学作战。自然科学家是新兵，如同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新兵一样。大公司在把科学发明转化为可行的产品方面做得更好。他们很快开始直接招募科学家新兵，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和开发（R&D）部门。战争期间科学与工业、大学与政府的愉快联姻，按照堪萨斯州的一个农场男孩——后来成为总统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就是为所谓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建立了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把分散的法人团体诸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框架：大的工业公司、大学、工会和政府采购代理。

因此，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又回到过去的时代的主题——如果它曾经在现实生活中而不仅仅是在经济学论文中存在的话。竞争从来不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在英国，也是提倡对受限实践的放任式容忍，而不鼓励积极的竞争政策。这样，非竞争性的实践——例如，旧学校的领结对于学生的种种强制性约束——比较活跃。伦敦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大爆炸”（the ‘Big Bang’）之前，那里一直流行着非正式的企业联合和带有阶级偏见的选择性雇用现象。在奥地利和德国，对自由秩序的拥护也很盛行，但这也很难作为具有竞争行为的生动实例。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而且至多是在1835—1885年期间的英国——我们可以看到，有了竞争秩序的表象，但是，即使是这种表象，也是作为工业化的先驱国家，在制造品的国际贸易中，受到国家垄断立场的支持。当然，即使在那个时候，帝国仍然提供着实际上的保护。你只能教育本地人：英国是最好的。

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即使某些怀疑还被坚持，但乔大叔（Uncle Joe）成了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带来了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的再认识。它是一种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迄今未发表的文本开始陆续出版。围绕马克思进行写作与辩论变成一种更广泛的实践。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开始正式面对马克思。熊彼特在他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中，对马克思进行了赞颂。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论马克思的经济学》和保



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都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斯威齐通过发表柏姆-巴维克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以及波特基维兹的结论（在本书第5章中讨论过）<sup>[3]</sup>，使价格—价值转化问题受到世界的关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通过流亡者法兰克福学派的出版物，知道现在有谁在美国。

这种影响在欧洲甚至更大。通过与抵抗运动打成一片，法国共产党的声誉得到增强。在英国，共产主义者的声誉从1936年开始受到重视，并继续得到提升，尽管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一直执行到1945年甚至更长时间。工党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现在它的许多年轻成员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它的主席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尽管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非常推崇马克思主义。1948年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之际，工党以官方的名义再版了该书，并由拉斯基撰写了长达100页的前言和导论，不过当时使用的是匿名。这在工党历史上是罕见的时刻，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二次。<sup>[4]</sup>

战争也推进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盟国，都是坚强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中坚。这对英国来说，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十足的帝国主义者。当印度问题出现的时候，丘吉尔迫于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进行调解，以满足印度国会提出的“在战争中发挥更大的官方作用”的要求。对这场战争，印度在提供人力和物质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丘吉尔在这一事件中不敢冒险。但是，战争期间谈判过程表明，英国在放弃它的最大殖民地方面坚持自己的立场。

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亚洲和非洲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政治上的独立已经成为经济独立的关键。根据这种看法，它意味着从外国——通常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其农业、矿物、工业、商业和金融公司的所有权中获得自由。它还意味着，独立的国家拥有设置自由贸易障碍和使用关税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有关自由贸易方面的说教已经不能很好地支撑下去。成为英雄的，是弗里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而不是大卫·李嘉图。对于自由贸易的拒绝，也导致了对于自由市场的怀疑。凯恩斯的经济学和苏联的例子，还有日本的例子，使亚洲的民族主义者确信，在国家培育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印度国会在1938年组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制定工业发展规划。工业化是经济独立的神奇药方。从这个方面看来，马克思、列宁和苏联显得很伟大。





到了1943年，情况已经很清楚，盟国已经走上了取胜的轨道。斯大林格勒没有陷落，德国从苏联的撤退开始了。日本人已经停止了对印度和缅甸南方侧面的进攻，太平洋上的中途岛之战也已结束。有关战后处置的计划，明智地把梅特涅（Metternich）和伍德罗·威尔逊的设想混合在一起。大国将对战后的和平承担责任，但是还要有一个联合国。大国将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永久性成员拥有否决权，但是联合国大会将由所有独立国家的代表组成。关于联合国具有的潜力，还存在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后来的实践删去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设想。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战后的经济安排有效地为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代打下了基础，因为凯恩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sup>[5]</sup>这之前，凯恩斯已有很高的声誉，并在英国财政部担任重要职位。当他设计了战后外汇的制度安排时，他实际上意识到，英国可能会由于战争方面的财政支付而变得穷困。他想同时控制资本流动和限制自由贸易。但是，美国人在成为战争伙伴之前所通过的租借法案，已经承诺了土地租借权。这种要美国放弃中立的请求（在华盛顿地区，有一股强大的亲德势力的游说议员）并不是无任何代价的。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罗斯福的商务部长，就是一个顽固的自由贸易的捍卫者。他要求英国拆除其帝国自由贸易区域，他把这种区域视为帝国主义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如果英国想要得到美国的产品以进行战争，他们必须答应，不得将美国的出口产品运输到他们的市场以外的地区。因此，对于任何战后的处置，这都是一项基本的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

无论如何，凯恩斯十分清楚，英国的黄金储备与外汇储备将减少，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英镑将得不到维持，英镑的自由兑换因而不得不进行资本控制。长期以来，英国享受着靠帝国的利益维持着伦敦的英镑结余。在战争期间，这些国家提供人力和物质，并且所接受的支付结果变成了亏欠英国政府的英镑债务。现在这些国家的债务将要遗留给英国；这样一来，英国的外汇储备将比已经显示的还要少。凯恩斯也知道，他的经济理论是一个与封闭经济相关的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贸易是一个“漏洞”。资本的自由流动，会打乱甚至中断政府对储蓄、投资或者利率的控制。因此，凯恩斯想要任何一个政府都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而进行资本控制，这也是英国政府一个特别重要的职责。

美国人以哈里·怀特（Harry White）为代表，要求自由贸易和自由的资本流动。<sup>[6]</sup>美国不缺乏储备，而且拥有巨大的出口能力。他们想要恢复金



本位制，以利于美国占领世界市场。这并不是什么险恶用心——这正是 19 世纪世界经济的存在方式，所不同的是，那时是英国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如今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取代英国当初的位置。贸易毕竟是一种需要双方都同意的行为，要开放竞争。因此，如果美国能够在世界各地出售他们的产品，那是因为他们的商品价廉物美。但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欧洲滑回到它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习性，那么美国国会将会进行报复，而且经济大萧条将会再次发生，这对于罗斯福、赫尔和财政部长摩根索（Morgenthau），无疑将是持久的噩梦。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所达成妥协是，美国将以 35 美元 1 盎司的固定比率为基础确定美元与黄金的比价。这样，黄金与美元成了可以互换的等价物。世界不再需要黄金解决贸易赤字，美元可以充当替代品。为了照顾英国的情面，英镑也被指定为“主要通货”，它的价格与美元的价格实行固定比率。其他欧洲国家仍然继续使用老的汇率体系，它们被假定，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其目标是监控固定汇率体系）的建立，这些国家将会加入这种制度安排。美国还拥有足够用的资源帮助任何一个处于暂时贸易平衡赤字的国家。这将能够避免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造成大混乱的通货贬值。基金会是根据每个成员的最初提供的贡献来建立的。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美国人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因此在基金的管理体制中享有最大部分的选票份额。当各成员参加的时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贡献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他们控制了绝大部分选票。贡献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借款的数量。在基金会存在的最初 20 年中，对发达国家而言，它主要是一个由这些将自己的通货与美元的汇率固定下来的国家驱使的体系。这些国家的赤字意味着是暂时的和周期性的，而不是持续的和结构性的。只有美国的赤字无关紧要。倒是对于其他国家，他们必需获取美元以便可以互相进行贸易。美国成了世界通货的供给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个孪生机构，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在根本上，它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受战争影响的欧洲经济的重建问题，而不是发展问题。在 1943—1944 年，发展还不是主要的观点，尽管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发表的一篇先驱性的文章，当时他是伦敦大学教授，后来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专门讨论了东南部欧洲的重建。<sup>[7]</sup>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稍后变成了举世闻名的世界银行，经过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它不断把业务扩展到整个世界，为

非殖民地国家提供长期贷款，同时提供有关发展方面的专家意见。当然，在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帝国（葡萄牙和比利时帝国是一个例外），作为对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不断增长的压力的回应，也出现了由这些帝国政府各自推动“殖民地的发展”。在首次接纳这些殖民地国家的成员时，世界银行也招募了不少在殖民地国家从事发展工作的官僚。直到几年以后，才发明了一种新的发展理论（见本书第 15 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两个机构都很关心短期的和长期的资本需求。它们在那里确保反对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或者挫败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式的发展计划。但是贸易仍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第三个机构，国际贸易组织（ITO），作为《哈瓦那公约》的一个结果被提了出来。但是，这个机构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承认，因为它担心美国的经济主权会受到威胁。对于战后经济秩序来说，幸运的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很快被提了出来 [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影响，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sup>[8]</sup>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成员与影响力，在当年发展得比较缓慢。它开始为发达国家提出一个适度的多边的关税减让表，并让那些非殖民化的国家获得许多让利，以满足他们自己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规划。

这样，战后经济秩序——至少为着贸易目的，保证了汇率的稳定和通货的可兑换。自由贸易得到了这种制度安排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它稍后于 1948 年成立）的推进。强调保持贸易和汇率的稳定，意味着必须付出控制资本流动的代价。这是美国对其他发达国家进行的让步，当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战后重建的实质性问题。在其后的 30 年中，资本控制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项主要职能。

美国人在战后的经济制度安排方面对欧洲人显示了慷慨的态度，但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却保持了强硬的姿态，它欢迎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帝国与其在亚洲的殖民地断绝殖民关系。在这方面英国同美国的这种姿态是相反的。在世界庆祝战胜日本纪念日之后，英国派遣部分印度武装帮助法国重新夺回印度。它们也试图帮助荷兰重新获得成立不久的印度尼西亚。美国人援助了这些独立运动。胡志明是乔治·华盛顿式的英雄，他从对抗日本人转到对抗法国人。对东亚而言，日本帝国和法国帝国的解体变得与冷战纠缠在一起，并且一直持续到 1975 年，那时美国已经放弃他们的反帝国主义，开始献身于反对共产主义的事业。<sup>[9]</sup>

战后不久，发生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件，但它们实际上都是那场战争的



结果。第一个事件是1947年印度的独立和分割。印度的独立打开了非殖民化的闸门。在印度脱离帝国的20年中，英国已经放弃了几乎所有的海外领地。推迟移交香港，在这个方面不应该引起误导。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很快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大部分都是实行非暴力的权力转移。法国帝国在它解体时，尤其是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使用了更多的暴力。但是，在时间框架中，1970年可能是这一进程的最后边界。葡萄牙没有参加战争，因而没有加入非殖民化进程。在果阿（Goa）、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葡萄牙放弃权力之前，武装对抗还是必需的。只是当葡萄牙在1975年之后实行民主政治时，它才默许非殖民化。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中国革命强化了较早的俄国革命，它采取的方式是先占领落后的乡村。但是在中国的情形中——与俄国不同——被驱除的政府既不是君主政体的政府，也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共和政府。中国自从1911年以来已经实行共和政体，它的总统蒋介石被同时代的人视为一位杰出的亚洲领袖。他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孙中山是一个受全国和国际所尊敬的英雄。日本入侵中国，破坏了国民党也即蒋介石的国家主义政党的可信度。地方军阀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流行起来，如同腐败在整个国家政府中流行起来一样。毛泽东领导的战役以延安为根据地，既反对日本人又反对国家主义者，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而且很快，远远出乎了人们的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斯大林主义强加的结果，而是真正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声望。现在亚洲也同样拥有了它自己本土的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一个盟友，中国在战争期间已经是公认的一个大国。这样，执政的共产主义者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占据了两个席位（尽管在美国人勉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之前，又花费了另一个22年的时间）。但是，由于它抓住了土地问题，并把它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因此，中国的共产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共产主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曾把土地的问题作为少数派问题来关注，这正如考茨基在《消灭农业国》（Die Agrarfrage）中所说明的。<sup>[10]</sup>列宁对考茨基的印象非常深刻，并把他的观念应用到俄国农业。列宁的观念尽管很有影响力，但却仍然具有明显的西方化和以城市为指向的特色。民粹派——以及稍后的社会革命党，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俄国的实际。A. V. 蔡雅诺夫（A. V. Chayanov）关于俄国农民的著名著作，对于农业动力问题的解释与列宁的著作截然不

同。<sup>[1]</sup>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试图理解农民。马克思自己对农民的看法也不多，直到晚年他研究俄国问题时，这一情况才发生转变。

毛泽东对于农民的理解完全不同。在这方面，他更接近的是蔡雅诺夫而不是列宁或考茨基。他是在农民中长大的。在1927年冒险主义的起义中，以城市为指向的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自杀性的行为。然后毛泽东缓慢而有耐心地确立了他对党的控制。奔向延安的长征，以及在那里建立共产主义自治政权，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共产主义者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能够给人民带来福利的政策。这样，当中国共产主义者夺得政权的时候，已经获得许多有关政治和政策落实的常识，这一点不同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具有更少的理论色彩和思辨色彩。

无论如何，他们同样也是一支军事力量，他们抵抗日本人并赢得了不少战斗，因此，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机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亚洲的共产主义，无论在哪里取得胜利——在中国，在老挝，在越南或柬埔寨——都拥有一支植入党内的军事力量。有一个国家不是这种情形，这就是印度尼西亚。但是在那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遭受了巨大的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在1945年之后的冷战世界的第一次对抗中，就在显示了它的勇气。在朝鲜战场上交战双方的进进退退，潮起潮落，终于在1954年达成停战协议，这点警告了美国人，亚洲的共产主义的军事力量是十分坚韧的。这一教训只有到1975年美国在越南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时，才真正得到吸取。

但是再一次，我又说远了。这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自由主义秩序创造了一种矛盾的情势。资本主义变得安全，然而与其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体系，不如说是一个由个别国家资本主义像拼图玩具一样拼出来的体系。在欧洲西北部还涉及一个自由民主政治的重建问题（伊比利亚继续保留了威权主义）。当然，欧洲被分成自由民主政治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对德国和柏林的分割是最好的例证。从易北河一直到中国海洋，在欧亚大陆有一些共产主义政府。希腊正在经历一场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共产主义者险些取得胜利。在那里美国人选择了用战斗来阻止共产主义的推进。

冷战看到了修正主义历史的多重层次。美国的历史学家有证据证明，美国加入战争既有值得庆贺的旋律，也有可以讥讽的音符。但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之间的战时同盟从来不可能是永久的。法西斯主义的灭亡澄清了这场战斗。现在只存在资本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以私有制和利润为基础的体制同相反体制的对抗成了基本问题。当然，在战后资本主义中也存在着“计

划”的因素，或者存在一种混合经济，不过甚至在更高级的混合经济中，绝大多数的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是私有的。

冷战是在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纯粹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它的前沿阵地。当美国提供大范围的消费品的能力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变为一种武器的时候（就像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参观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展览会时所证实的），自由主义者的议事日程——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放任政策——从来没有被西方所采用。战斗主要涉及经济增长率、生活水平和技术（空间技术和军事技术）。当涉及自由价值时，资本主义世界就有了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且冷战使美国人对于不民主的政体变得更加宽容，只要他们留在“自由”的阵营内。

因此，当这两种体制进行相互对抗的时候，他们彼此变得更加相似而不是更加不同。每一方在宣传中都把另一方画成漫画，以迎合当地的大众，并声称这种竞争是“中立”的（正如经济学家声明应该那样的）。甚至像约瑟夫·熊彼特这样一位忠诚的自由主义者，也要按照经济效率以机械论的方式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sup>[12]</sup>他对于大公司及其增长效率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他认为这种巨大的效率可以使资本主义趋同于社会主义。他认为，单独的企业家将会变得多余，公司将占据统治地位。因而，资本主义的公司将会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公司。

另一方面，熊彼特解释道，民主政治会遵循市场的逻辑。既然美国只有两大政党，与西欧政党相比，它们是非意识形态的，熊彼特发现，他们之间的竞争是以销售商出售普通产品的方式进行的。公司要获取利润的最大值，政客要获取选票的最大值。为了做到这点，他们研究选民想要的是什么，而且制定了一个最可能吸引最大多数选民（购买者）的纲领（产品）。熊彼特的见解在1957年被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所吸收，提出了《民主的经济理论》。<sup>[13]</sup>因此，政治学正如经济学一样，可以从实证主义的和工具主义的框架来理解。因此，政治学变成中立的。政治系统传递着“产品”，这些系统是可以根据它们的效率进行比较的。现在，共产主义是根据物质生产的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的；对自成风格的马克思遗产的继承者来说，人类的解放是不再相干的事情，西方也不再需要辩解，它比关心GNP更关心自由和人权。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贴上这样的标签——商品交换替代了人的关系——商品拜物教。当然，现在共产主义也变成了具有商品拜物教的性质。

对于20世纪中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截然不同的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被提了出来。博兰尼和哈耶克俩人都来自维也纳。他们都是经济学家（在这个词所具有的广泛的意义上说）。他们都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中市场的角色，但是他们其中的一人主张对市场关系进行约束，这点受到了激进的辉格党和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欢迎，并且自从20世纪之交以来已经成为公认的准则。在《大转折》中，卡尔·博兰尼看到了劳动力市场的局限性。劳动力市场作为政治民主化引进的产物，证明自由的市场秩序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sup>[14]</sup>他把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刻画为涉及生活所有方面的商品化。这样，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劳动力的买和卖——对于博兰尼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步。他把19世纪30年代旧的《济贫法》的改革，解释为是引入劳动力的自由市场，但是，对这种自由市场的反动，以及引进限制劳动的商品化的立法通过立法程序限制了劳动商品化，对博兰尼来说，都说明市场局限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指示器。

博兰尼的著作非常有影响力。市场失灵的观念已经被凯恩斯当作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来对待，而庇古的微观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看法对此进行了补充。这样，市场被看成了具有失灵的倾向，需要从上面进行调控。博兰尼把这一论点进一步引向深入，认为即使是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如果不能与民主的人道主义政体相协调，也同样是失灵的。对博兰尼来说，他的全部的观点是，让经济按自由市场规则去运行是否定的乌托邦。当市场最完美的的时候，也是它最糟糕的时候，不得不对之进行控制。

博兰尼的思想时常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但是马克思将不会与博兰尼产生共鸣。当资本主义持续时，市场是明晰的制度；交换价值在决定生产方面比使用价值更为重要。利润必须通过在市场上出售产品才能实现；仅有剩余价值还是不够的。马克思会说，市场只有在私有的财产被废止的时候才能被超越。劳动力市场源于每个人都拥有的私有财产权。约翰·洛克在人类劳动与土地的混合中说明过私有财产的起源。洛克的理论受到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批评，因为他不承认通过剥削进行的积累。但是，人类劳动的私有财产的起源是以人类自身的私有财产为前提的。马克思把市场对于任何商品（包括劳动力）的买卖的约束描述为早熟的和浪漫的。他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和《反谷物法》的急躁情绪，正好说明自由贸易虽然不理想，但是比以前的情况要好。保护主义的替代方案不比自由贸易好（如我们在本书第7章中看到的）。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显然存在着同一种急躁情绪。他抵制拉萨



尔派关于一切劳动产品的主张，因为他把它们视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需求不一致。后来，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完全变成了反资本主义的教条，资本主义的增长被看作是一种倒退的运动。市场被视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平等和剥削的同义语。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变成左翼运动特别讨厌的东西。

然而，博兰尼的论点非常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被他视为经典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的确没有经历过一个大胆的自由化进程。在1832年英国《大改革法案》（the Great Reform Act）通过之后的15年，旧的《济贫法》被改革，通过了一部《银行法》，以使货币政策合理化，自由贸易成了重组英国农业的基础。在这之后不久，政策开始出现逆转。人们甚至可以说，英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的先锋导向，使它成了一个富国，但是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英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英国的贵族阶层在1832年并没有失去权力。英国所出现的是一种阶级妥协，真实意义上的经济关系的自由化被拿来做了交易，中产阶级由于从中分享了一部分政治权力从而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完全的自由化立即接受交叉联盟力量的检验，一个是贵族政治，一个是正在成长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然后是工会）。这反映在迪斯雷里（Disraeli）的小说——《女巫与科宁斯比》（*Sybil and Coningsby*）中，也反映在他随后的政治生涯中。在皮尔之后的托利党并不是一个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政党。索尔兹伯里勋爵正如迪斯雷里一样，由于保护穷人免受市场的掠夺，在英国政治中代表托利党走过了一生。在19世纪中期，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例如，格莱斯顿）存在自由党中。稍后，激进的辉格党从左的方面选择了拥护市场调控。英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制造商，他们需要关税；一是伦敦城的金融界，他们支持自己的自由主义信条。

英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成为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激烈争论的焦点，这些争论发表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翼评论》上。<sup>[15]</sup>这场辩论引发了一场关于英国弊病的大论战；在同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机制的比较中，看疲倦的英国经济。我不想在这里探究那场辩论，只是想提醒——与博兰尼所说的相反——人们可以把英国看作长期以来从来没有进行过自由市场的实验的国家。

当然，研究资本主义处于全盛期的地方不在欧洲而在美国。由于美国没有封建制度和贵族政治机构的拖累，它可以采用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而不



会遭致前资本主义力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对。相对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一直具有更多的自由—市场导向。在劳动市场中，美国很少给予管制，拥有的授权体制是十分弱小的。自从新政以来，“福利”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是政治上有争议的话题。民主党执政的漫长20年（1933—1952），经历了大萧条和战争，营造了一种福利国家的气候。在凯恩斯主义的1/4世纪（见本书第14章），公司、工会和政府（一个大政府，如美国人所称呼的）的融合，导致了暂时的政治妥协和两党联合支持福利国家的扩张，这在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的社会纲领》（*Great Society programme*）得到了概括。但是，正如我们将会在本书第16章中所看到的，这种妥协随着1981年共和党重新回归总统宝座而终止。如果说英国经历的自由市场实验最多持续了50年时间的話，那么美国偏离自由市场的时间大致也与它相当。

美国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没有一个社会是理想的——但是，它的充满活力的民主主义传统和社会的平等主义风气，在把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融进美国经济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买卖劳动力的自由市场，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不是工会设置就业障碍，或者宗教信仰歧视，像整个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英国那样（例如，牛津与剑桥大学禁止非英国教徒入学；在公共雇用中歧视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将会有为数众多的人民生活在无望的下层阶级中。

因此，博兰尼的论点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特定的。参照列宁与民粹派的论战，人们可以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才允许和支持对市场进行实质性干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将摆脱而不是加强这种限制。这点并不矛盾，但我将在总结那一章中回到这个主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有关资本主义的未来的辩论，博兰尼的论点将是能够转动它的轴心之一。

正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维护了博兰尼关于市场和国家的论题的对立一极。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的合理性问题，已经讨论过了。但是在战争期间，当炸弹在伦敦上空落下的时候，哈耶克从自由主义的秩序出发，对集体主义和社团主义的起点进行了深刻和意义深远的批评，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极权主义的根源。在他探索（亚当·斯密的）国家自由体系之哲学基础的漫长而孤独的生涯中，《通往奴役之路》是其中的第一步。哈耶克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同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早期社会进行戏剧性的决裂。但是，他从卡尔·门格尔那里，甚至从19世纪早期的德国思想家那里，

接受了社会作为自组织的有机过程的概念——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在他的著作中，把社会作为一个自组织的实体的观念代表着永恒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只有在宗教和封建权威衰落之后才有可能确立（也就是在启蒙时代及其之后）。因此，亚当·斯密的阶段理论是以自组织社会的出现为背景的。一个社会是如何从它早期的阶段变为自组织社会的一——也就是说，从早期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或者过渡到自然的自由的体制——是哈耶克没有提到的问题。

哈耶克所关心的是一种具有竞争性的社会观——构成主义者的观点，他把这种观点追溯到法国的社会主义哲学家圣西门。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可以按照人的设计、计划和描绘更美好社会的蓝图加以改变。但是，这种构成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方案是反自由主义的，因为它干扰了自组织社会的有机程序。“看不见的手”受到了伤害，并被那种机械的注定要失败的信号所取代。自治的、自我均衡的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是自由的保证。

哈耶克的著作并不像博兰尼的那样成功。后者符合 20 世纪 40 年代的精神——干预主义，怀疑市场能力，并相信自由主义最终将会被消除。它也是一本读起来令人兴奋的书，里面充满了刀光剑影。而哈耶克的书是严肃的，风格是标准的——几乎经过了严格的消毒。哈耶克分析了欧洲文明的崩溃，这正如博兰尼所做的，但是他的看法更加悲观。紧接着 1944 年之后，哈耶克被人们冷落一旁，但是他点燃了一段慢慢升温的保险丝，并于 30 年之后炸毁了凯恩斯主义的共识。但在我讨论这些之前，我们一定要看看那 30 年。

#### 【注释】

[1] Friedrich von Hayek (1944), *The Road of Serfdom*, Routledge, London.

[2] 关于凯恩斯在扭转反对卡特尔的攻击方面的重要作用，见 Arthur Schlesinger (1959), *The Age of Roosevelt, Volume 3: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MA.

[3] Joseph Schumpeter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5th edn 1996, Routledge, London; John Robinson, (1942), *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Macmillan, London; Paul Sweezy (1948),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Böhm-Bawerk (1949),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4] Laski (ed.) (19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e Centenary Edition*.

[5] 关于导致了 IMF 和世界银行的出现战时谈判, 见 Robert Skidelsky (2000), *John Maynard Keynes: Battling for Britain, Volume 3*, Macmillan, London.

[6] Skidelsky (ibid.) 认为, 哈里·怀特 (Harry White) 与苏联进行了秘密勾结。如果不存在这些活动, 在美国的反英 (anti-British) 情绪也是非常强烈的。

[7] Paul Rosenstein-Rodan (1943), "Problems of Industrialisation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53, pp. 202-211.

[8] J. 米德 (James Meade) 亲自告诉我, 有关 GATT 的安排是他想出来的, 他作了记录, 那时他任职于英国内阁办公厅。该记录见 Susan Howson (ed.) (1990),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James Meade, Volume 4: The Cabinet Office Diary, 1944-1946*, Unwin Hyman, London.

[9] 关于美国对于英国帝国的态度, 见 Christopher Throne (1979),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0] Karl Kautsky (1902), *Die Agrarfrage: eine Übersicht über die Tendenzen der modernen Landwirtschaft und die Agrar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e*, J. H. W. Dietz, Nachf, Stuttgart, trans. Peter Burgess, Swan, London.

[11] A. V. Chayanov (1966), *The Theory of the Peasant Economy*, trans. Basile Kerblay, ed. Daniel Thorner, 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Richard D. Irwin, Homewood, IL.

[12]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3] Anthony Downs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Harper & Row, New York.

[14] Karl Polanyi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Farrar & Reinhart, New York.

[15] 这些论点和所有的资料, 见 Perry Anderson (1992), *English Questions*, Verso, London.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14 章 国家资本主义 的黄金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30 年，甚至比 20 世纪最初的 45 年更令人吃惊，尽管这 45 年已经是相当的变故丛生。这 30 年（有些人说是 25 年：1948—1973）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或凯恩斯主义的 1/4 世纪，“凯恩斯时代”。<sup>[1]</sup>但是，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帝国解体的第二个阶段——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的海上帝国的解体。它见证了在新独立的疆域（民族）中，国家的形成像大爆炸似的激增。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而言，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一个相当封闭的事件。非殖民化进程使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人口都有权利进入全球政治的体系之中。非殖民化进程既不平稳也不平静。共产主义世界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的



1949年革命，大大加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作为战后发展的结果，再一次不自觉地增强了共产主义的阵营，苏联借以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它的许多欧洲邻居——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以及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对于东欧来说也许不那么金光灿烂。

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这个30年，既是资本主义声名鹊起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声名鹊起的时代。现在变得很流行的资本主义，就是在两次战争期间遭到失败的同一个资本主义，现在它却成功了。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如我在前面称呼的——国资本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把各种不同的民族资本主义汇集在一起，就能够使人类福利获得普遍而深刻的改善，这点已为那些国家所见证。充分就业，几乎没有明显周期从中作梗的持续的经济增长，高水平的大众消费，包括公共产品的消费和私人产品的消费，在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改善——所有这些成为这些年来那些国家的共同经历。不是第一次，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个新的和持久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是伯恩斯坦的幻想的回归。

但是，社会主义的事业同样得到了普及。许多议会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执政了。资本主义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确实在于，那些把自己的议程确定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SwC）的人转变了它。对于第二国际（现今的社会党国际），这也是一个黄金时代。<sup>[2]</sup>另一个趋向，我称之为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SoC）——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时期也变得令人敬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被翻译和传播。其他人，例如毛泽东，托洛茨基和切·格瓦拉，是作为晚辈和众神庙中有争议的成员而补充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大学，在出版物和其他媒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新出现的非殖民化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充满热情，并实践他们的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们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少数几个国家——例如古巴、越南、朝鲜、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简短而凶残）——甚至跟着踏上了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然，还有一个冷战跨越了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对峙被核武器武装着，持续贯穿着这个时期的始终。它在1962年到达了一个高潮，这是由于古巴导弹危机所致，但是幸运的是，核武器对峙并没有导致一场真正的战争。军备支出在双方都是巨额的，在主要的对峙国家中，公众生活的绝大多数方面都弥漫着军事的文化。在美国和法国，都有一个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军事英雄执掌政权。艾森豪威尔在 1952 年和 1956 年顺利当选为总统，并不是什么不吉利的征兆；戴高乐于 1945 年执掌政权，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理由，但是在 1960 年，他却是以一场波拿巴主义的政变重返政坛的。但是，成为政治领袖的并不只有军事领袖。五角大楼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比它在以前 170 年的美国历史中所表现的地位更加引人注目。苏联继续通过它的计划机制追求国家资本主义/战时社会主义。对冷战的双方而言，罗莎·卢森堡的第三部类的出现都显得特别突兀。

冷战导致了政治语言的庸俗化。于是我们有了与东方相对应的西方，北方和南方，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对一个阵营来说，自由变成了西方的惟一拥有物。东方说，他们的公民拥有积极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自由，而西方只能保证消极的——政治的——自由。西方说，它拥有民主政治；东方把它的体制称为人民的民主政治。非殖民化的国家通过指出他们所遭受的帝国主义的掠夺，公开指责西方的民主假象。<sup>[3]</sup>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意见不一致，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再加上在中国政治环境业已发生转变，五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使得联合国成为一个不能实现其功能的仅可用来谈判的店铺。因此，联合国的“大国剧场”因子出现了机能失调，民主的因子——联合国大会——变成了可以摆出各种不同姿态的议员席。随着它的会员数量的增加，它的代理机构在发挥作用，联合国的核心出现了硬化症。没有梅特涅的实力观念，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理想主义是空洞的。

在所有这一切中，重要的是失去了人们对于 19 世纪自由秩序的信念。在政治方面，成人选举权在民主政府中的上升，改变了民主国家的性质。拥有以财产为基础的选举权和对于财产实行保护的不受干扰的自由国家——A. V. 戴雪 (A. V. Dicey) 所理想化的国家<sup>[4]</sup>——从人们的观念中消失了。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者损失得甚至更多。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资本家和工会分子一样，都认同“混合经济”的优点。混合的程度——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在美国和北欧之间是存在着差别的。甚至在欧洲内部，也存在着差异。但是大体上，解除管制的或者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看来好像是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国家预算在和平时期作为 GDP 的一部分长期维持着较高的水平，而且在整个期间继续增加。市场失灵的观念，以及需要增加或减少税收和补贴以校正“外部因素”导致的溢出效应的观点，被广泛接受。这些“外部因素”包括噪音，污染和拥堵。在宏观经济学方面，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各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同组合——被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广泛采用，德国是仅有的罕见例外。凯恩斯已经指出宏观经济水平上的市场失灵的范围。这样，“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观念变成了一般惯常智慧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对于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殖民化国家而言，似乎是一种实现经济增长的极为有效的方式。在时间记录方面，苏联似乎是穿越了从不发达的（或倒退的，用那时流行的词语来说）经济到发达的经济之间的距离。尽管遭受了深重的战争伤害，苏联在工业方面的成就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在美国之后很快获得了原子弹和原子核反应堆新式武器。然后，在1957年，它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第一个无人驾驶的宇宙飞船，因而在空间竞赛中超过了美国。美国人在20世纪第一次感觉，他们已落在另一个国家之后。至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据说美国蒙受了“增长差距”和“导弹差距”。新总统把美国人登月计划作为他的纲领的一个主要部分。肯尼迪没能活到看到人在月球着陆，但是这后来变成了一个现实，还要归功于他的决定。

如同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封闭的经济，寻求达到自给自足。德国战争经济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正如苏联在1927年被隔绝之后所做的——就许多非殖民化国家致力于自己的发展而言，这样做成了一种最适于付诸实践的学说。这里存在着一种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也存在着一种由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保罗·普雷比希（Raul Prebisch）和一位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先驱汉斯·辛格（Hans Singer）所发展出来的新的和有力的论点，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比出口制造品的国家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sup>[5]</sup>因此，贸易不宜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他们不应该仰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因为专门生产初级产品对于他们获得进口制造品的机会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进行工业化，而要工业化，他们就不得不搞进口替代。

这是单一市场的失灵，在这一市场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ACCs）希望与其余世界的产品有所不同。如我在本书第13章中所概括的，在战后同盟国（现在已不包括苏联）所商谈的举措中，存在着一个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假定，否则就不是自由贸易。这样，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TO）的失败，因为美国国会的不情愿，很快就被创建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所矫正。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自己之间执行了多边缩减关税的道路。

这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稳步实现更大的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推动，



仍然保留了19世纪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惟一的生存原则。对于扭转未来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命运，它将被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在黄金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中，是保护主义和弗里德里克·李斯特确定了战后经济的精神实质。<sup>[6]</sup>西欧六国建立起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对于理解这一观点是很有帮助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一个李斯特主义的组织，对外实行反对进口的高关税壁垒，而对内则实行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日本也使用了一个高度管制的贸易政权，以加快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于是，甚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承诺自由贸易更多的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弊病，因为最大的资本主义美国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阵营中。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体制的扩展，变成了美国经济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这将是一个决定性的长期承诺。

同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同——这次美国抛弃了它的孤立主义立场，积极从事战后欧洲的重建。马歇尔计划是一个慷慨和强大的干涉计划，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是有利于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甚或不是有利于法西斯主义的复归，它改变了西北欧甚至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平衡。转移支付的规模——达到了美国GDP的5%——是异常巨大的，这在其后政府间主动的转移支付中，是再也没有重复出现过的。这种转移支付对美国利益阶层和对那些接受者一样有利，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凯恩斯主义逻辑的力量。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与所有科学领域中的研究及高等教育的巨大发展是一致的。社会科学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自然科学。经济学不再是使人感到沉闷的科学，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种发展。它通过可操作的、数学的/量化的研究方法为自身建立起了社会科学中最“科学的”学科之声誉。经济模型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经济学家作为经济顾问扮演着重要的和看得见的角色。他们以大量的研究巩固了市场失灵的范式，并通过教科书和专题论文传播这种研究。这种占优势的研究方法是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经济日益被比作一部机器，一个控制论的系统，可以被研究但却要服从于控制和调节。<sup>[7]</sup>计算机在战争期间已经被发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变得更好和更快——尽管体积还比较大。经济学家用计算机建立模型，以模拟经济或它的部门。列昂惕夫（Leontieff）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之前，已经开创性地进行了投入—产出分析。这要求要对现代经济中的各种交叉关系，制定出详细的图表。当然，它对许多国家制定军事计划和经济增长计划，也是有用的。这是对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方法的实际落实，也是对那些对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





提出质疑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回答。<sup>[8]</sup>

在战争期间，同盟国拥有的货船运载能力非常有限，许多目的地需要穿过大西洋才能到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新的解决“运输问题”的数学技术由荷兰的经济学家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乔治·丹兹格（George Dantzig）同时开创出来。这种解决运输问题的署名，就是大家知道的线性规划。<sup>[9]</sup>一些线性的目标函数必须求出最大值（运送货物的吨数）或求出最小值（货船空闲的时间）。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轮船的装载能力，运送的距离，它们可以达到的最大速度，等等。后来表明，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值”也是经济学家要解决的经典问题。消费者要使效用最大化，使支出最小化。约束指可支配收入、所达到的福利水平、配额等，只要是在具备商品的情况下或者公司要实现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这些条件是生产技术等。线性规划通过使用线性方程，使手头的问题得以简化，但是这很快就被两位普林斯顿数学家哈罗德·库恩（Harold Kuhn）和亚伯拉罕·塔克尔（Abraham Tucker）所超越，他们解决了非线性规划的问题。<sup>[10]</sup>近70年以来，甚至自从边际革命开始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是用普通理论的术语进行讨论的，现在变得精确和可计算了。经济学一直是与数学的联姻正在生产出丰硕的理论和实际方面的成果。因而在紧接战后的时期，它导致了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坏。又过了30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能够进行反击。

反对意见认为，对物质关系进行定量计算会忽略市场价格，因而导致不合理的配置，这种意见也得到了保罗·萨缪尔森——他那代人中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强有力的回答。萨缪尔森表明，与这种物质配置相对应，一个“影子”价格系统被自动地决定了。这是对数学的线性系统所做的一个简单但富有想像力的应用，而且它对市场失灵范式和自由经济范式之间论战的影响是深刻的。价格不再仅仅产生于市场，就像米塞斯和哈耶克所主张的那样。影子价格可以使用数学的线性系统加以计算。如果这些系统是适用的，就可以将影子价格与市场价格进行比较。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存在着市场失灵，影子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就会存在差异。但是有时市场并不存在——举例来说，在公司或者政府机构内部，对于清新的空气或者是公司内部或各个部门之间的配置而言，就不存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只存在影子价格。因此，这样一组影子价格要比那组市场价格高许多。这不能作为证明社会主义者在经济上无知的例子，物质配置的方法只是导致了对市场失灵论点进行的一般

性概括，因此它比市场配置变得要更加强有力。<sup>[11]</sup>

于是，经济学把社会科学引向了一个中央经济集权论的方向。对保护市民的福利而言，国家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如果不是至关重要的——代理机构。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和政治实体，国家成为一个令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着迷的对象。亚当·斯密所阐述的具有自主性的早期市民社会的观念，如今被抛弃了。社会不再被视为一个有机的实体，而是被视为一个机械的实体。列宁曾经把俄国的发展描述为一个有机的过程。资本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与对斯密、黑格尔或门格尔来说一样，是一个自我组织的有机过程。现在，甚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经济是一个以先验的设计进行建构或调节的机器或建筑物。国家要控制经济。它要对解决社会问题负责——婚姻、离婚、青少年怀孕、犯罪，等等。社会科学要为这种改革、调节和控制提供工具。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很乐意成为国家目标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应该是批判性的这一观念（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失去了人们的偏爱。我们现在都是实证主义者。

西方资本主义在黄金时代的经济绩效是引人注目的。产出增长率平均为3.8%，而1914年之前的最好绩效为1.4%——相对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是不可思议的。劳动生产力快速增长——年均5.5%——而且实际收入也是如此。这里不仅存在着充分就业，而且存在着过度的充分就业，这导致外国工人的入境移民，呈现出单一的净流入，这在西欧国家是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甚至在国内，也存在着大量的人口从（低生产力）的农业向（高生产力）的制造业转移。这导致乡村的衰落和都市的繁荣。美国南部的黑人小佃农移居到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在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候，北方已经解放了南方的奴隶，但是继续把他们限制在南方。现在，80多年之后，他们突然在北部城市中冒了出来。农业实行了高度机械化，为新的化学肥料的投入所改造，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爆炸了。粮食价格的跌落横扫资本主义国家，而农民不得不游说议员，争取政府以担保价格购买他们的剩余粮食。

但是，低价格对于消费者来说意味着更好和更富营养成分的食物。在战争之后，北美很快出现了一个婴儿潮。婴儿死亡率极度下跌，而寿命却在增加。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女人开始比男人享受更高的生活预期——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确切的信号。她们在战争期间已经工作，但是在经过一个短暂的、低工资/秘书性质的工作经历之后，曾被鼓励回到一个妻子—母亲的角色。家庭苦差事被交给了新的小器具——电冰箱、洗衣机、洗碗机、

吸尘器，它们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流行的时尚，先前懒散富人的独占之物，现在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下层阶级结构之中。妇女有了专门杂志可以来渲染她们所关注的问题。如果她们仍感觉在这些年间被关进了笼子内，那么它至少是一个镀金的笼子。

但是男人，尤其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男人——或者蓝领工人，用美国的表达方式来说——仅受过基础教育但拥有良好的体力的男人，在黄金时代拥有最好的时光。工会成长了，拥有为数庞大的会员，并被认可有权在车间进行工资议价。一个年轻男人在15岁或16岁离开学校，可望得到一份“3个48”的工作：48年的雇用期，每年48个星期，每星期48个小时。每周工作的小时数，当然包括加班时所得到的比平常更高的工资。工会向他们的会员保证，他们的实际收入将会逐年上涨。他们可以期望提高生活水平，在足够宽敞的房子供家庭居住，可以拥有耐用消费品，甚至是一辆汽车，可以送他们的孩子到比较好的学校读书，甚至是送进大学。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开始发现了中产阶级化的工人（bourgeoisified worker）。这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终结吗？这是马克思的终结吗？

许多社会科学家，甚至政治家都是这么想的。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一位聪明年轻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黄金时代的高峰时期写下了《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一书。<sup>[12]</sup>凯恩斯很高明地解决了失业问题，当然，稳步的经济成长也得到保障。经济增长化解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关于他们在收入中应得份额的斗争。蛋糕正在增加，所以即使所得的份额是一样的，或者甚至有所减少，你也可以吃到更多的蛋糕。克罗斯兰重新提到了英国社会主义的美学传统这个论题——例如，威廉·莫利斯——要求得到一个更大的公共份额，以改善消费的质量：为艺术、市政当局经营的公共咖啡店以及设计良好的住宅楼提供资助。

在美国，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成了黄金时代人们广泛阅读的主持弥撒的神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美国资本主义》（*American Capitalism*）中已经看到，大企业和大工会之间的均衡正在美国形成。<sup>[13]</sup>他关于这种势均力敌的力量的看法是：马歇尔关于需求与供给之间静态均衡的观念已经转化为现代的观念。这里存在着静止，但静止中存在着和谐和均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加尔布雷思写了他最著名的《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一书，它进一步指明了美国存在的问题。美国不像在西欧，几乎没有可以借助的公共产品生产。没有市政的社会主义，没有对



艺术的资助，甚至没有像样的道路和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也许，他关于道路所说的话是错误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刚刚实施了一项庞大的高速公路建设计划，但是他预知了私人的富足中所存在的公共部门不足的悲惨情境。然而，他也许没有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的优势——它的生产力，它的盈利能力，它的增长潜力——都强烈地依赖低水平的公共税收，这是美国资本所喜欢同西欧资本进行比较的地方。无论是晚些时候，还是当盈利能力受到影响时，没有什么人看到这一点。随着时间流逝，每个人都在想，我们可以拥有更丰富的一切。不仅马克思已经被消灭——甚至研究稀缺的微积分学也是多余的。

对一代人来说——任何 1920 年之后与 1945 年之前出生的西方人——黄金时代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正常形式，既有增长与充分就业，福利国家也不断扩张。他们长大后认为，为保证充分就业而进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特征。的确，许多人认为——并且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提供充分就业，而不是追求利润。贸易周期和大量失业已经被凯恩斯永远消除了。但是也有一种信念——正如碰巧发生的那样是错误的——认为凯恩斯曾经说过，预算赤字不仅无害，而且是有益的，公众债务无关紧要，因为那是我们欠自己的债。凯恩斯自己主张，隔一个周期就要平衡预算——清理繁荣中的剩余和衰退中的赤字。但他也并不介意债务负担；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都强烈感到要用低利率借款来收回英国的战争债务。他认为这是可行的，因为他担心储蓄的大量充斥。在这方面他不仅错了，而且过于被英国两次战争期间的经历所束缚。只是过了一些年之后，这种谬误才暴露出来。公平地说，尽管是英国人，但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凯恩斯主义者，比他们在美国的同行更像是激进的财政主义者。<sup>[14]</sup>

在 1945 年，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预测，经济将会面临一次战后衰退。新的和自信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正在被展开以支持这些预言。但是碰巧，立即出现了一次战后繁荣，直到 1949 年都没有出现过衰退。这种繁荣有许多原因。一种被抑制的需求是存在的，并且随着婴儿潮开始而增长。人们在战时已经开始储蓄，购买政府债券，现在他们准备要兑现。美国经济已经能够毫不疲倦地对付这场对抗战争，并且为向和平时期的生产转变作好了准备。新的家庭小器具像洪水一般从工厂中流出。家庭搬到市郊的新房子，购买私家车用于交通，购买新玩具——电视——以便娱乐。

凯恩斯主义的预测的失败，并没有摧毁建立模型的事业，但却对其提出了挑战。凯恩斯的新古典主义的批评家——尤其是他以前的老师和皇家学院的同事，A. C. 庇古——辩论说，凯恩斯可能遗漏了一种摆脱衰退的机制，这种衰退在市场上是会自动产生的。萧条时期持续的价格下跌，将增加储蓄的实际价值——真实结余（real balances）。人们将发现自己在财富方面更加富裕——真实结余只不过是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准备去消费它。在庇古看来，凯恩斯并没有重视真实结余在积极影响消费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因此当他展示，削减货币工资或利率不能恢复充分就业时，这正是这种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庇古想要说明的是，国家干预对于充分就业是不必要的。<sup>[15]</sup>

作为一种学院式辩论的理论论据，庇古的理论对凯恩斯进行了第一次“敲击”。它让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有了一条裂缝，通过这条裂缝，可以传达对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更为深刻的批评。但是，当《充分就业法案》被国会通过时，美国的政治家对凯恩斯主义所承诺的过度财政仍是持怀疑态度。一旦冷战开始，许多青年凯恩斯主义者也受到了左翼的感染。对于凯恩斯主义，民主党比它的对手保守党保持了更多的忠诚，但是，即使在民主党的党员中，左翼“自由主义”（按美国的说法）比其余的党员更是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共和党和保守的民主党使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陷入困境之中。只是在肯尼迪任总统期间，经济顾问委员会才可以说全是清一色的凯恩斯主义者。当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当选总统的时候，他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使他自己成为也许是第一个凯恩斯主义的共和党总统。<sup>[16]</sup>

在充足储备的财政政策与消极的货币政策结合在一起的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更是一场英国的实验。国际收支差额的约束正在束缚着英国的决策者，为了协调充分就业和固定汇率，就必须经常变换财政姿态：停停走走。英国在战争期间积累的外债，也使得严格的资本控制必需。凯恩斯在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筑中提供了所有这一切。对于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来说，货币贬值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是一服有魔力的药剂，但是，唉，却是一服被禁用的药剂。两次贬值——1949年和1967年——都付出了政治代价，但是在经济学家中却仍然流行。

美国人并不存在国际收支差额的约束——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不存在。他们有资本可以输出，有巨额的黄金储备，这些可以按35美元1盎司



作为外汇交易储备用来出售。美国经济被证明是十分强大的，足以承受如下负担：重整军备，进行朝鲜战争，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维持一种积极的约定的军事态势，而且仍然能够提供不断上升的消费支出。只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收支差额的约束才开始吃紧。但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可能维持一种谨慎的财政姿态。阿瑟·F·伯恩斯（Arthur F. Burns）作为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并不是凯恩斯的信徒。只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肯尼迪的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才拥护并实行一项有优先购买权（preemptive）的减税计划以维护于 1962 年开始停滞的持续繁荣。这种繁荣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接着麻烦就找来了。

问题出现的一个前兆，是 1957 年—1958 年爆发的温和的衰退。在 1945 年以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失业上升而通货膨胀却没有下降的现象。这不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衰退，而更接近于哈耶克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直警告的那种衰退。但是，哈耶克那时被其他事务所缠绕 [正在完成后来的《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没有人注意到这种反常。对于凯恩斯主义者来说幸运的是，1958 年伦敦经济学院的 A. W. 菲利普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勾画出了失业与货币工资率之间的关系。<sup>[17]</sup> 菲利普斯检查了英国 19 世纪的经济数据。他发现，在 1861—1913 年间，有 6 个半平均大约 8 年一次的周期，他建立了一条可以表达两个基本变量之间的反比关系的曲线。因此，随着失业率的上升，货币工资率将会下降，直到他们到达底线——大约 10%。但是，当失业率下降到零时，货币工资率的上升开始加速。菲利普斯接着试图检验两次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数据，看看它们与 19 世纪的曲线是否相符。没有发现任何相似之处，但是他认为应该存在一种关系。

两位卓越的美国经济学家，后来都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罗，采纳了菲利普斯的方法，并把它应用到物价膨胀方面。<sup>[18]</sup> 利用美国的数据，他们发现了一条表达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关系的平滑曲线。在菲利普斯怀疑曲线是否适合于所有时期的时候，萨缪尔森和索罗一点也没有这样想。这样，在 1960 年，菲利普斯曲线得到命名。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一剂对抗通货膨胀的良药：增加失业。通货膨胀降低一个百分点究竟需要多少失业的问题，占据了许多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的全部心思。初步的结果显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降到零可能需要失业率达到 15%。这样的结果是令人怀疑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探讨一些延伸的和可替代的药方。必须完善这一药方，以使剂量变得合理。但是，很

少有人会怀疑这服药的疗效。毕竟，它有着经验的计量经济学的根据。

在西方，由于凯恩斯主义的胜利而一直保持沉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为这一发现而激动。为了维护工资膨胀，需要保留失业储备军，因而价格膨胀就降低。工资生产率比率——单位劳动成本——是关键变量，而且——像我在本书第5章中所表明的——与剥削率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首先发动的进攻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来自集中在芝加哥大学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牢固联盟。他们从来没有与凯恩斯主义进行过合作，并宣称货币在解释收入波动方面是一个被忽视但却很关键的变量。可以解释周期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收益增殖率，而是货币供应和数量理论。这个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美国大学校园中，是许多人取笑的对象，就像我能够亲自证实的那样。<sup>[19]</sup>但是他们的坚持得到了回报。通货膨胀对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菲利普斯曲线不仅在政治上是不吃香的——尤其是对左翼的凯恩斯主义者来说——而且被证明是无效的。直接控制工资议价和价格设定——收入政策——开始被提倡。欣赏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保守主义者乱了阵形。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着特殊的问题。1964年肯尼迪—约翰逊的减税计划延长了繁荣，但是接着越南战争开始增加联邦预算。那时又存在着劳动力短缺和通货膨胀。美国开始经历较大的贸易逆差，而美元看来被高估了。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要求把自己的美元储备转换成黄金储备，这被看作是他们的权利。美国的赤字使世界遭受美元浪潮的冲击。于是便有了通过对资本流动增加税收来阻止资金外流的尝试。这又导致了对于这种税收的规避。美国银行把自己的美元留在海外；因此欧洲美元市场诞生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开始袭击正统经济学的大本营。庇古最初关于真实结余的异议，与涉及价格的资金沉淀（money deposits）有关。货币与货币政策据说被凯恩斯主义者忽视了，如果不是被凯恩斯本人忽视的话。货币供应不得不被约束以控制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失业与通货膨胀的最佳组合能够被选择出来，也能作为一种均衡加以维持。弗里德曼则认为，工人将在他们的预期中吸收通货膨胀，并哄抬工资。更高的工资，要么意味着更高的失业率，要么——如果政府试图把失业率维持在预先设定目标的水平——意味着更多的开支和更高的通货膨胀。

维持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必须带来对工资议价的控制。改良主义的社



会主义者与凯恩斯主义者许多做法上是重叠的。他们最初是朋友和工会的捍卫者。是一个争论性的问题开始把他们分裂开来。保持充分就业而又不发生通货膨胀，看起来与不受调控的或自由的工资议价是不一致的。在瑞典，这点始终是公认的，工资议价是在国家层次上由三方决定的事情，它涉及政府、工会和雇主。在奥地利和德国，类似的“社会契约”是十分普遍的。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工会是相当脆弱和分散的。雇主们非常不情愿联合起来进行国家层次的工资谈判。“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flation”）成为形容这种政治、工业关系和宏观经济学肮脏混合物的行话。

在这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晚期），货币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答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这看来太简单了：控制货币供应。但是，随之而来还必须消除预算赤字，而由于造成这种赤字的支出是通过市场借贷、并非是靠“印制货币”，因此，要冲销这种赤字，还必须提供金融支持。在许多情况下，货币主义者也是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因此弗里德曼攻击固定汇率体系，认为它给美国带来了太多的问题。在许多右翼政治集团的眼中，公共债务成了怪物，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一定是货币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开始把公共债务视为一个代际（intergenerational）问题。我们借钱，我们的孩子还钱。朴素的凯恩斯主义所具有的简单性被抛弃了。

关于凯恩斯主义消亡的全部故事，还必须等到另外一章，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一问题的性质可能是（或者曾经是）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团体所认识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工资支出导致的通货膨胀，的确是一个利润率的问题。当存在着可以从农村、从婴儿潮中或者从移民中征募的剩余劳动时，生产力将保持增长，工资不会上升太快，从而工资/生产力比率将维持在低水平。这样，劳动收入份额保持不变，而且可以提供合理的利润份额。但是生产力的增长只能通过大量的投资来维持，用新的资本来替代昂贵的劳动。持续的充分就业和强大的工会，再加上与人方便的政府，其结果就是劳动份额的上升。实际工资的增长快于生产力的提高，利润的份额开始受到侵蚀。到20世纪60年代，宏观经济水平的利润率并不是凯恩斯主义模型的一部分。（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出现过一些试图把工资/利润的分割模型化以作为凯恩斯主义模型的一部分的尝试，例如，劳伦斯·克莱因的研究。但是，冷战使这一切都停止了。）因此通货膨胀与利润率的关系是被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被凯恩斯主义





认识到的。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哪一类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派别。在紧随战后的一段时间，共产党在苏联拥有声望，并且垄断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45年之后也曾一度分享政权。他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威望是很高的。这里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尽管非常小），向共产主义者的垄断提出挑战——主要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他们声明自己是列宁和马克思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同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主义进行辩论。争论关于苏联的性质以及国际主义的重要性，不过也涉及西方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冷战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帮助了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随着斯大林进入东欧和东南欧，随着德国被分割，共产主义者开始受到怀疑。但是，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得到了冷战战上的拥护。他们毕竟都读过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并了解铁幕后方面所进行的神秘活动。许多共产主义者作为科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待在大学里，尤其是在欧洲。现在，托洛茨基分子也进入学院，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为人们所接受。艾萨克·多伊彻这位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传记作者就是这类人。詹姆士·伯纳姆（James Burnham），一位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当他写作《管理革命》的时候，已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小头目。<sup>[20]</sup>与斯大林主义者相比，托洛茨基分子更不带正统性，也更少受到质疑。当然，他们也倾向于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奉若神明，但是，他们的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主义的教义式的简单化中解放出来。

1956年，大本营内部本身供认了斯大林的暴行。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尼基塔·赫鲁晓夫作为总书记斯大林的继任者，详细报告了苏联集中营——古拉格——的血腥记录。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这对许多共产主义者和更多的旁观者来说，无疑是引发了一场危机。有关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如潮水一般被释放出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20世纪50年代被广泛应用，尽管英文译本还没有问世。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在斯大林的白痴行为中曾经长期被忽视，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个有着启蒙运动传统的马克思，关注的是异化以及人作为类的本质的重建。<sup>[21]</sup>马克思最初的著作开始被再次阅读。他关于民主的观点，与占支配地位的自由民主的观点不同，被用来同布尔什维克以他的名义所鼓吹的观点，或者列宁和斯大林——事实上包括托洛茨基——所实践的一切进行鲜明对比。一个新左翼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诞生了。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一直是洋洋得意的，似乎不再有什么问题。第三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处于最后的危机之中的教条，比第三国际的寿命还要长。托洛茨基分子并不比斯大林主义者更固守这种观点。新左翼可能是反斯大林主义者，但是在他们看来，列宁仍然是一贯正确的，列宁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仍然被整个地生吞活剥。然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西方左翼学院和激进分子可以看到充分就业，看到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反殖民主义斗争受到关注，其中资本主义——尤其是欧洲资本主义——表现得好像已是很古老的事情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英国在马来西亚和非洲西部或东部，比利时在刚果，以及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所呈现的都是帝国主义的形象。否则，西方资本主义对于反驳列宁的理论就构成威胁。

传统的冷战智慧在苏联达成了暂时的妥协。在为赫鲁晓夫为他们所做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宣传感到高兴的同时，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仍然尊重苏联的军事力量和空间技术。他们不得不承认，工业化，无论如何是一个相当艰辛的历史进程，被苏联实现了。新的非殖民化国家努力要沿着类似的道路进行工业化，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学家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创造了一种增长理论：一种可以操作的、实证主义者的、超越背景的理论。收入增长的出现，是储蓄被投资的结果。投资是新的资本，由于可利用的技术又变成成为追加的收入。相对于现有资本，投资的比率越高，高收入增长得就越多。技术，象征着资本的产出比率——在那时令人惊讶地——被认为是不变量。因此，增长变成了储蓄与资本产出的比率。这是一个简单的一次数学方程。<sup>[22]</sup>

但是，由于增长就是增长，不论储蓄在哪里实现以及怎样实现，苏联的增长绩效也受到它的冷战对手的羡慕。新近达到的增长率从数学上计算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苏联的增长率至少是美国和英国的两倍——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尽管实际上西方也正处于近100年来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这种增长的根源一时间成为人们热切研究的主题，而20世纪50年代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增长差距”，也成了美国政治的烫手山芋。

这里存在着对于敌人的羡慕和钦佩。华尔特·罗斯托，一位专攻英国经济史的经济历史学家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开设了著名的马歇尔讲座。他把它们称为“非共产党宣言”<sup>[23]</sup>，但是罗斯托关于“起飞进入自动持续增长”的观念，的确表达了对于苏联体制的向往。罗斯托把任何一种经济的轨迹分为五个阶段，其中，一旦储蓄与收入的比率达到



10%，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即“起飞”的阶段。但是在更高级的阶段，出现的将是高额大众消费的经济。苏联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但是，罗斯托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与共产主义体制之间存在一种非常有可能实现的趋同。这是无情的指数增长率的逻辑。与自由、财产权和劳动力流动都无关。增长是一个自动的机械过程。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一种奇怪的学说。对于列宁主义者来说，它是对于衰退和最终危机学说的修正主义放弃。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它意味着承认，自由与经济福利是无关的。但是，对于塑造冷战政策的实用主义者来说，趋同是取消敌视的坚实基础——为了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正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民主党——支持趋同，因为它告别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恶毒的反共产主义，杜勒斯在艾森豪威尔的大部分任期内担任美国的国务卿。共产主义可能是邪恶的，但是，这是“他们的”体制，并且在运行着。极端的经济决定论者（始终否认马克思）甚至希望，繁荣可以导致苏联的民主政治。这是旧的教义问答手册的另一种翻版：财产——中产阶级——民主。一旦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冰箱和汽车，他们下一步就一定会要求民主。

当罗斯托在越南战争中成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政策顾问时，他很快参与对自己的论点的否定。正是这一战争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使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更为流行。持续的充分就业在各地都强化了对政治平等的需求。在美国，是有色人种，按照他们当时的称谓（随着政治风尚的变化，又被他们的贬损者称为黑奴，后来又被称为黑人，或者非洲的美国人，或者有色人种），在南方和北方游行，要求公民权利。古巴革命在靠近美国海岸的地方造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它使拉丁美洲人意识到，对他们所经历的各种专制形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肯尼迪建立了拉丁美洲民主联盟和一个和平小分队，把美国青年派往发展中国家，以展示美国的和平反共产主义的面目。但是，肯尼迪于1963年去世，而且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胶着状态与其通货膨胀的压力和贸易逆差几乎同时发生。被强制在前线服役的学生发现，美国这个几十年来一直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已不过是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面具下，使旧式的法国帝国主义永存。越南农民成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替罪羊，而这种意识形态是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白宫所实施的。现在受到攻击的，轮到了工会、黑人和穷人的朋友——左翼民主党了。



美国的激进运动从来没有转为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他们拥有自己的传统可吸收——例如，亨利·戴维·梭洛（Henry David Thoreau）开创的传统。但是它们开始质疑军事—工业复合体，质疑跨国公司与政府机器结合的复杂而又具有寡头统治性的权力结构。他们把暴力和非暴力都当作反抗的方法来采取抗议。从1964年在伯克利大学，到196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再到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民主党大会，激进的学生掀起了反抗的狂潮。

它得到了1968年5月巴黎学生造反风暴的回应。法兰西被震动了，学生们提出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法国共产党否认了学生与自己有关，持不同政见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毛主义分子的集团繁盛起来。马克思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被重新发现；自治、自我组织和反对官僚制度成为左翼的新口号。一时间，甚至看起来好像法国陷入了危险境地。不久，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的鲜花怒放，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一种非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可能夺取欧洲，包括东部和西部。

但是，罗斯托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体制将从两个方面粉碎叛乱。在巴黎和布拉格，骚乱学生和好战的工人证明，要动摇的不是各自的体制。通货膨胀和对利润率的侵蚀，对西方来说是更严重的威胁。在那时，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欣欣向荣的。到处的大学都有教授马克思主义或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对黄金时代自鸣得意的心满意足正在逐渐消失。罢工，违抗领导的工会斗争，商店服务员运动，反歧视斗争，开始不断增加。在学生与工人之间不存在意见一致的地方，每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抱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年轻的和那些不受旧的正统所约束的，他们回到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体制来批评，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等死的体制来看待。

持续的充分就业开始影响利润率。第一个这样的成果来自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安德鲁·格林和罗伯特·萨克里夫的分析，这一分析发表在《新左翼评论》上，而这一刊物则是1956年之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动荡的产物。<sup>[24]</sup>这是按宏观经济的数据来做的一份谨慎的练习，但是更多地集中在收入方面而不是在产出或支出账目上。收入数据（工资、年薪、利润和租金），比支出数据更难获得和更难计算（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必须研究所得税和利润，这成了一个难题。但是，要计算利润率，人们必须了解股本的价值。这是统计学的噩梦，因为折旧和废弃是不可靠的概念。在不同公司与不同国家，随着时间的不同，会计行为是不同的。财会人员所谓的那种折旧有税法



依据，很少符合经济学家用“折旧”所意指的东西。因此，在大量的宏观经济研究中，从那时到如今，利润计算往往被避免了。

但是，格林和萨克利夫作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同时也拥有锐利的批评精神，他们想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并没能穿越价格—价值转化的灌木丛（而这也使他们因缺少纯粹的研究受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同道的更多批评），但是他们的确建立了计算利润率的资本测量尺度。他们能够显示，在美国和英国，利润率在20世纪70年代显然低于60年代——美国可以看到，其利润率从1960年的9.9%，上升到1965年的13.7%，然后下降到1970年的8.7%。对于英国而言，利润率从14.2%（1960年）下降到11.8%（1965年），然后再下降到8.7%（1970年）。当然，这种趋势并不是普遍的。在联邦德国，利润率分别是23.4%（1960年）、16.5%（1965年）和15.6%（1970年）——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得并不明显。在日本，利润率从19.7%（1960年）上升到22.7%（1970年）。法国看到了利润率的复苏：1.9%（1960年）、9.9%（1965年）和11.1%（1970年）。

相对于日本或欧洲大陆来说，通货膨胀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面临的严峻问题。所不同的仅仅是工资议价机构，与其他地方的社团主义体制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体制更分散化和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真正的问题是英国和美国出现的对利润率的侵蚀。英国的情形是容易得到解释的。它在战争中受到很大的创伤，而且由于严峻的国际收支差额约束，不能够重新恢复它的资本储备，这点我在上面已提到。但是，美国拥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实力。它的工业到处都处于领先地位。事实上，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中已经指出，新的技术结构允许大的公司，像汽车巨头福特公司、通用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左右着消费者的需求，并控制整个市场。<sup>[25]</sup>现在，美国的工业正面临着来自欧洲和日本生产商的竞争。在汽车工业领域，大众汽车公司从德国，菲亚特汽车公司从意大利，标致（Peugeot）公司从法国——小型而且节油的汽车——正在袭击美国市场，同样也占领了他们自身的国内市场的很大份额。美国不得不增加投资去参与竞争，并在面临实际工资上升的时候削减成本。

所有这些压力在利润率的衰退中都得到了反应。格林和萨克利夫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们比其他任何人更早地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曾经是凯恩斯主义者或者是货币主义者的话，他们将会关心工资、政府赤字和货币供



应。这些变量虽然重要，但它们都是利润率的深层问题所引发的症状。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忽视了利润率。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某些年轻的、更具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到利润率。这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并不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主题来思考，他们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资本主义市场。利润或利润率在他们的分析中没有任何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关注资本主义，如果想要加速它的灭亡的话。

资本主义的新危机即将来临。在1971年，当这篇发表在《新左翼评论》的文章出现时，它仅仅吸引了轻微的关注。我记得一位伦敦经济学院的资深经济学教授曾问我，是否订了《新左翼评论》，并问我，是否可以把他听说的那篇文章给他看。但是，在1971年，甚至通货膨胀也没能摆脱两位数。在英国，新当选的保守党政府就受到警告，失业率还在上升，那一年以后，失业人数超过了100万，这个人们“很难接受的”数字，吓得政府赶快反向转弯，从而出现了更大程度上的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仍然是官方政策的理论依据。

越过大西洋，美国同样面临着自己的问题。越南战争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而且很快扩展到柬埔寨。尼克松正准备利用中苏分裂，并主动向毛泽东作出友好示意。但是，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决定放弃自己作为美元标准汇率捍卫者的国际责任。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国将不再按照35美元1盎司的价格购买或出售黄金。凯恩斯所精心构筑的实行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这样灭亡了。反凯恩斯主义者刺穿了城堡的墙壁。浮动汇率——被作为米尔顿·弗里德曼宠爱的话题，但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经济学视为愚蠢的想法给予抛弃——如今又回来了。

#### [注释]

[1] 论述凯恩斯主义黄金时代的文献非常广泛。在纪念《通论》出版30周年之际，R. 里卡契曼 (Robert Lekachman) (1966) 出版了 *The Age of Keyn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Andrew Schoenfeld's 的著作, *Modern Capitalism* (196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出现在黄金时代的巅峰，是凯恩斯混合经济理论的最好的典范表达的方式，也非常机敏。

[2] 关于社会党国际的历史，见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3] 关于非殖民化, 见 V. G. Kiernan (1982), *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 1815—1960*, Fontana, London.

[4] A. V. Dicey (1914),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8th edition), Macmillan, London. 这是一本经典的自由主义的教科书, 首次出版于1885年。再版为 a Liberty Classic by Liberty Classics of Indianapolis, IN (1982)。

[5] 有关普雷比希—辛格假设, 就像它被称呼的那样, 最好的说明见 John Eatwell et al. (eds) (1990),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Macmillan, London.

[6] Friedrich List (1837/1856),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Sampson Lloyd, Longmans Green, London.

[7] 有关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构建, 是和劳伦斯·克莱恩 (Lawrence Klein) 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他在1984年由于这项工作获得了诺贝尔奖。有关简单导论, 见 Meghnad Desai (1976), *Applied Econometrics*, Philip Allan, London.

[8] 投入—产出模型在紧接战后的时期为美国政府所使用。在艾森豪威尔执政之后, 这种方法在制定民用经济政策中被抛弃, 但在国防计划中还在继续使用。我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朋友被邀请去为华盛顿的 PARM 项目做投入—产出分析工作。他没有被告知, PARM 项目是支持 Post-Attack Resource Management 的。在美国之外, 投入—产出模型继续取得了成功。列昂惕夫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9] George Dantzig (1963), *Linear Programming and Extens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库普曼斯与苏联经济学家 L. 康托洛维奇 (Leonid Kantorovich) 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也可见 C. Tjalling Koopmans (ed.) (1951), *Activity Analysis for Production and Allocation*, John Wiley, New York.

[10] Harold Kuhn and Abraham Tucker (1951), “Nonlinear Programming”, in Jerzy Neyman (ed.) (1951),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Berkeley Symposium o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1] 影子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 于1949年首次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为兰德公司所写的备忘录中。出版物见: “Market Mechanism and Maximization”, in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Samuelson, Volume 1*, MIT Press, Cambridge, MA, pp. 425-492.

[12] Anthony Crosland (1956),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Jonathan Cape, London.

[13] 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52),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oston, MA; (1958), *The Affluent Society*, Hamish Hamilton, London.

[14] 凯恩斯在《通论》出版之后关于政策的观点, 在 R. 斯凯德尔斯基所写的传记的第3卷和最后一卷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R. Skidelsky (2000), *John Maynard Keynes*:

*Battling for Britain 1937—1946*, Macmillan, London. 但是, 甚至在早些时候, 对于凯恩斯观点的拥护也是十分小心的: Harris (ed.) *The New Economics*.

[15] 庇古关于真实结余的论点后来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见 Donald Patinkin (1949/1965), *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 An Integra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 Theories*, Harper & Row, New York.

[16] 美国采纳凯恩斯主义政策得到了彻底的描述。见 Herbert C. Stein (1969),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7] Phillips “The Relationship...”.

[18] Paul A. Samuelson and Robert M. Solow (1960), “The Analytics of the Anti-Inflation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 pp. 177—194.

[19] Milton Friedman (ed.) (1956),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这是这场论战的第一声礼炮。其高潮见 R. J. Gordon (ed.) (1974), *Milton Friedman's Monetary Framework: A Debate with the Cr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到了1974年, 弗里德曼已经赢得了论战。他也由此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

[20] James Burnham (1942),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or,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Now*, Putnam, London.

[21] 有关早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的叙述, 见 Eric Fromm (1967), *Marx's Concept of man*, Ungar, New York. 也可见 Robert Tucker (1972),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2] 就增长理论而言, 基本的贡献是由罗伯特·索洛作出的, 见 Robert M. Solow (1970), *Growth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for an explanation.

[23]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24] Andrew Glyn and Robert Sutcliffe (1971), “The Collapse of UK Profits”, *New Left Review*, 66 (March-April). 这是第一篇注意到利润率下降的文章。这一观点后来被扩充了, 见 Andrew Glyn and Robert Sutcliffe (1972)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Profit Squeeze*, Penguin, Harmondsworth; and Andrew Glyn and John Harrison (1980), *The British Economic Disaster*, Pluto Press, London.

[25] J. K. Galbraith (1971),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Houghton Mifflin, London. 另外的批评也可见 Aucrebach, Desai and Shamsavri (1988), “The Dialectic of Plan and the Market”.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15 章 社会主义的正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25 年，是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声誉达到顶峰的 25 年。但是像凯恩斯主义的情形中一样，它的自我毁灭的种子也在这一期间撒下了，虽然列宁主义体制的最后灭亡是后来的事情，但它的名誉却在这一时期结束之前已经开始不断丧失。在 1917 年，用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解放欧洲，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期待，尽管俄国以外的革命到处都遭到失败，但信奉这种解放行为的观念还是持续活跃了一阵子。接管东欧政府，废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强迫接受斯大林主义的政体，是一场悲剧性的玩笑，一场反对自由主义的反革命。这不过是沙皇与哈普斯堡皇室及霍亨索伦王室分享欧洲东部和中部大陆的旧欧洲政治的回声。



共产主义用诸如人民民主政治之类的虚伪的花言巧语打扮自己。不过，由于同盟在战后并不想破裂，因此，一个有影响力的苏维埃地域的存在被默许了。

不过，尽管它是反革命的，共产主义在随后的战后时期享有很高的声誉。它被认为是一种成功，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药方。它的追随者和政治上的同路人增多了，尽管在美国和西欧到处存在着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它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很高的威望，是由于中国革命，而且——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共产党对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也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因此，冷战一开始，就结成了集团。法国的新闻记者蒂博·门德（Tibor Mende）聪明地给正在去殖民化和依旧被殖民统治的国家贴上了第三世界的标签。这样，西方就成了第一世界。而苏联集团则成了第二世界。如此贴标签尽管有缺陷，但它却获得了自己的生命，甚至变成一种强有力的力量。第三世界就是这样的力量。立即引发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后目的地是否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拥有帝国的力量，塑造了（一些人可以说是误造了）这些国家反殖民主义的精英的意识。在许多国家，也存在着一个主张自由主义和宪政的派别，它们吵闹着要求独立，但是对这些运动的压制，产生了激进的左翼派别，从而影响了走第一世界的道路。这个派别的一部分，是具有第二国际传统的改良主义者，但是西欧的社会党政府的行为把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赶上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向。这样，在第三世界谋求精神和政治霸权方面，就至少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三种立场：倡导自由立宪制的前资本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宪政社会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和前共产主义者。

随着一些国家在1945年和1970年间去殖民化，实现权力过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种立场会登上顶峰。印度——对第三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或多或少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过渡，没有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领导下，自由立宪主义者与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在国大党中实现了结合。正是在印度，许多早期关于经济发展的思考被作为政策得到执行和试验。也正是在印度，那种在两大集团间保持不结盟的观念被首次提出；这增加了第三世界的凝聚力。还正是在印度，一种民主政体与带有计划的混合经济体制，作为一种政策框架受到了最认真的对待。第三世界雄心勃勃地要开创自己的道路——既不是第一世界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第二世界的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

但是，第三世界的经济政策更偏向于反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尼赫鲁吸

收了英国反对贸易和货币的绅士气派。印度的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开始正式与进口替代政策联姻。新兴工业部门的公共所有制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在工业化中充当领导的角色，而计划就是它的工具。印度并不是没有自己本土上的资本主义文化。在19世纪50年代，贾瓦蒂·布雷伊姆（Gujarati Brahmin）在阿美达巴德（Ahmedabad），就已经以棉织工厂的形式开创了印度的近代工业。经过许多动荡之后，在20世纪早期，印度获得了征收自己的关税的权力。在印度于1947年取得独立的时候，它已经拥有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都堪称最大的本土资本家阶级——商人、企业家和金融家。实际上，如果以工业输出量来衡量（不是人均资本），印度在1945年已是世界上的第七大工业国。<sup>[1]</sup>

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印度已经被英国的统治解除了工业化能力，并变得穷困。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看，比如说200年，印度在1950年比它在1750年更穷，尽管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期，收入的计算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是印度的经济学家，后来的芬斯伯里的自由主义的下院议员达达巴海·内奥罗吉（Dadabhai Naoroji），在他的《印度的贫穷与非英国人统治》（*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中率先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印度的财富不断地通过“排水沟”（drain）进入英国的保险箱，从而使其遭受损失。<sup>[2]</sup>印度的贸易顺差已经通过“国内费用”（home charges）——白金汉宫所征收的管理帝国的费用所吞没。内奥罗吉的批评得到了罗姆施·钱德拉·达特（Ramesh Chandra Dutt）的支持，他是印度政府机关的一名文职人员。他谴责印度的土地占有和使用体制，认为这是导致乡村贫穷的根源。在孟加拉，那里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拥有惟一永久的税收征收权，在19世纪已经很繁荣，因为农业生产创造的剩余被留用于土地上。然而在别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所引进的各种土地制度都把增长的剩余作为政府税收来吸纳。

到1950年，乡村的贫穷也吞没了孟加拉。大萧条的年代，使许多农民陷入破产，负债难以偿还。印度的人口在20世纪前50年上升了60%，而它的农业产出则几乎没有上升。可食用的粮食在20世纪前50年中一直在下降。因此，当城市地区已经享受所有新兴工业和商业的好处时，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却加剧了。印度已经在阿美达巴德和孟买建立了可以进行国际竞争的纺织工业，也建立了初级的钢铁工业，但是缺少机器和耐用消费品。因此，尽管印度决定实行工业化，但并不是建立在它已有的工业基础之上。通



对比较优势——出口农业和轻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进行剥削而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也被拒绝了。对贸易条件和在西方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市场采取悲观主义，导致印度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这样，印度就只能扩建自己的机器产业（第一部类），限制“非必需的”产品进口，而且对大的私人公司实行管制，因为它们易于行使垄断性的权力。李嘉图被拒绝了，对他的喜爱程度不再像喜欢马克思和斯大林。

印度在走这条路时并不感到孤独。许多拉丁美洲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和巴西——也采用了这个策略。亚洲和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在取得独立时，也研究了印度的发展政策。实行进口替代，让公共部门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这一发展处方成为一个公认的标准。政府不得不在各种环境下为脆弱的资本市场动员储蓄。几乎不存在私人外资流入边缘地区的前景，就像1914年以前的年代所发生的。这就很快需要外国的帮助——政府对政府的资本转移——因为国内的储蓄不能满足野心勃勃的工业化任务的需要。由于冷战，在两个阵营都获得了帮助，每笔贷款都是既出于政治的目的，也是为了经济援助。

在这样的气候中，市场差不多像私人资本主义一样被拒绝。价格、利率、汇率被管制或固定。世界银行乐意提供这种方式的支持，共产主义的捐赠人也一样。西方大学在帮助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它们的计划模型以及设计它们的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方面，都扮演了领导角色。西方的增长理论在实现第三世界经济增长的任务中变成一种关键因素。

然而，对于这种混合经济策略，存在着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攻击。在他们看来，拒绝或者管制市场还是不够的。如果想要增长，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拒绝资本主义本身。在这期间，出版了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即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sup>[3]</sup>巴兰，这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无法动员潜在的剩余，而这些潜在的剩余是以浪费的消费、奢侈的工业、官僚制、资本外逃和税收逃避等形式存在着。这类剩余如果被动员起来，是可以消除储蓄的匮乏的。但是，他也指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将不会允许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范围的发展，它们害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廉价的产品的竞争。这是因为，由于国内缺少投资机会，因此易于出现长期停滞和增长缓慢。这种长期停滞的观点来自阿尔文·哈森（Alvin Hansen），一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他曾经是给凯恩斯理论通报信息的使徒。



他预见到发达国家中的过度储蓄和不足投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停滞，将使这些国家在贸易方面采取保护政策。因此，贸易导向型的增长道路，或者说私人放任政策的资本主义，并不会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为了增长，它们必须完全拒绝资本主义。

巴兰的著作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有着非常的影响力。在他写这本著作之前，也就是在1960年，更多的国家正在获得独立。中国已经显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能出现共产主义革命。它已经实施了激进的土地改革，而且很快通过农业合作化进入人民公社。它在朝鲜战争中，已经受了美国军事力量的考验。毛泽东承诺将很快赶上美国，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如果说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对手——一个是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另一个是共产主义专政——那么它们之间的竞赛就成了冷战的一种外围翻版（尽管印度选择了不结盟）。中国，据说是显示了共产主义在发展方面的功效。

巴兰论点的另一条线索，在拉丁美洲的背景下，被安德烈·古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进一步采纳。<sup>[4]</sup>古德·弗兰克论点的主旨是，欧洲和美国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导致了南美洲的倒退和不发达。西方的资本，由于参与于榨取性产业（如智利的铜），并通过隐瞒转移定价来压低原料价格，因而实现了剩余向北方转移。这是对印度“排水沟”理论的一个摘要重述，但是应用于工业资本主义，而不是应用于帝国主义。由此，跨国公司在这些榨取性产业中的利润就变成了纯粹的剩余——不劳而获的租金。

这样，巴兰和弗兰克颠倒了19世纪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认为，资本主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会最终毁灭——但要到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所希望的最后阶段。由于赞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们忘记了他与民粹派的争论。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新殖民主义）中，资本主义只是从事破坏，而不进行创造。因而——如果引述古德·弗兰克《序言》的前面几行的话——“我和保罗·巴兰一样相信，资本主义，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它在过去生产着不发达，而且现在仍然生产着不发达。”<sup>[5]</sup>

在全球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无论在什么地方运行，资本主义的积累帮助的是北方，损害的是南方，南方成了这一过程的牺牲品。这条有关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对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以及跨国资本都怀有深深的疑虑。

这里存在几个悖论。在19世纪击败了伊比利亚的帝国主义之后，拉丁美洲在整个20世纪在政治上是独立的。相对于亚洲（除日本之外）和非洲，



它是繁荣的——是一个中等收入而不是一个低等收入的地区。科林·克拉克 (Colin Clark) 在他 1940 年出版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中, 把阿根廷列为五个最富有的国家之一。<sup>[6]</sup>当然, 在南美洲存在着许多土地分配方面的巨大的不平等——除墨西哥之外。当然, 墨西哥在 20 世纪早期就进行过自己的农民革命。拉丁美洲已经在两次大战期间享受到工业化的涌流, 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之前, 它可以算得上是具有适度的繁荣。

如果从国内的和结构的问题——土地分配、地区性的不平衡的工业化、不民主的政府以及操西班牙(葡萄牙)语的统治阶层对土著团体的种族歧视等问题出发, 是不可能分析拉丁美洲的落后的。但是避开所有的这些, 就会把罪孽固定在外部代理人身上: 世界资本主义。这是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甚至精英也会同意, 拉丁美洲的大学正在向人们推销巴兰—弗兰克的论点。

古巴革命强化了这种情绪。现在美洲有了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古巴是那样的小, 又靠近美国, 并且很久以来一直是美国的运动场 [回想一下《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现在它拥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府, 而且坚决地采取了一条反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事件引起了惊慌, 美国的不正当行动证实了巴兰—弗兰克的论点; 拉丁美洲受到美国佬的非正式统治。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如今已经持续 40 年。美国人对美洲共产主义叛乱的警告, 导致它对危地马拉、智利、巴拿马、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许多其他国家事务的大量干涉。但是, 美国不仅仅挑选上拉丁美洲, 它也轰炸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到 1945 年, 美国从自己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传统变成帝国主义的圣像, 这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整整一代的青年男女来说, 是美国管理当局连续遵循灾难性政策的一个后果。是美国的国务院、五角大楼和白宫“最优秀和最光明的人” [用大卫·哈伯斯塔姆 (David Halberstam) 所写的关于美国在越南政策方面的著作的标题来说]<sup>[7]</sup>, 制定了这些欺骗性的政策。在构造一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时, 美国把自己的历史忘记得差不多了。在这一事业方面, 大学被军事—工业复合体所诱使, 要它们的研究服从于政府目标。它们公开或私下接受委托, 操纵自己的研究议程——更可悲的是, 一些学生也参与其中的研究——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当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叹惜公共资金为数太少时, 中央情报局成了科学艺术院的强大而秘密的赞助者。它赞助《撞击》(*Encounter*),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期刊, 它可以支付反共产主义的作者巨额数目的费用, 以使他们加入这一事

业。它还支持抽象的绘画和歌剧，甚至投资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中心，一些非常优秀的关于印度经济计划的研究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美国的公司资本主义和国家安全机器盗用了美国文化的最优秀方面。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生发动反叛就不足为奇了。<sup>[8]</sup>

美国设法在不增加一英寸版图的情况下赢得帝国权力的名声，为做到这点，与其说它靠从其他国家榨取任何剩余，毋宁说是靠花费美国纳税人的大宗钱财。在最长繁荣期间的中间阶段，撇开在战争期间把钱花在贫穷方面不论，美国激进的经济学家都能够对自己社会的结构问题发起攻击。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这两位资深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中就提出过一种领先观点。<sup>[9]</sup>在他们看来，美国社会所拥有的剩余足以解决解决贫穷问题和向种族主义开战，但是，是“社会积累的结构”——如一本稍迟出现的书给它贴的标签那样——注定了美国要受这些问题困扰，尽管它很富有。美国人的批评针对的是国内问题；至少对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没有外国力量应当为其疾病受到责备。

美国新一代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从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对苏联既没有肯定的也没有敌对的情绪上的依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来自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来自同时代人对于自己社会的批评。他们也很关心（政治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和影响力的连锁网络。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在回到美国激进主义的反垄断主义和反同业联盟的传统：他们的路易斯·布兰德斯（Louis Brandeis）的传统。他们把美国资本主义的寡头垄断的性质，视为安逸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根源，这种军事—工业复合体转而把税收制度扭曲为从穷人那里获利，并把它付给大公司。<sup>[10]</sup>

对苏联的漠不关心，有助于美国激进分子避开了他们的西欧同志所遭受的外伤。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在国外显示了它的威权主义本性。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被残忍地镇压了，但是英国和法国在苏伊士的冒险也发生在同一周内的事实，遮掩了苏联暴行的影响。举例来说，在联合国的辩论中，印度更倾向于赞成苏联做法，而不是谴责它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一些著名电影导演就来自东欧——例如，安德烈齐·瓦吉达（Andrzej Wajda）和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他们的电影传达了苏联长靴之下生活的痛苦。]到1968年春天对布拉格的镇压发生的时候，苏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已丧失许多名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奇怪的温室植物。它是批评性的——这样是正确的——批评它自己的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很困难地移植到美国，但是现在却领导着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评。<sup>[11]</sup>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保持批评的传统方面可谓是乔治·卢卡奇的杰出的继承人，但是他们避开了经济学。而且，他们并不赞同苏联或中国（或任何的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他们也不喜欢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并不存在一个指向理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例，但与此同时，西方的“压抑性容忍”（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受到痛苦欢迎。因此，像法国所处的情形那样，英国的和意大利的新左翼作家融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广阔教堂。很多研究马克思手稿的学术著作，变得有利用价值。自 1924 年列宁去世以来，马克思与列宁得到了不曾有过的研究。然而，仍然有许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主义保持着忠诚，像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分子）所明确地阐明的那样。信仰主义者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战后不久，统一的共产主义集团就出现了一个分裂。南斯拉夫在洛普·布罗兹·铁托的领导下，是第一个分离出去的。但是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国与苏联发生了争吵。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的做法十分恼火。对中国人来说，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者。毛泽东变成了共产主义教堂中的一个新圣像，他被抬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中国比苏联更不妥协、更革命。这种分裂对粉碎苏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垄断产生了健康的影响。更多旧的马克思手稿被陆续出版。毛主义是反官僚政治的，比它的苏联的替代方案更具有平等主义，更与土地有关。中国对越南的支持，也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提升了它的威望。毛泽东关于农民的著作，在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与列宁的分析相匹敌。在印度，一场革命的毛主义运动——纳萨尔派分子（Naxalites）——引发了一场尝试武装攻击印度政府的战斗。它很快失败了，但是它的回声仍然在比哈尔（Bihar）省和安德拉·普雷德施（Andhra Pradesh）省的部落腹地中回响。<sup>[12]</sup>

毛泽东使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这是一起散乱的、充满暴力的、令人心烦意乱的事件。<sup>[13]</sup>它的起源在于毛泽东想要批评苏联遭受的官僚主义折磨。他想要彻底检查中国的领导人（当然，除了他自己之外），而且从年轻学生中寻求支持。大约 8 年（1965—1973）之后，中国有了一种持续的革





命骚动要处理。党、政府和工人必须进行协商，无论是在每个企业、每个公社，还是在每所学校和学院。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编年表中，分散治理的问题由此第一次提出来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官僚体制硬化症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解决办法仍然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式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一个民主的解决办法。

但是，正是1965年到1975年的越南战争，构成了全世界的青年从事革命斗争的中心。越南农民反对美国的军事崇拜在我们这代人中构成了中心，正如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较早的一代人中构成中心一样。马克思主义赢得声誉的，不是知识上的而是情感上的政治斗争，因为胡志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同美国的反共产主义力量进行战斗。当1975年美国失败并离开越南的时候，在许多人看来，至少在亚洲，共产主义总有一天要获胜。

越南像中国和许多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而且事实上还包括非洲——是一个农民社会。有关土地改革、土地关系和农业生产力的问题，在这里是第一位的。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扎根于村庄中。马克思很少提到农民，只是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在他的尚未出版的笔记中谈到农民问题，这些笔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才出版。列宁和毛泽东成了阶级分析的基本来源。问题是，如何动员小农和中等农民反对大地主。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小，被公开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印度从来不会有这个问题）。因此，反资本主义在亚洲的共产主义方面是根深蒂固的，但是由于与土地有关，它对市场有一个常识性的认识，这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缺乏的。只是在柬埔寨，科梅尔·拉夫（Khmer Rouge）领导的亚洲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具有屠杀性质的暴力革命。他们的观念——像他们的一个领导，索邦神学院（Sorbonne）的博士所明确表达的——就是，为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必须从肉体上消灭除农民以外的一切阶级。这样，波尔布特（Pol Pot）和他的朋友杀害了柬埔寨1/7的人口。除了它是在同一个国家里面进行的以外，它几乎是一种种族屠杀。由于比斯大林更坏，科梅尔·拉夫大大陷入了反人道主义的深渊。当然，他们得到了西方的支援，因为用冷战术语来说，他们是敌人的敌人。而在那个时候，这个敌人就是越南。<sup>[14]</sup>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东亚被限制在这场或那场战争之中时，在其他地方，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着社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

在南亚和东南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令人惊异的5%，甚至更高的程度。人均资本的收益提高了。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工业化政策的第一个结果一点也不坏。发展中国家——现在在联合国大会里面是多数——要求有自己的反自由贸易的联合国代理机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还有一个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UNIDO），其目标是要提高第三世界在世界工业产出中的份额。一个由进口替代驱动的、由政府引导的工业化策略，在所有的第三世界受到了推崇。

后来的事实证明，许多此类计划的惟一致命弱点，不在工业而在农业。说轻一点，工业化——尽管这并不是必需的——被认为意味着对农业的忽视，说重一点，是无情剥削农业剩余。农民被证明是很难管理的，而东欧的大多数共产主义政权并不敢强制推行集体化。中国人的公社体制看起来在中国运行得很好，但世界并不知道中国1962年的饥荒，当时有3000万人饿死，人们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一真相。在印度，尼赫鲁的土地联营与合作耕作政策于1959年在国大党会议上受挫。后来做过短期的总理的查兰·辛格（Charan Singh），是北印度的农民领袖。他有效地保护了私人所有权，在乡村送走了社会主义。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印度依然面临着粮食短缺的危机。这是一个神奇的（非计划性的）组合，由洛克菲勒基金引进高产种子，通过保证产出价格和补贴投入价格进行慷慨的激励，再加上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农民的事业心，他们突破了粮食瓶颈。绿色革命受到都市左翼知识分子和他们在西方社会的科学家朋友的公开指责。绿色革命存在的可能性、功效以及适用的范围都受到了怀疑。一些人甚至预言（或渴望如此）绿色革命会变成红色。唉，他们要失望了。<sup>[15]</sup>

至少花了100年，如果不是更长的时间，印度的农业第一次变得可以赢利。资本主义进入了印度的乡村。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印度曾遭到美国总统莱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羞辱，他利用美国公法第480条款中的食品援助武器处罚印度，因为它在越南方面的立场与美国希望的背道而驰。但在几年之后，印度不再需要仰赖食品援助。工业政策在印度长期以来都是中央集权制的，但是至少在农业方面，它给人一种成功的感觉。

印度的这种经验在非洲并没有引起反响。因新获得独立而备感自豪的非洲政府继续追求工业化。非洲西部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农业出口史——可可粉，咖啡，棕榈——他们居然不惜破坏自己的农业以追求工业的增长。农业

和出口销售在西非是妇女的工作；都市的男人不得不摆弄他们的新玩具。但是，忽视农业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并没有被感觉到——只是在后来，这项政策所造成扭曲的程度才被人们感受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的知识分子也都赞成这一种观念：资本主义使非洲变得不发达。市场不得不被拒绝了。那里甚至曾一度出现了被称为非洲社会主义的事物。而且为什么不呢？每个国家的精英应该有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如它享有定期航空服务一样。这是一个“必须拥有”的中产阶级的奢侈品。<sup>[16]</sup>

但是，对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而言，领导性的国家是苏联。它的增长绩效如同它从战争的蹂躏中恢复一样，是令人震惊的。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市民的生活开始好转。国家有了一种春来雪融的气氛，生活消费品也不像先前那样紧张。非斯大林化的运动被赫鲁晓夫和他在政府中的同伴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继续推进。由于他们追求国际关系的缓和，他们走访了整个世界，展示了这个威权主义国家的古老神话的和蔼可亲的一面。赫鲁晓夫认识到，农业构成了对苏联绩效的真正限制，他试着去增加更多的耕地。空间科学的胜利给苏联的声望贴上了封签，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受到的粗暴对待，也无损于苏联的威信。全世界的人们，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们，把苏联视为给它的国民带来自豪也带来了适量繁荣的国家。教育、公共运输和保健得到了很好的组织。美国在私人富裕之中仅有可怜的公共事业，而苏联在吝啬的私人消费旁却拥有良好的公共供应。

赫鲁晓夫处理农业制约的尝试，并没有很快结出成果。他被另外的一班人马所替换。勃利奥尼德·勃列日涅夫成了党的总书记，而艾莱克·柯察金（Aleksei Kosygin）则当上了总理。这里出现了对苏联经济学说进行重新检查的信号。苏联工业被证明并不是很有效率的，尽管仍然有着适当的增长。实现增长是很容易的：较多的投入导致较多的产出。但是效率需要从相同数量的投入中得到较多的产出（最大的产出）。另外一个检查方法，就是计算投入成本与产出收入的相互关系。最小成本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合适的目标，但是，只有当投入的价格相对于它们的生产力而言反映出原料稀缺的时候，这一观点才是正确的。苏联的计划是以物质上的投入—产出比率为基础的，忽视了价格或者影子价格。投入系数被冻结在它们的旧价值上，并没有人尝试找出比较廉宜的方法。

这里存在着对于市场原则的谨慎搜寻，以便把它附加到中央计划体制



中。资本主义体制拥有市场；尽管它们可能不完善，但是为了比较各种相关价值，价格作为准备好的计算表是存在的。如果生产以现有价格赚了利润，这至少是符合生产者的利益的。如果价格反映“真实的”稀缺，整个的社会就会获利。如此的话，利润是否可以在计划经济中用作一个导向呢？毕竟，不存在垄断者赚取过度利润的危险。但是，这种价格公正吗？什么是公正，评价公正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苏联集团都得到辩论。苏联的 E. G. 利伯曼 (E. G. Liberman) 教授在 1962 年由丁提出了应该把利润当作方案选择的一个判定标准而出了名。<sup>[17]</sup>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苏联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些带有市场异端的实验，尤其是在匈牙利。科斯伊金被看作是进行这个实验的推动者。但是不久便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以及对它的镇压。勃列日涅夫作为惟一的领袖接管了政权，正统在苏联集团中又被恢复了。

但是，南斯拉夫已经有了此类实验。在一个全部计划的体制中，却存在着单个企业的更大的自治。工人拥有了自己的企业。这给他们以努力工作的激励，因为他们的工资中包含了利润的成分。这像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证明对很多西方人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没有被斯大林主义所扭曲，也没有被自给自足的数量计划所阻碍。对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导致了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因为一些工人可能在能够盈利的公司工作，而另外的工人则不能，而且利润可能归因于外在的因素。一件产品可能不再流行，另一件产品可能变得很流行。在资本主义中，这是随时发生的事情。可以期望，工人可以被雇用和解雇，或者可能按他们自己的协定调换工作。但是，工人拥有的公司可能不愿雇用任何外人，以免工人的股份被掺水。对工人的解雇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在没有股份可以出售和没有股票市场的情况下，工人如何取走他的股票呢？

中国人对于工作和报酬有着不同的态度。农村公社非常之大，有数千户家庭，跨越许多村庄。对各种熟练的和熟练的劳动类型如何支付工资，在公社中也争论过。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是，不让家庭之间或村庄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增加。那些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之上工作的人们，或者，比方说，护理果树的人们，将比他们在建筑或清洁领域从事劳动的合作工人创造价值更大的生产力。但是总产品是一种社会产品，是所有各种不同劳动的联合成果。因此，有些共享劳动是必须完成的。相同的规则在都市的工业企业中也尝试过。当我在 1973 年访问中国的时候，那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那里好像是存在着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要削弱工资与工人被雇用的企业的

生产力之间的联系。那些未被很好安置的工人，可以分享社会津贴（dividend）。在所有的这些争议之后潜藏的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剩余是从哪里来的，谁挪用了它？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能否以它的生产力标准作为投资和工资政策的基础，而这种生产力标准却被视为有关盈利能力的惟一隐藏的信号？

在任何一个渴望成为社会主义却又很不发达的国家，必定会出现这种困难的问题。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如同我上面所标明它的，在这一时期是繁荣的。但是，是创造剩余和积累，还是消除贫穷和追求平等，以及如何对待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如何处理好消费者的选择和未来世代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研究解决。马克思除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此作过评论之外，对这些问题谈得非常少。而且这些评论都是否定性的，因为当资本主义和稀缺仍然存在的时候，应该告诫避免提出此类问题。俄国人在他们革命的最初10年已经辩论过这些问题，然而解决问题却是在一个等级制的、管理的和以生产力为基础的收入一分配体制内。当公共产品——保健、教育和运输——可以被所有人共同享有时，私人收入就仍然在进行着不平等的分配。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不平等的程度远远低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

在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似乎存在不断增长的多样性。在欧洲、亚洲和美洲，苏联、南斯拉夫、中国和古巴代表了一定范围内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代表了一定的气候的可能性。既有贫穷的、需要解决土地问题和人口拥挤的中国；又有古巴这样一个热带岛国，依赖于单一农作物；南斯拉夫则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南欧国家。当然，还有疆域辽阔的苏联，它涵盖了欧洲与亚洲的各种生态。从表面上看，好像资本主义是被限制在西欧和北美的一个角落，而社会主义却到处都是。它占领了欧洲的东半部，如果再加上朝鲜、越南和柬埔寨，它还占领了东亚一大块。这是马克思所能预见的吗？他会以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一切拍手称快吗？

当然，到如今，苏联已经很少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有关。但他的名字时常被提起，如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而且他那长有大胡子的面容在红旗上飘扬，旁边是恩格斯的头像。但是苏联已经放弃了西方革命的任何希望。共产党到处都被1956年事件弄得不知所措。当苏联与中国的争论突然激化时，一些分裂便开始了，但是只限于选择不同的导师作为意识形态的奴仆所服从的对象。因此，在印度，共产党分成两派，一个是印度共产党



(CPI)，另一个是印共马克思主义者（CPM）。这种标签是奇怪的，因为两者都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所不同的是，一个继续等候来自莫斯科的指令，而另一个则服从北京。印度共产党为苏联在1968年对布拉格的镇压行为进行辩护，正如印共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在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平息骚动进行辩护一样。

苏联抛弃了资本主义正处在最终的危机中或者已经成熟到进行革命的程度 的教条。承认在两种体制之间存在着和平共存。赫鲁晓夫在1960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22届代表大会上预言，苏联将会用一股商品的洪流埋葬美国。它要在25年内生产出比美国更多的钢铁和水泥，以及其他产品。这是马克思或列宁所不曾设想的景象，不论是在1917以前或以后。这两种体制要在经济规模的基础上进行竞争，这种经济规模可以用国民收入GNP来测量。这不是空洞的吹牛，它受到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认真对待。

中国人当然厌恶这种修正主义。毛泽东想要革命的无产阶级从边缘地区、从东方站起来。“东方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词语，也成为一部北京歌剧的标题。中国人帮助了越南，事实上，他们愿意帮助任何一个共产党，只要它拒绝苏联的不抵抗和消极革命。毛泽东断绝了同自己的长期同志刘少奇的关系，后者是一位具有苏联风格的温和的共产主义者。他转而支持了林彪，正是林彪推进了世界革命来自东方和击败资本主义的论题。不过他很快在中国共产党拜占庭式的政治生活中失去了信任。毛泽东继续推行他的平等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一时期（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中国的大学让他们所有的学生都阅读《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继续保持着一问一答的形式，像在第三国际下的做法一样。甚至更有趣的是红宝书，包含着被描述为“毛主义”的格言。它包含着一个公司执行总裁（CEO）所具有的平凡的说教，但是它在纽约的激进分子的别致聚会上变得很流行。然而，对国外消费来说，中国确实生产了具有竞争性的和较少删节的马克思著作的版本。一种具有竞争性的正统的出现，大大地帮助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现在存在着两种或者三种列宁主义的翻版，如果你再算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话。毛主义中的反对官僚体制的态度，与在西方年轻人当中正在成长的对官僚体制——大学、政府和政党——的不满，简直是不谋而合。当学生在西方起义并遭到了政府的射击的时候，毛泽东却鼓动学生造反。

在 1971 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从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秘密到中国旅行，要展开与中国的对话。很快乒乓外交发展起来，而尼克松对中国开放的政策开始为世人所知。100 年来这是第一次，强大的白种人（华人和许多其他的亚洲人是这样看它的）在平等的基础上来看望一位中国领袖。它不仅是对苏联与中国的分裂的认可，也是对美国在越南陷入困境的认可。这次中国已经把美国打得叫停。亚洲时代已经到来。

但是，亚洲还有另一个国家，事实上不仅美国人，而且所有其他人都低估了它的崛起。还在 20 世纪之初，日本人就已经击败了沙皇俄国，两次世界大战都参与了作战，终于在 1945 年在一片废墟中以失败而告终。麦克阿瑟将军使它的宪法、工业、外表甚至还有它的文化都美国化了。美国人资助了日本人，但没有注意到日本的经济增长。在 1971 年 8 月，当美国摆脱标准美元汇兑，拒绝以每盎司 35 美元的价格出售黄金时，他们甚至嫌麻烦而没有预先告知日本政府，如同他们对自己的西方朋友所做的那样。到这天，日本人记住了这次震动。每个人都说，日本人没有原创性。他们擅长复制其他人发明的技术。

日本是 20 世纪后 50 年最具奇迹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第一个达到两位数增长率，第一个在一个世纪中两次从贫穷走向富裕。美国人已经决意让日本成为一个农业国家，以作为对它的战时行为的处罚。但是朝鲜战争和冷战很快改变了一切。美国需要日本成为美国军事的东方平台。日本的社会抓住了这个机会。政府和工业的精英通力合作建立了拥有令人惊畏发展比例的工业机器。日本进口原料，但却抵制制造品进口。它控制消费的增长，并鼓励储蓄。这种非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得到一种具有攻击性的出口制造品驱动的进一步支持。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日本翻版——经济计划加上企业家的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国家的目标，私人企业愿意接受政府的指导（当然，政府也受到私人企业的渗透和控制）。这里也不存在伸手过长的胡说。利润要赚取，但是它们是一个次级的目标。第一位的目标是要确保日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国联盟中的地位。这是管理的资本主义。这是亚洲的资本主义。

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登台，重新塑造了人们对于成功增长策略的观念。当每个人都在注意苏联或中国，甚至美国时，是日本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适用的实现加速增长的处方。花一代人的时间把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可能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增长率在没

有劳改营的条件下也可以达到。未来是资本主义的。

然而就在那时，即 1973 年，资本主义陷入了另一场危机。

### [注释]

[1] 关于印度工业化的经济历史，见 D. R. Gadgil (1971), *Industrial Evolution of India in Recent Times, 1860—1939*, 5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mbay.

[2] Dadabhai Naoroji (1901), *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 Swan Sonnenschein, London. 原版出于 1962 年。

Romesh Chandra Dutt (1908),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2 vols, Kegan Paul, Trübner Trench, London.

有关印度经济史的许多事实都是有争议的。见 Dharma Kumar (ed.) (1983),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1757—1970)*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这是一个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尤其要看一下大卫·莫里斯 (David Morris) 所写的一章, “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Industry to 1947”, 主要讲的是印度独立之前时代的工业增长。

在 1914 年，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麻 (jute) 工业、排行第四或第五的纺织工业，以及第三大铁路网。

[3] Paul Baran (196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4] Andre Gunder Frank (1967),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5] *Ibid.*, p. xi.

[6] Colin Clark (1940),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Macmillan, London. 这在测量国民收入方面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克拉克 (Clark) 在剑桥大学是凯恩斯的学生和助手。

[7] David Halberstam (1972),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Random House, New York.

[8] 关于 CIA 对文化的资助，见 Francis Stonor Saunders (1999),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Granta, London.

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一个国际研究中心 (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让来自印度的年轻经济学家与他们的美国同行进行合作。在计划的数学模型方面，进行了许多优质研究。当发现这个中心是由 CIA 资助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尴尬。毕竟，许多印度经济学家即使不把他们自己视为共产主义者，也至少是社会主义者！

[9] Paul Baran and Paul Sweezy (1968),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0] 对于美国经济的一般批评, 见 Samuel Bowels, David Gordon and Thomas Weiskopf (1991), *After the Wasteland: A Democratic Economics for the Year 2000*, M. E. Shape, Armonk, NY.

博厄斯 (Bowels) 和他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同事发明了一种“社会积累的结构”理论, 以批评美国经济的不平等和浪费。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协会 [The 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sts (URPE)] 出版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这一刊物, 上面刊登了许多分析美国资本主义的文章, 当然它们反映的都是左翼的观点。

[11] 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好的资料来源, 见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也可参考 Perry Anderson (1979), *Considerations of Western Marxism*, Verso, London.

[12] 关于纳萨尔派分子的运动, 见 Sumanta Banerjee (1982), *India's Simmering Revolution: The Naxalite Uprising*, Zed Books, London。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80年, 标题是 *In the Wake of Naxalbari: A History of Naxalite Movement in India*, Subarnarekha, Calcutta.

[13] 关于“文化大革命”,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 的多卷本的历史是最好的原始资料: Roderick MacFarquhar (1974/1983/19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4] 关于柬埔寨, 见 Ben Kiernan (1985),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Verso, London。这是最好的记录。

[15] 有关绿色革命 (Green Revolution) 和其他事件, 见 Meghnad Desai (1975) “India: Contradictions of Slow Capitalistic Development”, in R. Blackburn (ed.) *Explosions in a Subcontinent*, Penguin, Harmondsworth。这是下文的扩充和修正版, 见 Meghnad Desai (1970), “The Vortex in India”, *New Left Review* 170, September-October.

[16] 那些非洲社会主义者的先驱——L. 桑戈尔 (Léopold Senghor), K. 恩克鲁玛 (Kwame Nkrumah) 和 J. 尼雷尔 (Julius Nyerere) ——都是诚恳和热心的政治家。当然, 非洲社会主义事实上保持着精神上的消遣。在一个还算不上资本主义的国家过早地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努力, 导致了千篇一律的惨重损失, 这正如在加纳和坦桑尼亚的例子中所表现的。见 Léopold Senghor (1959), *African Socialism*, American Society for African Culture, New York.

[17] E. G. Liberman (1971), *Economic Method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New York.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16 章 土崩瓦解

对我来说，1963 年的夏天是非常惬意的。我是在费城完成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当时我已经写完论文，并且得到了导师的同意，正在等待着论文答辩。这时在附近的斯沃斯莫（Swarthmore）学院有一场辩论。保罗·萨缪尔森和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要辩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这的确是巨人的较量——即使才 47 岁，萨缪尔森却已是一个无所顾忌之人，是他那一时代顶尖的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在芝加哥任教，资格较深，颇有学者气质，他的锐利机智广为人知。这是麻省理工学院对芝加哥大学，咸水对甜水，进步派（自由主义者 在美语中的称呼）对保守派。我们欣然前往，并非仅仅为了观看漂亮的本科女生。

这场辩论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新发现。萨缪尔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告诉听众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为了讨好我们，提高我们对他的认可水平，他还提到他与白宫保持着接触。不过他的自我吹捧是如此的巧妙，使人觉得并不粗俗，也不觉得是在敲凯恩斯的边鼓。然而，他并没有对眼前的问题发表意见。对他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辩论的。政府拥有一个积极的角色要扮演，而且正在扮演它。肯尼迪仍然活着，减税法案将要被通过。萨缪尔森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仅仅比加尔布雷思稍右一些。

施蒂格勒非常机智。他提出了透彻的、骇人听闻的问题。经济学家为什么总在讲授市场，如此对市场失灵的论点不加批判地接受？我们可以把邮局或消防服务私有化吗？如果不能，国家提供许多这类服务又有什么经济合理性可言？自然地，他有证据准备用来摧毁我们固有的但是未经过批判的观点。他能够“解构”（deconstruct）（在原初的并非后现代的意义）上市场失灵的论点。购买消防服务如同人们购买保险。他们这样做，的确是因为对火灾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那么为什么不检验一下私人提供消防服务的情况？为什么邮局应该对信和包裹的传递实行垄断？难道那是有效率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垄断是典型的低效率。

当我听到施蒂格勒的演讲时，我意识到，芝加哥大学拥护市场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被击败，也没有虚度时光。在一场智力战中，他们宁愿认同主流经济学家，并接受那种不充分的智慧。他们不是作为保守派，不是作为现状的拥护者，而是作为激进分子而出现——这正是某种我们左翼中的某些人自以为是自己垄断了的立场。从那之后，施蒂格勒的演讲不停地敲击着我的心灵，就像预示着有什么事情要来临似的。

芝加哥大学变成了阻击中间道路、市场失灵经济学的非官方的新中心。在宏观经济学中，弗里德曼承担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重任。在引领货币数量理论、反对凯恩斯的 10 年之后，他的付出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得到了回报，那时通货膨胀开始成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感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我在前面的第 14 章中详述过这场早期论战）。但是由于在 1973 年阿拉伯—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期间，石油输出国把原油的价格提高了四倍，从而使这场论战变得面目全非。除了把通货膨胀归因于较高的工资份额并因此降低了利润之外，我们现在有了更高的能源费用，以支撑整个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的日子到来了。凯恩斯主义者处于被攻击的地位。



而且在微观经济学方面，芝加哥学派也取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有关航空公司和公众效用部门的规定受到市场激进分子的质问。一个航空公司的企业联合为什么应该被维持？消费者在控制航班、目的地和航线方面的权益在哪里？受调控的公共效用部门是否造成了资本使用的浪费，因为它限制了它们可以得到的回报率？让它们实现回报率最大化是不是更有效率？1968年，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那时在芝加哥大学，稍后成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篇非常漂亮的分析作品中，展现了市场失败的多种情形，并指出这些失败是由不能确定或明确财产权利造成的。<sup>[1]</sup> 如果我需要一种安静的邻居关系，并且在购买房子时为这种需求支付了额外的费用，那么我可以控告我的嘈杂的邻居。人们可以按规则提起诉讼，反对在他们的后院增建额外的不动产。只有在权利界定不清楚的时候，这些侵权行为才会增加。科斯因此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论点，以反对经济学家必须说明的关于市场失败的看法。围绕科斯“定理”诞生了一个由法律和经济学等组成的庞大的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

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自由市场的争论卷土重来，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他们把它归因于保守的对手，后来甚至归因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华盛顿共识。我在上面叙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表明，主张自由市场的激进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直在努力地工作，思考的不是“想像不到的”事情，而是“未曾思考的”事情。当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正在自以为是地预言周期将是一个废词，而经济的最佳控制手段只是在等候一个更大的计算机时，拥护市场的激进分子正在专注于人类行为的古老问题。在自我批评中他们是无情的，在检查对手的论点方面也是如此。论战在各种学术期刊、会议论文和书籍中都有发生。尽管没有出现流血事件，但在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一场最深刻的转变——一场真正的革命——爆发了。

因此，当石油震荡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带进一场通货膨胀的危机时，相关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已经得到阐发——虽然当时它还是不流行的少数人的观点，并且从那以后才逐渐得到推广。在20世纪70年代的10年中，人们发现战争从学术界转移到政治的竞技场。在每个政党中，不仅仅是右翼的政党，都存在如何协调充分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的辩论。像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这样的思想战车，一直耐心地发表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激进的、具有市场导向的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导致了凯恩斯共识的崩溃——它本身也是油价上升和跟着发生的通货膨胀的结果——因为那些人认为这些思



想战车的观点渗透到了政党和新闻媒体。伦敦《泰晤士报》的编辑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现在是勋爵），变成了货币主义的热情提倡者。彼得·杰伊（Peter Jay），那时《泰晤士报》的商业版的编辑，确信他的岳父，即当时的首相詹姆·卡拉汉（Jim Callaghan）（现在是勋爵）所认为的，英国的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滞胀——不可能用凯恩斯学派的财政赤字和货币贬值的药物来治疗。<sup>[2]</sup>这是英国所品尝的一次惨痛的教训，在1976年的夏季，英镑价值在外汇交易市场上出现暴跌，刚刚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那里接替首相之位的卡拉汉，迎来了及时到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宣布放弃英国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原则（这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还是第一次，更不用说是在一个拥有主要货币的国家）。托尼·克罗斯兰曾经说过一句被时常引用的话：“宴会已经结束。”他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英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凯恩斯理论的1/4世纪，的确是一场宴会。每件事情不是维持了较高的规格：就业、工作时间和休闲；就是保持稳定增长：收入和财富。公共部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立企业——已经增长，并且没有引起任何的问题。政府大臣预期公共支出实际能够年复一年地增长。的确，英国财政部在年度预算中安置了大量的胡乱的开支，只有当人们一致认为经济已经增长时，才会反过来计算这些开支究竟是多少钱。货币是不成问题的；它们总是充足够用的。

在充分就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的时候，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可以在不增加预算赤字的情况下顺利实施。这就是贯穿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形。然而，一旦通货膨胀侵蚀了盈利能力，失业在私人部门中就会上升。有一种直接在公共部门创造工作岗位的趋向——地方性的主管当局，社会的服务，教师，保健工人。他们的工资从公众的钱包里支付，但是他们的服务的特点在于，它们不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这些赤字纯粹是通过那些工人的消费而对需求方面造成影响的。在供给方面，它们的影响具有双重的否定性。通过保持充分就业，他们维持了高工资，维持了增加工资的需求。但是可以出售的货物和服务的产出根本没有增长。一旦通货膨胀开始，这种具有双重否定性的影响便会引发通货膨胀。否定的效果就支配着积极的效果。借着高工资和上升的价格，费用在私人部门中开始上涨。利润首先受到市场力量的挤压，从而时常被作为反通货膨胀的收入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利润之所以被挤压，还因为税收的上涨。税收的范围和限额在货币方面是固定



的，并不会随着通货膨胀而向上调整。当价格上升的时候，货币收入上升，而且利润也会上升。在“真正”意义上，它们并没有上升——就是说，在允许价格上涨之后——其他一切从货币的角度看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先前在税收范围之外的人们必须开始支付所得税。小生意和大生意都被拉进公司的税收网络中。在1975年间，当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冲到25%的时候，出于税收目的而对库存进行评估的这些特殊规则，夸大了许多公司的利润，为此他们不得不支付临近极限的高额税收。

通货膨胀把税收带进公众的意识中，而对于税收的怨恨也随之而来。利润挤压把许多企业赶向破产。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到国外重新开始事业。尽管存在着巨大的预算赤字，失业人数仍在继续上升。通货膨胀使工人疏远工资议价，疏远了政府所做的一切，甚至当他们作为政府政策的受益者，享受住房津贴、免费保健（在英国）、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的时候，情况依旧如此。没有选票赞成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他们不得不节俭度日。

在防御方面，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收入政策或者说是在工人、雇主和政府之间订立“社会契约”的形式。在那些建立了国家水平的工资谈判机构的国家——奥地利、瑞典——这类的社会契约能够成功地保持较低的失业水平。在德国，有一种在雇主和工会之间结成社会伙伴关系的民族精神，而且这个合作主义的模型是作为一种社会妥协而运作的。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中——例如美国和英国——工资谈判是分散的。当有工会存在的时候，雇主很少有强大的组织可以与之进行谈判。收入政策是特设的，依赖于执政的是哪个政党。在工会和政府之间进行着决斗，而雇主们则置身于争吵之外或耍无赖。凯恩斯主义者把通货膨胀归罪于工人，这导致了社会党的危机，他们还指望依靠工会的支持取得政权和维持政权。如果利润被课以税收，这就恶化了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

利润率与就业之间的至关重要的关系，在凯恩斯经济学中从来没有得到过明确的说明。凯恩斯只是承认它们之间存在着关系，但并没有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米哈尔·卡莱斯基<sup>[3]</sup>，这位波兰经济学家，已经预见了一些凯恩斯关于宏观经济的洞识，建立了把利润视为来自垄断和求过于供的理论。他含蓄地采纳了马歇尔的观点，认为在竞争存在的地方利润率很低或者为零。但是如果存在着垄断的权力——由于准入障碍和集中化——这时利润就会变高。这种静态模型在凯恩斯主义者中，尤其是在激进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中获

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卡莱斯基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和创新的动力学。经济学教科书总是在均衡中处理静态的经济。但资本主义是一种动态的不均衡系统。利润在前一种情况下是邪恶的，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却代表着基本的活力源泉。而利润一旦被看作源自垄断的权力，那么较低的利润就变成一件令人期望的事物。由此，利润挤压就受到左翼凯恩斯主义者的欢迎。他们在滞胀主义的剧本中看到了激进的——毋庸说是革命的——可能性。政府可以对更多的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提供工人们想要的东西，同时通过法令控制价格。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清楚地看到利润挤压与滞胀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早就表明，利润率在下降，而通货膨胀却在上升，马克思或者年轻的列宁所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你想更多的就业，就要提高利润率。但是这种洞察力由于两个主要的混淆而失去了。因为通货膨胀被指责为是由工人工资的上升引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为工人工资的上升进行辩护，以作为自卫和纠正。这就为他们留下了解释通货膨胀原因的难题。20世纪70年代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采纳货币主义的观点，认为是过多的货币供应导致了通货膨胀；这样它也就是由政府造成的。<sup>[4]</sup>这种货币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联合的做法是令人惊讶的，但是它把马克思主义者留在工会的优秀著作中。但是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要发行过度的货币供应？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发了第二个混淆。

政府开支的升高，是为了给公共部门的就业岗位提供经费。这些就业岗位可以替代那些在私人部门中失去的就业岗位。但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不同于私人部门的工作——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和利润。马克思已经把这类工作标明为非生产性（unproductive）的。资本家雇用工人从事生产性的工作，其目的是要赚取利润。非生产性的工人被雇来提供消费服务，而不是用来赚取利润。像生产性工人一样，他们是从总收入中而不是从资本中提取工资。生产性的工人通过为资本家生产利润，增加了积累。非生产性的工人是一笔开支，是储蓄的转移。

区别的关键并不在于最终的产品是否是货物或服务。亚当·斯密作过一种类似的区分，非常接近地把产品所具有的物质形态作为一个判断标准。马克思把利润的生产视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一种经济的中心目的被认为是财富的创造——扩充生产力和积累资本，如同马克思所言。而消费者的满意或福利这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中心目标，并没有



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惟一的例外是对那些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才起作用。但是主题——从斯密到马克思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是财富的创造。李嘉图对于收入的分配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把它作为理解积累的源泉辅助物。这样，商人和企业家获得的收入分配越多，地主获得的收入分配越少，对于积累越有利。商人和企业家倾向于投资生产活动，而地主则更愿意用它来雇用仆人或食客。这就是为什么租金对积累是一种负担。

在整个 20 世纪，特别是自从 1945 年以后，政府活动的增长意味着，雇用工人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服务消费。在英国，教师、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s）、监狱官员、警察和公务员，所有这些都受雇于国家保健服务体系（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马克思看来，他们都是非生产性的。从人们的福利的角度看，他们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他们的工资是从税收中支付的，这就从积累中转移了储蓄。对于凯恩斯主义者来说，这种区别是不相关的，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就业对于保持有效需求的贡献。

许多新左翼是典型的非生产性工人——大学和中学的老师，各种不同水平的政府雇员，工会官员。因此他们的正常本能是维护政府的角色，而且会鼓动扩张它。他们强烈地相信福利国家的价值以及由政府提供教育、保健和住房。但是，马克思似乎在以他那乖张的方式，为把所有这些都变成私有化的营利手段作辩护。马克思主义作家虽然把自己看作革命的，但他们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吗？或者马克思仍然需要另外一种修正吗？

似乎是一种宿命的巧合，激进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他们受过良好的主流经济学训练而且精通数学方法，开始重新检查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与此相适应，对凯恩斯理论基础的重新检查也开始了，尽管在这里对它的攻击来自新一代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他们进攻的一条通常的路线，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复兴。<sup>[5]</sup>这个理论——首先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而稍后是在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原理》第四版中提出的——已经在大陆流行，而剑桥大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培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只不过是一种局部均衡。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开始严肃对待瓦尔拉斯的严格的数学论证了。对于这位理论家的挑战，就是要证明所有用于个人商品和服务的不同市场可以同时出清，在没有任何诸如政府之类的外来力量干涉的情况下，他们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可以按确定价格实现相互交叉。



这不是一个描述现实经济如何在日常基础上运作的现实主义方案。这是一个逻辑性的、分析性的方案，它要表明的是，在关于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和技术的最小限度假设的基础上，能够同时显示存在一种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均衡。瓦尔拉斯没有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没有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当供给按每种确定价格都超过需求时，人们很难想像出一个均衡。然后，亚伯拉罕·沃尔德（Abraham Wald），一个后来对统计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数学家，能够用一些最近发展起来的数学技术展示，一个理论可以包含这个问题，只是要求价格是非负值。其后30年，其他的经济学家诸如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他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等对这一问题继续研究，并于1959年因为一本书的问世而达到了高潮，这本书的作者是移民到美国的法国数学经济学家——罗拉尔·德布鲁（Gérard Debreu）。他的小书《价值理论》<sup>[6]</sup>对于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来说，更像数学而不是经济学，但是他在证实瓦尔拉斯均衡的存在方面，建立了严格的数学分析的新标准。当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为使用微积分学和线性代数而感到窒息时，德布鲁使用了拓扑学的方法，这只是在最近才得到发展，并扩充到经济理论的范围。

德布鲁也被颁发了诺贝尔奖，但是当采访者问他，在得到通知的那天，他想过能够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做点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这一类型的经济学对于回答这样的实际问题没有用处。但是他的理论深深地改变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前景，也同样削弱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声望。然而，他是通过使自己的理论讨论一种你也觉得不现实的对象而做到这点的。阿罗-德布鲁经济学有其代理人——消费者和生产者。消费者拥有自己的偏好；他们能够对地排列一切商品——不是这件比那件好，就是消费者对于如何选择变得漠不关心。收入多比收入少好。每件商品或服务是确定的——今天伦敦的苹果，与今天伯明翰的苹果或明天伦敦的苹果是不同的商品。但是，限制除时间和地点之外，人们也可能在各种不同的偶然环境中需要商品。这样，如果2010年7月10日下雨，我可能需要一把伞，但是如果不下雨，我将不需要伞。有不少供应偶然商品的市场，它们承诺只要假设的情况变为现实，就可以把这些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如果一个人能够以这种灵敏的方式增加商品，那就明显地有很多需求—供给要给予详细说明，它反过来会导致均衡价格。在某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思维实验中，你可以想像，数百万的消费者可能被告知，从今天起到未来



任何时候，在确定的时间和所设想的各种环境下——在不同的“自然状态”中——他们所需要的数百万的商品。然而，像在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中那样，所有的数百万的价格将通过市场作为均衡价格在瞬间显示出来。这是一般均衡，是20世纪60年代数学经济学家的模型。这本书不到100页，但是它是一部充满着数学上的高雅的惊人简洁的作品。

但是，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人发现这本书深奥难懂的话，那么在10年之内，年轻的研究生们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够很熟练地开展德布魯的理论论证了。这是相当精妙的微观经济学。然而，尽管它是正确的——并且有证据表明它是正确的——人们如何才能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协调起来？如果所有的市场都出清，为什么在非自愿失业的意义上劳动市场显得特殊？如果劳动力的供给超过了对它的需求，为什么劳动力的价格——实际工资——不下跌以出清市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又在哪里呢？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斗争挑起了争端，如果说他们都关注实际的政策事件，那么寻找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则是学院的和理论上的探索。争论的中心围绕着失业——难道它是自愿的，也就是说，是出于对较高的实际工资的偏好而自愿放弃目前存在的工作机会，或者是非自愿的，即是说工人愿意在当时存在的实际工资的条件下进行工作，而并不存在对于工作的需求？凯恩斯强调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涉及长期的未来时，在这一时期中投资者必须补偿他的投资。凯恩斯认为，在一种货币经济中，工资谈判和契约都是按照货币条件而不是按照实际条件订立的。工人不能减少他们的实际工资，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不可能，惟一能做的只能是减少货币工资。如果价格随着工资下跌而下跌，那么即使削减货币工资，也未必能够削减到足以减少实际工资的水平。无论如何，如果投资者是悲观的，他们将不会投资和生产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拆除这个大厦，是年轻的芝加哥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sup>[7]</sup>的成就，他因为这项工作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奖。<sup>[7]</sup>他是从质疑菲利普斯曲线的逻辑开始的，这种逻辑旨在表明，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不同组合可供政策制定者从中选择。这将意味着劳动市场上存在着均衡的多样性。但是德布魯已经证明，瓦尔拉斯均衡在大多数环境中都是惟一的。因此劳动市场，连同所有的其他市场一起，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惟一的——均衡。在这种均衡情形下，失业水平是自然失业率。“自然”一词并非意味着不可避免或是上帝安排的。

瑞典的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在他的1914年之前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一书中，已经使用过“自然利率”这个词。“自然”是均衡的替代之词。卢卡斯接着证明，尽管货币的使用存在着不确定性，经济存在着一种惟一的均衡——就是说，存在着自然失业率——无论通货膨胀在什么水平。任何的政府政策选择都不能降低或者提高这一均衡比率。然而，政府在执行自己的政策以改变自然失业率时，可以通过它创造的货币供给来决定通货膨胀率。

如果可能的话，这是一个与凯恩斯理论相反的理论。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如果对它不管不问，将会产生一个比充分就业水平较低的就业形势，然后把不充分就业作为一种均衡情形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他也怀疑这种通常的治疗方法适用于这种情形——弹性价格、工资和利率。因此需要来自权威的行动，以免屈从于市场压力。这就是国家，它在黑格尔关于市场（市民社会）的思考中得到回应，黑格尔曾经担心，如果让市场自由运作，将会误入歧途。卢卡斯否认了存在一种不充分就业均衡的可能性。因为经济学家在教授微观经济理论时，都把竞争作为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来认同，宏观经济学不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否认这一基础。凯恩斯主义者忍受了所有的异议——黏性价格、公平工资、流动性偏好带来的利率缺乏灵活性和缺乏效率。但是这些都是经验主义的异议。在理论中，没有人能够证明，一种均衡可以在黏性价格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等等。这种制度性的现实主义的行为基础是缺乏的。如果你没有严格地完全证明你的不充分就业理论，那么你就不得不放弃。

来自东海岸各大学的凯恩斯主义者——所谓的“咸水经济学家”（Salt-water Economists）——展开了抵抗。人们尝试着许多经验主义的检验，战斗集中在谁的理论能够更好地适应数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凯恩斯主义者主宰着经济计量学。在那个时期，货币主义者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都在嘲笑由凯恩斯学派的计量经济学家所建造的技术上层建筑，自夸他们的更为简单的方法更为有效。这似乎很难吸引刚刚培养的热爱的年轻经济学家。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和其他的芝加哥和明尼苏达州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拉斯·哈森（Lars Hansen）——也登上了经济计量学的顶峰。卢卡斯摧毁了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大部分的经济计量学模型，他表明，它们对经济关系的估计——货币需求，菲利普斯曲线，等等——是高度不稳定的和容易破碎



的。这不是因为任何统计或经验的原因。原因在于，他们建立理论的基础忽视了私人——消费者，工人，生产者——可以采取逃避行动使政府干预归于无效的方式。这些模型假定，政府政策带有故意造成某种后果的倾向。但是政府只能提出计划；个人在经济——市场——中将会具体处理。

尽管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方程式和大型计算机，凯恩斯学派的经济计量学家们时常不得不修改他们的预言。这是例行公事，因为新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涌现。如此建立的关系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是“不变的”。在政策王国中，它们都不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不变量”。卢卡斯认为，缺乏这种结构性不变量，使大部分的此类模型变得没有价值。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式是，把这些方程式建立在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的行为之上。消费者会在他们的预算极限内实现满足最大化；工人会在不失业的前提下寻求收入最大化；而生产者会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们都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并形成关于未来政府政策或者价格变动等方面的预期，等等。在形成这些预期方面，他们会采取理性的行动，并利用他们处理过的一切信息。由于经济理论显示，价格与工资是相互联系的，实际工资影响就业，一个经济模型的建造者应该使这些认识有立足基础。你不得不假设，人们可能使用与经济学家所传授的同样模型去决策。

在20世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使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通常命题。可以认为，他使资本主义在民主政治方面更加安全。但是他是一个精英。如果他相信政府能够运作经济，那么他则希望自己和一些伊顿公学（Eton）、温彻斯特（Winchester）以及牛津剑桥出身的人能够掌控财政部。经济学家们从他那里得到了启示。为了论证，我们可以假定，人都是理性的，但是只有美国人照字面上的意思理解它。现实是不同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公务员——英国的、法国的或荷兰的——通常假定，在印度、印度支那或印尼的本地人都是不理性的。他们被风俗和习惯所约束，反应或变化都缓慢。社会的中坚分子，并不这样理性——绝不，从来。后来众所周知的《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继承了这一偏见。对他们来说，这是反新古典经济学。农民是不理性的。事实上，大众所接受的这种理性计算的观念，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味道。

是右翼的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勋爵），他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系任教多年，或者芝加哥的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教授——在农民和商人之中做了许多有耐心的实地考察，认为他

们的行为具有理性，正如他们认为自己也有理性一样。左翼俨然以恩人和精英自居；右翼乖张地自以为民主。迄至20世纪70年代，精英主义受到多方面的夹击——来自学生、黑人、妇女、第三世界运动，等等。人是理性的假定，对于经济思考来说是如此的基本，以至于人们惟一可以非难卢卡斯的，就是认为他对此太认真了。这样，当技术上的细节被争论，经验结果被双方用来攻击对方时，有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如果你认真对待经济理论，那么凯恩斯的理论就是有问题的。他们不辞麻烦地构建一个反瓦尔拉斯微观经济学以适合自己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一些闹独立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不是竞争性的，而是到处充满着求过于供的市场情况。但是那就是说，他们不能提供一个一般均衡的传说。这些听起来十分特别，简直让人不知所云。卢卡斯所提供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替代方案，用最新的技术语言去质问凯恩斯。

在横跨1972年和1975年的4年中，罗伯特·卢卡斯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五篇论文，但却在经济学中颠覆了凯恩斯理论革命的霸权：非自愿失业不可能是一种均衡现象。政府政策，如果预先宣布，如果它不与代理人的福利相吻合，它将会落空。在经过几个十年的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放任之后，李嘉图的沉闷科学又得到复兴并达到它的顶峰。这种对前凯恩斯经济学的复兴，由于1972年和1974年两次诺贝尔奖的授予而得到了加强。197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接着1974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冈纳·缪尔达尔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缪尔达尔是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在许多领域都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社会理论家，包括对于美国种族主义的分析。哈耶克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与缪尔达尔不同的对立面。但是当缪尔达尔日薄西山的时候，而哈耶克却在经过将近30年的时光之后，名声就像彗星光芒四射那样得到传播。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主义决策者的无助并没有使情况得到改善。收入政策导致了痛苦的罢工和政党的分裂。政府预算失去了控制，而财政赤字还在增加。1973年的油价上涨之后，接着在1979年又上涨一次。在那10年内，美国最终放弃越南这个鬼地方，并从那里撤离。理查德·尼克松未能逃脱弹劾，一位未经选举的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上任了。一场煤矿工人的罢工破坏了英国的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政府。在随后的第二次选举中，也就是在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组织了一个由脆弱多数组成的工党政府。在工会和工党政府之间，有关工资和物价的各种斗争频频发生。收入



政策的试验最终失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来，并对英国财政部施加了一种货币主义的原则。

资本主义处在危机中。工会、公司和政府之间的旧的妥协正在崩溃。看来左翼的力量会重新得到加强。工人的战斗性已经被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税收负担所唤醒。这里既有税收方面的造反，也有工资方面的动乱。对左翼来说，这是发动一场战争使资本主义突然灭亡并接管政权的一个机会。到处出现了主张暴力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团体，如德国的巴德-贝恩霍夫（Bader-Meinhoff），美国的望风者（Weathermen），英国的暴动队（Angry Brigade），以及法国、意大利、荷兰的类似团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游击队打乱了慕尼黑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马克思主义者也发现，他们的理论也没有微观基础。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大学经济学课程中变得流行。学生们想学习有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但是他们仍旧不得不在这里习惯于新水平的理论上的严格性。和在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论战中一样，第一轮的攻击首先来自老资格的专业人员。保罗·萨缪尔森在一本被广泛阅读的理论期刊中指出，马克思对于剥削的“证明”是有缺陷的，而他的“转化问题”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是多余的。<sup>[8]</sup>价格可以由任何投入—产出表的技术系数来决定。并不需要计算“价值”或“剩余价值”。一个系统所能创造的最大利润率，同样由技术给出。劳动作为投入是必需的，但是你既然可以计算“能源价值”，就可以计算“劳动价值”。

一个间接的攻击来自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他长期呆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引发了经济学舞台的爆炸，该文指出，马歇尔的竞争理论这一英国经济学的基础，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这就跨越了大量的有关非完全竞争、垄断性竞争等方面的文献。斯拉法是他同时代的多产经济学家的敌人：他憎恨教书，更讨厌写作。不过他是一位学者，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都在编撰大卫·李嘉图的选集。他停留在凯恩斯革命的边缘。但是在他所编撰的《李嘉图文集》第一卷的一篇简短序言中，他无意中说出了关于李嘉图的一个简单思想，利润率是由农业生产力决定的。如果在谷物经济中不考虑折扣租金，投入可以作为同一商品来计算，其产出也可以这样计算。种子作为投入才被需要。如果工人被支付仅能维持生存的工资，你可以想像谷物也一样。因此，利润，就像谷物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纯粹的剩余，可以独立地由价格或市场计算出

来。利润率在经济中是均等的，农业的利润率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它并不是由剥削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和技术决定的。

在德布鲁出版他的《价值理论》的次年，斯拉法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学理论批判导言》（*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sup>[9]</sup>在这本书中，他概括了他在《李嘉图文集》序言中提出的观点。一个人可以独立地以价格计算某种经济的利润率（以一个投入—产出表来描述），完全是作为这个体系的技术的结果。劳动、劳动力或者剩余价值是不必需的。

斯拉法对马克思主义是同情的，而且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个朋友，当葛兰西在监狱中的时候，他曾经给他提供一个账户申请书。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为斯拉法是那样的聪明，以至于他说，在斯拉法面前自己无可遮掩。这本书占斯拉法全部出版物的1/3，是他的第一本也是惟一的一本著作，一本只有100多页的薄薄的小册子。但是它极其深刻地破坏了马克思的理论。如果马克思认为自己提出了一种利润理论并改进了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那么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声明开始被质疑——这种质疑来自政治棱镜的左翼，而不是右翼。

斯拉法首先推导出了一个“工资—利润边界”（wage-profit frontier）。这预示着利润率与工资率是相互关联的。当工资为零的时候，利润的最大比率是由技术条件决定的。然而，实际的利润率将一般取决于社会和政治的条件——“阶级斗争”——因为它影响着工资。斯拉法自己并没有提及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但是他的追随者新李嘉图主义者这样做了。

斯拉法的意思是想摧毁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报酬——劳动和资本——取决于他们的边际生产力——就是说，当这种要素投入使用一个额外单位时，它们就对产出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边际生产力理论就这样否认了剥削的存在。斯拉法想要展示的是，由于利润率与工资的真实比率依赖于分配的结果，人们不能按照生产力来证明工资或利润的正当性。实际的利润率与其说是来自技术条件，不如说是来自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只有最大的比率和工资—利润边界是由技术决定的。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这种观点引发了一系列的文章，有的赞成新古典经济学，有的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论争者，一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罗勃特·索洛，二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



家琼·罗宾逊、卢吉·帕辛内蒂 (Luigi Pasinetti)。他们之间的论战就是后来闻名的资本论战，因为问题演变成成为独立地由利润率来测量资本价值的可能性。这个论战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就逐渐停止了。斯拉法理论中真正的刺痛对象，是马克思主义者。

斯拉法的理论结构与移居美国的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的一篇论文非常类似。1932 年冯·诺依曼在普林斯顿大学提交了一篇题为《一个一般经济均衡的模型》的论文，作为一个合适的天才数学家，他写出了在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论文。他认为，利润率的极大化取决于投入—产出技术，在那里投入包括机器、原料，也包括劳动。但是当原料在生产过程期间被耗尽，而且劳动投入在每个时期都被更新的时候，机器却是耐用的。人们该如何解释机器的耐用性？对旧机器的估价是经济理论的难题之一。几乎没有市场可以给一个使用五年的滚动轧钢机定出一种确切价格。会计员使用各种不同的公式进行折旧和摊销。但是对一笔旧资产做经济估价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观念。有关这种资产的许多争论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却没有任何进展。

约翰·冯·诺依曼对经济学家的麻烦一无所知。他作了一个简单的假定，在产出过程中，机器是以一个有时限的旧东西，可以视为最终产出。这样，产出的价值就包括旧机器的价值，当然也包括最终产品的价值，随着旧机器上的投入减少，劳动和原料上的投入也减少。通过不把旧资产看作是一种投入，而是看成一种可以重新成为投入的产出，旧资产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这被叫做联合生产 (joint production)。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酿酒。当葡萄被收割和压碎时，就使用了劳动。但是这之后，在我们喝到酒之前，要给葡萄汁发酵一段时间。通过一个巨大的环节，酒的价值才超过了葡萄汁的价值，而劳动对于这增加的价值并没有任何贡献。这样，价值和剩余价值只能来自劳动之外的环节。

现在马克思对资本投入的贡献打了折扣，马克思对旧资产问题的解决是通过把它们作为不变资本——转化为资本在生产中以劳动价值体现的耗损的价值来实现的。他在《资本论》第二卷的中间 1/3 的篇幅中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没有想到要修改他的基本论题。不过，现在人们不得不勇敢地面对这种可能性：剩余价值不是单独地来自劳动，还可以来自其他的方面。扬·斯蒂德曼 (Ian Steedman)，斯拉法的一位学生提出，约翰·冯·诺依曼和斯拉法介绍的新技术可以用来揭露马克思的论证是反常的。一个人可以拥有





负的剩余价值，但仍然可以获得确定的利润。<sup>[10]</sup>

在一定的水准上，斯蒂德曼指出了逻辑上的可能性，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结果。然而，围绕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的思想跨越了政治和数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分裂了，而且开始争吵。对于许多学术界以外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是辩论一个大头针上能够容纳多少天使跳舞。毕竟，资本主义的动态不均衡性质无处不在地处于争议之中。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在为马克思的剥削概念的“科学”基础而自豪。在宏观经济水平上，正如我们在本书第 5 章中看到的，剥削是一个与竞争力非常相似的观念。但是正如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建立缺乏充分的微观基础一样，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形也是一样的。

当马克思主义者处于混乱之中的时候，共产主义者的经济也好不到哪儿去。苏联经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放慢了速度，不再能够生产增长所需要的额外的投入，也不能提高现有投入的生产力。用马克思的说法，这个体制正在降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由于承诺对所有能够工作的人实行充分就业（在那里没有失业救济金），苏联时常雇用不断生产负剩余价值的工人——就是说，生产的价值少于他们得到的工资。这不是数学，这是苏联计划的政治经济学。除了军备和空间工业之外，几乎没有创新，也没有提高效率的激励措施。每个工人都被保证有一份工作，经理、银行家和计划者也是一样。生产力是很低的，而且苏联集团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是缺乏竞争力的。

油价上升帮助了苏联。作为一个石油输出国，它开始赚取大量的外汇。然而，1971 年在波兰出现了一场工人造反，他们想过一种更好水平的生活。爱德华·吉尔克（Edward Gierek），这位波兰的共产党领袖，大胆地在国外借款。苏联并没有阻止这一做法。于是很快东欧的许多经济实体都能够借到石油美元。由于苏联拥有很大的储备量，在这场与西方银行债务交往中，它被非常看好。在与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上，苏联改变了自己先前的做法，并且开始对那些以前剥削过的余下的经互会成员国实行资助。对于苏联集团的公民来说，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油价变化带来的好处，掩藏了滞胀的结构缺陷。

在经过 25 年的共产主义苦行僧生活之后，首次出现的一丁点幸福，便鼓励了苏联集团中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系统之外的单个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形成团体。他们并没有以暴力推翻共



产主义者政权的纲领。这不是 1956 年的匈牙利或者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些非暴力的、单个的不同意见者，是对主管当局的嘲弄。这导致了在波兰格但斯克（Gdansk）的列宁造船厂爆发大罢工，并诞生了团结工会（Solidarity）。根据 1975 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订的协议（该协议被作为缓和冷战局势的部分产物），规定在苏联集团内应该尊重人权，这就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一些保护。

在西方也有一些新形式的非政党政治的持不同意见者在不断发展。美国黑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进行的民权斗争，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先河。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妇女运动也爆发了。它困惑着已经确立的右翼和左翼的政党，也困惑着议会党和革命党。妇女对民主政治的性质、平等的定义以及对强调支付工资的雇佣劳动而不强调家务劳动的害处，都发生了质疑。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而工作，但却发现他们被攻击为忽视了跨越所有阶级的社会内部的性别和权力的关系。所有的权威都受到怀疑，因为它们时常是男性权威。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未能正视性别问题。权利差不多像利润一样，不得不被理解，不得不为之而战并赢得胜利。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地的妇女作为一支新生力量逐渐浮现出来。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是一样。随着盈利能力在北方的衰退，资本开始移向工资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许多产业中，妇女被证明在使用技术进行工作方面比男人更擅长。她们是灵巧的，喜欢顺从，而且喜欢弹性工时。妇女就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上升，这些国家接受着外来的资本。就业与收入授予妇女们更大的权力，妇女开始在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评价自己。她们还与她们在北方的姊妹进行联系。<sup>[11]</sup>

油价上升对于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恩惠。当然，它们是一些石油输出国。利用它们突然获得的巨大财富，它们开始从邻国输入熟练的和不熟练的劳工。这样，海湾的富有石油的国家，把来自南方和东南亚的穆斯林工人作为移民邀请过来。随着这些工人向家庭的汇款积累起来，这意味着数 10 亿美元的资本流向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也包括马来西亚。

最大的获利则更为间接。石油输出国吸收不了他们出口收入的洪流。大量的财富最终作为存款流入西方银行。这意味着利率的下跌，尽管存在着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在 1975 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为 25%，而其名义利率仅为 5%。银行变得热衷于贷款，而且是自从 1914 年以来私人资本首次开始流入发展中国家。当然，这些是银行贷款，而且就银行所涉及的范围而言，

贷款数目越大越好。这些贷款有的投向石油勘探，投向寻找石油替代品，甚至投向多少有些古怪的项目，例如清理巴西的亚马逊河丛林。一些净资产也从西方转移，但是大部分是银行的债务。

正是在这一时期——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个5年——四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以它们的出口增长业绩震惊了世界。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而且一直保持的做法——现在开始被亚洲“老虎”所效仿。<sup>[12]</sup>它们是开放的出口导向经济，因其颇具竞争力的价格渗透到整个世界市场。韩国以日本为仿效样板，在银行、制造业企业集团和政府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但是也存在着一个普及文化教育和实行土地改革的坚实基础。乡下的人们拥有足够的财富能够储蓄，而他们的储蓄则被银行系统动员起来，并由少数大企业集团进行投资。台湾很少有这样的大公司，但是它的策略是相似的——普及文化教育，实行土地改革，鼓励高储蓄和高出口导向的投资。另外两个——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海岛经济，拥有悠久的贸易中心的历史。国际贸易在70年代前30年得到迅速增长，应该感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连续回合的关税削减。海岛经济得益于这种商业贸易成长的大好时机，但是也得益于较低的工资和灵活的市场。它们避免了许多其他的亚洲国家所采取的中央集权模式。政府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更像是为市场增加营养而不是阻碍它的发展。它们使自己的实业家服从于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石油价格的上升总计起来相当于将近5%的GDP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石油输出国。这差不多相当于美国在马歇尔援助计划中转移给西欧的资金，但是这一次它并不是自愿的。转移的代价是失业，实际工资增长变缓，公共开支削减，以及公共服务减少。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官方政策仍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继续忙于印刷钞票以应付财政较高的开支，但是大部分都被通货膨胀吞掉了。就石油输出国而言，它们拥有的石油美元，如今变成了通货膨胀蚕食之后剩下的碎币。石油的美元价格是比较高的，但是美元价值也减少了。如果1盎司黄金在1971年早期值35美元，那么在这个10年结束之后，它大约值300美元。美元已经贬值，而这就意味着石油输出国只能从发达的石油进口国中买到较少的东西。

因此，通货膨胀是一种溶剂。至少可以说，它延缓了较低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所导致的问题。各地都出现了罢工和破坏，有时看来非常危险。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英国，种族主义也在上升。随着工业从旧工业区移走，并

重新布置到亚洲或拉丁美洲，蓝领阶层的工作开始受到威胁。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生锈的皮带成为北方将来要与之打交道的词汇。但是别处的人们也在被重新布置——当然，不全是他们，因为失业的上升横扫着西方多数国家。

通货膨胀的胶着状态不会持续得太久，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政府不想使通货膨胀加剧而失去控制，就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工资在上升，但是当通货膨胀吃掉了它们的购买力时，劳工是不满意的。罢工与联合罢工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上升。这比学生叛乱或者民权煽动更糟糕。持续满足劳工要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秩序的盈利能力必须得到恢复。如果不能恢复，那么取代它的很可能不是许多人所希望的社会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

1979年第二次石油价格的上升，逼出了一个激烈的解决方案。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存在着一种“理性的狡诈”，新的政治领导人在美国、英国和德国掌握了政权，这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他们能够超越旧规则，重新构建资本主义。社会成本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其风险总是这样：这场赌博可能会失败，民主政治自身可能会灭亡。但是，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赫尔穆特·科尔都是来自右翼政治队伍的激进领袖。激进主义不再为左翼所垄断。在挑战左翼的激进主义的霸权方面，新右翼着手进行改变自由民主政治的语言和文化。它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存机会。

### [注释]

[1] 罗纳德·科斯的的文章被结集成书，他自己写了一个出版序言，见 Ronald Coase (1988),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施蒂格勒的更流行的作品，见 George Stigler (1982), *The Economist as a Preacher and Other Essays*, Blackwell, Oxford.

[2] 关于多国的滞胀现象的研究，见 Michael Bruno and Jeffrey Sachs (1985), *The Economics of Stagflation*, Blackwell, Oxford.

[3] 我承认在有关卡莱斯基的重要贡献方面存在着一个盲点。更为引人关注的观点，见有关后凯恩斯理论的作品，如 Malcolm Sawyer (1985), *The Economics of Michal Kalecki*, Macmillan, Basingstoke.

卡莱斯基最早的论文，见 Michal Kalecki (1968),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lso (1971), *Selected Essays on Dynamism of the Capitalistic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4] Ernest Mandel (1978), *The Second Slump*, New Left Books, London.

[5] 关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思想的历史和有关它的存在的证明, 见 E. Roy Weintraub (1993),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Studies in Appraisal*,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6] Gérard Debreu (1959), *Theory of Value*, John Wiley, New York.

[7] 有关卢卡斯著作的对读者较亲近的说明, 见 Thomas J. Sargent (1996), "Expectations and the Non-neutrality of Luca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7, pp. 535-548.

这篇文章是纪念卢卡斯的《预期与货币的中立性》["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 pp. 103-124)] 发表 25 周年, 提出了一个反凯恩斯理论的论点。其他的有关卢卡斯的的文章也列入萨金特 (Sargent) 的参考书目。

[8] Paul Samuelson (1971),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9 (2) pp. 399-431. 萨缪尔森最近在这方面写了一个有意思的消遣游戏, 见 Paul Samuelson (1999), "Sherlock Holmes and the Swarthy German: The Case of Inanely 'Transforming' Mehrwert to Prices" in Martin Faase et al. (eds), *Economics, Welfare Policy and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ssays in Honour of Alfred Heertje*,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9] Piero Sraffa (1960),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0] Ian Steedman (1977), *Marx After Sraffa*, New Left Books, London.

[11] 有关孟加拉妇女在英国和孟加拉国的力量的最新说明, 见 Nalia Kabeer (2000), *The Power to Choose: Bangladeshi Women and Labour Market, Discussions in London and Dhaka*,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2] 关于亚洲“老虎”的很好的描述, 见 Alice Amsden (1989), *Asia's Next Gia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也可以见 Robert Wade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17 章 走出深渊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所面临的共同危机。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这不过是可以轻易从石油美元那里获得款项的情形：或者赚取或者外借。初级产品的价格在这 10 年期间一直在上升，大约在 1977 年左右才稳定下来。联合国的一个机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被第三世界视为自己的机构，提出了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个新秩序应对几个世纪以来由帝国联合引起的不公平和所谓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剥削进行补偿。这就需要为稳定初级产品价格，即便不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做出一种新的安排——初级产品价格，类似于石油价格成四倍地增长——也需要为贸易做出一种新的和公平的安排。那时，

在越南和其他地方受到围攻的美国，将会让第三世界感到高兴。但是接着第二次油价上升来临了，局势发生了逆转。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意义是不同的，而第三世界也陷入了困境。<sup>[1]</sup>

第一世界最主要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对第二次石油震动所产生的反应是极其剧烈和始料不及的。而当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把左翼的激进主义带到街头时，赢得观念之争，事实上甚至赢得投票箱的，却是右翼。决定性的一年是1979年，也就是当第二次油价上升发生的时候。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作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把美国的货币政策移向货币主义方面，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为保守党赢得了选举。沃尔克把控制货币供应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原则，这转而暗示允许政府债务上的利率可以达到它自己的水平。在英国保守党政府执政后的几个月内，解除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这样就步了美国1972年的后尘。这两个事件使利率飞速上升到两位数，实际上增长了三倍。这是因为富有的国家——它们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通过“印刷钞票”来支持自己的财政赤字——如今开始通过借钱来维持这个赤字了。当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降到很低的一位数时——英国在1978—1979年的通货膨胀率为5%——利率开始攀升到15%。自从1974年实行负数的实际利率的富源以来，期间数10亿的资金被借出，现在最终是到了该偿还债务的时候了。

采用货币主义政策后在美国和英国经济中相继发生的危机，是自经济大萧条以后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随着1973年利率第一次变成正值，产出急剧下降，严峻的失业随后而至。又回到了1945年以来未曾见过的失业水平，而且在10年内没有降低。凯恩斯主义者所构思的充分就业——永久紧张的劳动市场——现在被民主选举的领袖公开而明确地抛弃了。通货膨胀是一个新敌人。降低通货膨胀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失业率的上升，更深的衰退，工业产出的锐减，都是“值得支付的代价”。

在英国，GDP的生产要素成本在1979年第二季度达到了79.6（1990=100）这个最高点。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4年之后的1983年。工业生产的遭遇甚至更严重。1979年的89.1（1990=100）的峰值一直维持到1985年。它的最低水平，在1980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为77.8，在8个月中降低了近12%。1978年的失业人数是138万，在1982年成倍地增长，达到292万，而且在其后的4年中继续攀升，尽管大量的摩擦性统计数据掩盖了实际的失业上升。

经济增长的减速在美国显得比较和缓。产出在1979年和1980年之间处



于停滞状态，1980年是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之后在1981年略微有些上升，在1982年下降约3%，但是在1983年又恢复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作为一个团体，其GDP增长率从1950—1973年间的3.8%缓慢下降到1973—1989年期间的2.1%。在这种减速中，美国和英国遭受的损失最小。他们相对的增长率在1950—1973年之间发生了较为缓慢的下降，从1950年的2.2%和2.5%，分别下降到1973年的1.6%和1.8%。但是日本从8.0%跌落到3.1%，德国从4.9%跌落到2.1%，法国从4.0%跌落到1.8%。

然而，真正的变化不在于衰退的性质，而在于政府对它的反应。教科书的凯恩斯主义者的反应是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付出较高的预算赤字的成本也在所不惜，从而使经济再度膨胀以降低失业水平。这正是以前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在1971年的做法，那时失业人数达到了100万。撒切尔政府不但拒绝使经济再度膨胀，而且利用需求来排除预算赤字，更有甚者，它通过市场借款而不是“印刷钞票”来在财政上平衡一切赤字。这对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理论无疑是一种戏剧性的拒绝。面对随后的1981年的预算，有来自英国大学的364位经济学家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共同谴责财政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说他忽视了他们的建议。

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正当英国政府拒绝凯恩斯主义的再膨胀政策时，法国的社会党——他们在1981年刚刚开始执政，弗朗西斯·密特朗当选为总统——决定实施一种更具攻击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这在经济学王国中是一种不寻常的情形——一个检验竞争对手的理论的实验。当然，这个实验并不是在一种理想的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的，但是英国和法国都能够充当合适的豚鼠（guinea pig）<sup>①</sup>，这一点是非常相似的。在英国保守党政府和法国社会党政府之间，也存在着一条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的分界。每个政府都有充分的立法机构的力量去实现它的纲领。

直接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而且成为后来的许多辩论的主题。英国的经济在1981通货紧缩预算之后开始很快转向。衰退的谷底落在该年的第二个季度。得益于1982年在南大西洋发生的一场战争，撒切尔政府继续以更高的多数票赢得了1983年的选举，当时的失业仍然高于300万人——尽管事实上政府甚至并没有许诺要减少失业，它所说的一切就是反通货膨胀。放弃

<sup>①</sup> 借指科学或医学实验中以自己的生命换来技术进步的牺牲者。





旧的凯恩斯主义者对充分就业的承诺，并没有妨碍选举。较多的工会成员把选票投给了保守党，而没有投给他们的传统盟友工党。又经过了 14 年三次选举的光景，工党才有机会击败保守党。

法国的实验不得不在 1983 年被放弃并扭转过来。凯恩斯主义通货再膨胀的前景，敲响了金融和外汇交易市场的警钟。对法国社会党人来说，不幸的是，这些市场最近已经学会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操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已经有了 10 年的汇率浮动。法国人连同他们的德国盟友一起，在 1979 年尝试再建一个固定汇率体系——欧洲货币体系，启动它的欧洲汇率机制（ERM）。这个体系把法国法郎与所有其他通货的汇率限制在 2.5% 的狭窄的浮动范围内。由于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政策，随着财政赤字的相应上升，这导致资本从法国外逃和法国政府的债务市场崩溃。大的贸易赤字，加上资本外逃，迫使法国法郎贬值。欧洲汇率机制在四年之前才启动，现在不得不处理它属下的一种主要通货所面临的危机。法郎必须被“重新定位”。通货再膨胀政策必须被放弃。的确，在它的国家声誉遭到这次打击之后，法国的政府完全转向了稳定汇率的政策——法郎堡垒（the franc fort）——而任由失业上升到任何必要的水平，以保卫它的汇率。

这种对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双重打击，又被联邦德国经济的经验所加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从来都没有成为德国经济学正统的一部分。自从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实施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之后，德国一直实行正统的财政政策。德国央行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这被写进了联邦宪法，并长期奉行着一种货币主义的政策。它把货币供应视为一只鹰，优先考虑对抗通货膨胀。德国更多地依赖高储蓄和高投资，而不是依赖作为经济的推进力量的消费需求。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结束，以及滞胀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冲击，德国央行的声誉——同时也暗示着联邦德国的声誉——上升了。德国一直强调低通货膨胀、低政府债务和高投资。它是一个主要的工业产品输出国，而且享受着贸易顺差。联邦德国公民拥有比较低的消费水平，但是也拥有较高的就业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工会、雇主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令其他国家感到羡慕的合伙契约关系。但是所有这些优点，没有一个是来自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这是德国宣传的古典政策。德国马克变成了仅次于美元的主要通货，日元是另外一种。

德国和日本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经济大国。在它们被彻底地摧毁之后 30 年，这两个先前的敌方国家，发展出了值得效仿的资本主义经济。

但是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遵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股份融资的公司模式，也不存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逻辑。在日本如同在德国，在大公司中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合伙关系。所有者权益比举债筹资的作用要小一些，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即如果存在股本筹资，它是被严格控制的。这里存在着一种较大程度的公司之间的相互所有权，而银行在融资和管理企业方面都扮演着一种活跃的角色。在日本，政府负责制定产业的策略，而公司和银行被作为自愿的伙伴也参与其中。拥有集团控股的大企业，把持着工业和服务业——三井（Mitsui）、三菱（Mitsubishi），等等——是日本策略成功的关键。这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这里没有轻蔑地把它与纳粹主义的邪恶结果相联系的意图）所使用的哲学是相同的。

它们所实行的也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日本只出口而不进口制造品；进口原料但不进口粮食，尤其不进口大米。这样就使外国资本对于日本工业的所有权排除在外。德国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也是关税同盟的一个成员，但它却不鼓励进口。德国和日本都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许多轮关税的削减谈判中扮演它们的角色，然而它们的策略更多地带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色彩而不带有亚当·斯密的色彩。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跌跌撞撞，而轴心国的经济却一派兴隆。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痛苦的重建过程时，这两种政策的对比就显得更加明显。在英国和美国，失业在增加，利率也在增加。制造品进口已自由化；这引起了国内工业的倒闭。英国政府预见英镑贬值将是一种武器，就像美国，但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前5年，美元却一直维持着过高的币值。由于北海油田的开发，英国成为石油净输出国，因此，当石油价格第二次上涨时，英镑的币值也上升。随着石油价格从它们1979年的高度跌下，与美元和德国马克相比，英镑开始下跌。不管怎么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开放经济政策，连同它们对外贸的放任的态度，最终导致了高失业率和对过去建立的工业的破坏。当这个策略表现出它的大胆的时候，它也作好了严阵以待的准备。对于发达国家的许多人来说，德国人/日本人的带有人性关怀的、有社会责任的资本主义模式，显得比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模式更为优越。

放弃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英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在美国只不过是浮夸之词。里根经济政策拒绝了福利国家的设想而且支持供给经济学。控制货币供给，是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来执行的。但是不像撒切尔夫

人，里根不能控制公共开支。国防方面的开支飞速上升，而且预算不能平衡。尽管里根在控制和削减政府开支方面措辞严厉，但是实际上发生的还是减少福利预算的上升，并以国防开支和慷慨的税收削减来填补。里根经济政策在实际上是不带贝弗里奇福利政策的凯恩斯财政政策，用凯恩斯自己在 1938 年的强硬言辞（虽然没有正式地承认它）来说就是：军备开支是把经济从衰退中拉回的一种好方法。实际产出从 1982 年开始连年增长，到了 1989 年，它上升了 1/3。然而，反凯恩斯主义的浮夸之词也获得了胜利。

在微观经济政策方面，解除管制和私有化变成了标准。在美国，公共管制的航空公司、通讯、电力公司（公用部门）一直要服从许多经济学家的广泛言论批评，罗纳德·科斯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航空公司被解除管制，以适合于它们的费用结构和飞行时刻表。无线电波的波段在市场上被拍卖，而不是被官僚机构定额分配。大的电力和电话公用设施被拆散，并且允许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没有设置任何最高限度。在英国，公有产业不仅被重组——它们还被私有化。航空、钢铁、电话、石油和电力——一个接着一个——“指挥中枢”（commanding heights）也被出售给私人购买者。私有化的程序是被这样设计的，通过出售公共财产，给普通市民提供应得的股份。市民被劝诫参加股票博弈，刚开始时，股票的价格偏低，一旦开始交易，股票价格就可能上升。大的囤积者高声叫喊着这样的广告词：“告诉 SID”。SID 是你周围的普通英国人，在本能和习惯方面是一个赌徒，现在应邀登台表演，并通过私有化发一笔横财。这就带有平民主义诉求的私有化。

无论如何，事情并非总是一帆风顺。骚乱在城内中心地区出现——有伦敦的布里斯克斯顿（Brixton）、利物浦的托克斯特克（Toxteth）以及洛杉矶的瓦特斯（Watts）。在英国，发生了漫长而痛苦的罢工——英国煤矿工人、报纸印刷工和新闻记者举行的罢工。在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党开始上升和增长——它们攻击的只是政府的表面，因为它服务于一种激烈的治疗方式。妇女运动变得广泛、声势浩大和颇具影响力。它对于政党并没有什么偏好，因为从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所有政党都是问题的一部分，并不必然是问题的解决。要求权利和正面认可的呼声在美国此伏彼响——黑人、印第安人、妇女、残疾人和老年人。当民主政治的形式保持原封不动的时候，它们的背景已在发生变化。公民不再满足于成为选举基地里的一个普通的自发投票人。由于政府放弃了福利制度，市民形成了自愿



者协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通过法院行使自己的权利，并通过游说争取特别的待遇。

这种结构调整最令人吃惊的方面是，当工会、知识分子和“先进分子”激烈地反对什么的时候，投票人往往却支持它。左翼一直认为，它代表着大多数的人民，只有迂回的策略才能防止永久的权力。但这里的情形是，政府采纳的是反工人的浮夸言词，选择拆除的是已确立的工业结构，公然蔑视正统的累进税和公共开支的做法，但他们却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当选。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3年的胜利由于马岛冲突而差点错失，但是在马岛冲突之前，支持她的名义票数已经开始从谷底回升。工党的分裂对此确实起到了帮忙的作用。但是即使我们不谈可以打折的1983年，她还是赢得了1987的选举，而她的继任者约翰·梅杰也赢得了1992的选举。看来人民并不介意所经历痛苦，如果在艰难道路的尽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收获的话。里根在1984年的胜利以及布什在1988年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一点。密特朗在1988年再次当选，尽管在整个1983—1988年这一时期，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所发生的情况是，1945年受罢工影响而订立的社会契约要被重写。充分就业不再是它的核心。低通货膨胀和稳定的增长成为问题的关键。一个富裕的选民阶层想要质量更好的社会服务，并不介意谁提供这些服务，或者由谁支付费用。西方是幸运的，因为新出现的政治领导人能够看到这种重写社会契约的需要。他们事实上正在重建经济以恢复盈利能力。他们只是部分程度上意识到，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资本流动将重塑单个国家的经济。资本向廉价生产地区的迁移，推进了寻找新经济的活动——战后经济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是服务而不是产品，是高级的创新产品而不是稳定的制造产品。新技术也同样被引入类似的过程，这是政府计划的看得见的手所不能引导的。计算机变得更快速、更有效率而且更小，公然蔑视所有庞然大物的预言。微芯片引入袖珍计算器，然后引入个人计算机，引导了19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产业革命。

新技术是熊彼特主义进程的结果。企业家对于风险资本与杰出的冒险才干的依赖，在硅谷得到了结合。以没有组织和没有计划的方式，他们的竞争活动帮助开创了IT革命。数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价格降低、质量改良的产品群。信息收集和无线通讯一天比一天变得便宜，而且很快开始改变生产和消费。这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装备精良的巨人——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贝尔公司 (Bell) ——实际上被无畏的新公司打败的过程；这是一个公然蔑视许多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人们都思考过的世界运行的逻辑的过程。对诸如加尔布雷思之类的经济学家来说，巨人公司是强大的和永久的。技术结构是不能征服的。来自左翼的激进批评，强调了工业的集中程度，强调了在一种产业的总销售中三四个最大公司所占有的份额。但是，这里有的是把巨人公司从它们的栖息地上推翻的新公司。新的工业正在被创造。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静止的或者甚至不是一种平稳状态的增长过程。它尽可能地寻找利润，而创新是一个“当然”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才能恢复盈利能力。这就是贯穿我们一生的“创造性毁灭”。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世界在调整结构中陷入了失败。民主政治能够与自己的市民重写社会契约，但是专制政治被证明在这方面太胆怯了。当勃列日涅夫在 1982 年去世的时候，他的继承者是苏联老人政治中最坏的例子。尤里·安德洛波夫 (Yuri Andropov) 和康士坦丁·契尔年科 (Konstantin Chernenko) 在历史上甚至不能称作一个脚注。作为高举布尔什维克火炬的列宁的继承者，他们是惹人不开的典型。当西方紧缩和重新调整的时候，苏联颤动了。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在 1985 年掌握了政权，许下了许多诺言而且几乎取得了成功。他的公开化是受欢迎的，而且最终导致了苏联帝国在东欧的拆除。但是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一种凄凉的失败。苏联经济迫切需要深层的结构改革。它在生产剩余产品的基本任务和恢复增长方面是失败的，这些方面早就瓦解了。它所生产的产品不再受人欢迎，对西方人来说这些产品在竞争性和技术上都不再具有优势。尽管它在军事技术和空间装备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计算机、无线通讯、纤维光学这些新的领域已经落后了。在生产耐用消费品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方面，苏联经济一直是落后的。它是高成本、低质量的经济，市民很少有可供替代的消费选择，而只能消费现有的东西。苏联似乎表现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估价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如果以如此低下的国际价格水平来重新估价它的产品，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就是除了军事—空间复合体之外，苏联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它在价值规律的严格测试中失败了，一个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这样说。

苏联的情况变得显而易见的严峻，它的卫星国更是如履薄冰。东欧国家从西方银行取得的贷款必须以硬通货偿还。到了 1985 年，石油价格已经暴跌，而且苏联不能为它的依附者垫付这笔资金。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向

西方输出它们的制造产品，因为——不是太优质——都是些垃圾，而且是高价位的垃圾。它们必须输出农产品，从而提高了国内市民的食品价格。人们突然意识到——尽管不是在这些方面——多年来靠无情积累建立起来的工业结构——钱不值。如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不是一件物；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已经不再拥有生产性的经济，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和它的增长速度的测量再一次在这里受到误导。（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事件，而是一种可预见到的闭关锁国的结果。西欧的农业同样地被高估了价值和高定了价格。如果在农业方面的自由贸易要变成常规，它也将崩溃，而且愈快愈好。）

从东欧到苏联，20世纪80年代被证明既令人欢喜也令人烦恼。许多幻影被打碎。有人设想，市场社会主义可以提供一条出路。但是他们忘记了，在最初关于市场社会主义（见本书第12章）的辩论中，所说的是由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生产剩余价值的任务被认为已经完成。对劳动和产品而言，市场被设想为是活跃的，并且深刻地渗透到其中。东欧经济不可能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因为它还不够资本主义，而且不懂市场戒律。这种悖论是许多人所不能把握的，他们曾经认为，由于苏联模式的“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可以避免资本主义。

这些国家曾取得了持续成功。不仅仅是表现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方面（当然，军备和空间技术除外）。它还表现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在工程学、数学和自然科学这些领域，他们也很优秀，因为在这里，批判的思想不是根本的。而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他们是停滞的。只有个别人，例如像瓦·卡拉弗·哈维尔（Vaclav Havel）这样的诗人，或者乔治·康拉德（George Konrad）这样的思想家，以及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这样的新闻记者，才提供了最后改变这些政权的创新思想。他们是企业家——意识形态的企业家，他们冒着危险，引导了旧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创造性毁灭。但是站在他们身后的，是能够用语言清晰表达感情的有文化的群众读者，他们能够在这些思想的武装下把社会推向前进。这些思想是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们祈求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洛克、哈耶克和波普尔。对他们来说，马克思被斯大林变成了怪物——一个擅长镇压的怪物。他们拒绝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但是赞成自治、地方分权和个人持不同政见。这些思想破坏了旧政治和权力结构。民主德国人在黑白电视上可以看到的图像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被联邦德国人抛到了后边。斯大林主义许诺给它们富裕，代价是不自由，但

是最后所送来的是既贫穷又不自由。是的，不平等的程度是降低了，但这只是证实了亚当·斯密的原则：平等的社会是贫穷的社会。<sup>[2]</sup>

这并不是它要追求的东西。社会主义的兴起是要向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倾向提出挑战。它的诺言是要把贫穷连同不平等一起废止。这也是人类解放的纲领。但是，20 世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牧师以马克思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将永远损害了他的思想。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过早地在 1917 年诞生，而消亡于——感谢没有发生流血事件——1991 年，从那时开始苏联不再存在。那些把它作为希望的灯塔来高举的人，或者那些对革命的扭曲表示哀悼的人，没有人会预期到它的死亡。它的最坏的敌人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力量，并为这突然的崩溃感到惊讶。奥兹巫师（Wizard of Oz）原来是一个瘦小的、担惊受怕的老头。所有那些走过通向寺庙的黄色砖路的人，都会醒悟过来。

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统治意识形态的死亡，对它的社会党对手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但是甚至在更早的时候，麻烦就存在。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曾遇到最大的挑战，而且失败了。那时，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社会党政府掌握着政权。社会党人在奥地利、瑞典和丹麦也拥有霸权。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的好运气决定性地依赖于资本主义的繁荣，它在调整结构而且紧缩的任务中遇到了麻烦。先前有凯恩斯主义的安全带保护的一国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解除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和实行有浮动的汇率，对于自治的国家经济政策是一种严厉的限制，正如法国所发现的。市场——现在装备了远程电话和计算机连线，一天比一天变得快速而便宜——开始不停地监视着利率与汇率。货币开始大量地从各个国家流进流出。

这是一个新世界。当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持续的时候，汇率被固定在狭窄的范围内，资本是不流动的，电话是迟缓的，股票经纪人还没有与计算机相连。1973 年 3 月，在通货危机期间，一天内只有 30 亿美元被交易。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每日的成交量是 1 000 亿美元，80 年代末期为 6 500 亿美元。在 1960 年，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可以同时支持 138 对交谈。到了 1995 年，由于纤维光学的出现，这已经上升到 150 万。

这些交易成交的速度和规模会使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运用政府权力去控制经济的人失去勇气。对许多人来说，这样大的交易以账面资产的方式来实现，似乎是邪恶的。人们在经济想像中，对于有形物总是显得特别的迷恋。



他们认为实体的东西才具有价值，而且应该有价值，也才与人们相关。将价值归因于抽象的数字处理好像是猥亵的，尤其对沉浸在一种粗俗的劳动价值理论中的那些人来说，更是如此。制造品是好东西。服务，尤其是金融服务，是很坏的东西。对于那些社会党来说，情况更是不言自明，因为这些政党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来自制造业的联合劳动。但是道德家拥有的是错误的经济学。他们也患有严重的近视症。在任何一个跨越了简单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一个苍白的的神话）的社会中，购买和销售交易量总是人口数量的许多倍。这些交易的价值，也是最终产出价值的许多倍。它完成许多半成品的购进与出售的交易，以便投入生产线重新进行深加工，生产出消费品。每个阶段的价值增加，是购买的总投入价值或出售的总产出价值的一部分。一双鞋子可能是早先 15 或 25 道程序的结果——得到兽皮、硝皮、剪切和定形、上鞋底和后跟——它们本身也是几个分散程序的结果：缝纫、抛光、传送给批发商，然后传送给零售商，直到你购买它们。其中的一些程序可能涉及国际贸易，皮革来自印度，鞋底/后跟的材料来自另外的国家。这些投入还必须被传送到印度国内的港口，通过一系列的贸易商的环节，然后再抵达本土。如果我们“加倍计算”每个阶段的其他交易的总价值，它将是出厂时最终售价的许多倍。

道德家拒绝这种论证。在他们的世界中，产品无论如何应直接从最初的生产者那里购买，所有的中介都是多余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吃新鲜的有机食品，而你又坐在你位于都市的住处，那么只有把这些食品沿着乡间小路、高速公路和都市的道路，运往你所在地方的超市，以便能够满足你的渴望。你想要的食品越新鲜，传送的速度就要越快。你想要你的食物卫生而有益健康，因此它将需要塑料或玻璃纸包装，从而使交易价值增加。

当我们变得更加繁荣的时候，我们的需求也会提高。这不成问题，因为现代经济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劳动分工，就是被设计出来以迎合这种高级需求的。但是从最初产品到最后消费者的链条变长了，而且产生了额外的阶层。它召唤着很远地方的资源。其优点是，尽管存在着被延长的链条和多样的阶层，我们得到的东西仍然是以合理的价格传送的。国王无法提供的东西现在我们拥有了，因为存在劳动分工。但是这也涉及中间商、多重交易和多种部门的合作。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由市场完成的。毕竟，这是亚当·斯密所喜欢谈论的天然的自由体制。

金融交易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它不是迎合普通的消费者而是迎合



公司——银行、非金融性的公司、养老基金会和股票经纪人。金融产出是抽象的；它是一种非耐用的服务，很像街头卖艺人的音乐，或老师给学生讲的课，或某个医生做出的诊断。当这些被递送的时候，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可以显示，但是被提供了一种服务。当金本位制存在时，不会存在外汇市场。随着固定汇率遍及世界，情形也是一样。（汇率不能改变的其他不利结果也是存在的，但是我暂时把它撇在一旁。）如果两种通货变得富有弹性，那么，为了直接——当期——交易，就要确定一种汇率。但是可能存在着对将来贸易需求的预期。因此将会出现远期交易。这种交易可能会很多，它依赖于递送的时间。但是很可能出现未来的突发事件，通货的价值可能会改变。人们可能愿意预防此类的突发事件给自己造成损失。他们围以树篱。因此，即便为了两种通货，围绕它们的汇率也存在着许多交易方式。只要未来是不确定的，人们将要建起围栏以防止未来的损失，或者赌未来可能的收益。

当你增加通货的数量时，汇率的数量则会加速增加：两种通货时只存在一个汇率；三种通货时存在着三种汇率；十种通货存在着45种汇率；100种通货存在着4950种汇率。这样，当汇率变得富有弹性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要解除它们对资本市场的管制（所有欧盟国家在1988年之前解除，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1990年之前解除），可交易通货的可能数量爆炸了。在几个国家同时进行贸易的大公司，为了防止自身在支付或回收多种通货时出现汇率波动，是需要建立围栏的。不但存在当期交易而且存在远期交易，还存在那些为偶然条件所允许的交易，对于公司的财务主管来说，如果不能预见通货出现波动并建立防止它们的围栏，所要付出的成本将会变得非常严重。

汇率运动是由预期的预算赤字的转移与货币供给引发的。人们看到，如果政府对待通货膨胀和裁减预算赤字都软弱，该国的通货必定会经历贬值。为了遏制这种情况，需要提高短期债务的利率。因此，预期利率的运动也成为市场投机所考虑的因素，这常常强迫政府一有意识就要采取行动。正统财政的规则——平衡预算和控制货币供应——对政府来说成了社交礼节。

这与社会党的学说相反。它们效忠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以及在某种情形下对收入进行有利于穷人的重新分配。执行这种政策的工具是预算赤字、低利率和累进税。但是在新的混乱的国际市场，就需要掌握驾驭这艘国家的财政之舟的技巧。保守党拥护减税而且颠覆重新分配。按照加州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Laffer）的忠告，里根裁减了

所得税，随后撒切尔夫人也跟着这样做了。社会党已不能把平衡预算和低税收与为创造就业岗位而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协调起来。欧洲的社会党政府也把汇率机制的紧身衣强加在自己身上。这就限制了自己让货币贬值的自由，强迫它迅速废止任何可能导致汇率贬值的动作。以公共开支推进就业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在新的开放经济的背景下，由于存在大的进口渗漏，公共开支限制了国内的收益增值率。因此，凯恩斯所主张的旧式的自我清算的预算赤字不再起作用。公共开支会导致一种小的收益增值率和贸易赤字。

对社会党来说，它们并没有立即明白，变化已经发生，需要重新思考。要重新开始，总会有人抵制放弃旧政策。其中许多党是在几十年之后第一次掌握政权，所以想试一试它们所拥护的秘方。它们的支持者期望着国有化、迅速的增长、高工资和充分就业。它们面临着先前没有预料到的外部压力。陆续地，欧洲执政的社会党不得不吸取法国在1983年曾经吸取过的教训。

在财政约束之内，也还存在进步政策施展的空间。政府可以迎接妇女运动、少数民族以及老龄人口所提出的挑战。它们试着建立一种“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但是其中的许多人都是穷人。看来，必须特别思考用公共开支救济穷人的各种方式。对左翼反对官僚和精英支配福利利益，也是有转变的。分散化、地方分权和自治都是迫切的需求。这些在财政上都是中立的，为了满足这些新的需求，社会党是以新的进行成本效益核算的方式进行实验。

社会党选举基础的转变，是隐藏在这些新需求背后的原因。大规模的制造标准化产业作为最大的工作岗位提供者的重要性在降低。现在广为人知的产品，连同它们的标准化的技术——成熟的制造业——正在被重新安装到劳动力廉价和熟练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的蓝领工作岗位面临着压力，虽然程度有所不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英国、美国——处于制造业衰退的前线。但是法国和德国也不能抵抗这股潮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地方的制造业，不得不专攻知识密集型产品——医药品、航空航天、无线通讯和信息技术——而造船、汽车、纺织品和电子产品都在转移。新的服务业取代了它们的位置。金融服务得到最快速增长，当然也包括信息处理、通讯、广告、设计和时装。这些都是新的“抽象”产品。但是这些产业雇用的是大学毕业生，是执行弹性工作时间和非等级制结构的典型的小企业。传统的工人阶级正在收缩。一种新的由白领职员组成的混杂集体正在取代无产阶级。左翼不得不

与中产阶级选民阶层妥协。

同样，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旧的确定性正在受到挑战。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连同其任何生产方式内部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结构相契合的优雅链条，被重新检验：先是从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法国哲学传统的视角，然后是格里·科恩（Gerry Cohen）这位英国哲学天才的视角。<sup>[3]</sup>这里没有法国的哲学家可能会喜欢笛卡尔式的数学的确定性，同样，也没有一个英国哲学家所需要的严密的逻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晚期产品。就像亚当·斯密的财产方式理论（theory of modes of substance）一样，在我看来，对解释西欧如何在18世纪跨进资本主义门槛，它不啻为一种有用的传说。但它不是——而且不应该被演变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图式。它是一个千年的划时代的图式，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当他讨论特定的历史插曲的时候——如1848年、1851年和1871年的法国——马克思运用了更详细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一个由两个阶级构成的图式被多重阶级和派别所替代。机会和意外事件的动力学放到了突出位置。必然性几乎不存在。像他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通信中所展现的（见本书第5章、第6章），马克思意识到他的理论的特殊性。马克思是把他年轻时的观点提升到一种普遍宇宙理论的最后一人。结果是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升为宗教。

认为无产阶级总在热切地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观念本身就要受到审查。工会会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公共部门的或以知识为基础的私人产业的白领工人。拥有一种终生工作的传统工人——一生干48年，每年48个星期，每星期48个小时（包括加班时间）——正在消失。但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也开始受到质疑。妇女运动突出了家庭劳动中的剥削，坚定的无产阶级变成了家长统治的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中的出现，提出了殖民主义的问题，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贵族”从帝国主义的剥削中受益的方式问题。无产阶级在哪里？如何定义阶级？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继续发展，但这是一种冒险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范畴受到重新审视和检验。鉴于许多统计数据可以利用，阶级与职业是不是一回事？在阶级之间是否存在流动性？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Roemer）对阶级和剥削的观念进行了严格的审察，结论是，是财产的最初捐赠决定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无产阶级没有财产捐赠；小资产阶级有一些，但是不够，



还要依赖生产利润生活；资产阶级拥有足够的财产捐赠可以雇请其他人，但是他们自己不工作。<sup>[4]</sup>一旦阶级被这样定位，罗默的模型就是不允许阶级之间的流动性的。它是一个静态的、有一定期限的模型；这样在生活周期上的积聚问题，或者由于技术甚至机会的获得所形成的流动性问题，在这个静态的框架中就提不出来。马克思关于剥削的观念已经被修正，如同我们在本书第16章中所看到的。资本与时间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重要性还必须被确认。这些是技术方面的考虑，最初奥地利的马克思的批评家尤金·冯·柏姆-巴维克并不了解这点。但即使是这种反对意见也足以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光环。从瓦尔拉斯经济学的要求立场来看，马克思的理论被发现不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当然，瓦尔拉斯经济学——甚至在它最近的具体化形式阿罗-德布鲁经济中（见本书第16章）——也是静态的。它没有涉及周期、创新和危机。它没有安排利润或积累的角色。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的社会科学家看来，是马克思没有通过瓦尔拉斯测试，才破坏了他的吸引力。

如果说并不存在可界定的拥有完美无缺的革命证明书的无产阶级，那么资本主义惟一的反对派可能来自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20世纪80年代表明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弱点——或者毋宁说，再次证实了德国人在1914之前的几十年就已经确定的有关社会民党的辩论。当资本主义繁荣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就会兴旺发达，但是不幸的是，只有当资本主义有麻烦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通常才有机会执政。一旦问题被解决，资产阶级政党就会收获繁荣的果实。在20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政党在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问题时已经展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紧随其后，生怕危及自己，无论是在好的情况下还是在坏的情况下，他们都受到自己的敌人的排挤。

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的时候，社会党面临着社会主义的暗淡前景。它们从来没有一个革命的纲领，而现在它们又失去了与自己连为一体的阶级的支持。它们偏好的经济哲学——凯恩斯主义——正在退却。随着它们的追随者更多地进入中产阶级，福利开支面临着压力。接着发生的是柏林墙的倒塌和列宁主义政党在东欧的消逝。这些国家要选择的道路，不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更加放肆的资本主义道路。它们把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视为死胡同。不论是对是错，对东欧人来说，资本主义才是通向解放的道路。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甚至更糟糕——虽然说不

上悲惨。但是，也正是在这10年期间，在第三世界的不同成员之间开始出现差距。第三世界，或者说它组成的游说实体77国集团，开始失去它的同质性。正当一些国家陷入失败的深渊时，其他的国家出现了成功。一种新的发展范例正在被开发出来。

灾难的根源是过度的石油美元借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信贷资金的吝啬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源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经合组织打开了金融资源的闸门，发展中国家可以想借多少就给多少，而且借款越多，商业银行的回应就越快，办理得越迅速。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认为接受这种借款可以不听劝告的观念被抛弃了。这是对市场的信念出现动摇的先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应该表现得像世界的中央银行，或者至少应该检测银行信用如此大量注入的效果，但如今却默默地伫立一旁。随着布雷顿森林汇率体系的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20世纪70年代，再恢复它自身实在存在着太多的混乱；而20世纪80年代则对它的恢复提供了一个平台。

石油美元的借款名义利率约为5%（实际利率是负的，大约需要减去10%）。20世纪70年代商品的价格繁荣被证明是短命的，而且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期间持续呈现下降趋势。当凯恩斯主义仍然统治着决策圈的时候，尽管它一直受到攻击，借款照常进行。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欢迎的经济发展模型仍然是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借款可以实现许多计划，甚至是一些孕育时间长、回报率低、不怎么有出口潜力的石油勘探计划。

在利率上升使债务偿还成了一个问题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圈中的知识分子和发达国家中的某些人就已经发生了改变。预算赤字被认为是糟糕的，贸易逆差是宏观经济不平衡的一个信号，而固定汇率是不听劝告的。气候的回转非常突然；反革命很快征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信心百倍的灵丹妙药，如今被当作问题之根源的靶子。

在1973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的10年，是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美国和英国交锋最激烈的时候。到1981年，凯恩斯主义者发动了一场重新辩论的战斗。年长的凯恩斯主义者拒绝承认货币主义者的论点。但是，年轻一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在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受过良好教育——却认为，罗伯特·卢卡斯在技术上的高雅是吸引人的。他们承认了卢卡斯理论的基本真理，就是经济在自然失业率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均衡状态。争论的问题是，双方所展开的是否是一种永久的状态而不是短期的偏离，或者是否



存在着一些松弛现象。双方所展开的这种论证，采用的是一种技术的形式，是用数学方法和计量经济方法。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霸权结束了。我们现在有了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抗的卢卡斯的新古典经济学，这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是引进了瓦尔拉斯的均衡信息。卢卡斯的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被贴上了“非加速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NAIRU）的标签，从而维护了新凯恩斯主义者的名誉。

当然，在这场争论开始之前，在凯恩斯主义者中存在着不同意见。许多英国剑桥和别处的左翼凯恩斯主义者，公开指责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私生子。后凯恩斯主义者与所有其他凯恩斯主义的学派有着文本的和解释学的分歧。他们总是将官方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或多或少地说成是新古典主义的。但是，当被右翼包围的时候，凯恩斯主义者——新的、左翼的和后的——都显得进退两难。

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一个长期被坚持的论点，认为凯恩斯理论是不适用的。所有的各式各样的新古典经济学，都被怀疑是盲目接受市场规则。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到处看到市场失败，看到对政府进行全面干预的需求。新古典经济学家或者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哪里谈论竞争的市场，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就会在哪里发现寡头垄断和卡特尔。他们调制了一个包括苏联计划、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和有关宏观经济学刚性的结构理论在内的混合政策。

但是，他们的国家突然面临着巨大的贸易逆差、巨大的还债账单和急剧的外汇短缺。墨西哥是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主要典型，在 1982 年首先宣布无力支付它的债务。许多其他的债务国有着相同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破产吗？他们能够渐渐减轻对出借人的偿付能力吗？那个夏天谈得最多的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凯恩斯的话被一些人引证道，当你欠银行 1 000 英镑时，你将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但如果你欠的是 100 万，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的将是银行。

这个伤感的幽默被用错了地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管着负债累累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以弥补外汇短缺。这就是凯恩斯为什么要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短期借贷的权力的原因。他指出，准予贷款可以消除任何通货紧缩的需要。但是那是在 1944 年；现在是 1982 年，而且凯恩斯去世又过去了许多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严格的通货紧缩，坚持及时削减预算赤字，坚持固定汇率贬值和控制货币供应。由于借款

国家不仅没能控制进口，甚至没能控制临时性关税，他们必须拆除贸易保护，实行进口自由化。他们不得不放弃进口替代，并采取出口扩张的政策。

假如要不是结果如此悲惨的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命不凡地自以为是全知全能简直就是胡闹。每种经济，不管其历史、地理或文化条件如何，均被简化到由两个或三个方程组成的拼图模型。这里有一个货币需求方程，一个通货膨胀和产出方程（菲利普斯曲线），而且也许还有——仅仅是也许——一个汇率方程。每个国家都被假定应该存在着一定产出水平上的均衡（卢卡斯已经这样说过），在这个均衡点，它的通货膨胀将会消除，而且它的贸易逆差也会消失。这样的一种均衡在国民收入有一半富余的水平上可能存在，但是，这不说明问题。应该存在某种零通货膨胀的均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诫债务国家应该如何达到这点。

一种古怪而不幸的发展帮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方面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其效果却是破坏性的。非殖民化之后新的领土国家在数量上的激增，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现象。新的国家必须拥有作为国家的随身用具——自己的通货、自己的中央银行和自己的航空公司。它们现在也拥有自己的国民收入，这是由联合国或西方大学训练的甘于奉献的经济统计员所测定的。这些收入数字在表面上是科学的，但却常常遗漏了传统经济留下的巨大包袱。从好的方面说，它们试图捕获乡村、畜牧者和都市非正式部门所从事的创造价值的活动。从坏的方面说，这些活动都被忽略了，它们只是捕捉到都市的正式活动。货币供给的测量时常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这又会与许多经济无关。

然而，仍然有一些数据适合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对货币方程的需求进行“评估”（estimates），它也这样做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扭曲的经济图形，让它充当进行控制的手段。这样，无异于将一个控制汽车的仪表盘装配在一辆牛车上，而且要每个人假装他们知道该如何驾驶这种新的交通工具。后果是灾难性的。

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签署了“意向书”，事实上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它会进行经济改革，因此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当然，这些意向书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者口授的。这些国家必须削减预算赤字，使汇率自由化以推进出口，并且降低关税。自然，削减预算赤字的影响全部落在穷人身上，因为已经借到石油美元（而且在瑞士许多被作为私人财富储存起来）的统治精英并不准备遭受困苦。这些国家的军队继续受到优待，但是老百姓的食品津贴却被认为无效而废止。花



费在公众教育和健康上的可怜的少量费用也被减少。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它总的关心是，应该削减赤字；它不可能建议，这种削减要具有进步性和保护穷人。

对增加出口的劝告执行得更糟糕。许多债务国，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都是单一商品输出国。它们处于孤立状态，每个国家都被这样告诫，为出口“给定”一条“世界需求曲线”，这样收入与价格的弹性就可以被估计出来。这条曲线反过来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和降低成本被用来计算削价，以达到充分推进出口。但是，即使将它们加在一起，这些输出国也不可能全部都能够通过降低价格来增加出口。它们正在彼此竞争。世界需求曲线不是在任何意义上都能“给定”的。如果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应该能够看到这点的。但是它没有看到。它的经济学是天真的，而且无论如何，“国家办事处”（country desks）是分别运作的。

在所有的负债国，这些结构性调整项目（SAPs）变成了可憎恨的对象。多数负债国家的收入是负增长，尽管如此，却把猖獗的通货膨胀归罪于货币贬值。在这些主要的穷国中，人民蒙受着现实的苦难。不谈国民收入统计数字，悲剧还反映在对婴儿死亡率和生活预期的测度中。这些，虽然是不完全测量，但是它与真正的事件有关，而不是虚拟的实体。在过去 20 年中，随着公共卫生的进步，婴儿死亡率已经被降下来，而生活预期在上升。现在这种进步停止了，如果不说它倒退的话。这些数字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衡量其政策效力的一部分。它们不是宏观经济数字，国际货币基金所关心的只有那些宏观经济数字。<sup>[5]</sup>

因此，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在独立之后首次融进国际银行贷款和融资世界的经历，突然变得具有悲剧性。然而，主要的债务是由拉丁美洲国家所欠的，它们既不是新独立的国家，也不是人均资本收入最小的穷国。它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作自受（self-inflicted），因为它们借钱用于公共部门的项目，这些项目生产水平低下，也没有什么出口潜力。随着它们把结构性调整项目的费用分摊在本国的穷人头上，有一点就变得十分清楚：本国存在的问题在于财富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结构，同样在于自己的经济政策。当它们的精英责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还击这样的批评：他们运作的政府既不是民主负责的，也没有推行消除贫穷的政策。

相反的，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中有一些真正的成功故事。正是在亚洲，这种新的发展范例被发现了。亚洲虎——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



国香港——其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出了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制造品的健康出口。它们也有了高水平的教育和卫生保健，在乡村与都市之间有着很好的平衡。它们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显示了较低的不平等。它们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它们的经验可以被效仿吗？

亚洲四小虎很快得到其他亚洲国家的加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菲律宾。它们拒绝自给自足的进口替代的模式。它们都是出口导向的。它们的制造业部门不是国有而是私有的。政府仍然在提高出口效率方面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对东亚人来说，理想的模型不是苏联而是日本。在战后的日本，只有一种对国家经济繁荣的精神追求，政府、公司和银行由此结成了共同利益联盟。银行以较低的利率动员节俭的人们进行储蓄。这些基金被引到那些被政府指令要在特殊领域追求出口增长的公司——钢铁、汽车、收音机/电视机和计算机。这是一个理想的社团主义国家，以经济增长为惟一精神目标。

亚洲虎拷贝了这个模型。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这就减少了乡村的财富的不平等。它们还提供了免费教育，达到了文化普及。它们的医疗保健体系也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要好。它们在建立制造业时谨慎地选择了对出口导向型企业实行补贴。这就自动地确保了，它们的产品质量必须达到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水平。社团主义的共识是亚洲虎成功的关键。

亚洲虎的悖论在于，它们的成功是双重的，既有市场的良好运作，又有高水平的福利，尽管它们拥有的是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巴西在威权主义政府的领导下实现高增长率的时候，它疏忽了公平和普通的福利。墨西哥拥有一党制的民主政治，在公共部门进行了社团主义实验，但是没有让普通百姓受益。在印度，存在着带有较弱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混合的社团主义的民主政治，它以国有部门为导向，但是增长和股份化方面却失败了。韩国和中国台湾，还有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它们都为威权主义的合理性统治进行了辩护——它具有一种对穷人负责的能力。

在意识形态的论战中，各方都把亚洲虎的成功看作对自己的哲学的证明。那些偏爱开放型经济和私人所有权的人们，为避免国有制和避免敌视国际贸易而欢呼这一奇迹（像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做的那样）。那些偏爱政府利用市场控制经济的人们，祝贺亚洲虎“驾取市场”的能力。<sup>[6]</sup>那些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抱怨经济增长没有带来贫穷减少的声音，如今为平等和



福利的成功而欢喜。这些国家的许多领袖，特别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发现他们的成功对西方民主的衰微是一个敏捷的还击。这里指的是节俭、勤劳和守纪律这些亚洲价值观，再加上一种坚定的威权主义的指导力量。这些都是成功的关键。

日本和亚洲虎所实践的这种类型的社团主义——在政治、产业和金融之间建立的共同联盟——在两次大战之间曾被作为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替代方案被实验过。社团主义与纳粹主义的联系曾经使人不信任它，正如我所强调过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对计划的创新以及实现公立企业与私人企业的混合体制，无疑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成就。应把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党人所实施的毁灭性的反犹太主义区分开来。它在其他方面也存在问题——缺乏民主，实行避免国际竞争的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日本比较，它还限制进口），以及在国内生产方面培育联合企业，相应地就要以牺牲消费水平为代价。在亚洲四小虎中，存在着普遍接受的高储蓄的传统，这样会有助于维持推动出口的低消费主义策略。不过，至于这些储蓄倾向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自愿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控制机制还有讨论的余地。

对国家社团主义模型的检验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当然未来还要检验它。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之前，存在着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新的发展范例根植于亚洲的经验。它一方面表明，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持续而迅速的增长是可能的——就是说，不用走保罗·巴兰认为的惟一摆脱落后的道路：古巴已走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这是一条可以与平等、高水平的教育和公共卫生结合在一起的道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这种混合体制称为人类发展的范例。它亲善市场但也亲善穷人；它欢迎开放经济的导向但也欢迎政府起积极作用；它把健康和教育放在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的位置。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很一致。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详细阐述了“新内生增长理论”（New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sup>[7]</sup>新古典主义的增长模型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提出了，它表明了资本积累是如何导致更高产出的，尽管随着工人人力资本的上升，额外投入将会减少。如果是这样的话，拥有高资本产出率的富国将比穷国增长得更慢。这是一个均衡的结果。战后经济增长 40 年的经验是，从没有发生过这种均衡——或者说肯定没有以任何值得注意的速度发生过。这说明了什么？

卢卡斯—罗默模型强调，对教育和知识的投入能够增加回报，因为它能

引发技术方面的创新和进步。随着每项创新对产品功能的提升，对工人更高人力资本的回报不是下降，而是提升了。这种洞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固定资本转向人力资本，从硬件转向软件，从钢铁厂转向学校。有一个罕见的预见事例，它曾预言随后 10 年将要出现知识经济。

但是下一个 10 年将要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经济，还将看到自从 1914 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复苏，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消逝和《共产党宣言》所反映的世界的回归。

#### [注释]

[1] 有关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背景，见 Meghnad Desai (1981), *Testing Monetarism*, Pinter, London.

[2] 见 Mary Kaldor (ed.) *The Ideas of 1989*, LS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Publication, forthcoming.

[3] Louis Althusser (1969), *For Marx*, Verso, London; G. A. Cohen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4] John Roemer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有一个这方面的批评，见 Robert Veneziani (2000), *Exploitation and Time*, unpublished, LSE.

[5] 特别参考 Giovanni Cornia, Richard Jolly and Frances Stewart (eds) (1987), *Adjustment with a Human Fac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6] Wad, *Governing the Market*.

[7] Robert Lucas (1988),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pp. 3-42; Paul Romer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pp. 1002-1037.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18 章 梦幻曲

在 1989 年之后的 10 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 200 周年和社会党国际成立 100 周年之后的 10 年，所发生的事情是人们最料想不到的。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这个庞大建筑，列宁主义国家及其延伸地区，即从易北河到太平洋的横过欧亚大陆的整个大厦——苏联，连同它的东欧卫星国一道一一崩溃了。<sup>[1]</sup>那里肯定存在着麻烦的酿造过程。在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但是以前已经有过类似的不同政见，而苏联在 1953 年、1956 年和 1968 年都把它们全部粉碎了。在苏联内部甚至也偶尔存在着反对派，像内森·沙兰斯基（Nathan Sharansky）之类制造麻烦的领导人，也都被放逐了。

没有人，是的，没有人能够预测苏联体制的崩溃。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解释以说明它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些都是事后的解释。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家、所有的苏俄政体研究者，以及所有的把它视为邪恶帝国的人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如同多萝西（Dorothy）的情况一样，对于奥兹巫师的恐惧被夸大了。苏联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庄园，它的存活更多的是靠敌人的尊敬，而不是靠任何真正的物质力量。

社会主义夸口说自己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而言，在生产相对效率的领域，它已经牢固地失去了论据，吹嘘之辞只限于这一主张，说什么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上，社会主义可以改进资本主义。至于国有化工业的优越性，指挥中心的公有制的优越性，是很难谈得上什么的。但是列宁主义的替代方案、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等，则提出了不少主张。社会主义在生产和分配方面都比资本主义要优越。留给辩论的惟一依据，是政治的和公民自由权的消极自由同经济和社会权利的积极自由形成对照。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后方面临着巨大的改变。要求平等的斗争已经把它的焦点从经济的（收入和财富的）平等转移成社会的平等，对妇女、黑人、土著人和残疾人来说，是身份的平等。这增加了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人民继续进行反对其地方精英压迫的斗争的意识，这些地方精英常常与西方政府进行勾结。因此，越南、南非、尼加拉瓜、智利在为西方的抗议运动呐喊助威。其中许多斗争，尤其是妇女运动<sup>[2]</sup>，是在传统的右翼/左翼政党框架之外发生的。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政党有时也得到支持，不过经常是在它们没有掌权的时候，因此，它们经常抱有一种矛盾心理（例如，英国的工党政府对越南战争的立场）。

同时，随着西方出现经济危机，随着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的发生，资本主义的经济优越性正在受到质疑。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政党必须与这些问题作斗争，并时常以采纳一种保守的经济纲领而告终（例如密特朗领导之下的法国）。对许多人来说情况似乎是这样的，这些政党在政治上受到的压力越大，社会主义国家就越能避免经济问题。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正在经受的深刻的经济危机，被隐藏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作为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高石油价格允许苏联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它能够缓和国内的政治压力，而且能够把它的储备剩余通过贸易关系输送到卫星国。这就是为什么波兰团结运动的前景比20世纪



50年代和60年代所发生的类似抗议要看好一些。甚至当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在努力维护政治权力的时候，还被迫不得不与工人进行艰难的经济谈判。苏联体制已经与斯大林主义的不计道德的最恶劣的行为拉开了一段距离。

时间才过去10年，这点似乎被夸大了。在西方，社会主义者早就告别了斯大林主义。他们已经读过古拉格（Gulag）<sup>①</sup>的故事。正统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成员已经减少。这里存在着欧洲共产主义，一种旧共产主义主题的时髦复活。意大利共产党，西欧最大的共产党，开始与“资产阶级”政党分享政权。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共产主义仍然保持着它的吸引力。中国，尽管存在着对于市场的偏离，但仍然是一个一党制的列宁主义国家。在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苏联的实验也拥有自己的支持者。在生产资料方面拒绝市场和私有制，这点对于那些想要加速增长的第三世界的领袖是有吸引力的。古巴和越南——甚至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呼吁是有效的。

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的辩论的复兴，有意识地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较早时期的辩论（见本书12章）。<sup>[3]</sup>但是这次对瓦尔拉斯系统有着更高的赏识。新的辩论也可以吸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经验。1968之后的匈牙利，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波兰，在以市场核算为导向方面有所松动。大约在这一时期，即1989—1991年，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希望，就是使中央计划经济平滑转向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而不是转向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

在这一阶段，争论是从兰格的解决方法开始的。这样，以“按门类进行核算”来代替市场的思想——奥托·纽兰思的思想——被抛弃了。应该存在价格，存在消费者的选择，同样也应该存在劳动市场中的自由交易。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一个方面，是没有把投资决策留给私人进行的利润核算。这样，资本是通过凭单被公共部门所拥有，但是这些凭单并不意味着可以交易。在这种观点看来，资本主义的核心缺点是，私人投资是以一种非理性方式受对未来利润率的期望所驱动。这很像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认为的。因而，答案是要使投资决策社会化，但却要通过使所有公民拥有对资本的所有权而避免国有制。有了如此广泛的所有权作为前提，利润就可以被平均地分配。

所以，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型非常注意避免循环的不稳定，注意把

<sup>①</sup> Gulag，俄文“劳动改造总局”的缩写。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降低到最低限度。当然，哈耶克的激励经理人提高效率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没有涉及熊彼特的创新问题同样存在。那些冒险和创新的人期望有较大的回报。这正如亚当·斯密在 200 年前所强调的，不平等是刺激生产力增长的马刺。这里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买卖现存资本的所有权（即股票）而获得大量的财富。当股票市场出现不稳定的趋势时，尽管不完善，但它可以作为一条戒律对不能够使公司的净资产达到最大值的经理人采取行动。

新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准备为监控经理人行为设计一套灵巧的方案，但是他们所有人讨论的都是这种或那种监督类型，而没有看到财富的诱惑，或者破产和被接管给人的打击。假定他们的模型成立，他们的资本经济是瓦尔拉斯系统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增长和周期的动态不均衡在这个模型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而，资本主义不是按照瓦尔拉斯模型运行的。它是通过不稳定和周期以及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而运行的。在数学模型之外，想把生产力增长和限制财产积累协调起来，是不可能的。这种新模型充其量不过是停留在数学社会主义的王国。

然而，人们有一个普遍的欲望，既避免苏联类型的中央计划的最坏方面，又避免资本主义的繁荣与萧条。以某种方式，资本必须被驯服，而劳动必须被授权。在这场新的辩论过程中，这是一种早就准备好蓝图的乌托邦。

这里甚至有一个此类乌托邦的活生生的例子：南斯拉夫是这种模式的经济。它主要是工人所有制，而非国家所有制。它有计划，但是在联邦体制中，却存在很大程度的省自治。市场核算并没有被排除。南斯拉夫看起来像是苏联的一种人道主义翻版，而且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是工人的天堂。它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不像古巴是一个穷国。

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劳动管理（labour-managed）的经济思想被证明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公司，而且可以雇用和解雇经理。<sup>[4]</sup>这样，就存在着一个与资本家雇用和解雇工人相对应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对称。与所有公民拥有凭单或息票不同，在这个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型中，是工人自身并且只有工人才拥有的企业，他们在这种工厂中劳动并获取作为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的利润。除南斯拉夫的公司之外，在西班牙〔蒙德里安（Mondragon）〕和法国或比利时，也存在各种合作企业，在这些地方类似的制度安排非常流行。

在理论上，劳动管理的公司能够像股东拥有的公司一样运行。在任何一种情形中，经理被雇用都要实现净资产的最大值。这里遗漏了创新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缺点。但是即使不提这一点，如果公司的股票是可以交易的，也存在各种问题。当工人离开公司的时候，他不得不在公司内部出售他的股份，而不能卖给一个局外人。如果市场仅仅被局限在他以前的工人同事之中，他们就会有各种动机给他一种低价格。同样地，一个刚被雇用的工人立刻就得到其他工人多年在公司中创立的所有股票。当然，这种劳动管理的公司应该做的最后一件事，将是减少劳动力以实现结构调整，如果那被证明是公司生存下去所必需的。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中存在许多不平等。在理论上，可以设计出各种替代方案以避免它的缺点。但是资本主义的优势——它的生产财富的能力、它的动力机制和创新——与它的缺点是辩证地连接在一起。在数学模型之外，很难把两者分开。但是，即使是资本主义模式，从平等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到非常不平等的拉丁美洲经济，结果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既能被减轻，也能被恶化，而且常常是，各种偶然的变量构成了资本主义动力学的核心。财富的不平等是创新性和承担风险的活动的—种结果，与封闭的半封建土地所有制所引起的不平等，或者由精英控制政治权力和寻租所引起的不平等相比，并不能算是一个问题。这或许是东欧为什么选择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的前景而不选择斯大林主义的经验或市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的原因。

在列宁主义的左翼，总是存在着一种希望，就是希望在俄国被扭曲的革命能在内部被工人阶级所推翻。由于斯大林主义背叛了列宁主义的遗产，而且欺骗了俄国英勇的工人阶级（这种分析就是这样推论的），下一个步骤将会是工人重新夺回权力。他们将粉碎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建立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到那时，尽管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扭曲，但充足的资本积累将会产生。因此，工人将会接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熟的（国家）资本主义机器。

柏林墙并不是一下子倒塌的。它是由民主德国人和联邦德国人一块一块地破坏的。戈尔巴乔夫的决定不是要加强苏联在东欧的霸权，而更像是一个激进的非殖民化宣言。他已经看到苏联需要根本的改革。在政治领域，这意味着更大的开放，尽管还不是多党的民主政治。它意味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宽容；公开化。但是它也需要经济的结构调整；改革。在这一方面，他没有



清楚的答案。他认识到他必须给企业更多的自治，但是他没有把握澄清财产权利的重要性。企业，虽然是国家所有，但已经停止返还它们的利润。也没有什么公司所得税。财政系统崩溃了。

在1989年和1991年之间，更多的损失远远不只是苏联霸权在东欧和欧亚大陆上的消失。苏联的彻底消亡，如同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政治和权力结构的结束一样，是不同寻常的。<sup>[5]</sup>它没有给俄国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留下任何恢复的机会，也没有给俄国革命社会主义经济留下任何复兴的机会。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没有未来。毕竟，它仅能拥有有限的生命，像许多有机组织一样，只可惜在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生命记录上，它是短暂的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的终结”总不如希望的终结那么强烈。社会主义一直是以这样一种希望为基础的：未来会比现在要好。这是乐观主义的教义。它的衰落是希望的终结。

在它的历史上，苏联也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其他替代方案——也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即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前景。虽然它们的关系是敌对的，但是两种替代方案共同分享着一种社会主义的梦想：生活将会比资本主义提供的要更好；通过调节、控制——而实际上是废除私有财产——人类历史的下一个阶段会被界定。在拒绝列宁主义的威权主义和集体化方面，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已经与资本主义达成暂时的和平。但是它最终意味着把资本主义想像成一种更好的体制：通过公众消费领域的稳定扩张；通过证明公共所有权比私人所有权的优越性；通过开动追求有用性而不是追求利润的经济；通过满足多数人的需要而不是少数人的贪欲来实现这一目标。

苏联的消亡使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很难再站住脚。当然，这是不公平的。没有相反的实验被付诸实施，以证明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是难以运行的。甚至英国工业国有化的提案，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还是一直受到辩护。然而，突然之间，那种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计划/公有制来更好地开动经济的观念，开始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以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也发现，对它们的高税收财政的福利资本主义的成就，也必须重新认识，因为它们的资本家可以在国外投资，而不一定非得交纳税金或者购买政府债务。一股意识形态的浪潮猛烈地撞击着各式各样的现存社会主义的沙塔，并把它们一扫而空。对于20世纪70年代及其之后出生的新生代来说，任何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运行的想法，都是难以理解的。我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十几岁的孩子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如此告诉过我。



当然，这股意识形态的浪潮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复兴。在我看来，把它称为新自由主义是错误的。因为人们往往把新自由主义等同于各种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跨国公司也被类似的刷子涂了沥青。但是这需要区别纯粹的保守主义和纯粹的自由主义。前者在通过税收休假（tax holidays）、津贴、工会联欢以及甚至保护主义方面帮助资本家，为政府承担了大量责任。有时候，它也具有军事的攻击性，尽管那可能是冷战时代的意外事件。财政的保守主义和一种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统治着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栖息领地，但是它们仍然把政府视为经济的舵手。货币主义，第一个自由主义的化身，为政府控制（通过中央银行）货币供应而欢呼。里根在口头上是一个财政保守分子，但实际上，是公共财政的狂热花费者。玛格丽特比她的任何前任都使经济权力更集中。她甚至选择把公共资产出售给私人垄断者，而不是释放竞争力。

但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对于其历史上出现的有着更深根源的变化——19世纪的自由主义信念的复兴——不过起到助产士的作用。它们现在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但是它们基本上却持有这样一套观念，即所有19世纪的思想——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都应该拥护。基本的观念是，作为有机过程的市民社会（市场，也包括更广大的社会），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因此，没有一个单一的机构，或者甚至没有一些机构，能够对每天发生的事件过程负责。马克思不责备垄断的资本家，他谈论的是所有权的阶级垄断。甚至资本家也只是寻求赚取利润和进行积累。他们既不控制市场，也不征服竞争。的确，在古典经济学中，并不把竞争作为许多公司生产同样产品并获得零利润的游戏来理解。公司可能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它们可能试图通过专利权、企业联合协议和固定价格而控制市场。但是最终将会出现替代品、创新和竞争性产品。一个像IBM一样庞大的公司，能够被像微软一样的不断创新的小鲤鱼所侵袭，而这个小鱼转而又可以成为一个庞大的公司。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微软或是任何其他的大公司，又会受到利润、创新以及创造性摧毁的风暴的侵袭。按照同样的说法，政府并不被看成能够控制经济，或是被看成应该干预经济的机构。如果新自由主义是一个20世纪热爱政府的保守主义的翻版，那么自由主义则是它19世纪的激进表姊妹。<sup>[6]</sup>

当然，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由意志论的自由主义——的复兴，有一个物质基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于解除了对资

本流动的管制。正如我已经表明过的，这是对盈利能力下降的一种内生性的反应。但是如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种政策的启动，也存在大量无法预料和未曾考虑到的结果。随着英国依照美国的做法，也解除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采取了浮动汇率而不是固定汇率，政府控制经济的积木的基础就动摇了。这并不是说，政府不再非常强大。它继续控制着通货（不是金本位，像19世纪所存在的），控制着公共税收和开支，当然，也控制着入境/移民（不存在劳工的自由迁移，它像19世纪那样）。

但是，政府不能控制经济，就像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宁静的1/4世纪它所习惯的那样。它控制公共钱包，但却只限于驱动庞大的财政赤字。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不再相信，这种赤字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政府控制着对于通货的垄断权，但是它再一次意识到，货币处置失当的结果是严重的。一个解除管制的全球资本市场，限制了国内利率能够游离于其他国家借款利率的范围。如果汇率是有弹性的，就会立即出现相应的资本流动以平抑任何通货放任所得到的可能的利润。如果它是固定的，国家将会失去对等的防护性储备。

这种政府在控制经济方面的权力的缩小化，对于某类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日本的增长，是通过政府领导精英公司，并借助于银行动员储蓄为工业扩充筹集经费而实现的。一旦投资国外像投资国内一样成为可能，日本的银行也开始输出它们的资本。甚至日本的像索尼一样的公司，也开始从制造业走向多元化，进入美国的媒体和娱乐公司。旧的政策内聚力很快失去了。日本发现，不论是它的银行还是它的公司，都不能在国外有效地运作，也不能在旧的策略所划定的狭窄界线之外参加竞争。在20世纪90年代，一种长期的衰退缠绕着日本，并且没有显示任何快要结束的迹象，因为政府不能够而且不愿意大幅度地调整经济结构，如同玛格丽特·撒切尔或罗纳德·里根胆敢做的那样。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的韩国也遭遇了相似的危机。资本市场自由化和对外国竞争开放经济的挑战，完全暴露了由银行、公司和政府三重联盟艰苦建立起来的结构的脆弱性。不像日本，韩国欢迎政治上的变化，也欢迎经济上的变化，而且在一个新政权的领导下开始着手痛苦的结构调整，这个新政权的总统，来自旧的政治精英之外。但这个政府，在塑造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或列宁主义翻版的经济方面是如此的有力，如今却被指派从事毁灭它的成就和适应市场的困难工作。<sup>[7]</sup>

全球化，如这一时期被人们所知道的，是解除资本运动的管制、在信



息/通讯/传输技术方面取得进步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从社会民主党和国家集权向新自由主义和意志自由主义转变等三方面的组合。<sup>[8]</sup>所有的三个方面是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出现石油危机之后出现的，而且它们聚集起来，列队前进，最终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达到相互加强的状态。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意识形态，是第一个输掉战斗的。<sup>[9]</sup>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在20世纪80年代退缩的，那时解除管制和实行私有化开始被作为创新性的替代方案来尝试。尽管这些趋势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和英国开始的，但是其他发达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也开始参与进来。与此同时，东欧的转型经济也融入了这股放弃国有制的洪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甚至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欢迎这种解除管制和实行私有化的学说。

这种变化仍然在继续。甚至现在，在不同的国家的速度也是不同的。与英国相比，法国是一个不情愿自由化的国家，但是德国和意大利却加快了它们的速度。印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反对自由经济改革，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结束的时候，人们已经看到这种政策变化的明智。<sup>[10]</sup>各处的决策者开始重复强调，政府不能创造就业，不能引起经济的扩张，只能为私人部门创造就业岗位和收入增长提供条件。

在对待外国资本方面也出现了一个转变。外国公司的到来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不受欢迎的，尤其是当它们不是来自横跨大西洋的“表姊妹”国家的时候。在最近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汽车和电视机对英国的侵入，就曾招致一些英国的工会领袖发出怨恨的评论。英国的就业，被认为只能由英国拥有的资本来创造。美国人对日本入侵好莱坞和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也感到吃惊。但是很快，这些态度改变了。政府，甚至富裕国家的政府也同样意识到，它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吸引外国资本来装备劳动，以完成生产性的、高附加值的工作。这一举措的必然结果是，新技术需要熟练的、受过教育的工人。教育变成了大量宣传的政府的职责。在这个新的范式中，资本与劳动不是对立的。甚至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政府（或它们的美国副本，克林顿的民主党）也看到，一项活跃的政策必须执行这些新的任务——吸引资本，并通过训练和再培训来教育工人。

这个新时期的一个结果是，政府不再控制经济，而是变成众多表演者中的一员（当然，是主要的一员）。对它不能控制但却必须给予回应的各种力量，政府必须适应并且作出调整。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

经济学里占优势的比喻是一辆行驶在收费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实现了最大增长），或者是一架起飞的喷气式飞机（发展），那么现在的世界更可以被比喻为一艘在公海上扬帆航行的航船。船上有一些控制机器，但是在航行时，船长不能控制波浪或者海风。这些力量可以被研究，但是它们不可能被控制。船长要是忽视或者藐视这些力量，将会理所当然地使船触礁，并且全部沉没。

经济的确是以这种方式触礁的。法国就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触过礁，而且不得不改变了航线。秘鲁在阿兰·加西亚（Alan Garcia）领导之下触礁，是由于鲁莽的过度开支。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仍然握着在过去建立起来的非生产性资产被遗弃一边，当时像竞争或市场这类思考是被忽略的。印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也不得不改变它的政府导向的经济政策。

尽管如此，思想中的旧看法和过时的习惯仍然继续着。这在金融市场中看得最清楚。在这些市场上，交易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扩张，这也提高了对有关价格的不稳定性的关注——利率、股票价格和汇率。众所周知，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 1992 年 9 月就有过关于让英镑从欧洲汇率机制（ERM）中退出的大胆构想，如今却记录着抱怨价格过度不稳定性的懊悔。

周期连同周期所带来的狂躁、崩溃和恐慌，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病症（endemic）。<sup>[11]</sup>在现在的情形下尤其如此，那里解除了对于资本流动的管制，就像 19 世纪那样。在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期，尽管也存在着对于资本流动的限制，但周期一直很浅，而且比较稀少。的确，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之前，经济学家所询问的是，商业周期是否已经是荒废的陈词。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一些严重的衰退开始出现。甚至其后，全面的周期随着金融危机也开始降临，这就是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因为它从亚洲扩散到了俄国和美国，并继续传到了巴西。然而，像从前全球化阶段的所有周期一样，它还存在复苏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复苏比 19 世纪快得多，两年时间。1994 年 12 月墨西哥的比索危机是地方性的，但是甚至那也证明是突然和剧烈的，但在 18 个月内就复苏了。

还会出现更多的此类周期，更多的金融危机，更多的股票市场价格的震荡。但是它们不太可能像 1931 年的经济大萧条那样。那是一种罕见而独特的经验，农业供给过剩（由于苏联的集体化和俄罗斯农民的倾销）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美国中央银行在运作国际金本位制方面缺乏经验，导致了流动性阻滞。今天，这是不太可能的。实际上，是美国在 1998 年 9 月至 10 月



间快速地连续降低利率的决定，把世界经济从亚洲危机中拯救了出来。

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观点。<sup>[12]</sup>第一种是古典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周期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的病症，但是它们也可以自动矫正和自我维护。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不需要对市场进行保护性的治理。马克思认同这个理论，虽然他也强调资本主义体制具有自我毁灭的能力。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例如哈耶克和新奥地利人，则洞识潜在秩序的自发性。<sup>[13]</sup>

直接对立的观点是，市场经济遭受失灵的威胁，如果不能得到适当治理，可能会造成震荡。人们关于经济大萧条的记忆，为这种观点增添了色彩。解决市场失灵的答案是实行诸如罗斯福所执行的新政。如果市场现在是全球性的，就需要一种全球的治理秩序，一个世界性的财权威威。当然，由于这种国家间体制是等级制的，任何此类的治理秩序都会是不民主的，除非事情发展得比它们在过去数百年中更好一些。但是在这里，这种有关市场机能不良的观念具有核心性。博兰尼是这个观点背后的精神领袖。

居中的观点声称，资本主义体制是正常的，而且通常可以自我调节，但偶尔会出现混乱。这需要轻轻触摸一下方向盘，是顺流而下而不是逆流而上。美联储在1998年秋季的行动是这种有效干预的例子。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全盛期间，英国发明中央银行正是为此目的。与这一观点关系最密切的是凯恩斯。不像许多其他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市场应该被允许尽可能地自我运作，并偶然地进行矫正。黑格尔，由于他对市民社会的批评，应该被视为另外的一个代表人物。

这三种观点——马克思/哈耶克、博兰尼和凯恩斯/黑格尔——涵盖了人们研究资本主义体制如何运作的所有可能的看法。没有理由相信任何一个是正确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可能最符合马克思/哈耶克模型，但是有时也可能偏离到凯恩斯/黑格尔的模型。它很少能够到达博兰尼所害怕的程度。毕竟，在法国革命之后的塔利兰德（Talleyrand）的吹嘘又得到资本主义的回应：“我活过来了”。

#### [注释]

[1] 有关苏联崩溃的讨论，见 Michael Cox (ed.) (1999),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Pinter, London;

Robert Skidelsky (1995) *The World After Communism*, Macmillan, London; János Kornai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2] 关于妇女运动, 有一部广博的文献。见 Shelia Rowbotham (1972),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Allen Lane, London; Nancy Folbre (1994), *Who Pays for the Kids?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straints*, Routledge, London.

[3] 不少书籍和文章谈论过市场社会主义。尤其需要参见 Alec Nove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Allen & Unwin, London.

存在着一些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辩论的复兴。他们建议投资社会主义化/公共控制。见 John Roemer and Pranab Bardhan (1993),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Joseph Stiglitz (1994), *Whither Socialism?* MIT Press, Cambridge, MA.

[4] 工人所有制首先被 J. 范尼克 (Jaroslav Vanek) 广泛地讨论过。J. 米德 (James Meade) 也在这方面写了著作: J. Vanek (1977), *The Labour Managed Econom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Y; James Meade (1972), "The Theory of Labour Managed Firms and Profit Sharing", *Economic Journal* 82, pp. 402-428.

[5] 关于社会主义的灭亡, 见 Meghnad Desai (1992) "Is Socialism Dead?", *Conten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ndianapolis.

[6] 有关新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对比, 见 Meghnad Desai (2000d), "Neither Ideology nor Utopi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vember.

[7] 有关无权国家的讨论, 见 Linda Weiss (1998),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Polity Press, Cambridge; Kenichi Ohmae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Collins, London.

[8] 关于全球化方面的书很多。见 Paul Hirst and Graeme Thompson (1996/2000),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Polity Press, Cambridge; David Held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y Press, Cambridge; Meghnad Desai (1995b), "Global Governance", in Meghnad Desai and Paul Redfern (eds), *Global Governance: Eth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World Order*, Pinter, London; Meghnad Desai (1998), "Profitabilit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Capitalism", in R. Bellofiore (ed.), *Marxian Economics: A Reappraisal, Volume 2, Essays on Volume III of Capital Profit, Prices and Dynamics*,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pp. 291-305; Meghnad Desai (2000b), "Rejuvenated Capitalism and No Longer Existing Socialism", in Jan Toporowski (ed.), *Political Economy and New Capitalism: Essays in Hon-*



*our of Sam Aaronovitch*, Routledge, London.

[9] 关于凯恩斯理论的灭亡, 见 Meghnad Desai (1996), “Hayek, Marx and the Demise of Official Keynesianism”, in Mauro Baranzini and Alvaro Cencini (eds.),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Routledge, London.

[10] 关于印度改革, 见 Meghnad Desai (1993),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India*, EXIM Bank, India; Meghnad Desai (1995a), “Economic Reform: Stalled by Politics?”, in Philip Oldenburg (ed.), *India Briefing: Staying the Course*, M. E. Sharpe, New/York/London; Will Hutton (1995), *The State We're In*, Jonathan Cape, London.

有个评论, 见 Meghnad Desai (1997), “It's Profitability, Stupid”, in Gavin Kelly, Dominic Kelly and Andrew Gamble (eds), *Stakeholder Capitalism*, Macmillan, London, pp. 203-218.

[11] 关于周期, 见 Charles Kindleberger (1978),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Macmillan, London; George Soros (1998),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Open Society Endangered*, BBS/Public Affairs, New York.

[12] 我已经探讨这三种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 见 Meghnad Desai (2000a), *Financial Crises and Global Governance*, unpublished, LSE.

[13] 有关马克思/哈耶克的争论。见 Chris M. Seccavaccia (1995), *Marx, Hayek and Utop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York, Albany, NY.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第 19 章 资本主义的前景 II： 最后阶段或游戏？

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幸免于难，生存了下来。事实上，它不仅仅生存了下来，还取得了对主要挑战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和列宁主义。它还把作为一种严肃前景的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清除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仍然到处徘徊，但它本身不过是其前任的一个黯然失色的阴影。也许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处于蛰伏之中，因为它实现了自己的大多数目标。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对此还有争论（克罗斯兰的看法），甚至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再一次接手处理资本主义的最近一次危机的时候，人们还是有争论。但是，它不仅因为自己的笨拙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而且在承认新自由主义政府（撒切

尔，里根，科尔）在民主竞选中取得胜利方面，甚或在效仿它们的方法（密特朗在1983年之后；英国工党在1994年之后）方面，承认敌人智高一筹。更有甚者，它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的如此巩固的成就——充分就业、福利国家以及政府控制工业和公共部门——也受到侵蚀。

资本主义不仅仅生存了下来，它还焕发了青春，并显示出根本不存在即将崩溃的迹象，甚至不存在任何老化的迹象。这是20世纪完全不可预知的结果。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些人指责现在的新体制存在着不公平、不平等和浪费。另一些人则期望回到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期。的确，凯恩斯主义政策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些人的惟一目标，他们仍然赞成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的旧翻版。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体制进行比较时，评论者对德国人或日本人的社团主义进行了赞美，因为在前者中，社团所有制既具有竞争性，同时也时常被竞争。带有强烈统一封闭色彩的劳动市场，在工资谈判和工人招募方面都受到了称赞，与美国和英国的弹性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财政运用的规模，安全网的坚固性，反对国际贸易和外国资本的褊狭程度，对资本主义来说，都变成了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的指示器。

然而它们全都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不同翻版。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还不存在一种具有竞争性的生产方式作为可行的替代方案。资本主义是城镇中的惟一的游戏。竞赛是在不同竞争性翻版之间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欧洲大陆—日本人。<sup>[1]</sup>金融市场资本自由化所造成自由运动的各种力量，以及运输、数据传输和通讯等新技术的出现，至少在现在看来，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模式是有利的。这是因为就盈利能力而言——这肯定是检验资本主义所取得成就的惟一标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在全球化的第一个10年，即20世纪90年代，要比社团主义者的经济进展顺利一些。不仅利润在增加；更有甚者，尽管早些时候出现过有关“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的令人沮丧的预言，但与相应的欧洲大陆的经济相比，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中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就业水平。就GDP增长和收入增长而言，各种情况也在继续好转。

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在20世纪期间，许多思考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都曾预言，资本主义的前景是，如果不会灭亡，至少将会衰弱下去。所有的社会科学变成了“政府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控制经济，应该成为控制减轻社会问题的主要代理人。一种观点认为，与其要那样一个世界，我们宁愿面对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它可能不会灭亡，但却指明我们都

必须适应的变化步骤，尽管它也存在许多错乱和混乱。当然，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全球化没有使什么发生，一切都不新鲜，或者它不过是关于国际化的一个错误标签——所有这些断言都是强有力地作出的。<sup>[2]</sup>人们热情地认为，政府在面对全球化时并非无能为力。市场是不能获胜的；它是一个仆人而不是一个主人，法国的社会党总理里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就这样来描述他的立场。博兰尼对市场进行了有力的批评，认为它是不可能的、毁灭性的和机能不良的糟透的社会，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苏，因为人们担心全球化可能（将会）自我毁灭。

还有一些有关全球化必胜主义者的各种描述。他们所提出的预言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历史的终结、每个人都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繁荣、各国都实行的民主政治以及每个家庭都有一台录像机。

这些分析所缺少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矛盾的观念。资本主义是一个受利润驱动的积累体制，而且不断探索新的技术以提高生产力。同样，资本主义也带有周期性，会发生崩溃和出现恐慌。资本主义是减轻贫穷和悲惨的最佳安排，甚至当它为重建经济而侵害就业岗位时也是如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行为对于各国都是一条强有力的戒律，然而其自身又是极其活跃和高度脆弱的。就像在先前的革命时期——18世纪晚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19世纪晚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平等伴随着旧工业和就业的衰退而增加一样，现在它又随着新的技术和技能的出现而增加。<sup>[3]</sup>

不过，先前的工业革命主要影响的是欧洲西北部和美国。它们通过帝国主义冲击了剩下的世界，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摧毁旧的方式而不建立新的方式。然而，现在这个阶段却真正是全球性的。资本的影响力——不论是作为有价证券还是作为直接投资——金融市场的霸权，逐渐增加的贸易渗透，全都曾被所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经历过。事实上，这个用数字命名不同世界的方法，现在看来是不必要的。在世界的任何角落，资本主义的收益和成本在成几何对称地下降，尽管它并不相等。200年来第一次，资本主义的摇篮——大都市和中心——也像它的边缘那样，非常担心变化的疾速。

这就是为什么，在1999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会场外面汇聚的示威人群中，有许多是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成员国的联合起来的工人，他们要求为自己的高收入的工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却并没有人关心环境问题或者再分配问题。<sup>[4]</sup>通过

把自由贸易描述为共同的敌人，发达资本家国家的繁荣的市民既能够拥有自己的蛋糕，又能够享受它们，实现两者兼得。毕竟，自由贸易会把蛋糕转移出去分给其他国家的低收入工人。

但是，也有一种真实的利益联盟，它的成员既有穷国和富国，也包括那些在不同地方——西雅图、华盛顿、达沃斯（Davos）和布拉格，或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七大工业国会议所能召开的地方对全球化表示了自己的愤慨的人。要理解这些逻辑和它们的不合逻辑性，就需要把目前的资本主义阶段作为近代历史进程的一个结果来考察。这是因为，全球化已经艰难地开始了。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这个新世纪是同龄人，开始于1989年“短暂的20世纪”的结束。1945年后全球秩序的逻辑——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象征——与这种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市场引导的逻辑，是相抵触的。鉴于此，我们必须再一次，但却是最后一次折回我们的步伐，回到马克思，回到近代历史。

## 长期视角下的资本主义

这样，21世纪的到来，既是一个开端，也是一个中断后的继续。世界回到了它1914年离弃的地方。然而，这不是一种循环，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这是因为在许多方面，现在与19世纪是不同的。

这不但是一个新的世纪，而且是一个新的千年。日历当然是欧洲人的和基督徒的，然而时间却已焕然一新。在前一个一千年到来的时候，欧洲正处在“黑暗时代”。那个时代的动力，是伊斯兰教征服世界的力量。中国是一个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而且也许是最繁荣的国家。开罗和巴格达的大学正在保存、传输和增添源于古希腊和同时代印度的知识。

正是在过去的1000年的下半期，欧洲与其余世界（这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欧洲表达方式）之间的平衡改变了。轻便而快捷的航船，装备着枪支，成为使伊比利亚的冒险家能够同美国、非洲和亚洲订立契约的重要创新。哥伦布在1492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1498年，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序幕。这开创了现代帝国主义的时期。帝国是一直存在着的，但是过去主要是以陆地为基础的扩张。现在，我们首次有了海上帝国。

正是作战和航海方面的创新，才使这种扩张成为可能。<sup>[5]</sup>但是它影响了

剩余货物从殖民地到大都市的转移，而且大多是借助暴力来实施的。它标志着宗教狂热所点燃的种族傲慢开始了。上帝和枪被用来掠夺黄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比利亚，它在上一个千年的较早世纪中已被穆斯林教徒所殖民，现在成了欧洲种族主义的傲慢的前锋。

改变欧洲帝国主义景象的，是18世纪晚期科技的飞跃。现在，西欧可以很快生产出比帝国主义先驱者所掠夺的总和还要多的剩余。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的生存又有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这个新时代的是织布机和车床，并非上帝和枪。在19世纪，帝国主义继续发展，甚至还进一步扩张到亚洲和非洲。但是它的基础已经改变。它寻找市场和自然资源。不仅有了剩余产品的转移，而且有了提升剩余产品的技术出口。

20世纪的结束，不仅仅标志着向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进行挑战的结束，而且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包括大陆帝国主义和海上帝国主义，也失败了。欧洲，它在数百年来打上了深刻而持久的帝国主义烙印，在两个不同时期曾经失去它的帝国。以陆地为基础的帝国——奥托曼（Ottoman）、哈普斯堡（Habsburg）和罗曼诺夫（Romanoff）帝国——在1918年之后消逝了。当然，罗曼诺夫帝国曾经焕发青春。但是接着在1945之后，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海上帝国，连同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一最后和最不情愿离去的帝国，一起消逝了。因此，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胜利所看到的是经历了近500年的所有帝国的终结。没有殖民地的斗争，这些是不会发生的。事实上，在它最后的阶段中，美国，一直渴望担当反对帝国主义的领袖，但从1945年到1975年，却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抵制殖民化的越南战争中。

正是大量新的领土的（民族的）国家的存在，使21世纪的全球化阶段有别于19世纪的全球化阶段。在20世纪下半叶（1945—1989），非殖民化与冷战的互相影响，在新的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中生产了许多扭曲现象。在权力政治的富有讽刺意味的游戏中，独裁者受到了两边的拥护。然而，当这场充满战争的世纪随着列宁主义政权在欧洲崩溃而和平结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事实上还包括东欧的非殖民化的国家）开始进入了自由—民主的新时期。

古典的自由主义高扬自由，但它对民主是谨慎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未完成的对黑格尔的批判，在这个时代会显得那样激进。<sup>[6]</sup>把无财产者（无产阶级）接纳为有选举权的阶层，超出了洛克或穆勒的想像。对于古典的自由主义来说，自由意味着占有并享受财产果实的自由。这当然包括你自己的

劳动力财产。然而，一旦你把财产的经济自由延伸到选举权的政治自由，自由民主所隐含的矛盾便一目了然了。

青年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批评中认为，把选举权扩大到无财产者，就会破坏那种要求选举阶层的表达权必须有财产才享有的政体。因此，取消对于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其实是一项彻底取消财产的行为。但是，这是因为他还不了解政治经济学：这个体制是如何生产和再生产了无产阶级的——也就是说，工人如何自愿地签订了导致他被剥削的契约。这还需要时间。这是在他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才理解的，在《资本论》第6章中，专门探讨了“劳动力的买与卖”。

无产阶级的创造带有极其深远的、没有料想到的结果。一旦签订契约和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被认可，契约中这种地位的同等性就只能导致人们在其他方面也要求地位平等。先前所有社会不仅建立在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且建立在地位的等级制这样一个狭窄的金字塔的基础之上。但是，一旦人们变成了交换的主体和劳动力的出售者，地位的不平等便变得难以维持。工人的选举权是第一步，尽管它在旧世界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实现。（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早期引入男性公民选举权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下一个步骤是妇女的选举权。性别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是因为，男性工人在经济上签订契约的自由在他们享受政治权利之前已得到确立，而妇女在经济方面的授权却比她们获得政治权利落后了半个世纪。但是妇女运动和工人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演变成了非殖民化的推动力。这反过来引起了美国的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权运动。地位不平等的消除，是契约经济权利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希腊人在自己的民主政治中并没有地位的平等，妇女和奴隶都没有投票权。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正是契约自由才导致了地位的平等。

但是，不论是授予选举权，还是消除地位的不平等，对于解决经济的不平等都没有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一旦劳动力变成商品<sup>①</sup>，它就拥有了自由和流动性。它就拥有了订立契约的法律上的权利。然而，这种平等与财富方面的经济不平等是同时存在的。雇主（富翁先生）所拥有的收入/财富，可以抵得上数百个雇员，如果不是数千个雇员的话，而以法律上的平等为基础的交易，是在

<sup>①</sup> 在英文版中“商品”（commodity）词误为“共同体”（community）。

经济上不平等的背景下实现的。

但是在1867年，或甚至更晚，马克思再也没有与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新发生联系。财富给予了雇主不成比例的力量，而工人的力量只是表现在数字上。在劳动力市场中，数字只是在决定工资谈判上才显示力量，但是在这里，马克思自己的周期理论再一次表明，当利润受到威胁的时候，资本是如何取代劳动的。在广阔世界中，政治上的组合——如果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即选举权，比经济上的组合要强大得多（虽然它们是相关的）。这是因为，政治权力的波动并不像经济的波动那样构成一个周期。因此，民主政治成了对市场的挑战。

然而，它也被证明是对于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挑战。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德国革命的失败，其原因是德国的工人深思熟虑地决定支持温和的改革，以使德国变成一个共和国。他们不想要德国社会民主党提议的废除财产权的革命的替代方案。这是因为，有了共和国，就能给在德意志帝国之下长期维持的地位不平等以沉重打击。在推翻霍亨索伦王朝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只不过充当了工具，使德国政体变得更具包容性。

这样，所固有的拥有选举权的工人，又被资本主义所赎买。民主权利能够把工人进行工资谈判的力量推进到某个高度。如果它太多地威胁了盈利能力，那么资本将会撤回或者转移。如果把马克思的逻辑颠倒过来，我在上面讨论过的东西就变成，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一种进行长期互补的需求，尽管——或者可能是因为——存在着短期的循环冲突。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全部观点解释为一个强调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的观点，这种周期性不能保证利润率下降足以破坏这个体制，这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利润率不会大幅度地跌落。如果工人与资本斗争所赢得的结果不是废除资本主义，而是资本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甚至最终只能强化这种互补。

我认为，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所得出的结论，尽管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得出的。社会民主党到处都看到，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就会影响到盈利能力的恢复。但是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它就需要来自工人的合作，而不是冲突。而且它得到了这种合作。安巴拉瓦纳·西瓦纳德（Ambalavaner Sivanandan）在批评英国左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取的方向时是这样戏剧性地描述的：“资本已经摆脱了劳动——也完全逃离了左翼。”<sup>[7]</sup>

冲突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但是这也只是这样来看，资本主义不会很快

灭亡。因而，工人的信念和行为将经历一个修正。当然，这不会立即进行，也不是最终在每个国家都是如此。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普遍撤退，应归因于这种既代表劳工又代表它的政治代言人的资本与劳动之间这种互补的实现。

民族国家(nation-state)<sup>①</sup>在20世纪后期的激增，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引入了另一种冲突逻辑：国家间的(interstate)[时常叫做国际的(international)]政治体系<sup>②</sup>的性质。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始，欧洲的国家体系在其后的三个世纪中是以一种欧洲中心论的方式进化的，但是它的对外扩张和普遍化则属于20世纪后半叶。在摧毁国家间政治体系的欧洲中心论方面，伍德罗·威尔逊失败了，而富兰克林·D·罗斯福却取得了成功。联合国采用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主权国家的逻辑，而且正是通过条约，这个政治体系才为自身做出了安排。在20世纪期间，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自1919年以来开始突破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以条约为基础的逻辑被扩展到国际经济领域。在构建1945年战后的全球秩序方面，诸如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融实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被创造出来。这些机构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有关主权国家保持象征性的平等的观念之上，又增加了由超级大国共同管理的观念——把欧洲扩大到全世界。这样，联合国有一个总议会(威斯特伐利亚)和一个由五个常任理事国组成的安全理事会(剧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的投票权，不是按照一个国家一张选票进行分派的，而是以国家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本所做出贡献的额度为基础进行分配的。在这里，再一次是七国集团处于支配地位。

因此，经济的或者事实上的不平等，与政治的或者权利上的平等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存在状况之中。这与马克思于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自由没有什么不同。在财富和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之下，潜藏的就是这种现象的不平等水平。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这种国家间体系的逻辑变得流行起来。这有赖于冷战的帮助，当然也有赖于一国资本主义体制之中的

---

① 这里的民族国家，主要是相对于1914年之前的资本、商品和劳工可以自由流动的国际环境下的国家而言的，即国家之间存在着对于资本、商品和劳工自由流动的限制，也可以理解为与真正的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相对立的国家状态。

② 这里指的是非全球化状态下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体系，也包括在全球部分地区形成的政治组织。



物质基础。它使世界秩序支离破碎。一方面，存在着西方和东方的冷战分界。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组成了第三世界，这些第三世界的成员对这两大敌对阵营有着不同的效忠，同时它们也在响应不结盟运动。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经济划分，被贴上了北方和南方的标签。

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之间矛盾的结果，是使全球组织更无法发挥效率。这样，在联合国内部，联合国大会被看作是认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而安全理事会由于常任理事国中的东西方阵营划分而陷于瘫痪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看作是第一世界的组织机构，受七国集团（就像后来为人们所知道的）驱使，代表着第一世界的利益。第三世界要求并且组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它被认为是其自己的机构，在涉及关税和发展方面，它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甚至世界银行表现得更友好。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为消除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冲突又提供了某种空间。

无产阶级的矛盾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矛盾之间的相似性，不能被引申得太远。然而，确实存在着这样做的尝试。因此，曾几何时，就存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理念，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应该像无产阶级一样站出来，破坏全球性秩序/世界的资本主义。这是托洛茨基的假设的一个极端翻版。因此，与马克思的理论完全相反，这种最薄弱环节成了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最遥远的环节，并将引发世界革命。南方团结起来对付北方的不太具有革命性的观点，也流行了一阵子，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石油价格危机削弱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许多此类事件被这证明是一种错觉。由南方国家单独实现这种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论它们是多么团结。正如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政党所明确意识到的，它们的事业取得成功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繁荣的时候，南方不得不承认，它自己的繁荣的道路要建立在与北方的交易之上。这点与下一种情况是相似的：在“倒置马克思”这种观念的国家间认识水平上，交易更主要是一种互补过程，而不是一种冲突过程，即使是在交易的当事双方拥有不平等的权力的情况下，也仍然如此。

实现这种逻辑的机会是由各种谈判带来的。这种谈判在1945年的一种制度安排中发生了，这种制度安排不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南方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歧义做法（见本书第17章），已经制造了一些“新兴工业化的”国家，而且迫切要求进入北方的市场。他们主动开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这最终导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和条



约签署。贸易是互惠的关系，而且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它所有的成员同意把最惠国待遇条款延伸到其他所有的贸易伙伴国家。互惠和对等因此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程序的核心。它的结构在所有的国际机构中是最平等的——一个国家，一张选票。然而，它的操作抵制任何平民主义的煽动行为——不像联合国代表大会。它的程序已经导致对北方强国的成员——美国和欧盟成员——的惩罚，这点是无论联合国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从来没有努力过的。

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化新时代的第一个机构。全体成员都是自愿加入的，但加入该组织并非是无条件的。各个国家必须在实现贸易自由和避免有歧视的贸易壁垒方面满足一定的标准。这样，中国在加入之前必须进行长时期的磋商，尽管它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通过显示热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发展中国家证明，1945—1989年的分裂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是现时代的最终悖论。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的各种力量，正在慢慢地但是确定地创建着一个世界。世界贸易组织是这一时期全球治理的首要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属于一个较旧的国家间体系。力量的不平等在它们的操作方面得到了编码。不像贸易，国家之间政治上的（力量）关系是既不对称，甚至也从来不自互惠的。主权平等的假定与贸易关系的互惠的事实，并不是一回事。

也许，最好应该举例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被以有争议的方式予以解决，正好与朱比利2000年研究项目新近提出的消除债务的呼吁形成了对比。20世纪80年代遭致损失的债务，产生于西方商业银行对拉丁美洲主权国家所发放的石油美元的商业贷款，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的贷款。当墨西哥在1982年不能支付债务时，发出了债务危机的信号。结果，在冗长的多次谈判之后，因不能支付而被勾销了一大笔债务。许多金融新举措——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等<sup>[8]</sup>——在设计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案时都使用上了，但是到最后，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债务被支付。这是因为，当那笔债务被平仓时，该债务在金融市场上的实际价值是偏低的——只相当于其名义价值的一部分。

引人注目的政府和多边公共贷款机构的公债，被证明更难以取消。它的影响程度甚至更为严重地超过了早期的债务情形，因为在目前的情形下，债务国主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非洲。债务的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未付的较早该支付的分期贷款所造成的结果，这是一笔原始债务之外被追加的债务，因而具有复杂性。这些债务能否偿还，前景并不乐观。但是国家间体系不能够接

受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所为，不论是取消债务，还是对它进行平仓。因此，我们看到奇怪的结果，市场常常被诋毁为全球化的邪恶的天才，却被证明比那些国家间体系显得更宽容和更少伤害，而这些国家间体系的许多成员（法国和德国）都鼓吹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是鼓吹某种进步的社会哲学的形式。

真正具有全球性的另外的一个问题，是生态系统的问题。臭氧层穿洞和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这是两个明显的超越国家间体系的问题，更别说是超越单个主权国家的问题。对于工业过程和消费模式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为人们所清醒认识，见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当时，许多此类观点都还带有民族国家性质，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中，许多环保组织都在同政府和工业进行斗争。从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到《布伦特兰可持续发展报告》（1989年），再到里约联合国大会（1992年），环保运动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

一种论述环境问题的观点认为，它是一种大规模的市场失灵。为了追求利润，企业忽视了它的行为所造成的真正的环境代价。消费者也受到市场的鼓励，去追求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在这种论断中的确存在着一种真理。然而，市场同样可以被证明，它能够有效解决此类问题，也就是说，通过税收和补助改变消费者和企业的激励机制来解决，并且这种改变比单纯的命令更可靠。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的最大的进步，是由1973年原油价格上涨到四倍，甚至在1979年又出现另一次涨价而引发的。

这里也存在着对产品和生产程序强制实行严格的调控，以保证降低对于环境的损害。那种认为市场可以不带任何类型的规则或调控地运行的想法是天真的。金融市场到处都受到严格的调控，到处都服从于为欺诈、破产和挪用等而设定的法律。正是苏联和东欧，或许才采取了更加有害环境的产业政策。在那里，市场是缺失的，指派的权威选择了忽视环境的问题。

但是，更为严肃的问题是那些真正具有全球性质的问题。在这里，尽管存在着各种代表大会，联合国体系是无效的。像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所表现的情形那样，有效的方式是让进行全球制度安排谈判的政府和企业都联合起来。关于氯氟碳化物问题的蒙特利尔大会，是解决臭氧层问题的第一个成功范例；它对电冰箱生产以及其他使用氯氟碳化物的技术做出了限制。这里，整个产业——包括它的成员中强大的跨国公司——都同意



通过接受这些限制而进行合作。

全球变暖的问题被证明更是令人难以捉摸。在联合国的赞助之外，召开了另一个全球性的会议，也就是1998年召开的京都会议，而且制定了一个时刻表。但是在这方面，一些大的生产商是主权国家，而不是公司。提上议程并准备行使的解决方案，是引入交易许可证制度。这是科斯在解决市场失灵时的一个例子——在清洁环境方面引入产权，并以交易许可证的形式分配这些权利。交易许可证的采用是不容易的，因为市场的逻辑与国家间体系的逻辑是相抵触的。银行必须面对的竞争性压力，与主权国家是不相干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债务取消的情况下一样，市场的逻辑比权力的逻辑更亲切和更有效。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友好的或慈善的体制。它是迄今为止在财富创造方面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它没有至高无上的目标，因为它通过数以百万计的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努力而运行的。它创造了经济的增长、繁荣和作为副产品的就业。它也以自己不断变化的趋势造成了大量的痛苦和破坏。但是，在过去的200年中，它创造了几千年来所创造的福利的总和。有一个事实是，与1800年相比，现在有更多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大约是1800年的6倍），而且他们的平均寿命也更长——大约比那一时期的人们多活10至20年。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尔萨斯是错误的，虽然这不能阻止马尔萨斯主义者继续追随他。如果寿命可以作为一种衡量潜在福利的天然尺度，就是说，1800年，地球上生活着10亿人，人均年龄为40岁，如果与今天生活着60亿人、人均年龄为60岁相比，是一组很能说明资本主义成就的数字。在1800年，也许那10亿人中的2/3是穷人；而今天，64亿人中的最多只有1/4是穷人。然而，消除贫困既不是自动的，也不被视为理所当然。<sup>[9]</sup>

无论如何，亚当·斯密的如下说法是没有错误的：天然自由的资本主义新体制在实现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的同时，也强加了不平等的代价。在最近的200年中，尤其是自1945年以来，更多的人脱离了贫穷，这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摆脱贫困的人数都要多。这种认为贫穷可以被消除的观念，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任何阶段是不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消除贫穷的手段，但是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这些手段可以直接或最终导致贫困消除。绝对贫穷只是在19世纪完成工业革命100年之后，才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大英帝国——开始被人们谈及。在出现机能失调的两次大战期间，正如贫穷作为私人体验得到强化一样，它也作为公共关注而消失。<sup>[10]</sup>

正是在凯恩斯主义黄金时代的高峰时期——20世纪60年代——穷困在富裕国家作为一个论题再次出现。在这之前，焦点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在去殖民化的国家中，经济增长在国家进步中处于优先地位，而贫穷的减少只是一种无意的结果。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一些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国家，开始采用开放经济、市场导向的政策，并出现更多增长现象的时候，这一问题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许多这类亚洲国家中，对提供文化普及和良好的卫生保健都有各自的智慧。因而在亚洲，数百年来人口最多和最贫穷的大陆，开始以一种最显著的和无法预料的方式迅速地摆脱了贫困。

中国也许是说明亚当·斯密的主张的最好例子。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直到1978年，它遵循着保持贫穷和平等的政策。在苏联模式经济下，出现了很多工业的进步，但是毛泽东政策的任意性导致了大饥荒，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带来更大的破坏。然而，基础被建立起来了，在人民公社中也实行了文化普及和良好的卫生健保。正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结构调整，在农业中实行更加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责任制，实行经济对外国资本开放，并鼓励地方企业的发展，这样，中国才开始经历着两位数字的增长率。在过去的22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8倍。地方性的不平等已经增长，收入不平等也已经生长，然而贫困却减少了。中国保持着一党制的政府，保持着悲哀的人权记录。但是，它已经从一个贫穷但平等的社会，走向一个不那么贫穷却更不平等的社会。

所以，我们仍然要碰上马克思对于亚当·斯密的挑战。马克思非常清楚，资本主义有着消除物质匮乏的潜力，但他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消除不平等和贫穷。然而，在他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作品和《资本论》的成熟著作之间，他越来越不确信，资本主义制度会立即消失。令人遗憾的，是他的青年时期的华丽辞藻，而不是他的成熟分析，成了他的遗产。数不清的罪行是以他的名字实施的，为的是唤起这一预言：资本主义会很快就要灭亡，就要被苏联创造的新秩序所打败。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这一观点被忘却了：资本主义，当它持续的时候，是一个进步的生产方式，它无忧无虑的发展比反动的替代方案更优越。现在它回来复仇了。资本主义已经变得真正具有全球性，而且它还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这样，对于马克思来说，究竟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回忆一下马克思勉强做出的关于资本主义之后应该出现什么社会的预言吧！它将是社会主义，过一段时间之后接着是共产主义。但是，它会怎样到来、是个什么样子以及它将如何运作，这些都是他所没有触及的问题。在经过 20 年专注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后——对于资本主义如何运作进行的分析——他再也没有回到在他的早年手稿中所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个不仅仅是自我组织的，而且是可以自我意识的社会吗？一个社会能够完全自我意识到它自己的工作，能够指导他们，使个体不是从他们的工作中异化出去，或者从他们自身异化出去，而是能够完全参加他们的自我解放，实现他们作为物种的全部潜力吗？换句话说，存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beyond Capitalism）吗？

马克思从以回答这些问题为己任，转向研究资本主义，并严厉谴责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景上所产生的错觉。然而这些错觉在他死后再次出现，并且在 1917 年之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幸亏世界历史上这个悲惨、强暴和野蛮的时代过去了。马克思已经实现了他的复仇。但是，他会得到奖赏吗？将来还会出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吗？

### [注释]

[1] 关于可替代的资本主义，见 Hutton, *The State We're In*, Chapter 1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rld Capitalism" pp. 257-284。

[2] 关于全球化，除了本书第 18 章引用的资料之外，也可参见：Peter Burbach, Orlando Núñez and Boris Kagarlitsky (1997),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Rise of Post-Modern Socialisms*, Pluto Press, London (该书从左翼的视角提供了一种关于全球化的十分消极的观点，但对于变革的迫切性却是非常乐观的。作者还为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做了辩护)。

Samir Amin (1997),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Zed Books, London (一个来自老资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批评，对于欧盟将构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抱有一些希望)。

Saskia Sassen (1998),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 New Press, New York (随着它们对全球化形成的影响，从女权主义角度对移民和非正规经济做出了解释)。

[3] 辩证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被发展了，见 Desai, "Profitabilit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Capitalism"; and Desai, "Rejuvenated Capitalism and No Longer Existing

Socialism”。

[4] 关于西雅图和 WTO，见 Meghnad Desai (2000c)，“Seattle: A Tragi-Comedy”，in Barbara Gunnell and David Timms (eds)，*After Seattle: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Catalyst Pamphlet，London。

[5] 对于伊比利亚人扩张至关重要的武器与航海创新，见 Carlo Cipolla (1996) *Guns, Sails and Empires*，Pantheon，New York。经典研究见 Emmanuel Wallerstein (1980)，*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Academic Press，New York。

[6] Karl Marx (1844/1970)，*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ed. With an intro. by Joseph O'Mall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7] Ambalavaner Sivanandan (1990)，*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 Writing on the Black Struggle for Socialism*，Verso，London。

引自第二章，“All that Melts into Air is Solid; The Hokum of New Times”，p. 23。全文是：

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抛弃经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累赘的同时，也抛弃了经济分析的工具，这样就不能带来新时代 (New Times) [英国共产党在 1988 年 10 月在《今日马克思主义 (Marxism Today)》上发表的新纲领]。他们认为，他们如此敏捷而勇敢地描述的社会与文化的巨变，是基于 (反过来又有助于) 经济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革命性转变，这些都是由新技术引发的。这里存在着持续的革命，这种革命的规模、范围和容量，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它正在从左翼身边溜过——撒切尔主义不经意地让它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即使在那时，左翼所了解的也是科学和技术上的巨大成就，用 L. 马多克 (Lewan Maddock) 爵士的话来总结就是，电子计算机已经取代人脑，正如当初蒸气取代肌肉。但是，它的社会学影响——资本已经摆脱劳动——也完全摆脱了左翼。工党过于沉醉于它自己的工联主义，而没有看到工人阶级在新的生产力的冲击下正在瓦解，旧的劳工组织形式已经变得支离破碎。(pp. 23-24)。

我认为 Sivanandan 将会同意我的分析，他书中的许多内容深化了我对全球化的理解。

[8] N. 布拉迪 (Nicholas Brady) 是里根-乔治·布什时代的财政部长，为解决债务问题，他引进了由美国政府担保的债券，以便使债务国可以从银行买清债务。

[9] 对于人口和贫困的评估，见 World Bank (2000)，*World Development Repo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10] 关于英国的贫困，见 Peter Townsend (1979), *Poverty in the UK*, Penguin, Harmondsworth.

在美国也“发现”了类似的贫困。见 Meghnad Desai (1995e), *Poverty, Famin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elected Essays of Meghnad Desai, Volume II*, Edward Elgar, Aldershot, 尤其参见第 13 章 “Poverty and Capability: Towards an Empirically Implementable Measure” (pp. 185–204)。





## 参考书目

Althusser, Louis (1969) *For Marx*, Verso, London.

Amin, Samir (1997)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Zed Books, London.

Amsden, Alice (1989) *Asia's Next Gia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Anderson, Perry (1979) *Considerations of Western Marxism* Verso, London.

Anderson, Perry (1992) *English Questions*, Verso, London

Arrow, Kenneth J. (1951)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John Wiley, New York.



Auerbach, Paul, M. Desai and A. Shamsavari (1988) "The Dialectic of: Plan and the Market: On the Transition from Actually Existing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70, September-October.

Avrich, Paul (1970) *Kronstadt 192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Banerjee, Sumanta (1982) *India's Simmering Revolution: The Naxalite Uprising*, Zed Books, London.

Baran, Paul (196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Baran, Paul and Paul Sweezy (1968)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Baranzini, Maurizio and Alvaro Cencini (eds) (1996)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Routledge, London.

Bellofiore, R. (ed.) (1998) *Marxian Economics: A Reappraisal, Volume 2, Essays on Volume III of Capital-Profits, Prices and Dynamics*,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Bernstein, Edouard (1899/1909) *Evolutionary Socialism*,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ie Voranssetzungen des Soc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J. H. Dietz, (Stuttgart) Huebsch (New York).

Blackburn, Robin (ed.) (1975) *Explosion in a Subcontinent*, Penguin, Harmondsworth.

Blaug, Mark (198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fourth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Bliss, Christopher (1975) *Capital Theor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North Holland, Amsterdam.

Böhm-Bawerk, Eugen von (1896/1949)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O. Boenigk (ed.) *Staatwissenschaftliche Arbeiten: Festgaben für Karl Kneis* (Berlin), ed. and trans. Paul Sweezy and published in Sweezy (ed.) (1949).

Bortkiewicz, Ladislaus von (1907/1949) *On the Correction of Marx'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 Ökonomie und Statistik*,

July 1907, trans. in Sweezy, (ed.) (1949).

Boulding, Kenneth E and Tapan Mukerjee (eds) (1972) *Economic Imperialism: A Book of Reading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Bowles, Samuel, David Gordon and Thomas Weiskopf (1991) *After the Wasteland: A Democratic Economics for the Year 2000*, M. E. Sharpe, Armonk, NY.

Brown, A. J. (1938)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Reinterpreted*, 2 v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Brudney, Daniel (1998) *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Bruno, Michael and Jeffrey Sachs (1985) *The Economics of Stagflation*, Blackwell, Oxford.

Burbach, Peter, Orlando Núñez and Boris Kagarlitsky (1997)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Rise of Post-Modern Socialisms*, Pluto Press, London.

Burnham, James (1942)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or,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Now*, Putnam, London.

Caravale, G. (ed.) (1991) *Marx and Modern Economic Analysi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Carr, E. H. (1950)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3 vols, Macmillan, London.

Carr, E. H. (1958)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3 vols, Macmillan, London.

Cartwright, Nancy et al. (1996) *Otto Neurath: Philosophy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Chayanov, A. V. (1960) *The Theory of the Peasant Economy*, trans. Basile Kerblay, ed. Danil Thoner, 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Richard D. Irwin, Homewood, IL.

Cipolla, Carlo (1966) *Guns, Sails and Empires*, Pantheon, New York.

Clark, Colin (1940)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Macmillan, London.

Cliff, Tony (1975—1979) *Lenin*, 4 vols, Pluto Press, London.

Cliff, Tony (1989) *Trotsky: Towards October*, Bookmarks, London.

Coase, Ronald (1988)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Cocker, Mark (1998) *Rivers of Blood, Rivers of Gold: Europe's Conflict with Tribal Peoples*, Jonathan Cape, London.

Cohen, G. 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Condorcet, M. de (1785) *Essai sur l'application à la probabilité des décisions rendue à la pluralité des voix*, Paris.

Cornia, Giovanni, Richard Jolly and Frances Stewart (eds) (1987) *Adjustment with a Human Fac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Cowling, Mark (ed.) (198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Interpretation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Cox, Michael (ed.) (1999)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Pinter, London.

Crosland, Anthony (1956),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Jonathan, Crape, London.

Dangerfield, George (1980),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Daniels, Robert V. (1960)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Dantzig, George (1963) *Linear Programming and Extens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Debreu, Gérard (1959) *Theory of Value*, John Wiley, New York.

Desai, Meghnad (1970) "The Vortex in India", *New Left Review*, 170, September-October.

Desai, Meghnad (1973) "Growth Cycles and Inflation in a Model of the Class Struggle",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December, reproduced in Desai (1995d).

Desai, Meghnad (1974)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Gray-Mills, London.

Desai, Meghnad (1975) "India: Contradictions of Slow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Blackburn (ed.) (1975).

- Desai, Meghnad (1976) *Applied Econometrics*, Philip Allan, London.
- Desai, Meghnad (1979) *Marxian Economics*, Blackwell, Oxford.
- Desai, Meghnad (1981) *Testing Monetarism*, Pinter, London.
- Desai, Meghnad (ed.) (1989) *Lenin's Economic Writing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 Desai, Meghnad (1990)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Quantitative Marxism", in Dunne, P. (ed.) (1990).
- Desai, Meghnad (1991)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in Caravale (ed.) (1991).
- Desai, Meghnad (1992) "Is Socialism Dead?", V. S. Desai Memorial Lecture, 15 December 1990, *Conten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ndianapolis.
- Desai, Meghnad (1993)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India*, EXIM Bank, Bombay, India.
- Desai, Meghnad (1995a) "Economic Reform: Stalled by Politics?", in Oldenburg (ed.) (1995).
- Desai, Meghnad (1995b) "Global Governance", in Desai and Redfern (eds) (1995).
- Desai, Meghnad (1995c) *Poverty and Capability: Towards an Empirically Implementable Measure*, in Desai (1995e).
- Desai, Meghnad (1995d) *Macroeconomics and Monetary Theory: Selected Essays of Meghnad Desai, Volume 1*,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 Desai, Meghnad (1995e) *Poverty, Famin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elected Essays of Meghnad Desai, Volume 2*, Edward Elgar, Aldershot.
- Desai, Meghnad (1996) "Hayek, Marx and the Demise of Official Keynesianism", in Baranzini and Cencini (eds) (1996).
- Desai, Meghnad (1997), "It's Profitability, Stupid", in Kelly, *et al.* (1997).
- Desai, Meghnad (1998) "Profitabilit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Capitalism", in Bellofiore (ed.) (1998).
- Desai, Meghnad (2000a) *Financial Crises and Global Governance*, LSE, unpublished.
- Desai, Meghnad (2000b) "Rejuvenated Capitalism and No Longer Ex-

isting Socialism”, in Toporowski (ed.) (2000).

Desai, Meghnad (2000c) “Seattle: A Tragi-Comedy”, in Gunnell and Timms (eds) (2000) .

Desai, Meghnad (2000d) “Neither Ideology nor Utopi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tumn/Winter.

Desai, Meghnad and Paul Redfern (eds) (1995) *Global Governance: Eth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World Order*, Pinter, London.

Deutscher Isaac (1954—1963),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1929*;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Dicey, A. V. (1885/1914/1982)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first edition 1885, eighth edition 1914, reprinted as a Liberty Classic in 1982, Liberty Fund Inc. Indianapolis, IN.

Dickey, Laurence (1987) *Hegel: Religion, Economics and the Politics of Spirit 1770—180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Dickinson, H. D. (1939) *Economics of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Döblin, Alfred (1983) *Karl and Rosa: November 1918, A German Revolution, A Novel*, trans. by John Woods,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New York.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Harper & Row, New York.

Dunn, Stephen (1982)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Dunne, Paul (ed.) (1990) *Quantitative Marxism*, Polity Press, Oxford.

Dutt, Romesh Chandra (1908)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2 vols, Kegan Paul, Trübner Trench, London.

Eatwell, John, Peter Newman and Murray Milgate (1990)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Macmillan, London.

Ellman, Michael (1975) “Did the Agricultural Surplus Provide Resources for the Increase in Investment in the USSR during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Economic Journal*, December.

Engels, Friedrich (1845/1892)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trans. Kelly-Wischnewetzky (1885), published in New York (1886) (John W. Lovell); and in London (1892) (George Allen & Unwin) with a preface by Engels.

Fasse, M. et al. (eds) (1999) *Economics, Welfare Policy and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ssays in Honour of Alfred Heertje*,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Feldman, Gerald (1993) *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Hyperinflation 1914—192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Feinstein, C. H. (1967)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Maurice Dobb*,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Figes, Orlando (1996)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Jonathan Cape, London.

Fisher, D. H. (1996) *The Great Wave: Price Revolutions and the Rhythm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Folbre, Nancy (1994) *Who Pays for the Kids?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straints*, Routledge, London.

Frank, Andre Gunder (1967)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Friedman, Milton (ed.) (1956)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Friedman, Milton and Anna Schwarz (1963)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Fromm, Eric (1967) *Marx's Concept of Man*, Ungar, New York.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Hamish Hamilton, London.

Furet, Francois (1988/1992)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70—1814*, trans. Antonia Nevill from *Révolution* (1988) (Hachette), Blackwell, Oxford.

Gadgil, D. R. (1971) *Industrial Evolution of India in Recent Times*,

1860—1939, fif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mbay.

Galbraith, J. Kenneth (1952)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oston, MA.

Galbraith, J. Kenneth (1955/1980) *The Great Crash, 1929*,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André Deutsch, London.

Galbraith, J. Kenneth (1958), *The Affluent Society*, Hamish Hamilton, London.

Galbraith, J. Kenneth (1971),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Houghton Mifflin, London.

Gay, Peter (1952)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o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Gille, Alan (1996) "The Origin of the Poverty Lin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XLIX, no. 4.

Glyn, Andrew and John Harrison (1980) *The British Economic Disaster*, Pluto Press, London.

Glyn, Andrew and Robert Sutcliffe (1971) "The Collapse of UK Profits", *New Left Review* 66, March-April.

Glyn, Andrew and Robert Sutcliffe (1972)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Profit Squeeze*,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Goodwin, R. M. (1967) "A Growth Cycle", in Feinstein (ed.) (1967).

Goodwin, R. M., M. Krueger and A. Vercelli (1984) *Non-Linear Models of Fluctuating Growth*, Springer Verlag, Berlin.

Goodwin, Richard and Lionello Punzo (1987) *The Dynamics of Capitalist Economy: A Multi-sectoral Approach*, Polity, Oxford.

Gordon, R. J. (ed.) (1974) *Milton Friedman's Monetary Framework: A Debate with the Cr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Gunnell, Barbara and David Timms (eds) (2000) *After Seattle: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atalyst Pamphlet, London.

Halberstam, David (1972)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Random House, New York.

Harcourt, Geoffrey C. (1972)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Harman, Chris (1982) *The Lost Revolution: German 1918—1923*, Bookmarks, London.
- Harris, Nigel (1995) *The New Untouchables: Immigration and the New World Worker*, I. B. Tauris, London.
- Harris, Seymour E. (ed.) (1952) *The New Economics: Keynes's Influence on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Alfred Knopf, New York.
- Hayek, Friedrich von (1931) *Prices and Production*, Routledge, London.
- Hayek, Friedrich von (ed.) (1935) *Collective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i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Routledge, London.
- Hayek, Friedrich von (1938)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 Hayek, Friedrich von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Routledge, London.
- Hayek, Friedrich von (1948) *Individualism and the Economic Ord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Held, David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Hilferding, Rudolf (1927/1981) *Finance Capital*, published in German by Wein, trans. Tom Bottomor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 Hirst, Paul and Graeme Thompson (1996/2000)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Hobsbawm, Eric (1964) "Dr Marx and the Victorians", in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Weidenfeld & Nicolson, London.
- Hobson, J. A. (1905/1988) *Imperialism: A Study*, Archibald Constable, London, first edition; Unwin Hyman, London, third edition.
- Hont, Istvan and Michael Ignatieff (eds) (1993)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Howard, M. C. and J. E. King (1992)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 1 1883—1929; Volume 2 1929—1990*, Macmillan, London.
- Hutton, Will (1995) *The State We're In*, Jonathan Cape, London.
- Hyman, Stanley Edgar (1961) *The Tangled Bank: Marx, Darwin, Frazer and Freud*, Atheneum, New York.

Jay, Martin (1984) *Marr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Juglar, Clément (1862) *Des Crises commerciales et de leur retour périodique en France, en Angleterre et aux États-Unis*, Pairs.

Kabeer, Nalia (2000) *The Power to Choose: Bangladeshi Women and Labour Market, Discussions in London and Dhaka*,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Kaes, Anthony, Martin Jay and Edward Dimendberg (1994)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Kaldor, Mary (ed.) (forthcoming) *The Ideas of 1989*, LSE, Londo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Kalecki, Michal (1968)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Kalecki, Michal (1971) *Selected Essays on Dynamism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Kautsky, Karl (1891/1910) *The Class Struggle (Erfurt Programme)*, trans. William E. Bohm, Charles Kerr, Chicago.

Kautsky, Karl (1902) *Die Agrarfrage: eine Übersicht über die Tendenzen der modernen Landwirtschaft und die Agrar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e*, J. H. W. Dietz Nachf, Stuttgart, trans. Peter Burgess, Swan, England.

Kautsky, Karl (1919/1964)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reprint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trans. H. J. Stenn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Kautsky, Karl (1946) *Social Democracy versus Communism*, ed. and trans. D. Shub and J. Shaplen, Rand School Press, New York.

Kelly, Gavin, Dominic Kelly and Andrew Camble (eds) (1997) *Stakeholder Capitalism*, Macmillan, London.

Koopmans, Tjalling C. (ed.) (1951) *Activity Analysis for Production and Allocation*, John Wiley, New York.

Keynes, J. M. (1923)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Macmillan, London.

Keynes, J. M. (1925)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

published as a pamphlet by Hogarth Press, reprinted in Keynes (1972).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London.

Keynes, J. M. (1940) *How to Pay for the War*, Macmillan, London, reprinted in Keynes (1972).

Keynes, J. M. (1972) *Essays in Persuasi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9,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1931 book, Macmillan, London.

Kiernan, Ben (1985)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Verso, London.

Kiernan, V. G. (1982) *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 1815—1960*, Fontana, London.

Kindleberger, Charles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Macmillan, London.

Kindleberger, Charles (1978)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Macmillan, London.

Klein, Lawrence R. (1947)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Macmillan, New York.

Kondratieff, N. D. (1926) "Die Langen Wellen der Konjunktur",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opolitik*, December.

Koopmans, C. Tjalling (ed.) (1951) *Activity Analysis for Production and Allocation*, John Wiley, New York.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Krader, Lawrence (1975)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ssen, New York.

Kuhn, Harold and Abraham Tucker (1951) "Nonlinear Programming", in Neyman (ed.) (1951).

Kumar, Dharma (ed.) (1983)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Volume 2: 1757—19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aski, Harold (ed.) (19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e Centenary Edition*, published for the Labour Party, Allen & Unwin, London.

Lehmann, William C. (1960) *John Millar of Glasgow 1735—1801*;

*His Life and Thought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Sociological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ekachman, Robert (1966) *The Age of Keyn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Lenin, V. I. (1893/1937) "On the So-Called Question of the Home Market", written in 1893, first published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 also reprinted in Desai (ed.) (1989).

Lenin, V. I. (1897) *A Characterization of Economic Romanticism: Sismondi and Our Native Sismondists*, first published in four issues of *Novoye Slovo*, April-July 1897; also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

Lenin, V. I. (1916)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2.

Lenin, V. I. (1921) "The Tax in Kind", reprinted in Desai (ed.) (1989).

Lenin, V. I. (1955) *Collected Works*, 45 vol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ewin, Moshe (1975) *Russian Peasants and the Soviet Power: A Study of Collectivization*, Norton, New York.

Lewis, W.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vol. 22.

Liberman, E. G. (1971) *Economic Method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New York.

Lippincott, B. E. (ed.) (1938)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List, Friedrich (1837/1856)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Sampson Lloyd, Longmans Green, London.

Lucas, Robert (1971)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

Lucas, Robert (1988)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Lundberg, Erik (1996) *The Development of Swedish and Keynesian Macroeconomic Theory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uxemburg, Rosa (1913/1951)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 Agnes Schwarzschild,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Luxemburg, Rosa (1935) *Leninism or Marxism*, Anti-Parliamentary Communist Federation, Glasgow.

Luxemburg, Rosa (1961)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Luxemburg, Rosa and Nikolai Bukharin (1972)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 Rudolf Wickman, ed. Kenneth Tarbuck, Allen Lane, London.

MacFarquhar, Roderick (1974/1983/19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McLellan, David (1969)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Macmillan, London.

Maddison, Angus (1991)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Long Run Comparative 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Madison, James,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1789/1987) *The Federalist Papers*, ed. Isaac Kramnik, Penguin, London.

Mah, Harold (1987) *The End of Philosophy and the Origins of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Mandel, Ernest (1972/1975) *Late Capitalism*, trans. Joes de Bres of *Der Spätkapitalismus* (1972) Suhrkamp Verlag, Berlin New Left Books, London.

Mandel, Ernest (1978) *The Second Slump*, New Left Books, London.

Mandel, Ernest and Alan Freeman eds, (1984) *Ricardo, Marx, Sraffa: The Langston Memorial Volume*, Verso, London.

Marquand, David (1977) *Ramsay MacDonald*, Jonathan Cape, London.

Marshall, Alfred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London.

Marx, Karl (1844/1970)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ed. with an intro. by Joseph O'Mal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rx, Karl (1859/1904)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by Otto Meinster (Hamburg), trans. N. Stone, Charles Kerr, Chicago; Lawrence & Wishart edn trans.



S. W. Ryazanskaya, ed. Maurice Dobb, London 1971.

Marx, Karl (1867/1887) *Capital Volume 1: Capitalist Production*, German publication Otto Meistner (Hamburg), trans. from the third German edition by Samuel Moore and Edward Aveling in 1887, Swan Sonnenschein, Lowry & Co,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74.

Marx, Karl (1871/1951)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Workingman's Association (London), in English in *Se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Marx, Karl (1885/1919) *Capital Volume 2: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 ed. F. Engels, published in German by Otto Meisner (Hamburg), trans. N. Stone, Charles Kerr, Chicago.

Marx, Karl (1894/1909) *Capital Volume 3: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ed. F. Engels, published in German by Otto Meisner (Hamburg); trans. N. Stone, Charles Kerr, Chicago;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74.

Marx, Karl (1974)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ed. David Fernbach, Penguin, Harmondsworth.

Marx, Karl (1975) *Early Writings*; Pelican Marx Library,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and Gregor Benton, intro Luccio Colletti, Penguin, Harmondsworth.

Marx, Karl (no date) *Selected Works in Two Volumes: Prepared by the Marx Engels-Lenin Institute, Moscow*, ed. V. Adoratsky, Martin Lawrence, London.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5/1956) *The Holy Family, or Critique of Critical Criticism Against Bruno Bauer and Company*,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1845 (Literarische Anstalt, J. Rutter, Frankfurt); trans. Richard Dixon and Clemens Dutt,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6/1964) *The German Ideology: Critique of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Its Representatives, Feuerbach, Bauer and Stirner* vol. I and of *German Socialism According to Its Various Prophets* vol. 2,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32 and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translators not given)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8/188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irst trans. by Helen Macfarlane, serialized in *The Red Republication*, November 1850.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54/1983) *Letters on Capita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as *Briefe über Das Kapital*, trans. Andrew Drummond, New Park Publications, London.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55)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Mattick, Paul (1969) *Marx and Keynes: The Limits of Mixed Economy*, Merlin Press, London.

Mayer, Arno (1981)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Europe to the Great War*, Croom Helm, London.

Meade, James (1972) "The Theory of Labour Managed Firms and Profit Sharing", *Economic Journal*, 82.

Meade, James (1990)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James Meade Volume 4: The Cabinet Office Diary*, ed. Susan Howson, Unwin Hyman, London.

Millar, John (1806) *The Origin and Distinction of Ranks*, Edinburgh.

Mises, Ludwig von (1923/1936/1981)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as *Die Gemeinwirtschaft* (Gustav Fischer, Jena), second edition 1932, trans. J. Kahane (1936), Jonathan Cape, London, republished as a Liberty Classic by Liberty Fund Inc., Indianapolis, IN.

Morishima, Michio (1973) *Marx's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orris, David (1983) "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Industry to 1947", in Kumar (ed.) (1983).

Naoroji, Dadabhai (1901) *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 Swan Sonnenschein, London, Republished 1962.

Neyman, Jerzy (ed.) (1951)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Berkeley Symposium o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Nove, Alec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Allen & Unwin, London.

Ohmae, Kenichi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Collins, London.

Oldenburg, Philip (ed.) (1995) *India Briefing: Staying the Course*, M. E. Sharpe, New York/London.

O'Leary, Brendan (1989)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Blackwell, (Oxford).

Overy, Richard J. (1994)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Clarendon Press, Oxford.

Owen, Robert (1991) *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Other Writings*, ed. Gregory Claeys,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Panitch, Leo and Colin Leys (199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ow, Socialist Register 1998*, Merlin Press, London.

Patinkin, Donald (1949/1965) *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 An Integra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 Theories*, first edition 1949, second edition 1965, Harper & Row, New York.

Payne, Stanley G. (1995)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 UCL Press, London.

Petrovic, P. (1987) "The Deviation of Production Prices from Labour Values: Some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1.

Phillips, A. W. H. (1958)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Rate of Change of the Money Wage Rate and Unemployment", *Economica*, new series, February.

Pigou, A. C. (1920)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Macmillan, London.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Farrar & Reinhart, New York.

Popper, Karl (1945)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2 vol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Prawer, S. (1976)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Preobrazhensky, E. (1966) *The New Economic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Putnam, David and Neil Waston (1998) *Movies and Money*, Alfred Knopf, New York.

Rabinowitch, Alexander (1968), *Preclude to Revolution: The Petrograd Bolsheviks and the July 1917 Upris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Ricardo, David (1821/1951)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Volume 1 of Collected Works*, ed. Piero Sraffa with Maurice Dobb,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Robinson, Joan (1942) *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Macmillan, London.

Roemer, John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Roemer, John and Pranab Bardhan (1993)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Roemer, Paul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term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Rosenstein-Rodan, Paul (1943)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53.

Ross, Ian Simpson (1995) *The Life of Adam Smith*, Clarendon Press, Oxford.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Rothschild, Emma (2001)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Rowbotham, Sheila (1972)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Allen Lane, London.

Rowntree, B. Seebohm (1901)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Longmans Green, London.

Ruskin, John (1958) *Unto This Last and Other Writings*, ed. Clive Wilmer, Penguin, Harmondsworth.

Salvadori, Massimo (1979)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Verso, London.

Samuel, Raphael (1994) *Theatres of Memory*, 2 vols,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Samuelson, Paul (1949) *Market Mechanism and Maximization*, Rand Corporation, reprinted in Samuelson (1966)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Samuelson*, vol. 1, ed. Joseph Stiglitz, MIT Press, Cambridge, MA.

Samuelson, Paul (1971)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9 (2).

Samuelson, Paul (1999) "Sherlock Holmes and the Swarthy German: The Case of "transforming" *Mehrwert* to prices" in *Faase et al.* (eds) (1999).

Samuelson, Paul and Robert Solow (1960) "The Analytics of the Anti-Inflation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

Sargent, Thomas J. (1996) "Expectations and the Non-Neutrality of Luca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7.

Sassen, Saskia (1998)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 New Press, New York.

Sassoon, Donald (1996)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 B. Tauris, London.

Saunders, Frances Stonor (1999)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Granta, London.

Sawyer, Malcolm (1985) *The Economics of Michal Kalecki*, Macmillan, London.

Schama, Simon (1989)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Viking, London.

Schlesinger, Arthur (1957/1959/1981) *The Age of Roosevelt: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1919—1983* (vol. 1),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MA; *The Age of Roosevelt: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vol. 2);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vol. 3) (vols 2 & 3 Heinemann, London).

Schoenfield, Andrew (1965) *Modern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Schorske, Carl (1955)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Schumpeter, Joseph (1913/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al in German (1913), trans. 193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Schumpeter, Joseph (1919/1951)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 trans. Heinz Norden, Augustus Keller, New York.

Schumpeter, Joseph (1939) *Business Cycles*, 2 vols, McGraw-Hill, New York.

Schumpeter, Joseph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fifth edition, reprinted with an intro. by Richard Swedberg (1996), Routledge, London.

Schwarzschild, Leopold (1948) *The Red Prussian: The Life and Legends of Karl Marx*, Pickwick Books, London.

Seccaraccia, Chris M. (1995) *Marx, Hayek and Utop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York, Albany, NY.

Senghor, Léopold (1959) *African Socialism*, American Society for African Culture, New York.

Shaikh, Anwar (1984)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rx to Sraffa", in Mandel and Freeman (eds) (1984).

Shanin, Teodor (ed.) (1984)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Sivanandan, Ambalavaner (1990) *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 Writing on the Black Struggle for Socialism*, Verso, London.

Skidelsky, Robert (1967)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The Labour Government of 1929—1931*, Macmillan, London.

Skidelsky, Robert (1983/1992/2000) *John Maynard Keynes*, 3 vols: *Hopes Betrayed 1883—1920*; *The Economist as Saviour 1920—1937*; *Battling for Britain 1937—1946*, Macmillan, London.

Skidelsky, Robert (1995) *The World After Communism*, Macmillan, London.

Smith, Adam (1757/1976)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Smith, Adam (1776/19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2 vo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Smith, Adam (1978)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ed. R. L. Meek, D. D. Raphael and P. D. Ste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Solow, Robert M. (1970) *Growth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Soros, George (1998)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Open Society Endangered*, BBS/Public Affairs, New York.

Sraffa, Piero (1960)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Steedman, Ian (1977) *Marx After Sraffa*, New Left Books, London.

Stein, Herbert C. (1969)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Stigler, George (1982) *The Economist as a Preacher and Other Essays*, Blackwell, Oxford.

Stiglitz, Joseph (1994) *Whither Socialism*, MIT Press, Cambridge, MA.

Sweezy, Paul M. (1948)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Sweezy, Paul M. (ed.) (1949)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Augustus Kelley, New York.

Sweezy, Paul M. (ed.) (1978)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Verso, London.

Taylor, Charles (1975) *Heg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Thorne, Christopher (1979)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Toporowski, Jan (ed.) (2000) *Political Economy and New Capitalism: Essays in Honour of Sam Aaronovitch*, Routledge, London.

Townsend, Peter (1979) *Poverty in the UK*, Penguin, Harmondsworth.

Tucker, Robert (1972)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Vanek, Jaroslav (1977) *The Labour Managed Econom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Y.

Veneziani, Roberto (2000) *Exploitation and Time*, LSE, unpublished.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ule of the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0)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Warren, Bill (1980) *Imperialism, the Pioneer of Development*, New Left Books, London.

Webb, Sidney and Beatrice (1923) *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Harcourt Brace, New York.

Webb, Sidney and Beatrice (1935)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Longman, London.

Weintraub, E. Roy (1993)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Studies in Appraisal*,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Weintraub, Stanley (1973) *Bernard Shaw 1914—1918: Journey to Heartbreak*, Routledge, London.

Weiss, Linda (1998)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Polity Press, Cambridge.

Wells, John (1997) *The House of Lords: From Saxon Wargods to a Modern Senate*,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

Williamson, John (1999) "Economic Reform: Content, Progress, Prospect", *www.icrier.re.in*.

Winch, Donald (1978) *Adam Smith's Politics: An Essay in Historiographic Revi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Wittfogel, Karl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

World Bank (200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